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RUDY WIEBE

天伦

[加拿大] 鲁迪·威伯 著
赵伐 张陟 郑茗元 译

之爱

重庆出版社



Winner of the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得主

“威伯赋予一系列门诺教人物鲜活的生命，让他们走出尘封的历史中，来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

——加拿大著名消费者杂志《麦克莱恩》

“这部重要的小说值得关注，它运用虚构的手法把历史上众多门诺教徒的声音编撰在一起，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现代人所体验的（也是继承的）挥之不去的历史压迫感。”

——《渥太华公民报》

“一部精彩、感人的作品。……鲁迪·威伯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声誉将经久不衰。”

——《环球邮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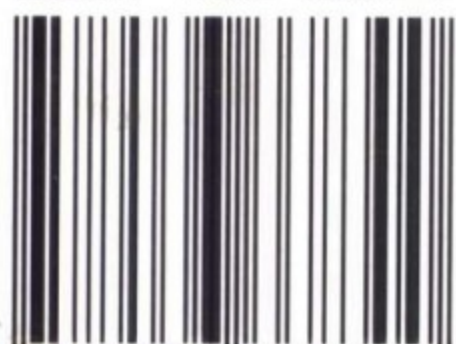
“威伯成功地将历史戏剧化了，让其悬念迭生、传奇浪漫、悲情满腔。”

——《卡尔加里先驱报》

“加拿大最富天才的作家之一……在对民族的历史和灵魂的描写中，他是无与伦比的。”

——《加拿大犹太新闻报》

ISBN 7-5366-6830-9



9 787536 668300 >

ISBN 7-5366-6830-9/1 · 1215

定价：22.00 元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RUDY WIEBE

天伦

[加拿大] 鲁迪·威伯 著
赵伐 张陟 郑茗元 译

之爱

重庆出版社



Rudy Wiebe
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本书据 Vintage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2002 年版译出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2004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2001 by Jackpine House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伦之爱/[加]威伯(Wiebe, R.)著;赵伐,张陟,郑茗元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赵伐,张敏生主编)
书名原文:Sweeter Than All the World

I. 天... II. ①威... ②赵... ③张... ④郑...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ISBN 7-5366-6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0811 号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天伦之爱

[加拿大] 鲁迪·威伯 著
赵伐 张陟 郑茗元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部电话:023-68809494

网址:www.cqph.com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17 千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66-6830-9/I·1215

定价:22.00 元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

史》，1994年版。）

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共3本：鲁迪·威伯的家史小说《天伦之爱》、大卫·理查兹的《车站街下的黑夜》和《孩子间的仁爱》。

主编 赵 伐 张敏生

2004年6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 1 章 讲瓦斯卡赫坎土话	(1)
第 2 章 航行去但泽	(8)
第 3 章 面饼与酵母.....	(26)
第 4 章 余火湖边.....	(37)
第 5 章 夹舌钳.....	(56)
第 6 章 曼哈顿.....	(69)
第 7 章 信即所见.....	(79)
第 8 章 左撇子女人	(100)
第 9 章 摆桌子	(122)
第 10 章 跨过伏尔加河.....	(127)
第 11 章 与弗朗茨·卡夫卡同眠.....	(144)
第 12 章 陪伴新妇的圣徒们.....	(165)
第 13 章 除了早已心知的上帝.....	(180)
第 14 章 犹太人和门诺教徒聚居计划.....	(202)

第 15 章	海里的贝壳·····	(221)
第 16 章	西伯利亚之行·····	(241)
第 17 章	旁观者的耳朵·····	(266)
第 18 章	我的哥哥万亚·····	(287)
第 19 章	桦树和丁香·····	(308)
第 20 章	罗曼诺夫第八村的群山 ·····	(345)
第 21 章	阿塔卡马沙漠之骨·····	(358)
第 22 章	家园·····	(372)
第 23 章	天使之梯·····	(389)
译后记 ·····		(401)
Acknowledgements·····		(405)

第 1 章

讲瓦斯卡赫坎土话^①

1942 年，北艾尔伯塔 瓦斯卡赫坎

夏天，杨树叶哗啦哗啦对他摇曳；冬天，笔直的云杉响声沙沙。那个小男孩，或者是在炎热里光着脚丫，或者是在银色的严寒里捆得像鼓鼓囊囊的包袱。他独自走进那片灌木丛，那儿所有东西都在对他说话：温暖的岩石、一掠而过的小动物、飞窜的鸟群、树干、横跨夜空的巨大火团、夏日休耕的土地、小溪，还有唧唧作响的积雪。万物都在说话，伴着他的呼吸，他感受到了：那语言清澈得犹如他记忆中的水，当时他背靠圆木垒起的墙躺着，尽管双目紧闭，只露出一只耳朵，但黑夜中他听到春天的蚊子爬到床单下来找他。

万物都在说话，而且说的是低地德语^②，跟他母亲一样。夏日的傍晚，当太阳仿佛在北方整夜燃烧时，她总是久久地呼唤他，声音尖利，渐渐又低沉，好像已经在哭泣：“呜——呜——呜——”

当他出现在母亲身边时，她总会用她硕大的手捧着他的头，猛烈地吻他，弄得他两眼轰鸣。

①即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克里族人的方言。

②德国北部的方言。





“干吗不答应，你呀？”她总是贴着他的头发念叨。“你干吗不回个声？林子这么黑，我听啦，听啦，你干吗连个声也不吭？”此时，他把脸拱进母亲大腿间那块湿漉漉的围裙褶里。不一会儿，她的念叨就会完，他就会摸到她的肌肤和那散发着唐棣果酱、菜肴和晚餐小圆面包气味的暖烘烘的围裙。那些吃的东西盼着他回来。

姐姐玛格丽特拿他的孤寂寡言开心：“在瓦斯卡赫坎学堂有27个小孩。你得说话，而且用英语说。学校里一句低地德语你都不能说，回答问题时你要是不用英语，老师就会让你去站墙角。”

“站——站——在大——大家——面前？”他突然战战兢兢地冒了一句。

“是呀，就站在所有人跟前，脸对着墙。因此，你最好开始说话，而且说英语。”

于是，姐姐试着教他许多东西的英语名称。但是，他不听。相反，当他独自一人时，他却在训练站墙角。他们家墙的圆木在动，在噼啪干裂，在不停地愉快地说话。圆木真棒，特别是冬天里它们紧紧地暖暖地挤在一块时。

外面更棒。他有时循着麝鹿在冰泥潭里冒出的芦苇间的积雪上用尾巴压出的依稀痕迹，有时在山边的地里等着野狼转过头看他，它举起一只爪子，正要去碰一团雪堆，嘴巴张开露出鲜红的舌头，和他一块儿在笑，突然，又竖起耳朵，一个猛扑！双爪扑向那雪堆，扑出个更深的泥坑。夏天，在小溪附近牧马场的柳树林中，他听见一头母熊在对它的幼崽说话。他看不到它们，但发现了它们在云杉背后的春雪里留下的踪迹，他父亲说要是它们靠猪圈再近点，那就有事情做啰。男孩知道，父亲不想有枪，可离他们最近的乌克兰邻居却开心地四处猎杀，管他听到的是什么。于是，男孩用双手捂住那个偌大的爪痕，用低地德语轻声

说：

“别来这儿，别再来。这儿危险。”

那所方方正正的校园坐落在山下的角落里，那条留作公路的道从那儿往南穿过那条小溪，绕过长满云杉的厚苔沼，通向他们的门诺派^①教堂，还有商店。在那座教堂里，每个礼拜天都有许多手在等着他。在男人们坐的长凳背后的角落里，有条楼梯通往楼座。在楼梯顶头，在斜屋顶底下，在楼下满教堂的人低吟着高地德语^②像淅淅雨声和窗前杨树叶的飒飒声中，那些手在捏他，让他发出声来。一双双粗糙的手伸着又厚又宽的拇指在他的脖子上忙碌，摁下去，齐摁下，直压得他那把小骨头透过张大的嘴呶呶地叫出：

“C—c—c——cat^③！”

“对了，对了，就像这样，再说一遍：‘cat’。”

于是，他又叫了，竭尽了全力，那些非凡的手紧紧地拽住他，好像世上万物自有它们合适的地方，于是，从前只要有人在听他就没法发出的那些美妙的声音终于从他嘴里发出来了，发得轻松，来得深沉，仿佛在拉开一扇门：

“Cat。”

“好嘞，太好了，来，说‘当心你的罪会找上你’。说：‘当心……’”

他已经知道“找”和“你”这两个词了，但“罪”是个啥？没人能在树丛里找到他，他不需要学说那个词，那些英语单词，管它是啥，绝不会挂在他嘴唇边嘶嘶作响。他吞下一口气，深沉而稳实：

① 16 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朴素、节俭。

② 德国中、南部方言，后成为德、奥、瑞士等地的标准语。

③ 英语：猫。小亚当说话有困难，不能正常发音，因此每到礼拜天去教堂，就有人按照门诺教徒的土办法摁他的喉咙，说是可以让他发音、说话。





“Ca—a—at。”他坚定地念道。

商店背后的邮局有扇折叠的小木门,礼拜四、五开门。他们从那儿收到伊顿商店冬季或夏季的购物目录,还有从南艾尔伯塔寄来的贴着邮票的信件,大姐海伦同丈夫就住在那儿,还有雷蒙,每年夏天他都要来,与他一道在屋子后面的树丛里玩耍。邮件是火车送来的,但他从未见过火车,只听见它在西边微弱地尖叫,像只傍晚的动物在光线沿着小溪升腾变成薄雾的时候迷了路。那声音奇怪、遥远,消失之后,他觉得自己也许根本没听到别的什么声音,只是渴望看到他大哥艾布拉姆讲给他听的从火车里冒出的那云一样的白色蒸汽,当时,艾布拉姆为它在地上铺钢轨,后来圣诞节它又把他从圣经学校载回来,那时冒出的蒸汽更白,在教堂,艾布拉姆大声朗读了东方三博士的故事^①,然后祷告。他哥哥说,那火车经过博伊尔镇,也就是排在一条宽阔山谷边的三排房子。大约一百人住在那儿,火车碾着弦一般笔直的钢轨沿着镇前面的那个大湖行驶。秋天,当路上的烂泥洞已经结冻但积雪不深的时候,他父亲赶着装有粮食或猪的货车去那镇上。回来时,他说他又看到好几英里平原的那边,人们在那片肥沃的谷地开垦出农场,有平顶的红色谷仓和白房子,全是瑞典人和乌克兰人,因为他们最先在那儿安家,在那片肥厚的地上,不像他们家,在石头和粘土上,没有溪流,没有泥塘,没有沼泽。

但自从男孩记事以前,那学校就一直在那岔路边了,如今,当他们赶车从山上下来时,他努力不去看它,不过他知道,学校那五扇大窗的每小格窗玻璃却在瞪他,直到他们走远。那是礼拜五,飞机第一次来,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一他就得像玛格丽特那样,每天去那儿了。

^①《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1 - 23 中记载的由东方前去朝见初生耶稣的三哲人。

他抱着从伊顿商店寄来的包裹，心想里面肯定是老早就订购的他第一天上学穿的法兰绒衬衫，红格子，黑钮扣，可他母亲“别把纸撕开！”的告诫从来都不会让他在到家之前打开任何东西的。他们的马很慢，一群可爱但没用的农场老马，他哥哥约翰管它们叫“Schrugge”^①，它们拖着马车像以往那样不摇不晃地爬上学校前面的那座山，这时，天上突然发生了什么，快得他几乎没来得及扭头看。远处的什么地方，一直在隆隆响，像雷声，但是天空却阳光灿烂。他父亲刚才正在说再过一礼拜他们就可以割燕麦了，遍地的麦子快熟透了，母亲坐在他旁边，身材宽厚，腰板笔直，编成辫子的头发挽成圆髻压在帽子下面，这时，几架飞机冷不丁出现在头顶，像一道电闪，他扭头去看，一架接一架像四个黄黑色的拳头低垂着向他们砸来，比他有生以来听到的任何声音都响，轰鸣着朝北飞去，掠过学校，掠过白杨和泥塘之间的那一小块麦地，掠过牧场和所有的树林，朝世界的边缘飞去。

他父亲没有抬头、转身，缰绳在手上挽了两圈，身子绷紧，拖住受惊的马匹，他的声音既悲又愤，像回音。

“光是俄国就受够了，天上又飞来这些。”^②

可那男孩正看着他母亲。也许第二天一早，当那些黄色的飞机雷鸣般掠过课间休息的学校时，他自己的脸看上去也像那样，那飞机很低，他看得见裹着油光光皮革的头上那对恐怖的玻璃眼睛正朝下盯着他，他尖叫，奔逃，钻到课桌的里面，玛格丽特曾告诉过他，必须坐在那课桌旁边。当他睁开眼，跟前是老师的那张脸，她那和蔼的脸凑得那么近，几乎是倒着脸在铁制桌腿之间朝他微笑，他蜷缩在桌子下面，新买的红格子衬衫拖在地上。老师温柔的声音在说：

①低地德语：跑得慢、只能犁地的马。

②门诺派教徒在前苏联曾受迫害，经常被秘密警察扔进黑色大囚车抓走。如今，虽然逃到了加拿大，头顶上训练的战机仍让他们不得安宁。





“来，”她说，“来。”

她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头发，像风一样轻柔，过了一阵，他扭动身子钻出课桌，慌忙从地上爬起来。他以为她在说低地德语，因为他还不知道“来”这个听起来同音的英语词是什么意思。

她领着他走过那堵被称作“黑板”的神奇墙，那天上午，她用从天蓝色的长袖里伸出的手指夹住白色粉笔划出几个代表他们学校名称的大字母：

瓦—斯—卡—赫—坎 = 家

她领着他穿过几排课桌，来到窗户对面靠墙的一排狭长的壁柜，她举起纤细的双手一拖，立刻，两扇柜门开了。全是书。他从来想像不到有这么多书。也许有 100 万册。

当然，她在对他说英语，多少年之后，当他一次次回忆起那一刻时，他始终无法对自己解释当时他何以听懂了她的话。她手上摊开的书籍向他展示出数不清的单词。她说，现在他只看到这些单词的形状，等他学读的时候，他就会听了，因为她告诉他，英语中的“读(read)”跟“说(speak)”是一样的，跟低地德语里的“rād(说)”^①相同，而且，等他能读了，世上所有人就会对他说话了。等他翻开一本书，他就会听到他们曾经说过而且继续在说的话，他会听懂的。

他盯着一些矮架子上的几本他后来才知道的旧书，然后回过头，瞧着老师手上那本书里那些看得见却看不懂的单词。她伸出右手，去摸他藏在黑色双排扣新衬衫袖口里的手，也许，就在此时，就在她手指收紧，他抓紧她的时候，他慢慢开始懂得，将来有一天，他要去读这世上许多巨大图书馆内若干若干楼层上成架成架的书；她将帮他发现他自己内心的感知，这感知使他听到人类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声音，诉说甜蜜与恐怖的声音，

^① speak 和 rād 在日尔曼语系中属同根词，表示“说”。

以及他们能想到的其他一切。他会聆听。

“亚——当——”

他母亲在北方漫长的傍晚里呼唤。

“你在——哪儿？”





第2章

航行去但泽^①

1953年，南艾尔伯塔 科尔代尔

他的名字叫亚当·彼得·威伯。开始上学时他就喜欢人叫他“亚当”。没有其他人叫这名字，大家都昵称他“亚迪”，就像他那个一开始就无所不知的姐姐玛格丽特那样叫他。后来，有个夏天，一位四处游走的传教士赶着他那辆瘦马拉的马车穿过树林来到瓦斯卡赫坎的门诺教堂，身子伸出讲坛老远，宣讲“亚当”就是“泥巴做的”，说上帝就是这样造出了地球上的第一个人。泥巴做的。而且这事发生在耶稣诞生之前4004年，他是上帝惟一的儿子，诞生在伯利恒的犹大家族^②。

那个大个子传教士讲述《圣经》中第一个故事时的模样让亚当终身不忘，犹如一段关于金蓝色闪电的记忆。他根本不想读《贺博圣经故事》^③中写的那个故事（那本书是当母亲意识到他读书再也不肯停下来之后从邮购书目上为他买的），也不想让路德^④沉闷的《创世纪》糟蹋了那故事。亚当，泥巴做的，上帝用他

①波兰北部港市格但斯克的旧称。

②基督教《圣经》所载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最强的一支。

③为儿童编写的《圣经》读物。

④马丁·路德（1483～1546）：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曾将《圣经》译成德文。

那双伟大、万能的手捧住亚当的嘴，往里吹了口暖气，湿润的泥巴就变成了肌肉。亚当的第一份任务是为上帝已经造出的每一种动物取名，这事不难，然后，作为奖赏，上帝捏出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女人——那个传教士是这样用高地德语描述的：上帝摸到亚当左边中间的那根肋骨，抽出来“捏”成了夏娃——接着他走下讲坛，高高举起他的两只大手，在空中比划出夏娃的头，然后滑下她的双肩，再掠过她高耸的双乳——亚当一辈子都记得他的手在那乳房上的起伏，那样缓慢，说不出的轻柔——再越过她的髋部，沿着她修长的腿一直到她的脚趾。接着，啊，接下来，那时光，亚当和夏娃一道生活在世上最美的花园里，吃着新鲜水果，摆弄着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里的金子、芬芳的树脂、珍珠和玛瑙，还在河里沐浴。这是创世纪中最完美的第七天，永远的憩息，永远是夏天。

传教士在割草和收获的季节来到瓦斯卡赫坎。如果雨下得不大，布道每晚都进行，礼拜日则三次。这个福音传播者用低地德语被称作“Groota Donnadach Peetash”，意思是“礼拜四打雷的大个子彼得”，他预告了下一个布道的题目是“罪恶：世上最重的词”。当然，他布道时讲的是高地德语，所以当他说“Sünde(罪恶)”时，那单词的确深重无比，那棵苹果树、夏娃、那条黏糊糊的蛇，还有吃苹果的亚当，这些的确罪恶深重，所有降生的男女、所有的生灵，甚至包括树木、小动物，就连蚊虫，都要为之而痛苦地呻吟、受难，忍受人类的腐败堕落所带来的束缚和痛苦，世世代代，亘古不息。

立刻，小亚当讨厌起故事的第二部分；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像第一个亚当那么傻，去吃那蛇果。他会相信上帝：既然上帝有能力创造，他也有能力收回，如果夏娃不懂，亚当应当明白。于是，就在他和其他小男孩一同坐在前排的那条窄窄的长凳上，就在大个子礼拜四高耸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就在那个时刻，小亚当突





然觉得“Sünde”这个词确实最糟，从今往后他将只用英语，因为英语中没这个词，这样，他就可以同美丽的夏娃和全能的上帝永远生活在美丽的伊甸园里，园子的东面没有巨大的天使挥舞着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①。

罪恶的亚当！大个子礼拜四一边吹喇叭似地对着老大一张蓝条手帕擤鼻涕，一边雷鸣般地发出上帝永恒的诅咒和无尽的宽恕。但很快，亚当的思维又回到了低地德语中，他只不过在学校里学了一年的英语，就已经不知道到底是用哪种语言在思考^②，也不知道是用哪种语言在做梦，他坐在教堂的长凳上，抬起头，看见落日余晖把大个子礼拜四慷慨陈词时的细细唾沫在他嘴巴周围变成阵阵闪烁可见的彩虹，此时，他深信，低地德语中的“Sind(罪恶)”非常接近英语中的“Sin(罪恶)”，因此，想借英语一逃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的名字。

亚当、彼得：“土”、“石”^③。亚当意识到他名字中的这两个字意思基本一样，只是一个更比一个硬。当然，低地德语里的“Sind”和高地德语里的“Sünde”还有英语里的“sin”也是同一个意思，罪恶无处不在，在任何语言里都有，他母亲始终不一地这样提醒他。

又过了四个夏天，阿伦·沃斯超载的卡车载着他们离开了灌木丛中的家园，向南走了两天的石子路，来到艾尔伯塔省的科尔代尔，一个有灌溉渠的草原小镇。在那儿，他的名字，包括他的姓——威伯，一点都不稀罕了。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包括摩门教徒、门诺教徒、捷克人、中国人等 20 来个不同种族、宗教的后代吵吵闹闹、打打小架，玩些难堪的游戏，有时候也有友谊，但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3:24：“(亚当偷吃禁果后，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二级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②低地德语和英语同属日尔曼语系，许多单词很接近，比如：罪恶“sind”和“sin”。因此，亚当很容易把两种语言混在一起进行思考。

③ Peter(彼得)，源自希腊词 Petros，意“小块岩石”。

当亚当进入科尔代尔公立高中，同学间盟友的朝结夕改更令他晕头转向。有一个牢记教理、自以为是的圣公会教徒朝他咒骂：“你只是堆垃圾，肮脏的罪恶，狗屎亚当！”

所有其他带英国姓氏的家伙尖叫着起哄，亚当回骂道：“你跟我一样脏，狗屎！”但这没用，没人在笑。

在迁徙而来的农民和四处流动的甜菜工人居住的平坦的艾尔伯塔，英国人尽管不多，但他们自认为是学校的主宰，不经他们许可，没有哪个门诺教徒能进入正式的篮球队。球队教练是受世界大战所迫从温哥华流亡来的日裔加拿大人，他的看法不同：亚当又高又壮，不该被排挤在球队以外。但只要顺口，随便谁都把“狗屎亚当”挂在嘴上，直到12年级，直到他去了科尔代尔镇北面的那所门诺教徒办的规模很小的高中——因为他母亲求他去那儿读两年书——他才有了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这个名字。他是多么喜欢这个名字，却又是多么恨它。这名字怎么这么容易就变成了一句诅咒？

这时，他意识到这名字与他家族其他人的名字怎么也不配。亚当的父亲叫亚伯拉罕·雅各布·威伯，在俄国门诺派的命名传统中，这名字意味着他自己的父亲叫雅各布，因此，他的大哥，那位在东俄奥伦堡罗曼诺夫第八村^①出生的长兄，就被叫做艾布拉姆·亚伯拉罕，他的二哥叫约翰·亚伯拉罕，约翰这个名字取自他们母亲的父亲，他叫大卫·约翰·洛温。那他亚当·彼得的名字又是从哪儿来的？

他母亲抬起头看着他，没有停下手中的编织。虽然以前他从没这样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们家过去的事，但对亚当的提问，她一点都没表露出吃惊。孩提时代，当他们在瓦斯卡赫坎的邻居来串门的时候，亚当听够了那没完没了的他们家在俄国时的事

^①门诺教徒在俄国居住的村落。他们用沙皇罗曼诺夫的名字给自己的村庄命名。





情，在科尔代尔，谈论自己、谈论自己历史的门诺教徒也大有人在，总是成百上千，分成三个不同的教派，一块开心，或一块争论。

她毫无犹豫地回答说：“实际上，你不叫亚当·彼得。在埃德蒙顿的政府档案里，要不在别的放档案的地方，你的名字是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对，档案里是这样写的，而且你的第二个名字是亚伯拉罕，按照习惯。你本来叫海因里希·亚伯拉罕·威伯。”

“我不叫亚当？”他17岁了，母亲这才告诉他的真姓真名？

“当然，你是亚当。”她平静地说，“那只是政府档案里登记的。你生下来时，我们住在很远的灌木林，你爸走了7个礼拜才到博伊尔，把你的名字登记成‘海因里希·亚伯拉罕’。”

餐桌对面，亚当的父亲继续在细读着他的《门诺评论报》；那副在莱斯布里奇的伊顿商店买来的眼镜架在他那长长的、近似贵族的鼻梁尽头。每个礼拜日下午他都这样坐着，这是一周中惟一一天他不用去农场喂牲口，身为雇工，他将在这家农场一直干到70岁，还剩下8年，而且永远也无法实现他曾拥有的那个加拿大之梦：一份整天都能坐在房子里、冬天暖和的工作。此时，他不肯吭声，尽管大家都知道，亚当母亲的讥讽终会把他激将起来。

“他还把你的生日弄错了。”她突然笑了起来，“他记得那是个礼拜五，却弄错了整整一个礼拜，后来他要申请入籍，我们拿到注册证时，丽娜·沃斯对我说：‘我们家的威廉跟你们亚当是同一天生的，接生婆先到你们家再来我们家的，你们的日子怎么是错的？’这时，我也才注意到。”

“那是8个礼拜以后，不是7个礼拜。”亚当父亲终于咕哝起来，好像纠正了她的小错误就能抵消他的大过失。

“8个礼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

父亲好像特别专注于新闻栏目。他只认识很少的英文单词，而且只有从每周一期的《门诺评论报》中才获知他所知道的有关世界动荡的些许消息。

“后来是阿伦·沃斯写的名字。”他母亲说，“‘亚当·彼得’，因此我们就把你的生日和名字给改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喂，孩子爸，你啥时入的加拿大籍？”

“1943年。你是不是还要我的注册号？”

亚当的母亲正在织毛衣，很自然地忽略了他的抱怨。一根下垂的红毛线一头连着她忙碌的手，一头连着套在两张椅背上的那圈毛线。亚当知道，当他父亲终于在加拿大公民证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立刻记下了44988这个号码，以防再次被迫流浪他国。13年前，也就是1930年2月24日那一天，他们家从汉堡到达新不伦瑞克省的圣约翰港口，最终在3月14日乘火车到了艾尔伯塔的瓦斯卡赫坎，当时他就发誓自己再也不离开加拿大了，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

“可你们一直叫我……”

“是的，我们一直这样叫你。”

“你们为啥用那个名字，叫我亚当？”

“哦，”他母亲停下手中习惯的编织动作，抬起头。她似乎在幻想。很多年以后，当亚当凝视自己女儿崔茜成年后的那张脸时，他将发现同样的神情：仿佛包容了悠远的过去和将来，像早已存在的希望，又像更多即将来临的痛苦现实。

“你是我们在加拿大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他母亲说，“我想，这么多事情之后，唉，这么多过去的事情之后，我们有了新的……我们家的邻居小温斯，他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可凯特雅·温斯告诉我说她是在海上的时候怀上他的，他是个小亚





当,真漂亮,经常唱歌,才四岁,很乖,在教堂的儿童房里笑呀,和其他婴儿一起玩,逗他们笑。后来他掉进他们家谷仓后面的泥塘,太让人伤心了。他慢慢地沉到满是苔藓和水的沼泽里面,就在那儿消失了,大家看不见他了,只有那条狗在跳,在叫。这事就发生在你出生之前——多好听的名字,他是个小亚当,多好一个孩子。”

“多美,多好哟!”亚当酸溜溜地说,“所以,你们尽了力了,至少留下了那名字。”

“亚当。”他母亲一边轻柔地说,一边伸手去摸他。就在这一刻,她的声音和手指好像要摸到他眼底的眼泪。

父亲用他沙哑的声音说:“你是在哪儿找到他的?你说的在波兰但泽的那个老亚当·威伯?”

“你以为在哪儿?在书上。”

“书,书,你的那些书会毁了你!”

亚当心想:老头子,那就让它们来毁我吧——你又是被什么毁了的?他一生中只听见父亲的悲叹和借口:出生于1889年的俄国,一个被拉进沙皇护林队^①而没被拉去服兵役的门诺教徒,他干了还不到4年,1914年跑回自己的村庄同卡特丽娜·洛温结婚,就在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又被拉回护林队,又干了4年,或者说是3年,因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把一切全结束了,所有那些布尔什维克忙着相互残杀,还不停地追捕他,一个人除了听人摆布还能有啥作为。可最后,当他40岁的时候,他的确自己做了件事:他抛弃了原有的那一点点家当——他们甚至比那些生活在罗曼诺夫第八村的草原老鼠还要穷——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坐火车到了莫斯科,然后试图离开那儿。永远离开那儿。他做了一件事,确实令人吃惊:头上有个门诺教徒的家长,还有

^①在俄国,门诺教徒坚决反战,他们愿意作为志愿者在沙皇护林队服役,或担任军医,但决不参加正规军,决不拿任何武器。

四个长兄，又在沙皇护林队干了7年，接着又经历了革命者闹腾的10年，他学会了听人摆布。

他父亲棕色的手拿着报纸，好像不知道怎么拿似的，指节被滑落的旧工具伤得疤痕累累。亚当突然觉得自己的那些想法太偏狭了。

“那个教书先生，弗兰克·巴根，给了我这本书，是1616年的。他看到书里面有个人，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瞧，在这儿，是德文写的。”

“你现在能看德文了？”他仿佛忘了在科尔代尔每个礼拜六他让亚当步行去教堂办的德语学校上学的那码事。

他母亲带着息事的口吻问：“这个但泽的亚当是干啥的？”

亚当/彼得——这些名字的分量绝对很重，能让任何人陷入最深的沼泽——亚当/彼得/亚伯拉罕，意思是泥土/岩石/尊贵的万众之父，既指泥土，又有至高无上的意思，敬爱的上帝呀，即使用低地德语，这些名字的意思也太多了^①，再加上“Wiebe”（威伯）这个姓，他是在1951年的那本《门诺教年鉴》里看到那个姓的，是弗里斯兰人用的“威伯”的变体。管它什么意思，或许指泥土。那本书里没说，但的确说了他的祖先并非像他以及大多数门诺教徒以为的最先是德国人。他们是弗里斯兰人，在但泽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当中生活了200年，在自己教堂里讲荷兰语，在其他地方讲他们自己的弗里斯兰话，他们固执倔强、难以平息，如同他们学着与之共生共存的北海沿岸的低地河流一样。这篇出自霍斯·彭纳之手、题为《威伯》的章节密密麻麻、不厌其详，亚当只能靠逐字逐句翻译才能艰难地读懂，他从此章得知，最早的那个亚当·威伯称自己叫“亚当之子威伯”，他

^①对于小亚当来说，“亚当”、“彼得”、“亚伯拉罕”这些《圣经》中的名字，意思太多了，加上“威伯”（意“泥土”），他无法完全理解。





于1616年从哈灵根乘船到了但泽，因为这座强大的汉萨同盟^①城市需要一位水利工程师来这个三角洲排水，而当时，弗里斯兰人比世上任何人更懂如何治水。1644年但泽的一幅雕刻展示了《年鉴》中这章的描写：漫长、低矮的地平线，左上角是但泽的市徽，右上角是亚当·威伯本人的半身像。

“瞧！”亚当指着插图给他母亲看，同时读着插图周围涡卷形页边上的文字给他父亲听，因为他不肯抬头看。“‘来自哈灵根的亚当·威伯’，就在但泽城的顶上，瞧，一幅特写，而且他还签了自己的名，用的是花体：‘亚当·威伯’。”

“嘿，瞧，”他母亲叫道，用空出来的一根棒针指着插图说，“瞧，这不是你爸的鼻子吗？”

奇怪，她说得一点没错，只是额头更高，眉毛更浓，窄长的脸庞围了一圈整齐的毛发，一直到了后颈，满满一腮有形有状的胡须，这位不可阻挡的天才为但泽服务了34年，人还没死就有好些街道、广场以及城墙上的一座棱堡以他的名字命名。

“那我的鼻子怎么不长呢？”亚当问母亲。

父亲鼻子哼哼说：“被你妈的洛温家族给弄没了，换成了翘鼻子。”

“这书里有洛温家族的照片吗？”

30年后，亚当将回忆起在艾尔伯塔科尔代尔8月里的这个炎热的礼拜天，母亲一边为孩子们编织红色的连指手套以便冬天防寒，一边问他这个问题。30年后的1983年，他将带着渴望和伤感回忆这段往事，心想要是她依然活着，他会告诉她这一切：洛温家族是佛兰芒人^②当中的门诺教徒，来自海港城市安特卫普^③，大多是珠宝商人。也许他们的商店就夹在鳞次栉比的狭

①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以德意志诸城市为主。

②佛兰芒人：比利时两个民族之一。

③比利时北部港市。

窄房屋的缝隙里，而这片房屋又挤在大广场与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之间，哥特式伯拉本廷大教堂耸立在斯海尔德河的锚地之上，其塔尖在所有低地国家^①中是最高的，当时，许多木船就是从这片锚地起航，驶向所有已知的以及尚待探索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船只来来往往，对她的祖先来说，迁徙到但泽，逃避西班牙罗马天主教徒以及随后而来的加尔文教徒的集体迫害，也许并不困难；事实上，他们也许比亚当·威伯早到几十年。30年后的1983年，他还能向母亲讲述那座美丽的现代城镇哈灵根，在迷宫般的堤坝和河道的包围中依旧紧凑井然，一圈圈的土地和水域交替着伸向灰色的大海；或者向她讲述他和女儿崔茜见到的那位披着金色长发、名叫德恩·荷特·威伯的姑娘，她父亲是北海阿默兰岛上的筑堤工程师，他邀请他们父女俩去看弗里斯兰人是怎样依旧围海造地；或者给她讲埃特斯特恩，如今，这城堡是座单纯的海洋博物馆，然而在16世纪60年代，宗教法庭却在这儿的地窖里囚禁那些“誓不反抗的基督徒”，判处他们信奉异教罪，然后拖出去烧死。

亚当要给母亲讲他后来知道的所有事实，讲他将要走访的先祖去过的一切地方，讲他将与之交谈的遍及全球的所有族人，但到了那个时候他只是想：与其展示这些年来他发掘的断断续续、无休无止的历史细节，我倒是更应当叫她唱歌。

她那美丽的的女高音，她唱的任何歌，在他记忆的皱褶里永远娓娓动听。那时，树叶发出来了，绿得像瓦斯卡赫坎泥塘里的青蛙和五月的杨树，她开始在屋外“夏天伙房”里做饭，好让他们低矮的原木房子昏暗、凉爽，便于睡觉。那歌也许来自他们的袖珍《美诗集》，没有曲谱，但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在门诺教教堂唱诗的人理所当然至少知道三四百首歌曲，如像英语表达的那么深

^①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





刻：真正是“铭记在心”。而他父亲总是在场院那边耳朵听得见的什么地方用男高音附和着她，他们的歌声荡漾，犹如手挽手的情人在明媚的空气中高高飞舞。由于某种比他的鼻子更走样的遗传变异，佛兰芒的洛温家族和弗里斯兰的威伯家族的音乐天赋到亚当身上却变成了左腔左调的毛病。虽然他能辨出任何旋律，但却不能重复或模仿，无论远近。甚至连由 26 个彼得·威伯组成的声势磅礴的圣乐团也没法帮他学会一首连贯的和谐的曲调。威伯家族的这两打儿孙后代们是他于 1983 年在西德找到的，他们在一间窄小的寓所里成天地学着和声，头脑里没完没了地灌着相同的歌词和流动的调子，他们个个身子前倾，犹如一个人。

“彼得·威伯？”要是亚当的父亲听到这名字，他肯定会抬起头睁大双眼。“那是我兄弟，有钱的那个，29 年在莫斯科跟我们一块的。”

“别提那事了。”他母亲赶快说道，她总是这样。

可一旦提起门诺教徒往莫斯科的那场大逃亡，亚当的父亲就没法打住，他只能滔滔不绝：

“29 年的 10 月，当我们赶着小车离开的时候，我的长兄雅各布，就是继承那幢石头房子和整个农场的那位，他和大儿子们还有帮工还在前院打麦，特娜，你还记不记得我说的话，我告诉他说：‘走，去莫斯科，机不可失啊！’可他却高高举起叉子说：‘好的，好的！我得把大麦打完。’唉，他还在以为钱能帮他逃出俄国。”

亚当的母亲伤心地点点头：“他妻子连面饼都没来得及烤。”

“当然没有！”父亲很得意，“集体社的那个科尔亚·威伯，年龄不大，还没结婚，可革命者却让他当了集体农庄的头儿，他把雅各布所有的粮食全没收了，可我的兄弟彼得……”

“住口，”母亲乞求道，“别提那件事了。”

“可那个彼得……”他的记忆沉重地朝她辗了过来，“我的二哥，他继承了我家的第二座农场，他把钱袋捆好，把路上吃的火腿熏好，套好三队马匹，提前买好从普拉托夫卡出发的车票，他们全家……”

“忘掉这些事吧！”亚当的母亲大声地打断说，头低了下来，系着松垂毛线的棒针不再移动。

“忘掉！”父亲劳作的双手一把捏皱了《门诺评论报》。“你能忘掉？要是你自己同死去的沙皇一样有钱的兄弟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一路对你讲：‘你带着有病的特娜和四个孩子，手里连三个戈比都没有，还想跑到德国去？’你怎么能忘得掉？”

“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上帝不需要钱。”

“感谢上帝，那些革命者也不需要钱。”父亲笑了，风趣中带着嘲讽。“30年代，有钱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出路。”

母亲的棒针又飞舞了起来，仿佛她手中红色的毛线能把一个破碎的世界重新补缀好。她低声说：“还是忘了那事吧，那……”

但如若当时是亚当在给他们讲这事，他会打断母亲：“爸，那不是你兄弟彼得，那是他儿子。你兄弟彼得也在莫斯科跟你在一起，至于他儿子，他在俄国挺了50多年，刚刚才逃出来。”

“彼得·威伯如今在德国？他是花钱买路逃出来的？”

“那不是你兄弟，爸，是他的长子。”

要是母亲听到这些，她就会说：“我记得他长子29年时的样子，我们总是叫他‘小彼得’，那个时候他15岁，矮矮的，瘦瘦的，眼睛很亮。地地道道的威伯家族的脸型。”

亚当第一次遇见他时，“小彼得”·威伯依然是那副模样。1983年，在西德的第一次庆祝他们最终逃离苏联的聚会上，亚当将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从几千门诺教徒中朝他走来，他高举





着双手大声叫道：“威伯家的脸型，威伯家的脸型！”

那一刻，他看上去像是亚当父亲的化身，个头稍微矮一点，稀疏的头发永远不会全部变白，那贵族气派的鼻子，宽阔的下巴，他蹒跚着走过来，人群分开，大家转过头，为他们的幸福、为他们的相互拥抱亲吻大声欢笑。亚当高过他，得弯腰去拥抱他，他的双臂抱住那副瘦削的身子，霍然，一阵深沉的寂静从他指间弥漫开来。他仿佛抱着的是自己的父亲亚伯拉罕，离开7年之后又复活了，尽管他父亲一辈子也没像这样拥抱过他。

“我才不想家里再有个彼得。”父亲坐在他们在科尔代尔家厨房里的那张桌子对面说，声音像呻吟。“有个亚当我不在乎，可彼得，再来个彼得……”

亚当的母亲一边编织，一边哼着歌。她哼歌倒不是为了回避他父亲，要是那样，他俩哪会一起生活61年？她的声音悠扬、甜美，音色敞亮，面对悲伤或痛苦从不迟疑，也从不因愤怒、无情甚至仇恨而中断。这歌声慢慢地、慢慢地把光明引进周日下午令人窒息的气氛里。

“我的家心中永驻，
何时我将返回故土？
我渴望去那美丽的天上，
与所有上帝的孩子，
和睦友爱，济济一堂。”

她边唱边织，亚当一缕一缕解下垂在两扇椅背之间的毛线，挽成线团。伴着棒针缓慢、不停、有节奏的拖扯，母亲将把她喜爱的《还乡之歌》的每一首都唱个遍。她会唱许多门诺教徒的“还乡之歌”——与他们在这世上的家乡毫无相干。这世上，你永远是个陌生人，在这里，你只能唱着悠长、缓慢的歌去忍受，在你

的渴望中，那歌声萦绕，飞向你惟一真正的、总是在那“彼岸”、在那“遥远星海之外”的家乡，那里因为有上帝而幸福、美满，那里亲爱的人儿已经等候着迎接你。

饭桌对面，父亲不肯跟着她一起唱，但亚当能够看出，那甜美、忧伤的旋律在牵扯着他，母亲在“和睦”两字上的女高音拖腔在他周围缠绕，那是一种抵挡不住的幸福的伤感。亚当在他面前摊开的《年鉴》，他连瞥也没瞥一眼，也没看他祖先亚当·威伯那张严厉、忧思的脸庞，1616年，这位祖先从哈灵根往东到了但泽，许多年后，他设计了那座城市的第一条木制水管，在广场上安上新的喷泉，在维斯图拉河、莫特拉瓦河和拉杜尼亚河沿岸筑坝修路架桥，排干沼泽地，给春季的暴雨泄洪，他还挖掘排水主渠，设计风力和马力驱动的抽水站，把暴涨的雨水抽过堤坝，泻入波罗的海。亚当·威伯造出旱地，因此，整个拥有深厚河泥的维斯图拉三角洲能够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弗里斯兰和佛兰芒门诺教徒的农庄。

“这是啥？”母亲用棒针指着问，“这些绳子，上面悬着的东西？”

她在看那张铜版雕刻的但泽的灰色图片，但泽的市徽在左上角，亚当满是胡须的脸庞在右上角。图片的中央印着“但泽城”的字样，但在这之上悬着一幅宽大的拉丁文卷轴，透过她阅读用的放大镜，这幅微缩的卷轴上有些文字还依稀可见。亚当能辨认出“新发明”，“人造机械”更清楚，然后是成排的分散的黑点，接着是“Exacta delin - ”的字样，突然又出现“神圣的”和“亚当·威伯，来自——”，其余单词因为镂刻、黑点和反复拷贝而消失了。无论这些单词曾经意欲表达什么，在左下角市徽的下方，还保留着一座高山的线条画，标着“毕晓普斯山，毕晓普斯堡”的字样。画面的中央是一片沿河和沼泽的低地，远处矗立着城市教堂的尖顶，但是在右下角亚当照片的下面，有一座几乎同





那座山一般高的建筑,清晰地标着“威伯堡”的字样。17世纪40年代,在但泽市议会的迫切要求下,亚当重建了城墙和那座特别的堡垒,以便在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国王、公爵、皇帝以及那些在欧洲随处可雇的投机将军之间所进行的“三十年战争”^①期间保护这座城市。由于这片多水的三角洲没有石头,亚当用毕晓普斯山的岩石和泥土在这片河道纵横、洪水泛滥的平原上重建了但泽市的整圈城墙,重新设计和建造了20座军事堡垒。图片中央的那些“缆绳,上面悬着的东西”是亚当用撑杆串起的双缆绳“新发明”,通过系在缆绳上来回循环的桶,毕晓普斯山上的泥土和岩石可以越过河道和沼泽,被运到城墙上。这些桶设计得非常巧妙,距离和重量计算得非常精确,仅仅靠它们的自重就能自行移动,满载的桶从山顶滑下来,掠过山谷,把泥土岩石运到堡垒的顶上,同时又把腾空的桶送回山顶。因此,尽管强大的瑞典军队在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②的统率下,驾着由6至8匹战马牵引的巨型轮式炮车,还有骑兵、长矛兵和装备了最轻、最快火枪的步伐一致的步兵,为了报酬、最终也为了他们所声称的虔心信奉的骄傲的新教教会而摧毁了大半个欧洲;尽管无数的军队后面尾随着更多的暴徒年复一年在维斯图拉三角洲的许多农庄一路烧杀奸淫,但在那恐怖的30年当中,没有一个敌人进入但泽的城墙以内,因为亚当·威伯发明了缆绳吊桶重建了这座无法防御的城市的防御工事。

“啊,真的?”母亲惊奇万分地说,“我从没听说过这些。”

她大声地读着历史学家霍斯·彭纳用高地德语写在图片旁边的说明文字:“‘来自荷兰哈灵根的亚当·威伯显然是目前拥

^①指1618至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②古斯塔夫斯二世(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改革财政、司法和军事,发展工业,对外与俄国、波兰、丹麦等国争霸,1630年出兵参加三十年战争,亲征德意志,在胜利进军中受伤去世。

有这个姓氏的大多数人的祖先。他是 17 世纪但泽极其成功的工程师和建筑师。”

父亲可以不看、不读，但他的大耳朵却没法不听。亚当故意大声地说：“亚当·威伯建了这一切，但他却只能住在但泽城墙以外，住在城外门诺教徒的一个村庄里。直到 20 年之后，他们才允许他在城里紧靠他改建的城墙边修间房子。”

父亲突然问道：“他干吗愿意住在那儿，和陌生人住一起？”

“战争期间，城墙保护百姓。那地方老有军队践踏，他们杀人，想要什么就抢什么，他们总是想要食物、牲口、女人——只要听说军队要来，百姓就把所有东西留在村里，逃进城里——如果但泽人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的话。”

母亲问道：“那些城墙真的把军队挡在城外了？”

“亚当·威伯的城墙能挡。”

父亲把书拖了过去，弯曲的右手拇指搓揉着图片旁边的空白处。最后他问道：“那这个亚当·威伯是啥时死的？”

“1652……300……爸，他为但泽干了 34 年，还有他的几个儿子，可但泽始终没把他作为市民对待。”

“是啊——”父亲用低地德语沉重地长叹道，“事情就这样，没变。我们在莫斯科郊外只能在夏天住的破房子里刚住两个月，那些革命者就来砸门，告诉我们坐上火车去德国，滚蛋！他们给了我一张黄卡，上面写着‘无国籍难民’。在俄国住了 150 年，他们还是把你赶了出去，一无所有，背上衣服，拿张黄纸，填上你自己的名字，‘无国籍难民’。”

亚当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同样一无所知。也许，面对某些事实，无知并不要紧。毕竟，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听说他的祖先亚当·威伯，但他们不也靠着一条缆绳，越过了多少湖泊、河流和海洋，穿过了多少集市，翻过了各大洲的多少山峦？当然，他们的无知——以及他自己流浪时的无知——决不会使这些缆绳不





再真实,使这些迁徙不再壮丽或不再暗藏杀机。

许多年后,他将记起他们在科尔代尔的那幢小房子,厨房的桌子铺着一张油布,他经常坐在这儿吃饭;他将记起母亲和父亲坐在那儿,他们的歌声犹如那条细长的缆绳悬吊在往事苦涩的河道和沼泽之上。他们在建什么堡垒?防御什么可能的或记忆中的恐怖战争?害怕什么记忆,以及秘密警察的敲门声:“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晚上你就能回家”?那个矮个子驼背“小彼得”,他是曾经富有的彼得·威伯的儿子,他只得在苏联过那种生活,而他亚当——无论他姓亚当还是海因里希——他是曾经贫穷的亚伯拉罕·威伯的儿子,却在加拿大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满世界地跑,人到底喜欢哪种生活?他的大叔雅各布·雅各布,胡须像雪一样白,他从革命者手里侥幸逃脱,最后于1962年在家人的围绕下与世长辞,他的二叔彼得·雅各布在1937年的血腥清洗中被人民内务委员部抓去,二叔的儿子“小彼得”在苏联的奥伦堡监狱蹲了一次没死,又被抓到古拉格监狱,蹲了两次而不是一次——这些都是事实,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已经成为事实,在亚当17岁那年8月中的一个礼拜天下午,当时,科尔代尔门诺教高中的历史教师给了他一篇德语文章,整整7页的关于威伯家族的档案研究材料,选自1951年的《门诺教年鉴》,他自己是绝对找不到这篇东西的,当时他也知之甚少,即使有这东西他也不愿去看。当时,他瞥了一眼文章头上那位满脸胡须的人的图片,看到了自己的姓和名。

就在那个夏季的礼拜天,亚当发现,尽管母亲和父亲讲了所有的故事,但关于他的名字,他们能讲的,或肯讲的却很少很少。他们所做的只是给他讲他们生活中的那些琐碎的、个人的、矛盾的、遗弃的和回避的细节,这些细节解释不了什么,好像没有棒针一阵阵拉扯毛线不知在给谁织手套的那样真切,没有那些依稀的图片真切,图片上的那些撑杆竖在低洼的平地上,支撑

着缆绳，这样，那些坚实的泥土就能轻而易举地越过沼泽和河流，从毕晓普斯山那高高的山崖上被运来修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威伯棱堡，无人能解释是什么天才、什么远见使得这些成为了可能。

“那么，”亚当看着母亲说，“那是我的姓，可第二个名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过了一会儿，母亲停下手中的编织。她抬起头看了看父亲，但他仍然盯着斜在手里的那本书，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们听见屋外有辆车在铺着沙石的街道上疾驰而过。

“那是在1935年，就在你出生前，”母亲说，“我们收到一封从俄国寄来的信。我兄弟彼得·大卫·洛温死了。你就取了他的名字。”

亚当细看着母亲那双枯瘦、静止的手，手指被柔软的毛线缠出一圈圈印记。

“他们说他是被杀死的，在萨哈林岛上的监狱里。”

“萨哈林岛……那是太平洋上的那座岛，靠近日本。”

“我母亲贾斯蒂娜就只有彼得和我两个孩子。我出生时她就死了，父亲告诉我，每天他都要穿过村庄，把我带你父亲的母亲玛丽亚·威伯那里。她刚生了内塔，让她也照看我。”

慢慢地，亚当的母亲又开始了编织。“你在学校肯定能找张地图。”她说，“看看萨哈林岛在哪儿。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你有多少岁他就去了多少年了。”





第 3 章

面饼与酵母

1927 年, 弗里斯兰省 马克姆镇

大约 500 年前, 我生于弗里斯兰省马克姆附近的一处农庄, 也就是荷兰现在的一个省。我叫特丽珍, 克拉丝·韦恩肯和彼得斯·威伯的女儿, 是他们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孩子。另外两个在我之后出生, 还没长大就夭折了。母亲说我是在初冬的一个礼拜三降生的。运河上结了冰, 但依然很薄, 不能横穿, 接生婆只好沿着堤坝走到第二架风车旁那座水闸的地方过的河。

我那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常有的事。甚至连西蒙斯·门诺^①的生口也没人知道, 虽然他为所有那些“誓不反抗的基督徒”写了好多的书, 让他们都以他的名字相互称呼。安娜·范·奥尔登堡伯爵夫人称他们“门诺信徒”, 尽力保护他们。门诺大概比我早 25 年出生, 离马克姆有 9 公里远, 而且直到这个世纪末, 许多门诺教徒依然说: “我是门诺信徒。”他们的人数超过百万, 散居在世界各地。

可我不是西蒙斯·门诺。我一个字也没写过。

我母亲也只字未写, 但从她死的那天起, 人人都知道她。那

^①西蒙斯·门诺(1496~1561): 门诺教派创始者。

一天被载入了一本纪录殉教者的歌集《为主献身》(1562年)之中,后来又写进了《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1660年):

公元纪年 1527 年 11 月 20 日

墨尼肯丹镇^①的寡妇、克拉丝之女韦恩肯
在海牙被焚致死

被焚致死。当时,西班牙的查理五世自称为“神授的”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他还以为自己是神授的荷兰各省的君主。于是,他接着又授权安东尼·拉良·范·霍赫斯特拉登公爵作为我们的总督,也就是我们最大的搜刮者。官方记载说,1527年11月15日礼拜五,我母亲身为囚犯被链条紧锁,用大车运到了海牙。总督于11月17日礼拜天到达海牙,11月18日礼拜一,我母亲韦恩肯当着他与荷兰执政议会全体成员的面受到提讯,被控信奉异端邪说。

夕阳西沉,当时,头戴钢盔的西班牙士兵在猛砸我家农庄的大门。透过外面的窗户,我们早就在等着他们。沿着堤坝上的那条路,他们走了过来,傍晚的夕照在他们周围烧得通红。看上去,这些人像一头硕大、厚实的怪兽,浑身耸立着矛和头,头各式各样,有的伸出来,有的缩进去,有的是人头,有的是马头,接着又是钢铸的人头,转瞬间长大了。我这一生曾在这条路上望过,但他们仿佛是从低矮的平地、从透亮的血海中而来。

我母亲赶紧把农庄上的人送回他们亲戚家,以免他们设法保卫她。我自己深深躲进阁楼的干草堆里。等她找到我时已经太迟了,没法去丽吉贝丝大婶家了。母亲使劲地吻了我,又把我

^①荷兰阿姆斯特丹以北的小镇。





推上楼梯。“上去！上去！”我一边往上爬，她一边轻声地说。听见士兵在楼下房间里砸东西的声音，我害怕极了，为她感到害怕，简直吓懵了，不敢往屋顶窗户外边看。就这样，他们把她拖走了，我只记下了惊恐中她紧贴着我的脸，还有她的吻。

我母亲是死去的彼得斯·威伯的妻子，住在马克姆。但因为她在荷兰的墨尼肯丹出生，所以在弗里斯兰省可以逮捕她，然后押送到海牙去受审。从马克姆乘船跨过须得海^①，离墨尼肯丹有80公里，在秋天的一次暴风雨中，我父亲的渔船被刮到海边，他们因此相见了。当时她正在拉她父亲商店的窗户，以便挡住狂暴的海水掀起的泡沫，无论他多么年轻、高大、英俊，她还是用荷兰人认出“闷声不响的弗里斯倔佬”^②时常有的那种表情瞥了他一眼。问题是恰恰这个时候他也抬起了头。

这故事她总这么讲。他和他的两个伙计为了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船，在搏斗了12小时之后，步履蹒跚地走上岸来。暴风雨中，为了减轻船的负荷，他们扔掉了船上所有的帆具和捕的鱼，他那坚实的身躯紧紧地从她身边擦过，弯得像棵顶着狂风的树。此时，他看见了她赤裸的脚，她的裙边，他浓密眉毛下的那双眼睛自下而上扫过她的衣裙，一直看到她的脸。期待中，凝视中，她撇起了嘴唇。他俩站得很近，一抬手就能摸到他。他俩的目光紧锁在一起，在他这个弗里斯倔佬蓝色的眼睛里，她看到了那变得倔强的眼光。

我母亲韦恩肯就是这么给我讲这故事。至于我父亲看到了什么，他从没说过。没有她眼睛里的那段故事，也没有别的什么。我只记得他一点点。他总是伸展着双腿坐着，光着脚，脚趾微微颤动，仿佛回想起了一首歌，凝视着我家烤面饼的炉火。他

①即荷兰的艾瑟尔湖。

②荷兰中部的居民瞧不起靠近北海弗里斯兰省的农民，因他们性格倔强而嬉戏其为“弗里斯倔佬”。

总是在补鱼网,或是在织鱼网。母亲告诉我,在冬日狂暴的海面上,在北海瓦登群岛的西面,上帝把他带走了,带到他自己的身边。我问母亲,上帝生活在狂暴的海上?她回答,我告诉过你,告诉过你上帝的家无处不在。

11月18日,海牙,我母亲独自站在高高地坐在议会大厅之上的范·霍赫斯特拉登公爵和全体执政议员的面前,手脚被铁链紧锁,这里没地方逃跑,难道以为她会袭击他们?当然,他们不会直接对她讲话。如档案所记,他们叫了一个女的来问那些博学多才、惟命是从的神学家事先准备好的问题:

提问:考虑好长官对你说的话了?

我母亲:我遵守我的道。

提问:已经警告过你。如果你死不改口,不思悔改,你将被判死刑。

回答:只要上天赋予你们权力,我随时承受。

提问:那么你不惧死亡?

回答:我常惧死亡,但我决不尝死味,因为基督在其《福音》里教导:“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①

提问:你对我们的神圣教会如何看法?

回答:没看法。我一生从没见过什么“神圣教会”。

提问:你言辞恶毒。那你对圣餐^②如何看法?

回答:你们神父所施的圣餐只有一种,不是两种。我知道,他所施的那种仅仅是面饼和酵母。

提问:小心你的话,这样回答是要砍头的。你声称你不相信

^①《圣经·新约》《约翰福音》8:51。

^②基督教(新教)的一种宗教仪式。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受难前夕与门徒晚餐时,手持面饼和葡萄酒祝祷后分给门徒吃,并称“这是我的身体和血”。





圣餐里有主的身、主的血？

回答：我忠实地相信，并且坚持认为上帝不是烤面饼。

面对高贵的君主和神父，我母亲这样一位商店老板的女儿、一个农民渔夫的寡妇、一个只能写写自己的名字但除此之外一个字也读写不好的女人，怎么能有这样的谈吐？

她常常对我说：“听着，我可爱的特丽珍，听着，”然后她笑着把我紧紧地拖到她身边。“你看，我们亲爱的上帝在我们脸庞中间给了张很好的嘴巴来说话，但是又在脸的两边给了两只很好的耳朵来听话。因此，两对一，你耳听六路得听两次，然后你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只说一次。”她总是俯下身，把食指轻轻地伸进我的两只耳朵里，很有节奏地蠕动，直摇得我头脑微微嗡响，这时我们两个都在笑。然后，她总要正对着我的嘴说：“听见了吗？”她的气息像是个亲吻。

自从记事起，我躺在床单上，看着她卖东西。她在马克姆的市场上卖她做的干酪和面饼，还有我们父亲捕的鱼。他去了之后，他的同伴依然把打来的鱼送给她卖，等我能走路的时候，她还用木头做的牛车把鱼运到维特马桑和博尔斯瓦德去卖。她跟谁都谈得上，朋友、熟人、许多停下来歇息的陌生人，但同所有赶集的女人一样，她听得更多。尤其听那些旅行者的话，这些人在市场上大声讲着别的镇上的消息，或者宣读有关神学的小册子，或者是关于政治的传单。就这样，她在听，在记，当时，一个叫乌尔里克·兹温格里的人在遥远的苏黎世开始了传道。他说，依据《圣经》，教皇本人并不比任何一位真正的基督信徒更具宽恕罪恶的权力。她听说梅尔基奥尔·霍夫曼^①正在周游欧洲，宣讲圣灵是向每一个活着的人倾注的，你必须倾听《圣经》中上帝的

^① 16世纪欧洲莱茵河下游地区传播再洗礼派教的主要人物，1533年在斯特拉斯堡被囚禁。

圣言，这样你就会感到圣灵在你心中涌动，所有男女都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她听见有人大声朗读《圣经·新约》，第一遍是马丁·路德译的德文，然后朗读者当场又译成荷兰语。

人们拥挤在集市的广场上，许多人张着嘴巴在听。女人们尤其如此，她们一边买卖、一边等待，一边相互交谈。难道神父们终生念念有词的就是这些东西？难道这些就是一般人从前不该去听、去领会的经文？女人们在议论，在争辩，在牢记；虽然她们不会说拉丁、读拉丁，但她们肯定能听懂这些、记下这些。

在集市上，母亲听到有人大声讲述费利克斯·曼兹^①在苏黎世的遭遇。他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追随传道士兹温格里学习神学。但他比兹温格里更激进，更出格。他胆敢让另外一个信徒给作为成人的他行浸礼，在审判他时还说是因为自己出生时的浸礼没有意义。哪个婴孩能保证自己成为信徒，遵循耶稣的教义，就像他作为成年人现在公开声明的这样？

1527年1月5日，曼兹被铁链捆绑着用船运到利马特河的河心。就在兹温格里每个礼拜天传道的大芒斯特教堂下面。刽子手把曼兹淹在水下，直到他气绝。对成百上千的旁观者，对那些在欧洲的城镇听到大声宣讲这件事的听众，这是个无法忘却的教训：任何成年人胆敢碰一碰再浸礼的邪水，那教会和当局就给他第三次浸礼，让他浸个够。

我母亲听说了费利克斯·曼兹临死前的声明，听说了迈克尔·萨特勒^②因同样理由于5月20日在德意志的罗滕堡被活活烧死的消息，还听说他妻子被迫目睹他受刑的惨状。尽管报道说她想同自己丈夫一样接受火刑，但他们还是在内卡河为她行了“第三次浸礼”。

我从没见过任何人有我母亲那样的记性。每次赶集她卖了

①苏黎世再洗礼派运动的三位主要人物之一。

②再洗礼派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多少鱼，卖给谁，她都记得一清二楚。什么事情她听一次，认为重要，她就能逐字逐句地牢记。她给我讲故事，她背下了《圣经》给我讲。她说，听，用心去听：

“《马可福音》12: 30, 31: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

“《使徒行传》2: 38: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

于是，当着荷兰总督和执政议会的面，当那个女的问话者照本宣科向她提问时，问她：“韦恩肯，这些是谁教你的？你怎么会有这些观点？”她不屑牵连任何人，而是单单援引耶稣的话：

“《约翰福音》10: 27: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听到这话，安东尼·拉良·范·霍赫斯特拉登公爵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御座上俯身向前，朝我母亲大吼道：

“女人，你胆敢教训我们？”

母亲勇敢地直面他回答：“听听我们的主怎么说，《马太福音》5: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她对面的那些大腹便便、披着皮毛和丝绸长袍的议员，个个都怒目圆睁。不过，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审问后，当卫兵把筋疲力尽的她押回地牢时，她的确哭过。特别是当丽吉贝丝大婶跨江过海从老远的地方来求她的时候。

“我的宝贝、我的特丽珍怎样？”丽吉贝丝大婶告诉我，我母亲被铁链锁在地上。

“她很安全。她不去农舍围墙外面。可她哭着要你，哭得很厉害——亲爱的妹妹，为了啥？你为啥？你愿意的事情难道不能自家想想，不说出来行吗？”

“他们问我信仰什么，难道我能保持沉默？”

“他们有啥德，有啥权来问……说假话！”

“对呀，那我怎么能相信他们呢？”

“我很怕。他们会杀了你的。”

我母亲擦掉她的眼泪，突然，她咯咯地轻声笑了笑。

“我在学拉丁。”她说，“每天都有两个多明我会^①的修士来我这儿，晚上还来两次。一个是来听我告罪的，很凶，满口的拉丁，一个很快活，不过也是满口拉丁。这就是他们迷惑你的办法，一个粗暴，另一个装出温和的样子。不过，那些卫兵倒是很好的老师。他们说在拉丁语中，‘多明我’的意思是‘主’，‘修士’的意思是‘狗’，因此，他们用手背遮住嘴巴告诉我说，不要让这两条‘主的肥狗’吓着你！”

可是，在这肮脏的石头地牢里，看着母亲双腿被巨大的铁圈铐住，那短截短截的铁环重得她根本抬不动……我的大婶说她笑不出来。

她给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在奶牛边挤奶。我坐着，搓揉着老母牛肥大的奶子，脸紧贴着它身体的一侧，感受它浓浓的暖意。这头牛真好，我们喂给它干草和粗粮，它却给我们带来上帝赐予的美肴。我能感到生命在它体内汨汨流动，从它屁股那层短浅的绒毛渗透出来，温暖了我，温暖了牛圈，温暖了我们的整个住处，一直到敞开的屋椽。老母牛转过它长长的头，睁着一只独眼，圆头鼻子上两个又大又湿的鼻孔在呼吸，看着我抚摩它。我们一起感到了奶水在往下汇集，奶头充盈、奶水温暖。

快搓，快揉，快挤，
快把奶桶装满。

^①由西班牙天主教修士圣多明我(1170? ~ 1221)于1215年在法国图卢兹创立的天主教修会。





以往，母亲和我一起挤奶时，总唱这首小调。如今，我伤心得连手都捏不紧了。

“你对圣油^①如何看法？”那个“温和的”多明我修士问我母亲。他在试图用终傅^②暗示死亡来威胁她。

我母亲回答：“油用来拌色拉是好的，要么用来抹鞋。《提摩太前书》4:4:……”

“该死！”多明我修士迸了一句，“《圣经》里是这么说的？”

“你不该诅咒，读读《圣经》。”她对他说，“《圣经》里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她不肯放弃信念。经过三天的审判，在11月20日礼拜三这一天，另外一个多明我修士领着她来到法庭，用十字架对着她的脸，朝她耳朵小声说道：“跪下，求主宽恕。”

但她把脸扭向一边，大声回答：“正义的人将靠信为生。《希伯来书》11:2:古人在信上得到赞美。”

修士告诉她：“你将被判受死。”

她更加大声地回答，所有人都听得见：“如果人因信而死，那他们的确不死，而是在主下永生。《希伯来书》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信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我将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大婶告诉我，听到母亲这话，全场一片寂静，仿佛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云一样的见证人挤满了审判大厅，众目睽睽。接着，其中一个议员低声地问她：“你要谴责我们大家？”

“我的主耶稣不会谴责任何人。”母亲回答，“他来给予我们安宁。”

总督狠狠地敲响木槌：“她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听听判决！”

①指东正教圣事中用的经主教祝圣的橄榄油。

②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即临终时敷擦“圣油”。

内德维克主教长走上前来，对着议员用拉丁文宣读了对她的判决，然后又用荷兰语朝她重复了一遍。接着，他把她移交给执政议会，补充说他不赞成判她死罪。等他和两个多明我伪君子离开议会大厅后，总督把目光转向所有议员。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点了头，于是他宣布：

“墨尼肯丹镇的克拉丝之女韦恩肯信奉异端邪说、亵渎圣礼、顽固不化，不惩罚不足以严肃法纪。”

他宣布，第一，没收她的财产，收归国库，作为审理这桩案件的费用。这些费用不加行刑费，包括议员每日会议的费用，已经超过50个荷兰盾。第二，把她押往城市广场，捆在柱子上，烧成灰烬。

这里，我发现了一个荒诞的逻辑。我母亲烤了一辈子的面饼。假如一个男子因浸礼必须在水中受死，那么一个女子因在面饼的圣礼上信奉邪说，就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最严酷的火刑。

那天下午，在受刑架上，她面对广场上成百上千观望的人群，请求从前被她得罪的所有人的宽恕。接着，她用一只手撩开颈巾，让刽子手把火药倒进她胸脯。一个神父在她面前举起十字架，但她推开了他的手。她转身面对木桩前面的那根凳子，周围堆着上等的柴火，她对刽子手说：“这凳子结实吗？别让我摔下来了？”

刽子手说：“坚信上帝吧，夫人。不要受欺骗。”

于是，她登上木凳。刽子手开始用铁链把她捆在木桩上，这时，那个神父大声喊了起来，挤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女的，男的，还有那些被父母举过头顶的小孩，全都听得见。

“韦恩肯夫人，你愿意作为基督徒而死吗？”

她清清楚楚地回答：“是的，我愿意。”

“你为自己的错后悔吗？”





“我曾经有错,我现在后悔。但这一次没错。我坚信上帝。”

说到这时,仁慈的刽子手在她脖子上缠上绳子,开始绞她。等他最后做罢,她不再动之后,他才点燃了木柴。

挤完奶,我和丽吉贝丝大婶给棚里和圈里的牲口喂了食。那些头戴铁盔、手拿罚没书的士兵还没有来。大婶在厨房的储藏室,小心翼翼地把牛奶倒出来,放一个晚上好让奶油浮上来。我坐在壁炉边的凳子上,望着炉架下面燃烧的泥炭,火苗跳来跳去,变化多端,太美了。弗里斯兰的农夫烧不起木柴,因为我们不是议会的刽子手。

母亲曾给我多次讲起《圣经》中摩西的故事。他从火焰中听到了上帝亲口对他说话的声音。

我开始倾听那火焰。从背后又大又高黑洞洞的牲口棚里,传来了牲口的声音,传来了它们硕大、懵懂的身躯慢慢沉入梦乡的声音。除此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什么也听不见。

听吧,母亲对我低语,她的手指塞进我的耳朵。

于是,我身体前倾。在炉架的边缘,我把手指伸向低矮的蓝色火焰。依然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伸直手指,把手往跃动的粗大火苗里伸,全神贯注地倾听。最后,我看到自己的整个手都埋在熊熊燃烧的泥炭里。终于我听到了什么,是的,我能听得越来越真切。而且我还辩出那声音,听起来像一声尖叫。

第4章

余火湖边

1961年，加拿大西北地区

亚当的头在无边的寂静中轰鸣。耳边炸响的那两枪像空气一样消失在大地上。那头驯鹿抽搐、扭动了一下，脚步摇晃，但没有倒下，鹿背塌了下去，可就不肯倒下。那副硕大的六角鹿角，还有两面如利刃的铲形板角，沉重地将它那顆巨型头颅压向岩石嶙峋的冻原，它喘着粗气，但双腿叉开，稳稳地挺着。亚当往前走了一步，看见在他与驯鹿之间，远远地有一片湖。

它怎么还不——快，再补一枪，对准前肩的背后。他扣动了扳机。

啪——噗，还是一样，那头公鹿岿然不动，白色的颈项牢牢地架在那副细长、黑色的鹿腿之间，鼻孔喷血。

亚当咕哝道：“天哪，怎么——”瞪眼看去，一时间，那驯鹿雪一般白的鬃毛^①突然使他想起儿时记忆中女人冬天穿的高领和她转来转去的圆脸；他蹲在一边的苔藓地上，头在晕乎乎地转。

埃里克在一旁嘘嘘叫道：“妈的，要打腿！”

可亚当左臂的肌肉鼓了鼓，痉挛起来，306口径的枪垂下

^①在加拿大，到了秋天，驯鹿颈部周围的鬃毛会变成白色。





去,对准了自己的脚。

“没用!”埃里克的步枪响了。公鹿的前腿碎裂了,它开始往下垮,是第二次往下垮!屁股往一边撅起,摇摇欲坠。在迎面耸立的山梁边上,只剩下那又弯又长的鹿角,尖尖的如花一般绽开,后面是那片遥远的湖水。

“我说过这些驯鹿很不容易打死。”埃里克正快步走上山梁。“骨架长大,夏天长膘,劲儿蛮大。”

亚当把枪锁好,一阵呕吐感浸遍全身。他蹲下身,紧紧抓住竖立在跟前的步枪,稳住身子。这办法是拿破仑·德洛姆教他的,是提纳人^①在身边找不到岩石时歇息的方式,在空旷的荒野上,这办法既可歇息,又可时刻保持警惕。拿破仑说,你以为你什么都能看见?这地方看起来很平,山坡伸向山梁,好像近在眼前,伸腿就到,但你受骗了,这地方遍地像老人的脸一样皱——笑着的脸,到处有沟、有水和巨石,嘿,不晓得从哪儿会冒出一头驯鹿,叫你大吃一惊。它看着你,你一动,它又消失了。

这头鹿就是这样冒了出来,看着他,一动不动。谁能知道风的去向,或鹿的行踪?提纳人是这样说的。

或女人。苏姗娜·莱昂斯。她曾停下来审视过他,然后说她想嫁给他。她说过。

他俩共同的朋友埃里克·冈纳森爬上山梁,使劲拽起那头终于咽气的公鹿的头角,一扭转将它翻过身,准备开膛破肚。亚当离她有千里之遥;往北,再往北,还有上千英里,一直到埃尔斯米尔岛和永恒之冰,然后再由北往南,弯进西伯利亚,对门诺教徒来说,那地名是折磨、痛苦、布尔什维克、野蛮人——埃里克常说他是“最可爱的蠢货”——的代名词。亚当感到自己笔直地立和平衍的原野上,像个全神贯注的人站在加拿大的一座苔原陈

^①分布在阿拉斯加内地及加拿大西北部的土著人,亦称阿萨巴斯卡人。

列馆里，9月的阳光照耀在周围一圈地平线上，远处，两排提纳人正在给驯鹿剥皮，周身涂满颜色。

身穿鲜红夹克衫的约翰·L^①正朝他和埃里克走来，他把枪举过头顶，表示已看见他俩杀死了猎物。

亚当小心翼翼地直起身。他感觉好些了，鼻孔里的气息如埃德蒙顿的春天一样苍凉，带着一丝极地的清寒。他沿着石丛间一条蹄印走上山梁。埃里克已经砍下那颗黑糊糊双目圆睁的鹿头，把它放在一边，架在那副又弯又大的鹿角上。如此硕大的鹿角绽开在一颗纤小的鹿头上，似乎比整个鹿身还长；鹿角尖上还长着长短不齐的绒毛。

“你枪法不错嘛，一枪命中。”埃里克说，“没来得及倒下就死了。”

亚当好不容易才把目光集中在驯鹿被肢解了的躯体和砍碎的骨头上。他说：“你的刀法也不赖嘛！”

埃里克在专心致志地解剖，没有听出亚当的口气。“枪打得正是地方。”他在两条叉开的后腿间的白毛当中寻找，找到一处下手的地方。“从这儿下刀。”

接着，他的刀在紧绷绷的兽皮上一拉，一条口子从肛门处快速裂开，紧贴着绕过阴囊或隆起的阴茎，穿过被子弹击碎的血肉模糊的胸腔，露出白色的脂肪和一条条殷红、深坑状的肌肉，不像他俩在医学院人体解剖室里那样，一连几个月对着福尔马林浸泡的陈年尸体一公分一公分地慢慢肢解，眼下，埃里克简直就是个剥肉屠夫，亚当提醒自己，吃新鲜的上等鹿肉，要心存感激。

“喂，快吃你的卷饼！”苏姗娜生气地叫道。

“你爸，他不喜欢我。”亚当对着厚厚的咖啡瓷杯嘀咕。

^①在当地，如果家庭成员中叫约翰的人很多，人们就在后面加个字母以示区别。





“不是你，傻瓜，随便谁都这样，我是他惟——”

“那敢情好，我只不过是‘随便谁’。”

“我告诉过你，是因为我妈。”她修长的手指分开一个大学糖果店卖的卷饼，里面浓郁的肉桂气味在他们之间飘荡。“他还在为她伤心。”

“你依然是他的，还多了个我。”

“没错，这个他知道。”

“那他干吗不喜欢我？”

“他喜欢你！只是你没意识到，听着，”说着，她从包厢对面的座位上溜了出来，坐在他的身边，“你不需要肉桂饼和咖啡，你需要亲密接触几下。”

糖果店包厢顶上的镜子把他俩的头反射成无数张脸，面面相觑，但那个时候，亚当还嫌不够。“‘亲密接触’，”他对着她的嘴唇重复道，“‘血管的亲密接触。’”

“没错，解剖课，课号 201，几何也有：‘当一条曲线最有可能与另一条曲线相交时，两条曲线就会接触。’”

“你背诵《牛津英语历史法则辞典》时我最爱你。”

“只为你。”她从亲吻中腾出半口气，说道，“纯洁的爱。”

“请说出《牛津英语辞典》对‘爱’下的定义。”

“‘一个人——括弧——因为对美好品质的认识、或对自然关系的冲动、或共同的情感——反括弧——所表现出的那种渴望对方幸福、喜欢对方在场以及希求对方赞同的情感。’”

“棒极了。”他又凑近了一点，“爱就是情，就是欲，就是欢。”

苏姗娜对着他的嘴说：“爱还是决心。”

约翰·L 穿着他那件火红的夹克站在亚当跟前，黑黑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每年秋天的苔原狩猎，你们的飞机刚一着地，不到一小时你们就打到第一头猎物。“不错，鹿臀很肥，肉都堆在

那儿。”他大声笑道，“这腿劲很大，好跳起来找小母鹿交配！”

埃里克说：“亚当打中的。”

“我打中了它，两枪，大概一枪在脊柱，一枪在心脏，可它就是不倒，立在那儿……”

约翰·L突然静了下来，说：“有时候它们站着就死了，就是不倒，好像在说，嘿，这是我的地方，我住在这儿，你们是谁？”

亚当的大脑一片空白；天空扣在他的头顶上，像一只惨白的薄碗。过了一阵，他看见约翰·L正递给他猎刀。

“要是你愿意，”他的声音很轻，带着提纳人含蓄的语气。开始，亚当以为那只是因为他们说英语时不带词尾后缀，后来他才发觉他们语句没有次序。“你得向驯鹿的魂献上感谢，感谢这礼物。你得为它放一小块鹿肝在地上，再吃一点。”

在被子弹洞穿的肥厚的肋骨处，埃里克的刀停止了剥皮。亚当接过约翰·L的猎刀，滑滑的早已沾满其他驯鹿的油腻。他跪在苔藓上，剖开让给他的尸体，照着约翰·L说的做。

他得把自己杀死但却没法撂倒的那头公鹿驮走。用公鹿自身泛黄的灰白兽皮把每一块红肉、脂肪、心脏、脑髓，还有没献完或吃完的肝脏全捆扎起来驮走。有120或130磅重，约翰·L边说边和埃里克一起小心翼翼地那捆肉抬起，放在亚当的背上，亚当理平勒在他额头上承重的背带。背上稳稳地放着这捆暖烘烘沉甸甸的鹿肉，他能轻松地站起身，后背和脖子前倾，直直地绷紧驮起那重量。你知道营地的方向吗？约翰·L问。有大石头的那座山梁，从那儿你能看到营地，你可以背靠那块石头歇歇气，别放下包袱，否则把你腰弄折了。埃里克笑着说，下一次杀头小一点的。亚当抬起腿踉跄了几步，约翰·L帮他稳了稳，说，那不是你，是驯鹿，驯鹿在考验你。





在空旷苔原的三块石头之间，凯西面朝一堆火，腰躬成直角，在煎燕麦饼。她往火堆里又塞进一根他们坐飞机带来的劈好的云杉木，让火焰燃得恰到好处刚好烧着平底锅，一点都不浪费柴火。她挽起袖子，黑头发扎在背后，戴着眼镜。

“你背了好大一捆肉哟，”她说，“明天你的背会有感觉的。”

“已经有了。”亚当说，“不是很糟，只有一点点。”

她笑了。亚当在想，她敦实，双腿稳稳地扎在坚实的土地上，肯定能用背带驮起150磅穿过苔原，走多少英里都没事，直到把这捆肉驮回家。接着，她直起身，女人的形体在肥大的衣服下扭动，她围着颈巾，穿着厚厚的夹克，北极熊的毛皮一直伸到黑黑的袖管，还有蓝色的裤子，裤腿折着掖进橡胶统靴；裹在她周身的棕色肌肤也许尽善尽美，她的胳膊、肩膀，还有也许是很大的双乳，她抬腿的姿势，宽松的裤子藏不住她大腿之间那条又细又长的股沟。

“给。”凯西把煎锅里金黄色的燕麦饼分成两半，用刀尖戳起一半递给他。“你干活，就有吃的。”

燕麦饼煎得很脆、很烫，在寒冷的空气中味道不知有多好。拿破仑·德洛姆在帐篷口出现了，亚当不知道他在那儿，可他又去哪儿呢？如他所说，即使是现在，飞机一小时就可飞越过去三个星期肩挑人扛、使船弄桨的路程，但他还是早已过了当猎手的时候。垂老的拿破仑，他是晚上回来歇息的。

“我还闻得到燕麦饼。”他说。凯西喷了喷鼻息咧嘴笑了，递给他另外一半。他光着手接过去，弯下腰，双腿盘起，坐在亚当身边的石头上。“我现在得多吃点，小的时候饿够了肚皮。”

“那个时候没驯鹿？”

“嗨，很多，比现在多，可你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不是坐在飞机的窗子前飞来飞去就能发现下面有驯鹿在跑。”

凯西说：“过去那些老人不是有魔力，能找到它们吗？”

“是的,有时候,有时候他们有,他们能知道驯鹿从哪儿带着幼崽打南边来。我祖父皮埃尔就有魔力。有一个秋天,他告诉我们说驯鹿可能在冬湖,我们顺着黄刀河一直划到那儿,那是条便道,只用了两个星期,然后驯鹿就来了,成百上千,整个冬天,我们在湖周围秋天最后留下的树林当中捕鹿,我们甚至不用很贵的子弹。可有时……”他的头在宽大的风帽下面忧伤地摇了摇。他的脸紧紧绷着,黑得像抛光的石头。

突然,他笑了。“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别讲了,爷爷!”凯西叫道,对着火堆弯下身。

可拿破仑又有了位新听众。“有了这魔力,我祖父皮埃尔就从未感到幸福过,人们总是需要帮助,而拥有魔力就始终有责任,有很多的活要干,而那些白人,商人,牧师还有政府里的人,吃得比他好,可好像他们从来就不干活,于是,他把我叔叔和我母亲送去学白人的知识,这样他们也不用不着干活了。”

拿破仑吃吃地笑了笑。亚当吃惊地问:“他送自己的子女去寄宿学校?”

“那个时候还是走读学校。到冬天,圣诞节前他们就搬到普罗维登斯,我祖父皮埃尔打猎、诱捕,修士^①教孩子们读书。我母亲很小,但她知道她祖父的名字叫拿破仑,那些修士给她讲皇帝的故事,他们说他是伟大的人,是法兰西的皇帝。她喜欢他们的那张大地图,他们告诉她那是世界的真实图像,于是她在一张纸上原原本本地把它画了下来。我是很晚才出生,可她依旧留着那张她在学校画的世界地图,有时,冬天很冷的时候,我常坐在她怀里,她会说:‘拿破仑,你就叫这名字,一个很大的名字,大得可以当皇帝。’然后她会笑着翻开地图,那纸是灰的,很破了,可她把法兰西和俄国涂成了红色。‘等你长大了,你也会迈着步

^①指被派到加拿大极地地区传教的天主教修士。





伐走进俄国，就像皇帝一样，可你将从这儿走，看，从这后面，从阿拉斯加出发顺着俄国这条长长的尾巴走，不从前面他们守卫的地方。这样，你将出其不意、轻而易举地拿下那座大城市莫斯科。那里的屋顶全是金子，’她说，‘你在那儿生活，一辈子富有，不会挨饿！’”

他们围坐在三块石头垒起的火堆旁，笑了，那笑声细得宛若宇宙里飘着的散发，鼓舞着这些千百年来一直像这样用扎带驮着鹿肉步履艰难地走向营地的提纳人从西北地区的这片不毛之地出发去占领金色的莫斯科！逃离加拿大，逃往俄国，这故事亚当在艾尔伯塔灌木林的家中可从没听说过，在寒冷的冬天，他也经常坐在自己母亲温暖的怀里，不过，他从没挨过饿。对他父母来说，莫斯科就是饥饿、苦难，对少数人来说，那是朝着陌生地的一场料想不到、无可名状的逃亡，可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放逐。背井离乡。这怎么可能？亚当在笑提纳人对莫斯科的征服，可他也差点快哭了。很清楚，在这片冻原上，一个行走的人永远都只不过是一个小黑点，可这却是拿破仑的家乡，也是凯西的家乡。

这女人很美：双腿伸直，弯着身子面朝那堆在苍穹之下燃烧的篝火。亚当觉得苏姗娜在他脑子里歌唱，她教会了他如何让一个女人恬静、完美的形体来浸润他的头脑，渗透他的全身。他得直起身，伸出他的腿，屁股下的那石头突然变得太硬、太粗，他不得不站起来，移动脚步，朝湖边那片狭长的沙地走去，就是在那儿，靠气囊浮在水面上的双引擎飞机退上湖岸，就是在那儿，他们抓起自己的包袱，匆忙穿过灌木丛，爬上冻原，立刻发现了那头驯鹿。在灰色的球形山包之间，有一排好似铅笔点出的小点，在天际下跳跃，变幻着形状，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他们根本没时间拿出望远镜。“看那儿！”站在他身旁的约翰·L说。右边也有驯鹿，离得很近，它们变成了一头头巨大的动物，排成单

行稳稳地前行,白中带褐的躯体仿佛就近在咫尺,脖子和肩膀的垂肉如雪一般厚,一副副高高掀起的鹿角在它们大小适中的头上向前伸出,它们往南,走在地平线上,仿佛在他们的上方,遥不可及,仿佛在空中行进。

苏姗娜,他的长腿苏姗娜。“我是他的一切。”他在想,巴德·莱昂斯,你能拥有她作为你女儿的一切,可做我妻子,她的生命更丰富,爱情更精彩。

苏姗娜,他生命的极乐,可这乐趣很久以前仅仅来自他对学习、对医学的专心致志和刻苦勤勉。要了解人体的方方面面,那是不可能的,但却必要;人体标本不像汽车那样每年在变,就像驯鹿被砍开的胸腔,总是一样的,但每副被砍开的胸腔的差别又总是那样无穷无尽。每个躯体都能长出迄今难以想像得到的东西,更不用说那控制情绪或细微感情的大脑了。可当他俩相互发现之后,一连几个月他俩像什么东西在渐渐地、必然地移近;在对无穷无尽的医学知识的每一份专注中,他开始意识到,她无索无求或犹如血液涌动那样不可否认的存在渗透了他,她就存在于他每时每刻的专注之中。当他俩在一起时,任何其他躯体全消失了,艾尔伯塔大学医院里六七百张病床上的病人消失了,那些尖叫的、痊愈的、垂死的、哭泣的或狂喜的人们也消失了,不见了。他俩交谈、拥抱、打趣、感受对方的躯体,一间房子、一张睡椅、一张床单,就足以成为他俩的世界了。

那么,他干吗惧怕?面对它吧,在这片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令人惊愕的大地上,他感到害怕。

从今天算起,四周以后,即10月7日周六,在埃德蒙顿。

“Na oba doch,^①”他母亲用低地德语轻声说,当然,苏姗娜是

^①低地德语中表示惊奇的感叹语。如今英语中也用。





听不懂的。“至少该去教堂。我们最后一个孩子，新娘我们只见过一次，第二次见面你们就办了登记，这怎么成？”

他想对她大声说：因为对你来说，办登记又是一次痛苦，要是没有痛苦，那怎么可能是上帝的意愿呢？可他看见苏姗娜虽没听懂母亲的话，但却听懂了她的语气，于是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不，妈，就在联合基督教会^①的教堂办，你和爸都来，行吗？我开车来接你们。”

“我们住哪儿呢？”

在埃德蒙顿 300 英里内没一个亲戚。

“都安排好了。”亚当向母亲保证。“住圣史蒂芬宿舍的客房，跟我住同一幢楼，我会把你们一直送到，苏姗娜的父亲会把你们送回来，他说他想来逛逛莱斯布里奇，他会把你们送回家的。”

“他姓什么来着，莱昂斯？”

“巴德·莱昂斯……我想大概是英语姓氏，他们一家是战后从美国来的。他会开着他的大轿车一天之内就把你们送到家，他说，他很高兴这样做。”

苏姗娜绿绿的眼睛在注视着，在又一次地告诉他：我要她去，我要两个老人都去，我的母亲去世了，因此她该去，做个体贴、周到的儿子吧，再试试。

“可他们都说英语。”母亲凄凉地说。

“难道你想把‘眼泪牧师莱马’^②也一起带去——”亚当止住口，又执着地解释说，“苏姗娜和我就要结婚了，可她不懂德语。”他站在那儿，右臂搂着母亲的肩膀，凝视着她灰色的眼睛，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①由福音归正会和基督教公理会总会联合而成的美国基督教会。

②牧师的绰号，他布道时很容易哭，因此而得名。

她凑近他的耳朵说：“告诉她，婚礼时我们可用德语唱首门诺教圣歌。”

“什么？谁唱？没人会说一句德语。”

“她和你爸，能唱得很美。”

“二重唱……？”

亚当意识到自己的脚正走在冻原弯弯的湖边，踏着沙地上驯鹿留下的许多铲子一样的足迹。这串串脚印不时地拐向一边，穿过沙洲，一条条依稀的足迹在冻原上向四面八方发散开去；酷似白杨林深处那一条条踩出的小道，他曾从那儿赶着奶牛回家挤奶，他环顾周围，好像在期待树叶在头顶上摇曳。可他看到的只是广袤、发蓝的天空，缕缕薄云飞快地奔跑，像驯鹿。

他担心的倒不是他的母亲——当然也不是看着苏姗娜、大声在笑的父亲。在他看来，她就是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修长、健壮、英国人气派，你居然给自己找了这样一个新娘！苏姗娜说，他们的歌肯定是婚礼上最美的一项。

“他们的嗓音沉稳、柔美，像中世纪天使的声音。”她对亚当说。

“那你在哪儿听过中世纪天使唱歌？”

“傻瓜，你难道不懂我的意思？”

“也许是吧……只是他们别唱我爸一辈子喜爱的那首：

“这世上如今我只是香客过路，
我的朝圣之旅哟，短暂仓促。”

苏姗娜说：“你告诉过我，门诺教徒在葬礼上才唱那歌。这是我们的婚礼哟。”





“你不了解我母亲。她的人生格言是：‘这世上我们没有定所，因为我们在寻求未来的圣城。’”

说话从不拐弯的室友埃里克才不信这些。“老妈们处在她们的位置，怀念过去是对的。”他把自己硕大的躯体摔在寝室的床上，为了聊天更方便，他把自己的床拉来横在亚当的床头边。“你的毕业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你可选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去实习，行医，然后变得富有，有个漂亮姑娘在爱着你，她聪明灵光，没等你实习完她就会拿到博士，总而言之，她爱你，你爱她，那还有啥问题？”

“结婚并不是一夜填鸭就能考试拿 A 的事。”

“嘿，我可没这样说，不过，你们这婚姻是上天配的，圣史蒂夫教堂就在这儿，去那儿走一趟，就你们俩，三位父母，加上 20 个朋友和一位牧师，周末到一家山里旅店去感感恩，做做爱，然后两个双双回来上课，万事照旧，只是你俩在一起……有啥问题？”

埃里克的逻辑真单纯，他俩舒舒服服同室了 3 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他不焦不虑，不紧不慢，肯定会成为一名能干的好医生。他出生在黄刀城，父亲在那儿开了家金矿，但要他从该死的洞口钻到地下走上 1 英里，那肯定没门。他个子虽大，但双手却很稳，像外科医生那双工匠的手一样灵巧；不像亚当，他肯定没打算把这一辈子花在在人身上找东西、割东西然后再缝起来这种事上面；有时候，他全然记不起自己为什么学了医。

“12 年级的时候，有个叫弗兰克·巴根的老师使我对历史真正发生了兴趣，对但泽这座城邦——”亚当停住了，即使在半夜，这样的倾吐也太隐私、太可笑了。“他还让我读了一本书，叫《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①，里面收集了许许

^①门诺教的一部重要著作，仅次于《圣经》，该书有 1140 页，记载 16 至 17 世纪 4000 名门诺教和再洗礼教的殉道者受难的故事。本书的第三章和第五章就引自该著作。

多多在宗教改革中被杀害的人的故事,有好几百人。”

“我的天,”埃里克叫道,“是不是一部宗教狂热者的历史?真的很恐怖?”

“是的,火刑、砍头、水淹,很多很多,很血腥。”

“对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来说,听起来很带劲嘛。”埃里克笑着说,“这老师很古怪。”

“他一点都不古怪,他对我说,历史不仅仅是国王征服世界的记载,还有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无奈、他们的信仰。有时候我想,要是我大学第一年的课程学得好一点的话,我肯定会学历史。”

“那个狗屁老先生麦克唐纳,脑子塞住了不开窍,一走进教室便拿起自己写的那本倒胃口的书读上一小时。”

“不过,学了历史能干啥?”亚当阴郁地说。

“啥也不能,也许教教书。嘿,现在不是蛮好的。”埃里克叫道,“对你来说,学医很容易。行医是个合法的职业,挣钱多,你可以随时转行,做你愿做的事。同时,你还得到一大堆的狗屁尊重。‘哟,你是位医生!’”

“没错,就像那个犹太老妈,她或许可以成为门诺教徒,站在海滩上大叫:‘救命!救命!我儿是医生,快要淹死啦!’”

晶莹的湖水拍打着他的靴子,拍打着两处爪印的边缘。在可以留下痕迹的沙土上,这爪印完完整整,同他戴着手套的手一般大,脚跟是个椭圆形的凹坑,在弯月似的脚爪里,每个水滴形状的脚趾头深陷在沙中。亚当的脚在柔软的沙土表面慢慢地沉了下去,湖水在周围哗啦起涟漪:苏姗娜,结婚——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会发生?生活,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可预见的,都是大学里有条有理的常规,上课,学习,醉酒,谈性,跳舞,喝酒,睡觉,上课——可他厌恶醉酒给他带来的那种糊涂。他曾决心让自己





的生活成为他认为是清醒、透明的一种循环：学习，学习，夏天在油田一身油腻，挣一大笔钱，然后省下再学习。专心致志于书籍、试验、教授，最后是尸体，以及明确的作业，这些作业只有当你专心致志、勤奋努力才能切实完成。他能在漫长的周末在高速公路上驱车 300 英里，去科尔代尔温习定义和人体器官，到该去教堂的时候才离开，当然，他母亲是理解的，他得学习。甚至连苏姗娜也这样认为，他俩是在一次滑稽舞会散场时偶遇的，后来便一次次地约会，直到他开始直觉到与她一起生活可能还有一种远比喝大学糖果店里的咖啡更快乐的幸福。然而，当他学习的时候，苏姗娜仿佛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幻想，一团从他头上飘过的影子，不知不觉，伸手不可即。可那时那刻，她的确就在他身旁，与他在一起，仿佛把他那可笑的狭隘世界完全撂在一边，在这种时刻，他彻底懂得了母亲为什么始终坚信，突然出现的事物总是有所期望的意义的。

“《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这样的书名很少见。”苏姗娜好奇地说。

“是挺怪的，但里面所有那些血腥的故事更不寻常。”

“17 世纪那个时候的书，书名都很长、很复杂……”

亚当对苏姗娜说：“有一个殉道者才十来岁，他们折磨她，‘用尖利的钩子撕扯她嫩弱的肢体’，我记得他们把她开膛破肚，露出了肋骨，她叫道，‘看呀，耶稣基督，我的主！你的名写在我身上！’”

苏姗娜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亚当低声说：“我记得那……故事……”

接着她奇怪地回答：“在写照里，你看见颠倒的世界。”

“对。”亚当说，“就是。而且总在你身后。”

在一起，他俩一往情深，在一起，他俩想像无限；此时不知怎

的，他苦心补缀的医学世界变得苍白、浅显，消失了。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消失，从她干干脆脆、实实在在地离开他开始，从他开始实习起，他觉得他的医学世界没有完全消失。

埃里克说别担心，他俩只是陷入了男女的那种理不完的琐事中。亚当倒认为，更有可能是他自己深陷其中。如果他能自拔，与苏姗娜分手后的生活会不会淹没他？一个人想淹死，还会有多少途径？

“走，醒醒你的脑子。”埃里克推了推他说，“开学前，结婚前休息休息，放放松，去冻原猎驯鹿，那里啥也没有，只有地平线。走吧，拿破仑说行的，只要愿意，我可以带我朋友去。”

亚当躬着背，蹲在北极圈里一座湖泊松软的岸边。沙土上印着四个脚趾的大脚印；灰熊有五个脚趾头。拿破仑会说：这是狼，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很久以前，世界之初的时候，它教会了我们怎样猎驯鹿，教会了我们怎么过好造物主给予我们的生活，一直过到我们去世。医院病房里残酷的情景、走廊上一排排名医的“杰作”掠过亚当的脑海，假如他们都能如自己躯体所示干脆死掉，那就太简单了，而他也干脆驮着一捆肉，拖着弯曲的身躯走过满是苔藓和乱石的冻原——我这是在胡扯。

他应该回去。咬一块烤鹿排，聆听猎人的故事，嘴巴哼哼地盯着三块石头垒起的火堆。不要胡思乱想、乱扯了。

秋日的夜色变深了，帐篷里，他们并排着躺在睡袋上或钻进睡袋里；帐篷很小，除非他们微微蜷起，否则腿会伸过中心线。拿破仑坐在机筒火炉的旁边讲故事。有些用英语讲，有些用狗肋骨族人的话讲，他听来的故事就是用这话讲的，约翰·L可以翻译。都是些关于这里的人们的故事，他们世世代代住在这里，对某些事情略知一二，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荒野这个词，因为这





片土地的任何一处都是家。飞机、皮舟、收音机、骨针，都没有改变这片土地和人们。从这儿到余火湖去猎秋天的驯鹿，过去要花三四个礼拜，划着船，驮着东西，绕过急流，从雷伊-埃多斯开始，在河流之间，他们的狗跟着他们顺着岸边在夏日成群的蚊虫当中奔跑，57个搬运者头上勒着皮带，甚至连小孩子也背东西。一路上，他们将通过巨兽海狸^①垒起的坝，立法者亚莫利亚^②曾在那儿与他们斗争过，也是在那儿，150年前狗肋骨族人和黄刀地区的提纳人相互以舞起誓，永远和平，他们跳舞时在地上踩出的圆圈如今依然深深地印在石头之间。拿破仑的嘴唇几乎没动，那是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的语言，而约翰·L那平静的说话声又把这语言变成更加神秘的英语，伴随着云杉树枝在火炉里噼里啪啦的炸响。他们慢慢地漂进梦乡，带灯罩的油灯发出吱吱的响声熄了。

突然，亚当猛地一下被弄醒了，火炉暖烘烘的烟囱砸在了他们身上。外面的暴风雪砰砰砰地打在帐篷上，像拳击手的连环拳！有人撩开帐篷的门，雪在灰色的晨曦中疾飞而过，轰鸣中，约翰·L大喊着叫每个人都坐起来，背靠着帐篷的边沿，桩绳怕是扯不住了。接着，他俯身爬向外面，风撩起帐篷门，仿佛伸进一只手来，轰地一声把帐篷鼓飞起来，那风要把他们全都掀进湖里；他们能听见下面白色的泡沫在冲击着湖岸。他们缩成团坐着，尽量使自己沉重，帐篷的帆布来回拍动，迎击着头顶上接连不断的冰雪和雷鸣，他们除了坐着，别无他法，别无所思；他们在帐篷里面，身上不湿，一个不少，无所事事，除了有时相互微微一笑。就这样坐等。

①在提纳人的神话传说中，巨兽海狸完成了许多史前的丰功伟绩，如垒山筑坝，开创天地。

②提纳人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是他教会了人们如何与自然和动物共存，遵守自然的法则。

拿破仑告诉亚当：“我祖父皮埃尔有预见动物的魔力。主要是驯鹿，但他总是告诉我，魔力就是去看。你需要的任何东西总有办法找到，你要做的就是首先睁眼去看。”

他们在湖尽头的一处长满灌木的凹地重新竖起帐篷。凯西在教亚当怎样把鹿肉切成恰到好处的肉条，以便晾干。他问她能不能让他试试时，她大声地笑了；那块切肉板很短，他好不容易切成的肉条，她能把一条改切成三条。尽管鹿臀上的那条条肌肉复杂得让人头晕目眩，但这儿需要的是麻利，而不是实验室里那种研磨和深究。他俩肩并肩地坐在地上，面前是那块长时间狩猎而切薄了的切肉板，此时，她父亲拿破仑用肘枕着头，往火里添细棍。

“你想要啥东西，”拿破仑继续说，“小时候我祖父总是说，你就得知道那东西已经在那儿了，你只需睁眼去看，然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得到它。因此，如果你需要驯鹿肉，你一开始就得去找陷阱，编好套，然后去查看驯鹿路过冬湖、往南穿过树林通向陷阱湖或圆石湖的踪迹，然后驯鹿会自己套在那陷阱里，因为那是你布的，而且你早就看见驯鹿会套在那儿。”

刹那间，有一种感觉在亚当心中萌动，像一种顿悟，但那感觉立刻又消失了。

“你的意思是……做梦？”

“不是，不是，像做梦，但不是在做梦，不是，你实实在在会看到。如果你看不到了，也不要惊恐。如果你惊恐了，那就会使你变得渺小，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亚当下刀，准备切第二块肉，他想：也许这条鹿腿就是我今早踏着冻原上的积雪驮到这儿来的，是约翰·L打死的，像脱掉他的皮大衣一样刮了皮，然后肢解、打捆，只用了20分钟，接着，我又驮着这捆肉步履蹒跚地翻过两座山梁，走过一条蛇岭，额头





上的皮带越勒越痛,在这片无情、无尽的大地上看不见很久以前被驯鹿踩出的好走的路。我比这狗肋骨冻原上的老鼠还要瞎。

拿破仑好像是在凝视着那堆火。五块弯弯的鹿排围着跳跃的火焰,插着树棍斜靠近火,看上去活像残忍的巨人用油腻的手指拨弄的椭圆的七弦琴。

如果所有的事可以被看成是早已发生了的,那么再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拿破仑说。这话他已说了两次。

老人从地上站起来。“咱们去看看那些动物。”他说着,朝他们和湖之间冻原上的那块微微突起的山丘走去。亚当跟着他。没错,在那儿,驯鹿又回到那球状的小山跟前,当他们的飞机刚刚降落时,那些动物曾经在那儿出现过;不过,眼下他们离动物更近,因为暴风雪迫使他们转移了营地。

拿破仑举起手,又停了下来。从帐篷里走出来的猎人远远地在右边,成了许多黑色的小点。一动不动的动物,流云飞走的天空,一幅北极的景象。亚当朝前走,朝着驯鹿继续往前走。

一直走,直到那些驯鹿一头接一头,然后整群地跑开。在他面前,它们像流水一样在平坦的冻原上泛滥开去,大群的驯鹿突然狂奔起来,离他如此之近,他看到它们如何低下头准备奔跑,如何在风中扬起鼻孔,他能听见鹿蹄嘀嗒,发出雷鸣,看着它们朝右奔去,消失在一座狭长的小山背后,远离猎人,最后又出现在远处的平地上,仍然在奔跑,只是又向左折回头来,直到爬上一条逶迤的山梁,在那儿,那些高顶着鹿角的渺小身躯朝南走去,高高地迎着那片苍莽、流云的天空。

亚当最后转过身,拿破仑仍然没动。老人默默地看着他,没有一丝表情,甚至连那双疑问的眼睛也毫无表情,亚当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朝它们走去,直到它们跑开,我干吗这样做?我干吗这么蠢?

火堆旁，插在树棍上的黑乎乎的鹿排还烤着。凯西弯下腰，抱起一堆他们切好的肉条。她开始往他们系好的那根绳子上挂肉条，那绳子一头系着帐篷，另一头拴在远处凹地的一棵矮云杉树上。亚当聆听着融雪的响声，空气平静得宛如盖了张毛毯。

凯西问：“你有你恋人的照片吗？”

“哦，有。”亚当回答。他切好的鹿肉看上去简直就像人体的肌肉；如果他死了，也许也会像这样，有人把他切成一条条的，风干，一模一样，他的肌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要少得多，让别人没法活。

“我能看看吗？”凯西转过头，朝他咧嘴笑了笑，肌肤和颀长的侧影像古典的埃及人。“她的照片？”

“可以。”亚当伸手去摸鼓出的钱包，就在他撩起皮大衣的衣边，在裤腿那地方他突然在大衣上擦了擦手，油腻的手，这是他母亲教他决不能做的动作，也是试验室里无法想像的，嘴巴在说，不停地说：“很小，在公共汽车站无聊时照的，大都发灰，照的不是她一个人，在埃德蒙顿，你把头伸进一幅帘子，她坐下后，当时我也想照，于是也把头伸到她旁边，正好这时，那傻瓜相机一闪光，苏姗娜当时正要问我……”

他喋喋不休，好像晕了头。

亚当想告诉这位冻原上的女人，从今往后他将不再去求任何东西了。他至此所经历的生活往事，以及他即将经历的更长的生活，他异乎寻常的人生，正如他在奔跑的驯鹿群中所看到的，早已完美无憾了。





第5章

夹舌钳

1573 年,佛兰德地区 安特卫普城;

1638 年,但泽

我于 1570 年出生在佛兰德地区安特卫普城自家的石头小房子里,这房子坐落在奥德纳尔德湖畔。我被取名叫简·亚当·温思。那是个恐怖的年代,乌得勒支省红衣主教安托万的宗教法庭^①残酷无情,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②率领的西班牙军队肆虐横行,西班牙暴政在煎熬着低地国家^③。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腓力二世自以为是反宗教改革的勇士,他的军队对异教徒和异端者一律格杀勿论,他用从美洲运来的整船金银打点那些雇佣兵。在新大陆的金矿里,人们因劳作而死,可在旧大陆,人们却因宗教迫害而死。一天清晨,我们的母亲被带出去杀害了,那时我哥哥阿德里安·温思 15 岁,我 3 岁。

在安特卫普的广场上,高耸着圣母大教堂。虽然教堂的尖顶

①安托万·裴诺纳特·德·格拉维尔(1517~1586):法国外交家和高级教士,神圣罗马帝国君主、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顾问,1559-1564 年任荷兰议会议长期间,引入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引起反抗,后腓力二世被迫将其召回。

②尽管腓力二世召回了安托万,但荷兰等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仍接连不断,为遏制以奥林奇王子、荷兰总督威廉一世(1533~1584)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反抗,腓力二世派遣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率军镇压。

③指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

尚未完工，但高度早已超过了面朝新市政厅的那幢七层楼的高房子。阿德里安爬上一条长凳，按照母亲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所嘱咐的，把我高高举起：“为了我，常抱抱你弟弟。”他尽全力把我举高，好让我俩都看得见母亲是怎样被烧死的。但是，当刽子手把我们的母亲绑在柴堆中的木桩上时，阿德里安昏了过去，倒在鹅卵石地上，当然，人群里没人注意。因此，实际上我俩谁也没看见她是怎么烧死的。

1573年10月6日。不论我怎么苦思冥想，脑袋里却一片空白。毕竟当时我只有三岁。可我妻子简莉肯却说她记得所有的事，不仅记得那年的9月6日她父亲汉斯·范·芒斯托多普单独一人被大火烧死的情景，那火太大，把围观者逼到一旁的街道，大家担心那火会烧着周围的房子，还记得后来的四次火刑。刽子手有了一个月的经验，因此火势控制得更好，燃得更慢，更折磨人，她母亲简莉肯·芒斯托多普，我母亲迈肯·温思，还有她的姐姐，我的姑妈玛丽肯和莉斯肯·丽温丝就是这样被烧死的。

“根本不可能，”我对简莉肯说，“你父亲死时你还没出世，你母亲死时你才不过刚满月。”

“我知道，我知道。”她用低低的、柔和的声音答道，边说边扬起那张娇小的脸看着我，表情像大主教一样庄严。“但我确实看到了。”

“怎么看到的？”

“我看见父亲的死，是因为我母亲看到了，那时她正怀着我。正因为这他们才没把我母亲一起烧死。而是等我生下来后才烧的，为我找了个奶妈。”

“这个我知道——可你怎么能说亲眼看到他们被烧死？那时你还没满月。”

“奶妈把我带去广场的。”





“可那时我都三岁了，啥也记不得！”

“要是你啥也记不得，你又怎么知道发生的事情？”

“阿德里安告诉我的。”

“可他告诉过你，不止一次，说他当时昏倒在地。你的伤疤足以为证。”

“事情的前后他看到很多了。”

通常，我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也没法说。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火炉边，一起温暖，一起沉默。她织着毛衣，我拨弄着火堆，从吊钩上取下或挂起水壶，里面的开水咕噜作响。阿德里安把愿意告诉我的全对我讲了，如今他已不在人世。当我和简莉肯谈起那段岁月，有时要相隔好些年才谈起，我们就像一对共同生活了47年的老夫老妻在聊天，知道自己还会一次次地回忆起那些恐怖的记忆，有时是偶然的，有时好像能够暂时承受。我们就是这样来到这世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以上帝的宽恕去忘记过去，那就以上帝的仁慈去记住它。

有时，当我忙着劈开或打磨石头，想造成所需要的形状时，我看到自己那双带有伤疤的手和那些工具总是在一点点地削去早已存在的东西：我们那无法削去的往事。那些往事犹如一大片无法减少的石头包围着我和简莉肯。手、锤、凿子、石头，还有这些年的生活，我们一直想把它们劈开、打造成恰当的形状，好让它们适合。

适合什么？怎样适合？如果你能记忆犹新，你能按照凿石的方式重造恐怖？为何要重造它？重造什么？

“要不是你父亲逃到弗里斯兰省，他们也会把他烧死。”简莉肯突然冒出一句，打断了我的沉思。

“那既然我母亲知道，为什么她还写信给他，要他去监狱看她？可他没去。”

“他把你和阿德里安送去，他知道他们不会害孩子，尤其是

没受洗的孩子。”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记不起了？连牢房黑暗的斜顶，石头的霉味，丁点儿记忆也没有。我14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阿德里安决定我们必须离开弗里斯兰，永远离开。他把我带回安特卫普，好让我对母亲死去的地方有些记忆。斯海尔德河畔上停泊的船我数也数不清，排列整齐的船帆要么卷起，要么张开，像天上的云一样白。可我们没时间去看行船，只是凝视着矗立在码头水面上那座埃特斯特恩城堡的石墙。石头凿得都很精细，安放得很精巧，单是那些拱形的大厅就可能容纳好些赞美上帝的唱诗班，他们的歌声飘过水面，鼓舞着旅行者去探索这地球上无边无垠的大海。700年来它一直是国王的城堡，如今却成了一座地牢。誓不反抗的基督教徒们被锁在这里呻吟，他们的躯体被打得皮开肉绽，流脓腐烂。

就像我们的母亲。4月被捕，经历6个月的折磨，10月烧死。阿德里安告诉我，我曾两次与母亲一起住在这石牢，住了几个星期。

简莉肯说：“他们只能做这些。你的父亲活着逃出安特卫普，干活挣钱送回来，好让4个女人在牢里吃得好一点，住得干净点。”她冲我笑了笑，那脸简直就像她母亲，活着的记忆，无需凿刻。“这样，我就不会降生在水下地牢的老鼠堆里了。”

“6个月。她偷偷送出过两封信，可我父亲一次也没来看过她。”

“你怎么知道他从没来过。”

我不知道。问题就在这儿。不管你怎样经常翻弄自己的那些记忆，你所知道的仍然有限，你依然知之甚少，意识不到你还想知道些什么，以后你还迫切需要了解些什么。而当那个以后来临，伸向无尽的未来，你能有何作为？

记住不能忘却的一切，哪怕是点点滴滴。晚霞倾泻在安特





卫普的码头上，河水铮亮，在城堡的映衬下像是被擦亮的钢铁，我与阿德里安最后离开了。穿过狭窄的大街来到大广场。当时只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男孩走过，很安全。我们的周围矗立着市政厅，石板屋顶像翅膀一样倾斜着，拱门和窗户是雕琢而成的，还有许多紧凑的、房顶漂亮的房子，在傍晚平射的光线里，我们仿佛站在一顶巨大、燃烧的皇冠的阴影里面。大教堂的尖顶还没完工；加尔文教徒暂时把持着这座城市，他们把天主教徒的摆设扔出教堂，也就在这时，红衣主教安托万和腓力二世也在低地国家的其他地方忙着烧死天主教异端。在欧洲南部，加尔文教徒像烧死天主教徒那样，很快地烧死再浸礼派信徒^①，他们称之为再洗礼者，但在安特卫普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其他方式折磨他们，如不许他们工作，让其饿死或背井离乡。

阿德里安把安放那条他曾爬上去站过的长凳的地方指给我看。他告诉我，在凳子上，我俩把脖子伸过众人头顶，想看到那四根高高的火刑柱。刽子手把那四个女人推上去；他们是用大车把她们从我俩刚刚去过的大教堂那儿运来的，走的就是我俩现在走的这条街。那时，喷泉还没有，耸立在喷泉之上的那尊罗马士兵的雕像也没有，他朝着斯海尔德河面高高举起那只被砍掉的巨人之手，用他的这个姿势挑战暴政，表达这座城市名字的含义：安特卫普，意思是“扔掉那只手”。

阿德里安和我站在那儿。或许他在祈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可我的脑子啥也不肯想。过了一会儿，阿德里安朝另一条街道走去。慢慢地走了十来步，我们来到一处卵石铺成的三角形广场。我抬起头，仰面看，面前是那座圣母大教堂。

当时，这教堂被加尔文教徒取了别的名字。但当最后一批

^① 16世纪20年代发端于瑞士、后流行于德、荷等国的基督教一派，他们认为婴儿受洗无效，成人后应再受洗礼，并主张不抵抗主义和政教分离。

信奉再浸礼教义的门诺派教徒离去，当亚历山大·法尔内塞^①和他的军队继而为维持辉煌的罗马天主教信仰而杀戮加尔文教徒、摧毁这座美丽城市的大半之后，我们的圣母又一次头戴巨型石冠站了起来，身穿她蓝色和金色相间的衣袍，头上的王冠比头高出三倍，左臂高高地搂着头戴王冠的小圣子。如果像他们所说，圣母和圣子不会睡着或晕倒，那他们强迫了多少千人来观看火刑？据说，光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就赶来了18000人。

我还记得向圣母倾诉的温情的祷告：“圣母玛利亚，您的圣子耶稣被缚于十字架的最后时刻曾把吾等托付于您的母爱之下。吾等向您祈祷，眷顾您的这座城市——安特卫普。”但这祈祷对我没啥用处。我没有母爱，谈不上忘怀。

简莉肯说：“可简·亚当，你有。我和阿德里安不是给你讲过那些事？”

有时候，我的脑子昏沉，甚至记不起那些事。那四个用铁链锁住并受尽迫害的女人，简莉肯说她“认识”她们，在她出生前5个月和后来短短的一个月里，她跟她们一起坐地牢。

“你母亲写信给你们，”简莉肯坚持说，“为了我，为了记住我，你们相互亲吻一下。我祈求你们，善待你们历经磨难的父亲，不要让他伤心。”

“阿德里安的儿子有那封信，第一封和第二封全在他那儿。”

她答道：“可你看过她写的那些话，你都背得了。她这样写道：‘我对老大怎么说，对老二也这样说。记住我，为你们的出生吃够苦头的母亲。’”

我接着对她说：“你母亲在死前的那天清晨1点也给你姐姐

^①亚历山大·法尔内塞(1545~1592)：意大利贵族，西班牙腓力二世统治下的尼德兰摄政，1585年攻陷安特卫普。





写了封信：‘这是给我女儿的棒针，好好收着，善待我这小女儿，她是我心中的小绵羊。’”

“对，”简莉肯说，“她写这话时，我正躺在她怀里。”

这些信，我心中牢记，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纸、关于褪色墨迹的记忆而已。既触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可是，我确实感觉到的是1584年把我和阿德里安全家运到但泽去的那艘船，摇摇晃晃，乘风破浪，船帆鼓鼓的嘎吱作响，那船在风的鼓吹下，船首朝下，哗啦啦地凿过泡沫，向着蓝色的大海驶去。起航了，我的人生旅程。

但泽是维斯图拉河畔一座富庶的汉萨城邦^①，在波罗的海内陆一英里的地方，被矮墙和那片名叫维尔达的咸河三角洲所环绕。但泽居民想拥有更多耕地来扩大他们的谷物贸易，因此他们欢迎门诺教徒来筑堤、挖河，在维尔达三角洲深耕细作，但在这座狭窄的城市里面，他们又需要更多的、只有这些荷兰人才知道怎么在狭窄土地上修建的一幢紧挨一幢的高房子。于是，在我15岁那年，阿德里安把我送到建房人在运河边的一处石厂，莫特拉瓦河就从那儿流过城邦的南墙，在城里形成了一座码头。

我是个苦工。我爬上驳船，一块块石头在甲板上堆得老高，我用铁链把每块岩石捆牢，以便吊起来，卸在石厂的码头上。我从未见过山，也不希望看到，但当我在这些巨石中攀登、平衡时，我开始领略那起伏连绵的山岳，这些石块就是从那里采来的。我的木鞋紧扣住它们的锐棱尖角，我的手臂抱住它们，尘土斑斑。当时，我意识到（假如我的脑子能意识到的话），在这儿，永恒世界的这些石料在磨损我的手指。

为躲避宗教迫害逃到但泽来的门诺教徒可以在城里干活；

^①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以德意志诸城市为主。

但不能住在城里,也不准拥有城中的房产,因为他们不是公民。于是,他们在城墙外面、在尽可能靠近城墙的地方建起自己的村庄,弗里斯兰人在哈格尔山以西的纽格登,我们佛兰芒人住毕晓普斯山下的皮特夏根南门外。就是在那儿,在一个夏天的礼拜天,我和简莉肯在教堂里见面了。

她对我说,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她说,第一次是在我们母亲的死牢里。尽管她经常提醒,但我不记得当时她是否说过那话。我只记得她站在那儿,褐色的衣裙打着宽宽的皱褶,外面围了条白裙,泛红的头发挽起,收进一顶盖住耳朵的白帽子里面,那只努出的小嘴在动。我整天都在搬运石头,猛地,在我的面前圣灵显现了:我感到仿佛上帝用两只手捧起我的头,拧正后对着我的脸说:

“简·亚当·温思,看着这瘦弱的女人。她就是你妻子。”

简莉肯让我领会并且接受了父亲给予我的那无可否认的遗传:一双泥瓦匠的手。我成了但泽石匠当中的一名学徒。用手、凿、尺、线和锤,我不仅学会如何从手中的石块去看山的模样,而且在打造它们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满足,有时近乎于幸福。同时,我还感到它们在练就我手臂和后背的肌肉。

那是我学到的最好的手艺,也是最有限的。因为通过石头去看山的模样,这不能教会我去认识那些更小、更精巧漂亮、门诺教派最伟大的石匠在这儿的造型。第一位大师是威廉·范·德·布拉克。为了躲避阿尔瓦公爵的迫害,他逃出安特卫普,但泽给了他许多建筑任务,包括宏伟的大城门,每年波兰国王的仪仗队进城必定经过这门。我从没有帮威廉大师干过活,可我为他儿子亚伯拉罕·范·德·布拉克打过石头。他虽不像他父亲是个天才的雕刻家,但肯定是个杰出的建筑师;甚至比哈灵根的亚当·威伯更优秀。

有一次,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在亚当·威伯负责的市中心





的重建中，我们在皇家步行街上修建那座“海神之泉”，亚伯拉罕对我说：“简·亚当，因为你，我要感谢上帝。每天如此。我能设计喷泉，威伯能引来活水，但只有你才能裁出这么完美的石头。”

他塑造了海神尼普顿的形体，它的三叉戟和小水池，然后在奥格斯堡铸成青铜像。我为喷泉修建了一座宽大的石头基座，如今，经历了370年的战争和重建，这基座还矗立在长街上，这条街逐渐变宽，通向市中心的市场。喷泉对面那幢阿瑟式的建筑精致的门面也是我打造的，被称作意大利北部至今尚存的最精美的文艺复兴建筑。也许是吧！当阳光在石头上交相辉映的时候，我总在想，任何人肯定会感到它的无瑕和宁静。

简莉肯的个儿太小了，而我却太高大了；火炉旁，在我对面，她正唱着歌。她把佛兰芒人的那首古老的跳绳歌织进了棒针咔哒咔哒的碰响声中：

“噢，虱子，虱子，
比老鼠还坏的虱子，
光顾你一次，
把你烦个死，
高贵威风的龙瑟主教^①
要让你不得好死。”

我附和着她，唱起了关于彼特·泰特尔曼主教的顺口溜：

“彼特，彼特，长鼻子彼特，

^①即现在的比利时龙瑟地区的主教，名叫彼特·泰特尔曼，主持宗教法庭，因用虱子咬死异教徒而著名。

你的鼻子，翘得太高，
大风吹来，脑子空了，
两只耳朵，通风真好。”

简莉肯接着讲道：“一天晚上，高贵、威风的龙瑟主教赶着马车来到一家旅店。”她的声音变得轻快起来，好像又在给我们的6个孩子讲这故事。这些孩子们以及他们身后的孩子们将把这故事融进他们的血管，传给后来的世世代代。“在那儿，主教遇见了科特里克镇的法警，他早坐在旅店里面，正享受丰盛的羊肉晚餐，还有水煮的火烤的嫩牛肉，还有鸡和7种奶酪，既刺激又味咸，正菜以外的是各种贝类，白白的面包松软得能蘸干嘴上的肉汁。”

我也加入到她的讲述中，像我们经常装扮不同的角色那样：“‘我最仁慈的主教’，法警说着，鞠了个深躬以便藏起自己的笑容，‘您又出行了。’”

简莉肯答道：“‘当然啰！’”主教正说着，那个忙献殷勤的旅店老板帮他从宽阔的肩膀上脱下毛皮斗篷，那斗篷质优、厚重，最适合在教堂这种地方披挂。接着，他坐在桌旁，毕竟，法警的级别与他相近，他可以体面地坐下来，甚至与他共进晚餐。“你不知——主教告诉法警，错用了耶稣的话，‘我应与我父的事为念吗？’”^①

我扮作法警说道：“‘这个当然，我的主教大人！因此您又要到处周游，给灵魂送去神圣的关怀。或者又要去猎杀异教徒了，对不对？’”

简莉肯说：“主教回答：‘你了解我，孩子，’然后疲倦地叹了口气，像是在祷告一样把那双柔软的大手放在自己滚圆的大肚

^①此句引自《圣经》《路加福音》(2:49)，原句是耶稣对前来找他的母亲说的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吗？”





子上。‘教会得时刻警惕，不得有片刻懈怠，否则罪恶会猖獗！’”

我说：“法警用手捂住嘴，用迷惑不解的口气问：‘大人，和您一样，我也到处周游，履行我的职责。我逮捕坏人、小偷、杀人犯、奸商、残暴的违法者。通常，我必须带上至少9个人，有时候12个人，才能实行抓捕，可您最多只带两个仆人，还有您那个能干的铁匠，好锻造合适的镣铐。要是我也只带这么少的人出去，我连一天也没法活。对大人您，这怎么就可能？’”

简莉肯说：“主教挨个儿地摸了摸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对这样的无知笑了笑。‘我用不着害怕，’他说，‘不管去哪儿，我都代表上帝的权威，而且我只抓那些从不给我带来危险的好人。’”

我说：“法警答道，更加糊涂：‘可是大人，要是我全抓坏人，您全抓好人，那么，我们这地方还有谁能跑得掉？’”

简莉肯的棒针停了下来，我跟着她的目光，朝我们家傍晚火炉里那堆矮矮的蓝火焰看去。她接着说：

“没过多久，上帝本人来到主教在科特里克的王侯般的宫殿，给他带来一个奇迹。他身上长出了虱子。虱子像草一样在他的身上疯长，数目之惊人，连他那不计其数的仆人也来不及给他洗身，给他拿衣，洗掉虱子，让他保持干净。他们从他身上刮去的虱子越多，虱子繁衍得就越快。天天如此，周周如此，月月如此……最后，在主教富丽堂皇的床上，他死了，死得很可怕。”

我妻子朝我看了一眼，她嘴角是不是有一丝微笑？我说不上。火光太黑。我接着把这故事讲完：

“四个女人虽然提心吊胆，但她们还是进来把主教抬出去埋了。在她们面前，第二个神迹又显现了。当她们掀开床单，只发现可怜主教的那具干瘪尸首，并没看见一只虱子。”

我和简莉肯经常相互讲述这段神奇的小故事；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如今，他们已经长大了，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俩把我们自己看做是第三个奇迹：在但泽，在远离安特

卫普的地方，在我们的母亲被铁链锁在各自的火刑柱上最后相互鼓励的20年之后，我们相遇了。她们只能用眼神来鼓励，还有呻吟；在升腾的火焰中，她们相互既不能唱，也无法喊出自己的信仰，因为她们的嘴被夹舌铁钳固定了。

等我长大能听懂这个故事，阿德里安给我讲了他如何从晕厥中醒来，如何站起身，发现大广场上已空无一人。只有烧焦的木桩和灰烬，冒着青烟。他说，我当时肯定一直在他身边，因为我头上流着血，看着他在那堆灰烬里寻找着什么。

我问他：“你找啥？”

他把我举了起来，尽管后来我长得比他还高，比他还魁梧，但他依然是我的大哥哥，满腹确切的事实和英明的决定。他说：“没有……道理，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看不见，那个时刻看不见。我根本没看见发生的事，现在啥也没了，这广场空了，没一个人，烟从那堆木桩和灰烬中冒出来，刚才我看见妈妈就绑在那儿，突然，我知道了，亲爱的上帝来过，他用手臂托起我们的妈妈径直去了天堂，事情就这样，她消失了，众人也都散去，各自回家了，我用脚踢着那堆可恶的灰烬，啥也不是了！我的脚碰到一件又尖又烫的东西，于是我大叫了一声，我正用脚在卵石地上踢那根木桩上的余烬，你这时走过来，弯下腰，把那东西捡了起来。”

我知道我是捡了。手上留下了很深的疤痕。每天我都能看到这些伤疤，因为我是用的手，凑得很近。我肯定是用右手捡起那副夹舌钳的，右手拇指和其他两根手指都有伤疤，然后我又把它放进左手手掌，左手被烫的痕迹更深。阿德里安告诉我说，他能闻到我左手烧焦的糊味，但是我却一声没吭。

我师傅亚伯拉罕·范·德·布拉克死于1628年的1月28日，在他父亲威廉大师去世仅一周之后。虽然两人都没获准住进但泽，因为他们既不是公民，也不是天主教徒或路德教会信





徒,但他们还是得到了全城送葬这样的最高礼遇,而且被葬在圣母玛利亚大教堂里面。

我母亲迈肯·温思没有墓碑,她的姊妹玛丽肯和莉斯肯·丽温丝也没有;我妻子的母亲简莉肯·范·芒斯托多普也一样。她们被烈火烧化,从地上升往天堂,她们离我们而去,在我们的视线以外,一柱白云接受了她们。但她们焚身的地方依然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城大广场上的那座“扔掉那只手”喷泉矗立的地方。

我和简莉肯至今还保存着那儿根棒针,还有那把夹舌钳。有时候,我把它拿在手里。我把粗糙的食指和中指插进去,像我母亲的舌头一样正好合适,这刑具是量身定做的。简莉肯对我说:“忘了吧,无须记忆。”

主教安托万·裴诺纳特·德·格拉维尔下令,在前往行刑的路上,被判死刑的异端者无须再当众认罪,更不准再唱歌,尤其是殉教者的歌曲。对忠实于教会的人来说,她们太蛊惑人心了。因此,在行刑的那天,龙瑟主教的那位能干的铁匠带着他便携的炭火炼铁炉来到埃特斯特恩城堡的地牢。执行官命令我母亲伸出舌头。她说:

“爱主吧!他将永存!”

然后,她伸出了舌头。

铁匠把那块弯曲的铁钳塞进她嘴巴,夹住舌头,直到铁钳两边把她的嘴唇撑得再也张不开了。他取出铁钳,用榔头再敲紧一点儿,然后又塞进她嘴里。他冷静、熟练、习以为常地在女人那张战栗的脸上干着这熟悉的活。他把铁钳拧到舌头不再冒血为止,最后,为了确保它不会滑落,他用钳子从火中夹出一块白炽的铁,放在我母亲的舌尖上。

第 6 章

曼哈顿

1616 年，佛兰斯兰省 哈灵根

但泽

几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将这样写道：我，亚当斯·威伯，于 1585 年出生在弗里斯兰省的哈灵根，可我母亲却说，我的出生是在 1584 年的 7 月 12 日。她说这一天很容易记住，因为她在生我的时候，听到哈灵根鱼市场上有信使在喊，说我们新教徒的君主、统治奥兰治和拿骚的威廉王子两天前被暗杀了。被一个天主教狂热者用子弹打死的；我们残忍的敌人、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肯定为他的死付了钱。

事情发生在代尔夫特，穿过田野，沿着堤坝，走一个钟头不到的路程就能到达海牙，在那儿，西班牙宗教法庭曾于 1527 年审判并烧死了我的曾祖母韦恩肯，因为她只承认自己信奉基督，以及弥撒的面饼，实际上是面粉和酵母做的。

13 年来，威廉王子率领荷兰人交涉谈判、残酷斗争，直到西班牙和罗马教廷让步，同意他成为我们荷兰联合诸省的独立总督。多少次，靠着利剑和谈判，他保护了门诺教徒不受迫害。如今，当听到他的死讯——特别是他最后的那句话：“啊，主呀，怜悯我的灵魂和这可怜的国家吧”——哀号声响彻云霄。我母亲嚎啕着，晕倒在她的鱼摊旁，等苏醒过来时，她正在分娩。





“那么你干吗不给我取名叫威廉？”我问她。

“不，不，你得叫威伯。”她说。“威伯是你的曾祖父，他死后，特丽珍·威伯成了你祖母的名字。你是两代人中的第一个男孩。彼特斯·威伯在1526年死在海上，要不，海牙宗教法庭的法官会把他和韦恩肯一起烧死。”

“不管怎样，他死了。”

“不，不，”母亲针对我的语气说道。“那完全不一样。大海永远都是上帝造就的那个样，可人……我们这些人可以从善从良，或常常却跟随邪恶。战争、仇恨、报复、恐惧……我们善良的威廉王子在与西班牙军队和耶稣会^①会士打仗时曾写信给腓力国王：‘上帝造人，不是作为国王或主教的奴隶，听从他们不论是对是错的命令，而是要国王为了他的臣民，关爱、支持他们，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像牧羊人对待他的羊群，如基督所教。’”

“基督教的这些话说得好。”我告诉她，“如今，笑话我们的是加尔文教信徒，不是天主教徒了。”

“一点笑话总比肚皮上戳刀子强。如果让他们高兴……”

“高兴！他们早上往河里倒马桶时就冲着我喊‘门诺教徒出嫁啰’^②！”

“威伯，威伯，”她叹了口气，“挨骂算啥，又没把你活活烧死？”

“我上算术课连老师都算不过我，可就因为我是门诺教徒，就上不了莱登^③！”

母亲没有抬头，手不停地编织，浓眉下的那双眼睛盯着我。她能看懂用德文、荷兰文和弗里斯兰文写的《圣经》，5位数的乘法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来，她就能心算出答案。她的手继续有节

① 1534年由伊格内修斯·罗亚拉所创的天主教一修会。

② 把早晨倒粪与门诺教徒结婚联系在一起，作为侮辱门诺教徒的脏话。

③ 即荷兰著名的莱登大学。

奏地拉扯,把那根毛线织成我穿的厚毛衣,能抵挡无垠大海上的任何一次风暴。她再一次对我说:

“上帝把海里这么好的鱼给了我们。你何必去大学听自以为是的教授对你撒谎?”

教授都是些撒谎的人吗?我自己没法去证实,因为我从没去过大学,可16岁之后,我也没时间去抓鱼了。当受到暴力威胁时,誓不反抗的门诺教徒只能做两件事:能找到地方去就逃走,或建座庇护之地把自己保护起来。15年来,我在弗拉讷克、利瓦登、博尔斯瓦德和斯内克帮人挖城壕,建城墙。世上那些军械师在铸造越来越威力强大的火炮,因此我重新设计了哈灵根码头上我们那座小堡垒的围墙和棱堡,对于那些无法从海上逃走的市民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避难地。我30岁那年,但泽市政议会邀请我去他们的城邦,为逃避西班牙人而跑到维斯图拉三角洲的门诺教徒们也写信给我。他们说或许他们逃得还不够远,虽然在但泽附近他们没有因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可更多因政治而爆发的战争却在践踏他们的村庄。

他们写道:你知道怎么筑堤修墙、引水治水,请来我们这儿吧,保护我们,还有那些庇护我们免遭凶残国王迫害的好人。

奇怪,奇怪。我祖母、母亲,还有后来的妻子都会织毛衣,织手套,织围巾,织帽子;她们把布、皮革缝成衣服,好让我在干活时不会挨冻,不被浸湿。在海上,在岸上,没有这些保护,我肯定会受冻,会死去,就像成千上万被我修建的城墙保护着免遭军队灭绝的人们一样。整个欧洲都在盛赞我用泥土和石头修建的建筑,国王们称之为非凡,可是,我母亲、我妻子所修建的“墙”把我这身躯围得严严实实,以至于我忘了去注意自己是如何备受呵护的,然而,她们并没得到赞扬。她们只是在做女人该做的事:保护。

我的脑子里充满着自己一生遇到的那些连绵不断的战争,





那些由自私的王子、主教、教皇、苏丹、国王、皇帝、伯爵和“基督教伟大的解放者”传教士路德和加尔文^①（虽然他俩早已呜呼了）所发动的种种难以想像得到的野蛮暴行的战争，他们用从美洲新大陆运来的整船的金银雇来越来越多的兵士去摧毁村庄，屠戮牲口，糟蹋妇孺，去让人设计更可怕的枪炮，如今的士兵居然一个人就能把它扛在肩上，瞄准目标，独自杀掉所有的人。1615年，当我正在考虑但泽城的邀请时，欧洲即将陷入“三十年战争”^②血腥的深渊。

当然，我不知道这些。但我觉得我那位杰出的建筑师傅——德莱普岛的简·阿德里安·利瓦特预见到了。

简·阿德里安教我领会建筑，教我如何从赋予我们的事物中求得合情合理的美，尤其是对水这种绝对的、不可破坏的连绵的依傍；教我如何从散乱的事物中、从那些在想像之外熠熠闪烁的似乎是不可能的碎片中去感受精神。当听说伽利略和他发明的望远镜，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

“想想看！”他叫道，“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星辰以外的地方，也许将看得更远，看懂人类是怎么活的，为什么活。”

当时，我不明白他的话；他的思维好像在转圈，可就我所能理解的，望远镜的奇特在于能一条直线看得尽可能的遥远。在德莱普，有时他也上台说教，但不太常有，作为他的学徒，我从台下门诺教徒的脸上看到了同样的迷惑，因为他卓越的实践经验仿佛把他的精神提升到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令人困惑的神秘。靠这些实践经验，他能设计城墙、磨房、溢洪渠，或设计水闸和堤坝，排干哈莱默湖的大片湖水，让德莱普岛镇成为荷兰最肥沃的

①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

②指1618至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产粮中心。但他在讲坛上的敛心默祷却没法开启德莱普的这些勤劳男女的心灵。他们变得不安起来，更加坚定地站到了固执己见的立场上。

对任何一个荷兰人来说，要做到固执己见从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对我们这些“闷声不响的弗里斯倔佬”而言，那几乎成了习惯。在17世纪，哈灵根有几支门诺教派，他们所固执的倒不是要不要行浸礼，或要不要拒绝拿枪去打仗，而是那些关于《圣经》的细微末节的诠释，就我看来，在神学上这些诠释没有什么分歧。简·阿德里安从没被邀请到哈灵根的任何一次门诺教徒集会上说过教，最后一次去哈灵根时，我和他连周日礼拜也没去，整个下午，我俩在春风中散步，一直到傍晚，来到哈灵根码头的外墙上。

在瓦登海的尽头，黑乎乎的维尔兰德岛和泰尔斯海灵岛托着夕阳燃烧的火球。它平射的阳光把大海釉成了一面深红色的镜子。

我俩被生活中的景物所包围。我们能听见从陆地排进运河的水声，周围，嘎吱嘎吱的风车把水抽起，最后排进大海。那是个无云的傍晚，但我俩更情愿站在雨中、风暴中，因为简·阿德里安喜欢看着水从天而降，流进耐心等待着的土壤，或凝视狂风和大潮带着巨大的能量驱赶着层层海浪，涌过沙滩，撞向陆地，永不停歇。他说，要是能建一台机器，像四平八稳的大风车收住每股吹过的风那样积聚海浪的些许能量，那咆哮的大海撞击在码头那短短堤坝上的能量就可以被用来把弗里斯兰所有的麦粒全部磨成面粉。但这大海有时毫无动静，有时却雷霆万钧，思索了20多年，他依然想不出如何掌握那能量，哪怕是一瞬间。

可是，那天傍晚，他没有去想摄取莘莘万物中那深不可测的能量的机器，而是对我讲起他终于建好的钟状的潜水器，像个倒扣的杯子，隆起的穹顶能保留空气，他钻进这东西能在霍伦港口





的海底行走几乎一小时。在防浪堤以外,在水下一片死寂中,他站在一年前在海港的入口撞上流沙的浅滩而沉没的那艘船上。

“有了这个潜水器,我们就能勘察任何港口的海底。”他说,“这样,人和船再也不会撞上沙滩遭损失了。”

“你自己钻进去,下到海底?”

“我造的这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学徒先下去?”

“你如今是个在水下行走的人了^①。”我惊讶地说。

在平射的光线中,他的髭须和尖尖的胡子与远处的海岛一样,仿佛燃着金色的火焰。这时,我发现他正在想着完全不同的事。

他仿佛在燃烧的嘴张开了。“阿德里安·布拉克回来了,所有的人都没死,还有满满一船的毛皮和稀奇古怪的植物。”

那是霍伦最大胆的水手,两年杳无音信,几乎被人遗忘,以为死了。

“他去了哪儿?走了多远?”

“他顺着英国人海因里克·哈得逊逆流而上匆匆驶过的那条河慢慢探险。他说新大陆和海洋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得多。如果像他们那样,去美洲要航行3个月,那么他认为,去中国,如果能找到直道,依然还得航行半年。”

“他有没有带回土著?”我31岁了,但除了阿姆斯特丹,我从没走出过弗里斯兰,也没见过任何陌生人,除了水手之外,他们航行的路越远,喝的酒越多,讲的故事就越稀奇古怪。像阿德里安·布拉克这样的门诺教徒只能喝啤酒。

“不。他说他不会带任何人走,土著人到了欧洲就会死。他们对他很友好,卖毛皮给他们,帮他们顺利度过当地的冬季。那是个美丽的地方。他们管那地方叫曼——哈——顿;意思是‘天

^①相传耶稣基督能在水下行走。

堂般的土地’。”

“那些土著人知道天堂？”

“阿德里安·布拉克说，那是地上的天堂。一望无际的大树，在弗里斯兰咱们绝对看不到，还有肥沃的厚土，一座能免遭风暴袭击的海港，面朝着条条丰产鱼的大河。真像天堂一样。”

我的眼睛在光线下几乎看不见了；我曾祖父曾消失在西边的那些岛屿背后，如今，这些海岛好像大海天空上狭长的黑云，流动着变得有棱有角，每一缕云的上方燃着火焰：真像天堂。要是他不¹说，我根本想像不到简·阿德里安还会想其他的事情。

他说：“宗教法庭，后来是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用火烧咱们，可现在，在咱们之间，却为了比浸礼、面饼、公民身份、和平主义还空洞的神学上的分歧吵个不休。咱们自己把基督伟大的教义变成了一把把锋利的小刀，把咱们自己给割开。如果有人不同意咱们的观点，咱们就用《圣经》去攻击他。咱们就说，你¹现在已被排斥在信徒之外了，你现在必须受到孤立！于是，咱们就不能与你共餐，甚至说话——都为了啥？神学上的纷争越多，那串细枝末节的理由就越越来越长、越来越狭隘。”

“你认为……”我努力在理解他的语气。“你认为有一个新世界存在？这可能吗？”

“也许吧。按照阿德里安·布拉克所说，如果航行3个月或6个月以上，在可怕的大海上把自己彻底吐干净之后，也许就能找到。”

我俩咯咯地笑了。这世上最大的海洋是否足以荡涤许多基督徒的狭隘？我们在怀疑。

“他说生活在那儿的人们邀请他去。”

于是，我提醒简·阿德里安：“我也受到邀请，来自不同的方向，只因你不肯去。”

“你是说但泽？”他说道，像是深叹了口气，“波罗的海边的





那座伟大的城市？”

“他们确实需要帮助，许多门诺教徒在那儿找到了庇护。”

“是的。”他说，“因为有座城市、有个波兰国王为他们提供庇护，他们就往那儿逃。能得到勤奋的劳工，这城市这国王才不信什么宗教法庭。因此，如今他们不像咱们，周围都是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还有从狭窄的海峡过来的英国人，而是瑞典人、丹麦人、芬兰人、俄国人、波兰人，还有普鲁士人、撒克逊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更不用提那些遭到迫害的吉普赛人、犹太人，还有那残忍的哈布斯堡王朝^①和霍亨索伦王室^②，上百年来他们一直相互残杀，为的就是证明惟有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来统治整个世界，不论这世界有多大——就欧洲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却有如此的历史。像地中海，或耶路撒冷，充满了杀戮。”

“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我们相互杀个不停？”

“为什么？”夕阳沉下去了，我们消失在黑暗当中。“如今，在整个欧洲，上帝是惟一的理由。”

“你以为我们不会把这带到那个‘新世界’去？”

“当然，当然，已经是这样了，几百年了。不过……听起来好像是《圣经》里的事，很美，很遥远，在曼哈顿，地球上一个被藏起来的角落。”

“可你又能把天堂藏多久？”我问道，感到自己口气中带着讥讽，可我不由自主。自从但泽的市政代表来到哈灵根，他拒绝了他们却向他们推荐了我以后，我一直在梦想能在一座伟大城市中兴建所有建筑。“《圣经》中，约翰看到了天堂，一座高耸着城墙的巨大城市。”

①欧洲最老的王室家族，其家族成员从1273年到1918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

②12~13世纪统治德意志并向意大利扩展领土的王室。

“那是新耶路撒冷。”简·阿德里安轻声说。“我经常读《启示录》，心里在想：《圣经》描写的天堂不是一座花园，也不是幽深、隐藏的森林。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①”

我看着他，我记不得《圣经》里有这句话。

“天堂首先是女人，羔羊的妻。其次是座城。”

我能说的只是“这话啥意思？”

他无力地笑了笑：“你看出我们这些勤读《圣经》的人，我们这些死抠字眼的门诺教徒之间为啥会老这样争论不休了吧？我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描画，地球上关于天堂的一幅描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很多。对于我，最简单的是把天堂看做城市，不过这也够复杂的了，一座巨大的、亮如碧玉的城市，四四方方，坚固无比……而且，”他突然补充道，“一条河从那里流过，两岸长满生命之树。要是我们建一座美丽的城市，有条河……”

趁他沉默时，我说：“有条河流过但泽。”

在但泽港湾，我们的船乘着从波罗的海吹来的晨风，鼓起满帆，如列队行进一般缓慢地从维斯特布拉德河的沙丘之间通过，然后逆流而上驶进维斯图拉河弯弯的河道。但泽城的教堂尖顶和塔楼在太阳下熠熠发光，我数了数有37座还多，太阳低低地驻足于三角洲的天上，衬托出西边三座山峰的轮廓，山下就是但泽城，还有停靠在那里的来自各大海洋的船只的桅杆顶尖——我看见沿河边码头有22根桅杆，当我们从它们之间驶过时，卷起的风帆映出更浓重的光彩。我想起了平坦的小镇哈灵根，幢幢房屋拥挤在范哈林科斯马运河的四条插渠之间，矮小的城堡俯视着瓦登海。但泽城很大，被城墙和棱堡包围着，坐落在几座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21-9。





小山之下，离海有一英里远，城区往内陆延伸得更远。当我们向右从维斯图拉河驶进莫特拉瓦河，在城墙的塔楼之间行驶的时候，眼前的港口狭窄了，变成一街迎接我们的流光。我们的船首斜桅朝前指着，右边是荷兰人阶梯形的房屋，沿左边的码头是巨大的谷仓，无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乘着蓝色大船来到此地。真的，1616年的但泽在我看来仿佛是座用金子打造的、漂浮在北方漫长的夏日流光之上的城市。

可是，我这双建筑师的眼睛看得出，这城市根本不像“从天而降、浓妆艳抹的新妇”。它的围墙高不到200腕尺^①，城门也不是珍珠做的。河水浑浊、迟缓，铁门早已锈薄了，石楣和石柱因岁月久远和炮弹轰炸而变得裂痕斑斑。在低矮的城墙里面，当我们绕过那座古老的、阴森的城堡，我们看见太多的房子、集市、谷仓，用鹅卵石铺成的拥挤的街道，还有巨大的木制和铁制吊臂，相互挤得紧紧的，无论哪里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能让绿树扎根。

一座用石头、污泥建成的最世俗的水城。我来到了自己毕生事业的中心。

^①古代的一种长度测量单位，以前等于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或约等于17至22英寸（43至56厘米）。

第 7 章

信即所见

1986 年 埃德蒙顿

“你见过成排的死人吗？”苏姗娜问。

亚当的眼光掠过每晚要看的头一天的报纸，看着她；在床前暗淡的灯光下，她的侧影像是在梦境当中。

“我见得多了。”他回答说。“活的和死的，够多了。”

“不，不是某次的一具，我是指成排的，长长的一排。”

“长长的……人人都会死，人人都会跑去看医生，你没法阻止……你是什么意思？”

苏姗娜凝望半空，目不转睛。“不，我的意思是……”她的手做着刀剁的动作狠狠地剁过床铺，“人们一个挨一个地长瘫瘫地摆在地上，比如有上百人，全死了。”

“没见过，哪里见得到？”亚当低声说。“对，我见过。”

“在哪里？”

“电视新闻，人人都看得到，几乎每天晚上。”

“不，电视不算。”

“不算？我们第一次买电视机，第一次看的电视就是李·哈





维·奥斯瓦尔德^①夹在德州警察当中被打死，电视实况，如今，12频道又在播放带尸体的新闻，成天不断。”

“我知道，可电视无非是电在闪光，就像答录机上的声音。我是指人的尸体，就是父亲曾经说过的，像这样。”

她又做起刀剁的动作，从他的报纸上砍过；虽然她的手势很优雅，但令他感到古怪。

“什么？你父亲？”

可她仍继续说道，神情茫然：“而且作为医生，你所受过的训练也没用，太多了，你简直无法相信自己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你得一具一具地去摸那些尸体。”她的指尖一时间放在他的肌肤上。“每具人尸。”

“是的，那是触摸，是证据。”

“还有嗅。”她说。

“啊，肯定会臭的，用不了多久。”

“是的，会的。”

她那平静的声音好像让卧室的灯光暗淡了下来，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一间吊着树枝形装饰灯的饭厅里，坐在蜡烛当中，隔着桌子，她的脸像拉斐尔前派^②的画像一样，美得难以领会，一时间，他简直没法认出来。

亚当不得不转过头；许多年前，他们就像这样，不过没有坐在床上读书。

“除非天很冷，”她说，“比如二月，否则尸体发臭，很快臭气会特浓。”

“还有苍蝇和蛆。”他犹豫了，可她的沉默越来越长，他得打

①暗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凶手。他在押解途中被另一位凶手杰克·鲁比开枪打死，电视播放了当时的实况。

②19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的一个画派，认为真正的艺术存在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拉斐尔（1483～1520）之前，该派画风情调忧郁，用色清新，画法审慎而细致，代表画家有亨特、罗赛蒂、密莱司和布因-琼斯等。

破这沉默。“从好运堡来的有个提纳人，我给他缝刀伤时，他告诉我说，即使在像麦肯齐河这样冰冷的河水中，尸体肚子有气也要浮上水面的，被鱼啄过后，你常常认不出脸了，可尸体肯定会浮上来的……”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他笑了。“至少在水里！”

“在加拿大，”她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只是在工厂的灾难中看到一排排的尸体，像在斯普林希尔^①，或是1914年的希尔克雷斯特煤矿^②……”

在皇家亚力克斯医院的那些长长的病房里，受难的躯体被一排又一排地摆开，决不许简简单单地死掉；要是不重三叠四地用上据信是急救设备的辅助设施，那你就等着吃一辈子的官司吧——亚当把报纸揉成团，扔到地上，可苏姗娜继续说：

“……在希尔克雷斯特有189人。当人们把他们从山底下被炸的坑道里弄上来时，大家把零碎的尸体摆在矿井的洗衣房里，手臂、腿、头，大家试图把这些重新拼起来，好让亲属辨认——”

“苏姗娜，”亚当只好插嘴了，“你干吗提这事？”

“我们可以开车去希尔克雷斯特，五个小时，差不多是座鬼镇了，去看所有那些坟墓。”她说。“长长两排矮小的尖桩，几乎没有任何墓碑或名字，只有克罗斯内斯特山和美丽的山谷以及陷下去的草坑，像巨人的脚印，一个挨一个。”

在他旁边，她的肩膀光着，更丰满，手臂更短，双手更粗糙，跟珍妮不太一样——她是从不会唠唠叨叨，陷入对尸体的莫明其妙的幻想当中！他赶紧开口，免得露馅：

“好多年前，我们是开车经过克罗斯内斯特山的。你干吗提这个？”

她摸着他说：“想起尸体，我记起了那美丽的墓地。”

①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一煤矿，曾发生矿难事件。

②加拿大一煤矿，1914年发生矿难，死伤严重。





“是不是柬埔寨，那一堆堆恐怖的头颅？”

“不是，是尸体，一具具地摆开，一排接一排。”

他的脑子一转。“你说过你父亲”——他举起手剁过床铺，剁过她的腿——“他见过？”她点点头。“是那场战争，他见过成排的尸体？”

“嗯，在德雷斯顿^①，1945年2月的一个礼拜二。”

“他是飞行堡垒^②的地勤人员，在法国，他怎么会看到德雷斯顿的尸体？”

她把手指绞成结。“而且他说许多人绞在一起。13.5万人被活活烧死。”

“他告诉过你他亲眼见过？”

她那没完没了的父亲，关于“他的”那场战争，他的缄默没完没了。难道这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天很黑，他们看不清对方的脸庞，终于，他们听见海狸来了。

溪水淌过石头，水声从山崖那边传回来，像一首永无休止的催眠曲，他俩像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靠着桦树，身影变黑，融进黑暗。亚当肯定，在这儿他们不会见到任何人。在这寂静的夜晚，他们没有了名字，他们消失了。他们可以就这样站着，全身上下贴紧，等待着。

他们仿佛等了很久，等着那轻轻的溅泼声，等着他们跟前池塘水面上破水而出的声响，那声音不易察觉，一开始他们没有听出来，那东西仿佛只是条小船……白色的响动掠过狭窄的水域从长满柳树的沙洲那边传来，一阵很小的声音，好像有东西被拖过柳树林和桤木丛，或许是什么东西的身体，在桦树之间碰得稍响一些。接着是一阵唠叨声，仿佛有位年轻的技师和一位年老

①东德萨克森地区重要城市，1945年二战结束前遭轰炸严重被毁。

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B-17重型轰炸机。

医生越走越近，在预言着这个长班之后马上会发生什么，接着又是扑通一声，掉进他们面前的那汪难以辨认的黑水中！非常的笨重，好像用肚子扑水，接着又是一声扑通，他俩吃惊地相互用肘轻轻推了推：这是不是那些藏而不露、从没人见过的海狸？它们垒起的水坝在每一处河湾、每一段激流把溪水分成一截一截、层层叠叠的水上台阶，在那儿，20米长的白杨树被啃倒，像麦草梗似的，压在那些依然临时矗立的树干上。他俩紧张地朝前走，更轻地碰碰对方，希望并且提醒对方不要发出一点声响，接着，在依然无形、突然寂静的水面上，他们看到了一行被慢慢拖曳出的星光。

“看那儿。”珍妮低声说。

亚当感到她的手臂在扬起，咯嚓一声，墨绿色的水泛起一团耀眼的光。一颗海狸的头，一小斑尖尖的头很快转过去，消失了，黑黑的背峰和尾巴“啪”地一声，轻轻一翻钻进一团浑水消失了，除了展开的涟漪，什么也没了，亚当几乎大声骂了起来，可还没骂完，那颗头又冒出水面，光集中在那头上，“哗啦”！悬崖将那巨大的声音挡了回来，像棍打的声音，水炸开了，好像在黄光中砸成了碎片。接着，又是一下太迟的击打，又是一声“哗啦”！把那些碎片又砸成了碎片。

“我砸中了吗？”

“嘘，好像没——”珍妮小声说。

又有颗头冒了出来，鼻子在被冲破的水面上高高地转着圈。是不是开头的那只？还是它的伙伴，愚蠢地迎着那无罩的灯光扬起鼻子，朝那无形的黑暗里嗅。

亚当扣动扳机，稳住身体，这一次，巨大的爆裂声几乎是同时的，震耳欲聋的声响榔头般撞击着他们的头脑，持续不断，与此同时，那灯光摇曳不定，搜寻着池塘。渐渐地，激流又恢复了它以往所坚持的轻响。被搅乱的水面上一无所有。





珍妮用手臂抱住自己的头。“可爱的耶稣和玛利亚,那是自动的?”

“半自动。”亚当说。“我一开枪就想把它打死,一枪了结。你觉得我是不是打中了?”

“声音太大,没看见。可能是头母的。”

“那好,那崽子也完了。”

“你这人心真狠。”

“不太狠。”他的舌头贴紧她耳朵,尝到野黑莓的味道。“只是对垒水坝的动物狠。”

珍妮轻松地把自己健壮的身子更紧地贴着他的身体,她的手电光又一次搜寻着波动的水面。一片深绿的光辉,似乎还有少量的白浮子。那可能是被泡白了的夏末的树叶,或是骨头。

“煤矿灾难不是大屠杀或战争。”亚当坚持说。“煤矿有正规的劳动秩序,有救援队,有医生——”

“那不是最终解决方案^①,但——”苏姗娜承认。

“那是生活着的一群人,有警察、消防员、选举出来的官员,所有人,还有家庭和亲戚,死的只是那些矿工,每次他们下井都十分清楚那是很危险的。”

“心里清楚并不等于不会死。”

“没错,但他们的工作所必须冒的险就是死——就像你,让学生不及格,不那么残酷。在地下的矿工,无论在山底下还是在海底下,都是在危险中干活。”

“就像在越南作个公民那样危险?要不在某个我们从没听说过的非洲国家,要不在智利?他们也仅仅是在生活,想方设法地干活好喂养自己的孩子,可突然间世界炸了,火像水一样从天

^①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方案。

而降,然后成排成排的尸体被摆了出来。从40年代开始,女人、孩子还有老人也在死,比干活的士兵还多。”

“那完全不一样,那是战争。”

“我不认为那‘完全’不一样。”苏姗娜平静地说。“这跟那些走危险路线的男人有关,知道人们会遭杀害,但他们依然那样做。”

“唉,又是男人。”他说道,早已没劲了。他从来不会跟珍妮争论女人和男人的问题,尤其是在睡袋里面。

“是呀。”苏姗娜回答。“男人经营商店企业,好让人在里面干活,男人控制国家,杀人以便保住权力。”

他特意伸出右手搂住她的腰肢,头紧倚着她的背;那温暖的气味是他对她最甜美、最踏实的记忆。

“是呀,是呀。”他对着棉衣说。“男人还最了解战争有多么恐怖。”

“哦,它们确实很恐怖。”

他用左肘把自己撑起,依然在她身后。“所有战争中的所有男人,甚至连那些跟法西斯战斗的正义战争,还有你爸,维修那些飞行堡垒好让伙伴把炸弹扔遍整个德国,那是恐怖,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要是他只呆在埃德蒙顿,”她说道,在死去了14年之后,她父亲又时而突然出现在她清晰的记忆中。“把他的头埋进DC-3引擎就行了。1942年的一天他说,800多架飞机从这儿一直不断地起降,飞往阿拉斯加。”

“都运了些什么?给咿呀学语的俄国儿童送的牛奶?”

他突然感到后悔——又自作聪明讥讽过了头——可苏姗娜只是耸了耸肩;在薄薄的被单下,她的腿长长的,一直温暖地贴着他的腿。她说:“在埃德蒙顿两年,可以说他只是在修引擎。可后来美国空军送他去了海外。”





“没去太平洋那是他运气。”亚当急忙说道，试图设法把他俩从她父亲和他靠着她的背时的所思所想中解脱出来，转向一种平和、一般性的话题。“我的意思是，当他真的进去了，参了战，除了他的伙计飞的被打得满身是洞的飞行堡垒，他啥也没说，只说他们恨战争。”

“哦，他们恨战争。不过……也许他们也喜欢战争。”

“啊，喜欢？”

“对他们来说那好玩，终于打了。在英格兰枯燥地等了好几年，终于最终参加了游戏，猎杀人类的游戏。回家后他们不吭声了，在家人人都知道战争有多糟，如今我们得恨它，而且有太多的暴力死亡，因此他们不敢告诉任何人他们有多喜欢战争。”

亚当微微拱了拱背；沉默寡言的巴德·莱昂斯是他俩在床上通常回避的几个话题之一。“那……你知道汤姆他爸的处境吗？”

“哦，汤姆他爸。他也是啥也不说，只是在荣军纪念日^①那天跟其他老兵一起参加游行，嚷嚷几声，然后跟他的老伙计喝几盅——他18岁就飞遍德国，后来在伊顿商店卖家具卖了40年，你以为如今他还有那样的激情？”

一天要看60个病人，翻来覆去都是咳嗽、蜂蜇、裂口、因为一只乳房太小而抑郁、顽疣，还偶尔来几个阳痿病人。

苏姗娜把他的手臂拉过她的肚子，生了崔茜和乔尔之后，那肚子已经不再那么紧了，而是软了，像做爱一样偎着他。可他却是个不知好歹的蠢货！^②

她对着昏暗的屋子在说话，似乎离他很远。“汤姆他爸从没讲过，对一个草原男孩来说，驾驶喷火飞机在欧洲燃烧的城市上

①每年最接近11月11日的那个星期天。在这一天，加拿大人和英国人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将士。

②此处，亚当因与其他女人有染而在自责。

空飞行,生死攸关地在空中缠斗,看着闪亮的炮弹,他的炮弹,划过天空,看到那些纳粹飞机拖着火栽下去,触地时爆炸,像魔鬼把人们推进烤箱一样,那是多么的好玩。”

“他们飞行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烤箱。”

“不要诡辩,以后他们全知道了,而且那东西让他们记得更牢,让他们的激情更富有道义。”

“那,他们难道不对吗?他们在阻止无法启齿的种族灭绝,是在做一件好事。许多人因此还献了身。”

“可他们也做了什么‘无法启齿的’事情?一个希特勒,再加上百万的儿童。”

“他们只得这样,没别的办法阻止他。”

“是吗?听着,Bengjeltje^①。”苏姗娜说道。低地德语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总是那么亲切,可在这被单下,她却正从他身旁移开。“别争了。你是知道的,女人是从来不会走到那种地步,相互做那种事情的。说到底,战争是男人的事。”

“好啦,好啦……就算说起好玩怎么样?汤姆他爸那么和善,连个苍蝇都不肯伤害。”

“没错!而且是个绝不会让自己儿子去打仗的人,我知道,不过,我觉得从某个方面讲,他也许会的。为的是战友情谊、生与死的恐怖,团队的激情,最能把人吓瘫的恐惧,要是活下来,你还知道自己找到了经历这一切的勇气。与某个人一道。买东西、逛商场、打高尔夫能与之相比——天哪,这怎么能相提并论?”

他伸出手,用他的胳膊挽住她离得远远的身体,挽得很紧,很紧。她把他的嘴给堵住了,他只能搜肠刮肚,找个说话的机会。“有时候……当我按摩胸腔时,突然我感到那颗心在跳,在跳动……”

①低地德语,意“我亲爱的小伙子”。





她轻轻地说：“你是位好医生。”

“医院里的团队，如果有人真的病得不轻，或伤得厉害，那是够紧张的了。”

“我的意思是，”她说，“在我们这代人当中，除了你们这些医生外，还有谁见过死尸？我们钉好棺材，唱着那首可笑的《学生王子》中的一句话：‘世上没有死亡，尽管眼睛不复明亮。’世上没有死亡！”

“那是哀悼者唱的，他们受到打击，就从幸福的往事中去找点什么来帮助——”

“听着，”她半转过身对着他，“罗伯特·格雷夫斯^①写道，他从一战继承来的最大遗产是‘难讲真话’。汤姆他爸不会公然撒谎，他只是不讲而已。”

亚当说：“谁为了‘难讲真话’就得去经历一场战争？”

苏姗娜严厉地看着他，眼睛朝上斜视着他。“当然没有谁啰！”她缓慢地说。“在你的办公室也是难讲真话的。”

“哦，我的办公室，该死，那只有每天必做的 S. O. A. P，每天要把 S. O. A. P. 乱写乱划 60 遍！”

苏姗娜笑出了声。“真聪明！这是你天天必说的，S 代表 subjective（自觉症状），‘今天感觉如何？’O 代表 objective（他觉症状），‘这儿按着痛吗？’A 代表 assessment（诊断），‘看来可能有心脏杂音，或溃疡……’P 代表 prescription（处方），‘抗生素——’”

“可笑！你的腿断了，可按照程序，我得检查你的内耳。”

“我们这位爱抱怨的朋友安迪·T，你的溃疡咋样了？”

“他很好。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说的：‘孬种命更长。’”

“我知道，可我觉得他不光想让自己成为命长孬种。”

^①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著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向一切告别》、历史小说《克劳狄乌斯一世》及爱情诗等。

他俩都笑了，一时间轻松像缠绵的睡意降临到他俩身上。可是和往常一样，苏姗娜又从中挣脱了出来。她一旦开始了什么，就决不肯善罢甘休。

“你记不记得汤姆父亲透露过的一件事？”她说。“他护卫一支轰炸机中队，他最好的朋友来自索西尔德，在一架兰开斯特式飞机上当飞行员。他没事返航了，没有空战，接着他朋友的轰炸机被打得稀烂飞回来了，差不多是强行着的陆，只有领航员还没死，后来没等他讲清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死了。那是个典型的战争故事：从来不讲什么，只要一讲就是讲死。这样你就啥也不讲了。这样讲让我们这些不在场的人啥也不知道。他老说：‘战争就这样，没啥。’”

“你认为你爸从来不讲，就是这原因？”

“‘没啥’能有很多意思。”

她在说她的父亲和战争，可亚当感觉到她更多的是在说男人和女人；他感到他俩的生活已不如以前了，她正引着他行走在又高又陡的山梁上，如果谁脚下一滑，就有可能跌下去，各坠一方。

“你从没问过他？”她执著地问，“‘男人之间’的那种问题？”

“他总是很随便，话听起来很坦率，但偏题。我问他什么，他就老是解释 B-17 和 B-24 轰炸机的区别。从不讲他知道的装上炸弹炸死平民的事。逼他没用，我从没听到他提过‘德雷斯頓’这几个字。”

“他告诉我那天晚上起飞的有 450 架飞行堡垒，764 架兰开斯特，装了 65 万枚火焰炸弹^①。”

亚当感到心中涌起一股情感，喉头一紧。

苏姗娜也有同样的感觉。“你爱他，我也爱他。”她用手拂了

^①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的总称，杀伤力极强。





拂他的脸。“妈死后他的话就更少了。”

“真希望我也认识你妈。”

“我认识你妈，这太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妈肯定会说我配不上她的‘金发公主’。”

她呃的一声，在他宽松的怀抱里动了动。“那只是爸爸说的，开个玩笑。”

“唉，谁都一样。”

他又犯了错，可感谢上帝，这一次她没接着这分歧或者说是争论往下说。他的手臂依然搂着她，如果他把头埋得更低一点，他会听见她胃里的咕咕声响，就像胃常发出的那种响声一样，可眼下，和以往那样，她似乎心神遥远，他突然决定——他多么想推她一把，把她推出或推进他没在想的事或地方——他急忙说道，话语尖刻犹如厨房的尖刀。

“你说得对，那是典型的战争故事。啥也不讲，那你的生活就是个谜——”亚当突然止住了，声音更粗。“那是不是他闭口不谈爱达荷^①，不谈波卡特洛的理由？在那儿他经历了某场个人的‘战争’。那是不是就是他啥也不谈的理由？美国人的过去，啥也不谈。”

被单下，苏姗娜挪了挪，几乎无法察觉，她仿佛正从别的什么地方返回来似的。“我告诉过你，”她平静地说，“我们从没在波卡特洛住过，那只是我出生的医院。”

“一位母亲难道只告诉她孩子出生证明上的出生地？你不是记得那座绿色的城镇？那片大湖？”

“不知道，我离开时还不到4岁。”

“那记不记得——”他说得很快，这样就不会细想问话的意

^①美国的一个州。

思了。“你推迟一周去欧洲，我跟人换了班，我俩一起开车去希尔克雷斯特？然后穿过山区，还有那些金色的秋叶，开到爱达荷？”

“我告诉过你，他非常喜欢埃德蒙顿，从美国空军出来后，他回到爱达荷，娶了我母亲，把我们带到了这儿。”

“在爱达荷州的什么地方，什么湖？”

“你知道我不晓得。”

“1946年他冒出来，跟你母亲结婚，之前你从没遇到过他，或见到过他？”

“妈是这样告诉我的。”

“可他是你的生身父亲。”

“妈是这样告诉我的。我记不得曾否见过他，当时我4岁，住在这儿，埃德蒙顿。”

“你们从没一起看过地图？找出生证明上写着的惟一的地方？”

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盯得他无法正视她的双眼。“亚当，”她最终低声道，“他是我父亲，他们都去了。而且下一周，我们结婚已经25年了。”

“我知道。我发誓，认识他11年了，除了发动机，他从没给我讲过任何事。”

“在加拿大，25年是无期徒刑的年数。”

“那只是《刑法典》的规定。你父母是从美国移民来的，他们为啥不讲过去的事，只字不提家族的事？”

“亚当，你干吗盘问我？”

她突如其来的生硬，像身体的一颤，令他震惊。要是她盘问他呢？然而，即使她的身子在床单下慢慢地变得硬直，但她的声音还是充满往常的那种理解。“你对那间诊室、对你的那些忧郁症患者、你的那些成天想着病人不断、伸手收钱的合作者已经厌





倦之极了，你惟一能读报的时间就是在床上睡觉之前。”

他那些乏味的合作者——他内疚，但他更紧追不舍：“我才不在乎他们呢！你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祖父祖母一无所知？每个人都得有祖父祖母。你可以说，你不是俄国的门诺教徒，不像他们，一听到个名字就要伸着鼻子往前嗅他三四代人找亲戚，可巴德·莱昂斯是什么名字？是英国人的名字吗？”

“我们又不是罪犯。”

“我是这个意思吗？战争创伤能让一个人沉默寡言——上帝知道，这个世纪这种情况够多的了——可他帮助好人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为啥不吭声呢？在爱达荷有没有犹太人？”

“问题是，”她缓慢地说，“没有哪场火燃得干净。就连最正义的火焰炸弹也如此。”猛然，她伸长身体，又硬又直。“已经 25 年啦。”

“像他们说的，我也行了 24 年零 4 个月的医了。”

“那也是个无期徒刑。”

亚当的记忆在回放；他凝视着她，她好像正望着远处。他闻着她的气息，这么近，却又难以理喻地那么遥远。还要等些时候他才能理解听到的这些话，发生在他眼前的这些事，而他却这么精心地保护着自己这个“与她无关”的生活。他隐秘的生活，与她父亲曾有过的那种生活不同，但却别无二致。

“我是不是——”他非常小心地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不是不想服更长的‘无期徒刑’？不想跟我一起？”

苏姗娜没有动。好像在看着薄被单下自己那颀长的身体，看着两只脚隆起的那对顶峰。

“你知道那是个反问。”她说。“你呢？不想跟我一起？”

在亚当锋利的刀刃下，那头海狸皮下的身体慢慢地露了出来。那是用刀尖在剥皮，一寸一寸地剥开厚实的皮毛，暴露出淡

黄色亮闪闪的赤裸之身。

“你见没见过躺在岩石上的海豹？”他问。“也许在动物园里？”

珍妮带着某种厌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身体和他那把弯刀。和以往那样，她一句话没说，可亚当察觉到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也许至少是强忍住的战栗。

“海豹要大得多，但同样是这种脂肪裹住的、好像是无骨的身体。”他解释说。“水中哺乳动物。我小时候，从这儿往北，根本就没什么海狸，现在它们到处都是，成了有害动物，到处都是它们垒的坝，拱的巢穴，你看。油脂有一英寸厚，把美丽的树木变成了板油，可恶！”

珍妮一言不发。亚当的左手紧握一卷油腻的毛皮，顺着剥皮刀割出的短短的几道刀口使劲往一边撕扯。他的双手沾满了厚厚的油脂和鲜血。

他单调地唱道：“‘我宁肯去爱达荷，不去任何别的……’”

他一直剥到了头，此时他下刀更加小心，好让那对小耳朵留在毛皮上，然后又剥到眼睛处。“看，”他用刀尖指着说，“眼皮半透明，在水下它们完全看得见。再看这儿，”他掀起那两颗獠牙后面的大嘴，“还有第二副嘴唇，在这对獠牙的背后。”他用刀敲了敲那对獠牙，像在敲击钢铁，“这样，它们在水下衔木头或石头，水不会进嘴里去。这是真正的进化，百万年来有目的的——”

她打断他说：“你剥了个洞，在这儿。”

“啊！好在我没想去当外科医生。”亚当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她的身材壮实，但那张脸能把电视广告里的牙膏卖给任何男人——他低下头，为自己这想法感到羞耻。“你看我时，站得太近了。”

“你不喜欢？”

“也许你不喜欢。不过，捕猎人总是干脆把头砍掉，这毛皮





没啥用。”

“那干吗把头留下？”

“我不是捕猎人。”他突然厌烦起她来，补充道：“难道你认为剥了皮的动物就不该有张脸？”

一时间，响起的只有溪水的声音和一阵风动，在他们脚下，那风仿佛冻成了冰。亚当急忙掩饰说：“我一直恨剥皮。很多年前，我曾跟着提纳人上北方去猎过驯鹿，我能做的事就是把宰好的鹿肉堆起来。”

“当了医生你的心肠就硬了？”

他毫无幽默地大笑起来：“哈——对，吃了让人心肠硬的药。”接着，他把刀放回到兽皮上那条开了口的刀口上。他为什么跟她一起在这儿？

“只是很小的刀口，”他说。“不像这儿的子弹洞那么大。合是合不拢的了，但我会把皮绷紧，你缝两针就能把鼻子这地方的缺口缝上。加工处理后，没人会注意的。”

“我干吗要碰它？”

“这是女人的活，提纳人教的，缝合……等兽皮张着晾干之后，你还得刮皮，然后嚼皮，要好多天，人的口水用来鞣皮最好了，直到皮鞣得很软很熟了，能裹住自己的脚，晚上保暖。”

“我矫了7年的牙就为了来嚼海狸皮？”

亚当大声笑了。“那这些漂亮的牙有啥用？”他看见她朝他露出的牙齿。

埃里克说过，没问题，就用那间小房子。要是你还有时间的话，那杆来复枪就锁在箱子里，你可以用它干点别的有用的事。^①

珍妮收起自己健壮的双腿，顶住胸脯，双臂合抱双腿，下巴搁进膝盖之间。

^①这段是亚当所想的。埃里克告诉他可以在那间小屋里跟珍妮做爱，做够了，也可拿枪去打点猎。

“你妻子会嚼吗？”

她让亚当吃了一惊，但只有一阵踌躇。

“我妻子要去欧洲，去马德里、图卢兹和米兰的档案馆。研究一些看不懂的文学作品。”

“连实验室的技术员也不懂？”

亚当哼了哼：“我不敢说我也懂。”

“那些语言她都会说？”

“还有几门。对比较文学的教授来说是有用处的。”

“她对你仍然说什么语言？”

“什么？”他严肃地说。“问这对谁有用？”

“我。”

“对其他男人，你说什么语言？”

“他们听得懂的。”

“那对。我妻子要去欧洲呆4个月。”

“这是你决定的，还是她决定的？”

“职业研究，没什么好‘决定’的。”

珍妮弯下身，双臂抱住自己，凝望着被风化的高崖下那片褐色的溪水，那条又厚又黑的煤层撑起灰色的泥土和矮树丛，还有直冲天空的白杨树。风景里坐着的女子，沉思冬日的临近。亚当伸出手，沾满脂肪和鲜血的手几乎快碰到她黄褐色的头发，可他忍住了。

“听着，”他尽可能轻地说，“这皮能鞣得比丝绸还要软，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毛皮很柔软……你在海狸毛皮上做过爱吗？”

“我不知道。”她小心地回答道。“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跟海狸^①做爱。”

“我不是那意思，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①在英语中，“海狸”还指“工作勤奋的人”。这里珍妮暗指亚当。





他俩咯咯地笑了笑，但不是一起在笑。他从毛皮上拎起被剥光了的海狸，仰着放在其他一排海狸的旁边，头顶上是斜立在让人站不稳脚的溪岸之上的苍白的桦树。这些海狸看上去不像是曾经鲜活的动物了，甚至不像实验室里的标本；它们成了四袋被拉长的青肿的肥肉，周身被割了无数道的切口。可奇怪，透过半睁半闭的眼睛，亚当看见它们在变化，变成淡黄色的、浮肿的孩子……每人都长着两颗巨大的龅牙，两个黑洞洞的缺口作为鼻孔，短小、赤裸的双臂高高地盘在发胀的肚子上，像是在绝望地祈求，行行好……行行好……他的脑子被迷住了。我这是在做什么，我太蠢了，我都做了些什么，都过了50岁了，却跟一个每天在大厅里要碰见10次的女人躲在树丛里，真是个白痴呀，我这是在做什么——

摆在泥土上的那排海狸尸体还在奇怪地变化着；在掠过溪水平射而来的晚霞里，在灿烂的桦树叶下，那些尸体渐渐地，一个接一个地着了火似的。

亚当挣扎着把自己拽回到平常在每个清醒时刻里的那种健忘之中。他单调地咕噜着：“我宁肯去爱达荷吃烤土豆！哦，我宁肯去爱达荷，不去任何别的——”

“玛丽莲·梦露！”珍妮叫道。“她当模特拍的第一张著名照片，穿的就是爱达荷土豆口袋。”

他摇摇头。著名的死去的玛丽莲。“你信吗？我从没去过那地方。只是脑子冒出的无聊的歌词。这些我们怎么办？”他指着那排尸体问。

“过一夜就没了。”她说。“草原狼会叼走的。”

“啊，草原狼。艾尔伯塔的四腿兀鹰。”

那些尸体又变回原来的老样，四只油腻腻被剥了皮的海狸。

“你看。”他接着用刀指着说：“这个很小的肛门，是进化中

适者生存一个非常特别的例证。因为海狸不能消化树皮，但它吃的就是这东西。树皮、木头纤维得靠细菌来分解，而起分解作用的细菌只能在海狸的大肠里产生，于是每天海狸得磨它的肛门，磨出些带细菌的粪便来，然后把这些粪便吃了，把细菌吞到胃里，来分解树皮，吸收木头里的营养，不至于饿死。厉害吧，啊？”

珍妮精心打扮的眼睛睁得老大。亚当继续说：“海狸生存了400万年，会用木头、泥土和石头垒坝来保护自己的巢穴，还吃自己的屎，每天吃，因此成了加拿大的国兽。”

她向他斜靠了过来，想抱住他的头，可他举起一只手臂挡在当中。他俩相互对视着。

“我的意思是，为了生存，你得做你自己必须做的事。”

她没眨眼。“请闭上你可恶的嘴好吗？”

床感觉很宽大，他俩等于是睡在不同的房间里。亚当知道苏姗娜跟他一样没有睡意，不过，他希望自己的疲惫会很快淹没自己。这时，她说话了，身子没动。

“你最近在《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上读到过什么没有？”

“我哪有——”他刚一开口却停住了。“好些年没读了。”

“你还记不记得卡特里派^①信徒，在13世纪？”

“记不太清了。他们住在法国南部，有点像韦尔多派^②教徒？”

“是的，但更严格。他们不食肉，不结婚，过绝对清洁的生活。对僧侣来说，真正的美德是极坏的榜样，因此英诺森三世^③

①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基督教异端教派，一译清洁派，强调持守“清洁”，主张苦修和二元论，主张禁欲。

②约1170年出现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基督教派别，由法国里昂商人彼得·韦尔多创始。

③英诺森三世(1161? ~ 1216)：意大利籍教皇(1198 ~ 1216)，其间教会权力达到顶峰，发动教会改革运动和两次十字军东征(1202, 1208)。





发动十字军去镇压他们。”

“我记不得卡特里派信徒殉难的故事了。”

“在概论章节中有记载。最残酷的一次是在 1243 年，当时教皇英诺森的军队把 200 多人从图卢兹附近的城堡赶出来，赶进一座村庄。但士兵不想杀他们，说没法区分基督徒和异教徒。于是主教下了决定。他命令道：‘全杀光，上帝自己会区分的。’”

亚当的眼睛睁得老大，好像他正在一间陌生的夜间房间里，或许是家旅馆，被门厅里步步逼近的脚步声惊醒，顷刻间他觉得电话马上会响。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干吗回话？

你打电话找谁？

“有时候，”苏姗娜远远地坐在床的那边说，“我认为，丘吉尔和指挥那些轰炸机的轰炸杀手哈里斯^①下的决定跟那个主教的没啥两样。”

“那希特勒和赫尔曼·G^②呢？”

“还有杜鲁门，还有驾驶伊洛瓦·盖伊^③去广岛的迪贝兹上校。”

你不在那儿？

你在哪儿？

但苏姗娜没有回应他随口而出的讥讽。而是翻开他俩一起在艾尔伯塔大学糖果店的镜子之间找到的那本祷文，用针尖一般无可避让的声音念道：

“爱就是情，就是欲，就是欢。”

①亚瑟·哈里斯爵士，英国皇家空军元帅，在二战中第一次提出并实施了火焰炸弹的轰炸方法，企图瓦解德军斗志，其结果是大量杀伤平民，而且并未缩短战争。最惨烈的是对德雷斯頓的轰炸。

②二战时期德国空军司令官，一个喜欢虚张声势、手段残忍的大傻瓜。

③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飞机上写的名字，是当年该机驾驶员母亲的名字。

而亚当必须回应道：“爱还是决心。”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回答了。

在高耸着玻璃和水泥墙的机场国际出发区，反复播放着到达和出发的信息，还有一遍又一遍的广播找人，但显然没有谁愿意拿起那些正在等待着回应的话筒，有一小圈人站在那儿。假如面部朝外，他们会像北极地区的麋牛，把幼犊围在当中，抵抗残忍的敌手，可是这些人只是面朝着他们自己：慢慢地低下头，越靠越近，专心于这围起的慢慢收紧的圆圈，脚并着，头低着，身体围成圆圈。这可能是一家子：母亲、儿子、女儿、父亲。在机场一块块回荡着声音的厚玻璃之间，有层膜一样的宁静笼罩着他们；也许是儿子或父亲要离去。显然，他们当中没有谁有那种刚沿天边飞了几个小时后被折腾的疲倦肤色。或许是女儿要离开，于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在这共同逗留的一刻，他们相互对视，试图从对方的眼睛中找出他们自己，也许以前他们从没这样，此时，他们伸出双手和双臂相互紧搂，试图感受每个人身体里的每根骨头，他们知道自己正爱着，带着不可抗拒的信念，就像伸出自己的手指触摸自己一样。

“崔茜，”那个女人说，“乔尔。”

他们搂得更紧了点，仿佛他们渴望成为中空的地球，每个人都能触摸到里里外外各个层面。

“游览游览，欧洲的档案馆不会跑没的。”

那男孩拖着步子往前挤得更紧。“现在，要是祖母在这儿，她会祈祷好一阵子的。”他低声说。

那男的没说什么。那女的离开了。



第 8 章

左撇子女人

1944 年，伦敦

我何时出生？1996 年纽约出版的《艺术词典》第 28 卷第 352 页是这样写的：“英国画家，约 1694 年生于但泽（即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1744 年卒于伦敦。”地点“但泽”没错，但“约 1694 年”不对。

祖母特丽埃娜知道准确的日子，我出生时她是接生婆。但她总对我说不要在乎无意或故意的无知。

她总说：“伊诺克，人总有出生的时候。可你，你会画，你是画家。”

“英国画家”对她来说可能很可笑。“猫跑进牛棚难道就成了牛？”《词典》里“伊诺克·西曼属第二流的肖像画画家”这话也不会让她生气。她经常对我说：

“你就是你。你只需努力，像你父亲、祖父和兄弟，只要你的像画得好，就会保存下来。你会从不困倦，从不需要睡觉，你给别人一家人画像，就还会有四个、五个，也许六个人成为永远的朋友。”

世上万事皆有尽头。开始，我不懂她对我说这话的真正含义。万事都一样，总是不停地终结，孩子们特别注意这些。我们

这个画师家庭在但泽、在华沙、在德雷斯頓遇到麻烦之后，我们从波罗的海和北海一路航行到了英国，当时我感受到了她说的话：这真是到了尽头。不过，当我看见泰晤士河流进更大的伦敦城时，我意识到这或许又是个开始。的确如此。

在英格兰，我受人委托画第一幅重要的画像是在1708年。我画的是《安德鲁·比瑟特上校及其家人》，至今，这幅画还保留在岩石丛生的苏格兰最东边的格兰扁区的福布斯城堡内。《艺术词典》将其称作“以戈弗雷·尼勒^①的风格但绘画质量有些参差的规模宏大的群像”。的确，“质量有些参差”——要是照他们记载的出生年份算，我画那幅像的时候还不到14岁，你还会有什么更高的期望？还有那个傻瓜酒鬼戈弗雷·尼勒，我的风格跟他毫不相干：是我父亲——老伊诺克·西曼——教的我们，而我俩则靠各自的天才，尽可能把他教的东西诉诸了实践。

我父亲告诉我说：“你画了什么，不要羞于向世人展示，就说是你画的，你亲手画的。”

当我把画拿给祖母特丽埃娜看时，我又问她：“我是哪一天出生的？”

“是呀，你现在是该知道啦。”她说。“这幅画将比阿姆斯特丹门诺派教堂里的浸礼记录更长久。”

“我不要受浸礼，不管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她眉毛下的那双眼睛凝视着我。她是个左撇子女人，眼睛比她的织针还要尖利。

“你弟弟彼得已经会教理问答了，他比你小。”她说。

“他喜欢数字，喜欢生意，如果可能他甚至想回但泽去。”

“你肯定你不想？”

^①戈弗雷·尼勒(1646~1723)：英国画家，生于德国，在阿姆斯特丹学习绘画。





“干吗想？在但泽，除了门诺教徒我啥也不是。”

“可你的确是门诺教徒嘛。”

“我还是个画家。”

祖父艾萨克·西曼把自己的长发拉到胸前，编成辫子。他在伦敦生活了25年，但就不肯戴假发。像以往一样，他在仔细听，但我知道他不会说一句话。祖母在继续织着，织着厚实的但泽手套来抵御伦敦无休无止的雨水。她平静地说：“1689年9月9号。我第一次摸到你血糊糊的头下来，是早上钟敲四下的时候。”

于是，在我的第一幅画上，我是这样题写的：Enoch Seeman, pinx. AE 181/2. 1708。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伊诺克·西曼（移居伦敦后我父亲把Seemann中的两个n给删了一个：“什么东西都双写把英国人搞糊涂了”）绘于（pinxit是拉丁字，意“绘画”）1708年18岁半之际（AE是拉丁字aetatis的缩写，意“在……岁时”）。《艺术词典》和193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卷数更多的《画家传记辞典》都记载了我的这句题词，但两部辞书都坚持把“约1694年”作为我的出生年。或许，让历史学家糊涂的不仅仅是拉丁字，还有数学。

肖像画画家靠别人约画生活，约我的人逐渐增加，从极少数的贵族到暴发的富人到皇室。我给伊莱修·耶鲁画过全身像，他是东印度公司^①的大老板，他把在马德拉斯^②“弄来”（有人说是盗，不过当然是合法的）的很多钱给了美国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至今，我给他画的肖像依然挂在耶鲁大学的艺廊里。几年之后，詹姆斯一世的曾孙汉诺威王朝国王乔治一世成了我的恩主；在他少有的几次访英途中，就在他1727年去世之

①英国政府于1600年特许成立的对东南亚从事殖民事业的组织，于1874年解散。

②印度东南部港市。

前的那一次,我照他所好为他画了一幅像:穿着他作为英格兰国王的加冕长袍,更加年轻。我一边画,他一边用德语志趣相投地对我说着——没说什么,皇室对平民说话的那个样。肮脏、拥挤的伦敦使他压抑,因此他不愿住在这儿,也从不愿学英语。他的儿子、继承王位的乔治二世,非常喜爱那幅画,也约我给他和他美丽的王后安斯帕奇的卡罗琳画像。全身和半身两幅。

这样吹自己,祖父艾萨克或许会骂我“prautzijch”(虚荣)。太不谦逊,太不像门诺教徒。但是在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记忆从来都只不过是接近消失的最后一段思绪。我出生的波罗的海的那一角,常常遭到摧毁:13世纪,有一种基督教传到了那里,当时,条顿骑士团^①得到教皇的许可,成了那些在波罗的海那一角过着异教徒生活的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当中的“传教士”。两个世纪之内,骑士团要么强迫他们洗礼,要么把他们杀掉。战争的暴行往往使一个人留名于世,可我,小伊诺克·西曼,是个誓不反抗的门诺教徒和画家。于是,我只能以作画来证实我的存在。

几个世纪以来,不管在欧洲还是美洲,人们都知道门诺教徒是个体农民。他们种稻谷,养奶牛,有的还说低地德语中精髓般的谚语,像“Wann wann nich wia, dann wia Kusheet Butta”^②,可我的祖父艾萨克·西曼虽然继承了乡下的一处地产和农场,但他不是农民。他是埃尔宾门诺教堂里的一名领读经文的传教士,更重要的,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特丽埃娜,是但泽工程师亚当·威伯的孙女,威伯一家之所以成为农民,是因为但泽市议员都是天主教徒,非常担心他的才华,建筑行会也非常害怕门诺教徒的竞争,因此没有准予他和任何门诺教徒但泽市民的身份。祖母特丽埃娜在伦敦住了好几年,给我讲我们家的故事:

①中世纪十字军的一个组织,建于1190年。

②意思是:“要是‘如果’不是‘如果’,那牛屎就是黄油。”





“亚当和他的两个儿子，亚伯拉罕和你祖父雅各布，在埃尔宾对面沿诺加特河岸买了六英里的泄洪平原。你出生前 50 年，威伯一家和其他在那儿安家的门诺教徒在上面建堤筑坝，把那地方搞得非常适合耕种，以至于附近的地主们抗议说我们的堤坝太坚固了！春天，山上的洪水顺维斯图拉河流进诺加特河时，原来的堤坝坍塌了，淹了波兰人的农场，有时候淹得很惨。”

“那他们干吗不雇威伯家的人，也修建更好的堤坝来保护他们？”

祖父艾萨克解释说那不行，因为有时候河流的洪水太大，需要一片泄洪的平原。可祖母坚持说不是，是因为嫉妒。

“波兰国王从没找过我们的麻烦。”她笑着说。“没人用的沼泽地不交税。”

事实上，到 1661 年我父亲伊诺克·西曼（后来人们称他“老西曼”）出生时，许多门诺教的家庭离开了但泽城墙下的门诺教村庄。不仅威伯家，还有布拉克家，他们是建筑工和雕刻工，还有做裁缝的艾索家，设计船只的彭纳家，他们驾船航行，远到格陵兰的冰山，为了鲸油而捕猎鲸鱼，还有迪尔肯家，他们是但泽最富的银行家，所有这些人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在维斯图拉河和诺加特河辽阔的三角洲上相对自由、不受约束的乡村农耕生活。

我的曾祖父雅各布·威伯和他的兄弟亚伯拉罕是人所皆知的杰出的工程师和农夫，但真正继承了我们曾曾祖父亚当的想像力的是雅各布最小的女儿特丽埃娜·威伯。她是祖父的第二个妻子（第一个在生我叔叔艾萨克时死了），她胆敢想像自己的丈夫不必做农夫，而是去埃尔宾门诺教堂里当牧师，同时也是艺术家，他们的儿女不仅要学读书，还要接受艺术教育，她的长子伊诺克能献身上帝，献身艺术，他必须出国跟门诺教徒一起学习，不仅去阿姆斯特丹，还要走得更远，去古典艺术的发源地意

大利。等我父亲 20 岁回到埃尔宾,接受了浸礼,奋斗了两年使自己成了心中所想的画家,而他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却仍然在努力,此时我的祖母却看到了结局。

“埃尔宾不可能。”她断言。“太小了。我们必须回但泽去。”

1683 年春。坐落在清晨毕晓普斯山阴影下的施托尔岑伯格(即高山的意思)村。我总觉得对于守旧的佛兰芒门诺教徒来说,这村名很古怪。就在山的那边,被壕沟包围的城堡在河流之间展开,城堡下是用泥土和石头垒起的威伯棱堡。我们称它为“我们的棱堡”,就在角落旁,离梅德洛克和沃尔夫棱堡不远,莫特拉瓦河上进港的驳船从那儿穿过城墙,沿港口的码头停泊,卸下船上的粮食和建房用的石头。

因此,施托尔岑伯格村才是我出生的确切地方,而不是但泽。我恬静的母亲叫苏姗娜·奥德娜,她和父亲离开埃尔宾来到这里不久就结了婚。我是老二,我出生时哥哥艾萨克已经三岁了。左撇子祖母是我们兄弟俩的接生婆。

我第一次记忆是光的气味。就像搭在我们家房子旁边的父亲画室里调色板的各种颜色、油画颜料的气味,从地上一直通到天花板的玻璃窗,一壁光的墙,面朝我们家车道和种着苹果树和玫瑰花的花园。有时候,我们那帮灰色身影会出现在那儿,像搭配的颜色,脖子高昂,鼻孔大张,后面跟着那辆马车,我们的车夫坐在上面,蓬松的头发和胡须像身穿制服、头戴毛皮头盔的轻骑兵。接着,我父亲会走出房子,男仆扶他上车,马车渐渐远去,留下的又只有树木和玫瑰,立正着的苗条的男仆。还有光。

我拉着祖母的手,站在毕晓普斯山顶上,看见高耸着三四根桅杆的大船穿过我们脚下的城堡的石墙,从远处的菜园、啃草的羊群、高大的谷仓和吊架之间驶过,像硕大无朋的鸟展开白色的翅膀,从教堂和高耸的荷兰式的山形墙房子跟前驶过,像风一样无声,却又吱吱作响;船只向东驶进光亮的维斯图拉河,沿河的





那个弯道往北拐去,经过维克瑟尔芒德堡垒的那些大炮,驶向世上芬芳的大海和金色的汪洋,祖母这样告诉我。

像任何被钟爱的孩子一样,我自认为咱们家是个幸福的大家庭。我不相信,就连我祖母当时也以为,除我最小的弟弟外,每一位胆敢作画的西曼都会客死他乡,我父亲伊诺克,我哥哥艾萨克和他的儿子菲奥雷洛,我和我的儿子保罗,最伤心的是我祖父艾萨克·西曼。他能流利地说荷兰语、高地和低地德语,还有波兰话,在门诺教堂说了20年的教,可在1730年他90岁那年,却客死在自己没法听懂、也没法交流的英国人当中。

一直跟我们过不去的倒不是但泽人,虽然一开始他们好像是。但泽画家行帮不肯吸纳祖父艾萨克作为他们的成员,结果没有哪个但泽市民会请他作画,他没了生计。后来,我父亲不屑加入行帮,而是作了一幅没有哪个但泽人能小觑的画。一幅从南朝北观看的但泽城的巨幅全景,从左边的毕晓普斯山,一直到右边威伯棱堡的胸墙,中央是圣玛丽教堂巍然的塔楼,下面悬吊着亚当·威伯“人造机械”上的缆绳和桶,这些机械所建造的城墙在半个世纪的政教战争中,连瑞典人也没能摧毁。每个但泽人都知道这幅画。于是,父亲越过行帮头目,把这幅美仑美奂的画直接赠送给了但泽市议会。我从没见过这画,但泽用许多铜雕版只做了几幅拷贝。据说,市长阁下克里斯钦·施罗德自己是个“忘了本的门诺教徒”,但尽管他与画家行帮反对,市议会还是授予了父亲“独立画师”的特殊许可。惟一的限制是他不得收学徒,不得画风景,以免与行帮会员发生竞争。接着,市议会立刻请他为每一位议员画像,全挂在市政大厅里!

到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和祖父艾萨克到处作画,早已名声在外,但泽画家行帮已经无能为力了。倒是我们自己人,那些上个世纪在佛兰德逃离了抓捕和战火的门诺教徒们,他们倒成了父亲和祖父的迫害者。

门诺教徒倒从没抓捕或烧死过任何人。从来没有，我父亲悲苦地说，没错，但泽城如今的那些富裕的门诺教徒不是宗教法庭豢养的走狗，他们不会要求市政当局去处死谁。但是他们能让你遭受审判，不是在剧场众目睽睽之下的那种审判和正式判决，而是在信徒圣会狭小的圈子里，在那些控制这个圈子的长老们更加秘而不宣的议论中。称这些人为“Vermahner”（意“训诫者、警告者、训斥者”）不是没道理的。他们无需铁链和夹舌钳；他们有言辞和教会禁令。

“咱们应该迁到科尼斯堡去。”我祖母特丽埃娜愤怒地说。

我、艾萨克和彼得正躺在屋中央那台用砖砌成的火炉上面，炉子的热量把整个房子都烤暖了。跟我兄弟们一样，我假装睡着，但我更想听听。

“至少在那儿，没有什么愚蠢的门诺教长老会告诉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

比起但泽，科尼斯堡离埃尔宾并不远，但方向相反。祖父的大儿子、我们大伯艾萨克跟着祖父的兄弟阿贝尔·西曼去了那儿，帮他干活。阿贝尔在那儿给市政建筑的墙壁和贵族的城堡画有传奇色彩、场面血腥的壁画，日子过得很不错。科尼斯堡画家行会准许他加入，因此我父亲说，他可以雇所需的学徒帮他画大片大片的背景。

在但泽，越来越困扰我父亲的是补鞋匠乔治·汉森。都知道补鞋匠总是很有主见的，或许是因为帮助人们走路给了他们更多的想法，就连我父亲也承认，汉森虽然是自学的，但确实非常博学。他作为教堂的主持已有25年了，最近又被选为但泽佛兰芒人门诺教会的长老，早已发表过一篇冗长的“信仰声明”和为教导准备受洗的人而撰写的详尽的问答集。

“哼！”祖母对那个老家伙从来没好感，她鼻子哼了哼说：“那老东西！俗话说：‘谁提到补鞋匠，就等于在说激进者。’可如





今，但泽的门诺教徒一提到‘补鞋匠’，他们等于在说‘比《旧约》还陈的老古董’。”

我把头伸出火炉的边沿，俯视着我们家那张饭桌。祖父艾萨克双手捧住头坐着，头发编成一条粗大、渐渐变细的辫子垂在背后。他一言不发，但我知道他是不肯去科尼斯堡他大儿子和兄弟那儿的。他恨透了战争的屠戮；用上帝赋予的天才去赞美它，甚至为了糊口，那是对他一生所依存的所有基督教情感的否定。

“可他是长老。”我母亲轻声说。“他主持教会。”

在灯火下，我父亲两眼盯着正在给婴儿伊丽莎白喂奶的母亲。他的长脸好像被雕凿得有棱有角。

“行帮不准我画风景。”他说。“现在，我们自己的长老又决定禁止画肖像。那我还有什么好画的？”

突然，他身体前倾，用他精瘦的手指框出母亲乳房的轮廓，仿佛他正在把那完整的曲线画在画布上。

“伊诺克。”母亲叫道，声音如此的轻。

他身子往后，退了回去，猛然间，我低头看见他的嘴巴，一直看到舌根底部的那条条红肉，他笑得很厉害。房间在回响，婴儿伊丽莎白扭过头去，惊恐地哭叫，露出母亲黑黑的奶头闪着光。带蓝色的奶水鼓着泡在奶头中央慢慢长大，滴了下来，又慢慢长大，这时，母亲把孩子搂得更紧。

“干吗，伊诺克？”祖母说。“你吓着她了！”

“要是我画这个，”父亲比划着，声音里沸腾着愤怒。“母亲哺乳婴孩，世上最美的举动，汉森就会称我是色鬼。难道玛利亚就从没哺乳过耶稣？唉，瞧瞧意大利画家是怎么画这场面的，那才叫你柔肠寸断。可在我们的教会里，惟有制定法典的保罗和伸出手指的大个子耶稣：‘你们这些绵羊右边去，你们这些山羊左边去！’审判，审判，毫无人情，只是万能的审判，右边去！左边

去！”

“哼！”祖母鼻子哼哼地说：“我这辈子一直是个左撇子山羊！”

祖父艾萨克一阵犹豫，然后轻轻地说，好像他没听见祖母的话：“汉森长老读过《圣经》，他说那是‘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画偶像’，所以他——”

“啥事他都能扯上《圣经》里的话。”祖母说。

“我没有画偶像。”父亲固执地说。“我没有画神，我画的是人的脸！我画的是男人，女人，就像我们大家一样，也许怀着爱意看着一个孩子。随便哪个傻瓜都看得懂，你只需要眼睛和感情，可是为啥我们那位杰出的思想家、作家和训诫者、那位最受尊敬的至高无上的教会长老、啊如此谦卑的皮鞋匠、我们最最高贵众人爱戴的乔治·汉森却不懂？他能把耶稣驳倒在地，是如此的聪明，为啥不懂？——我来告诉你为啥，”没等祖母来得及插话，父亲话题一转，“他没看见，是因为他不想看，因为要是他看了，他也许会懂得一些不同的东西，会有所感觉！然后他就得承认自己可能犯错，承认肖像画与他的‘不可画偶像’的论点没有逻辑关系，因为我也识字，我知道第二诫整句是这样说的：‘你不可为自己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按这个道理讲，画风景肯定错了，因为那是大地！可是他说那是可以的，但任何信教的人却不能画人的脸。我认为他被加尔文教义给醉晕了，我认为第二诫说的有关敬神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雕刻或画像的事情，他只要认真读一读百年前任何一位虔诚的荷兰门诺教神学家的作品，他们都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兰伯特·雅各布兹^①就是吕伐登的一位门诺教长老，他用自己关于《圣经》人物和故事的绘画让异教徒落泪，他……”

^① 17世纪上半叶荷兰门诺教长老，著名画家和绘画教师。





“伊诺克，伊诺克。”母亲怀里摇着伊丽莎白，一边在哭泣。

祖母严厉地说：“怎么啦，伊诺克？你怎么回事？”

父亲的身子使劲往后仰着，说话的声音很快，很响，眼睛直直地盯着火炉边上的我；此时，他好像已经看见我了，看见那张我知道是惊恐的脸。那时我7岁，从没听过或看过他这样。

他直直地盯着我，用他一向克制、平静的语调说：“我把所有的画都毁了。”

“什么……”母亲像是在叹息。

“今天下午他们告诉我，要是不毁，我就要被正式逐出教会，每一位教会成员都必须躲着我。所有人都不许对我说话，哪怕一个字，包括你苏姗娜，你还得不给我饭吃，不给我床睡，甚至……”他朝我做了个手势，动作很快，可眼光掠过我，茫然地看着别处。“甚至这些孩子们，为了他们的灵魂。所以，当着汉森长老、维马伯纳·萨瓦特斯基、范·斯特恩还有三个说我坏话的人以及店主丹尼尔·库兹、迪尔克·考文特和伯纳德·考恩豪温的面，我撕毁了37幅画，包括你的那幅画，苏姗娜，还有我们的孩子，还有你们的。”他朝我祖父祖母点点头，“和我自己的。我把这些撕成了碎片。然后……”

父亲停住了。这时，躺在我旁边的艾萨克和小彼得醒了，我们还有我们下面围坐在餐桌旁的每一个人都盯着他看。

父亲深吸一口气继续说：“然后他们把画烧了。在教堂背后，从街上看，没人看得见那火。”

“接着，”父亲越说越快，“我告诉那三个卑鄙、妒嫉的店主，我说：‘来，你们也得遵循长老说的第二诫。你们也得取下你们店铺上面的牌子，砸成碎片烧掉，因为它们也是人的像！’”

我看见父亲此时面色铁青，发灰，像是被火燎的岩石炸开一样危险。

过了一阵，祖母说：“他们不会的。”

果然，她说准了。父亲为市政议员画的肖像当然属于但泽，因此继续保留在市政厅的墙上，他说，为了养活我们，他还得画，汉森没管那三个店主，因此，父亲给他们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看见你们依旧挂着那些牌子，你们仍在崇拜那些画像，因为它们招引顾客，那好，正如我告诉过你们所有人，我相信你们拥有同样的自由。”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父亲又画了两幅肖像画，画的是但泽的银行家，不是门诺教徒。他还写了一本书。绘画方面，我父亲擅长隐晦手法——嘴唇上一抹色彩可以比整套服装更富寓意——但当他操持文字时，他却要求它们确切、达意，于是，他的书名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艺术的和神学的意图：

《揭示并痛击乔治·汉森的愚行：

一位热爱真理者

怀着美好意愿公诸于世的兄弟般的告诫和忠实的提醒》

作者 伊诺克·西曼 画家

施托尔岑伯格

克里斯钦·菲利普·戈尔桢印刷公司 1697 年印

他是用德语写的，所用的单词“Torbeit”的确比英语中“folly”（愚行）的语气强；近乎于“stupidity”（愚蠢之极）。“兄弟般的告诫”和“忠实的提醒”是门诺教派的牧师在说教时所强调的；显然，我父亲用德语而不用门诺教徒使用的荷兰语出版这本小册子，其目的是想让但泽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广为阅读、备受尊敬的教会首领和独立商人所犯下的究竟是什么“Torbeit”。

特丽埃娜祖母总是说，要想揭露那个“老家伙”的愚蠢，伊诺克应当用他的强项——绘画，而不要用汉森的强项——文字。或许，要是父亲跟祖母联手合作，用他描绘肖像的技能和她的刻薄的





言辞和讽刺,他俩定能发明出讽刺漫画,如同我的曾曾祖父发明缆车一样。结果是,一开始,我父亲的那本被许多门诺教徒称作“充满憎恶、恶意、狠毒的书”收到了良效。但泽市议会把汉森长老传唤了去,他不得不承认在公民道德和法律上,自己没有权力干涉一对合法夫妻的家事。市议会还请我父亲接受了他们专门为他设置的新职位:御用的“但泽市艺人”。只要是与该城有关的,他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画:肖像、风景、壁画,只要有人愿意请他画。

“过头了。”祖母说。

她又对了。父亲如今被人看成是个霸道的人,利用自己的天赋,尤其是与市议会之间的政治影响来支配教会的成员,支配但泽的市民,对于他们,我父亲坚持以为自己是忠心耿耿的,满腔热爱的。在附近的纽格登(亚当·威伯一家至今仍是这里的教会成员),更为宽容的弗里斯兰门诺教会过去是不会禁止父亲画像的,但如今他们的长老也只得赞同更加保守的佛兰芒人的门诺教会的看法,认为但泽市议会不能就教会最基本的教规戒律做任何决定。此外,“市艺人”这个肥缺让画家行帮的人比任何时候更加妒火中烧。在门诺教教会成员和但泽市民之间,我们西曼一家成了孤家寡人。因为我父亲,我们成了施托尔岑伯格的贱民。

汉森长老宣读对我父亲的禁令时,但泽城佛兰芒门诺教堂的全体教民都在场,站在彼得夏根城门处,共有230户人家,包括未受礼的孩子有上千人。当时我8岁,我记得长老有力的手举起摊开的黑皮封面的《圣经》,声音像喇叭:

“吾主施令:‘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①”

然后,他翻了几页,抬起头。他无须看着读,他心里记得:

^①《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6:19,全句是:“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于是主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①”

我父亲孤零零地站在他面前，然后转过身，从坐在长凳上的我们身边经过，沿着教堂中间的那条过道走出教堂。祖母特丽埃娜绕过祖父，走进过道，跟在父亲身后。

“让那个老家伙也把我逐出算了。”她对我父亲说。

可我母亲和祖父却不知所措。夜复一夜，我们全家围坐在桌子旁，讨论着。父亲遵守禁令，独自吃饭，不同我们讲话，而是写纸条，让祖母大声读出来。可不久他不再写了，显然，是因为祖父和母亲不敢违抗长老。

“上帝给了伊诺克绘画的天赋，”祖母争辩道，“干吗埋没掉？要是在这儿他不能画，还有别的城市嘛。”

父亲同意祖母的话。他决定离开但泽，接受萨克森公爵奥古斯塔斯二世的邀请，去他的宫廷，在经历了无数场战争之后，如今他也是波兰的国王。父亲赶到华沙，设计、装点国王自己在那儿建造的新宫殿，他带上我和艾萨克，开始了我们的学艺。

我曾是个备受呵护、孤陋寡闻的孩子，在华沙，我所见到的情形让我难以置信；从眼角偷偷看去，一切都如此让人惊心。奥古斯塔斯二世还不到27岁，还没到他在德雷斯頓建立欧洲最富丽最挥霍的宫廷时的那种放荡地步，但正如茨温格宫殿^②光彩夺目的建筑至今所证实的，他醉心于体验人类一切所能想像得到的美与恶，终生迷恋，难以抑制。我父亲画的是一幅巨幅壁画，帷幕一直垂到高大人物的脚，有时候帷幕斜到一边，露出大腿或胸脯，他画人物的肌肤、皱褶和边缘，我和艾萨克则按他的指导填实织物的颜色。但即便这看起来是最基本的工作，他对我们画的仍不满意。

“没错，这是布，但布下面是身体。即便布垂下来，很直，但

①《圣经·新约》《希伯来书》10:31。

②德雷斯頓最豪华的皇宫。





你得看见身体！”

我和艾萨克只得耷拉着脑袋。我俩枯燥地往灰泥墙上涂着抹不完的油彩；在我俩看来，哪有什么身体？肯定没有像我们装着没看见的那些在灯笼的光照下奔逃、追逐的身影。在突如其来的尖叫声中，那些身影穿过富丽堂皇的花园，花园上方是王室仆从的住所，我们就住在那儿。

“脱掉你们的衣服。”父亲命令道。“全脱光。”

我俩直愣愣地看着他。在施托尔岑伯格的家里，我们三兄弟睡一间房，与我们的妹妹们分开的，但即便这样，我们还是照母亲的吩咐，熄灭蜡烛，背对着背地赶紧脱衣。谁不知道夏娃和亚当令人羞耻的赤裸故事？

“我也脱。”父亲解开衬衫扣子。“把衣服脱掉。”

等我们脱完，他捧起我们的头，让我们先看到他。一丝不挂，肌肉宽厚，满身是毛。我……还有艾萨克……却个小，无毛，可我俩的体形却跟他一模一样。艾萨克那地方已经黑乎乎的有点毛了，就在他小鸡周围的三角形的地方。那东西不比我的更突出，一样肉绵绵的发红。

“你们的身体，看看，看看你们的身体。上帝给的。”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看没看见，每个部位都那样完美、出色？不论你们画谁，不管他们身上盖的是啥，这身体永远都这样！”

他猛地撩起一张床单，披在肩上，床单垂下，遮住他身体的一半，甚至包括他那“大家伙”的一半（我们的母亲从来不敢直呼那东西）。他扭动肩膀、腿，仿佛要扭起舞来。

“看看这边床单是怎么动的，同时看看这边的肌肉，看见了吗？一部美妙的身体机器，每个身体有所不同，但也相同。最好的画家总是从相同中看到不同。在意大利，在画室，画家就是这样画的，他们训练画裸体。”

他正在穿上衣服，可我不想穿。以前，我从未感到浑身上下

轻风习习。

“从意大利回来，我在埃尔宾受了洗，我想画像，给愿意坐下来让我画的人画像，当然不是裸体，画穿着平常衣服的男女，坐着的，站着的，窗前的。我画了一些日子，有一天，长老找到我，说人们都在传我给一个躺着的女人画了像。我告诉他那女人是倚着胳膊肘斜靠在一张躺椅上的，衣服垂到靴子……可她伸展身子躺着，那不就是躺吗？”

他说“躺”这字的样子、语气里隐含着什么。我感到寒冷，好像掉进冰窟之中。

“即便在埃尔宾，长老就已经过问我画像的事情了。”父亲告诉我们。“在你们出生之前，比在但泽关于第二诫的那件事还早得多。”

在华沙住了两年之后，父亲被召进奥古斯塔斯在德雷斯頓的宫殿。但泽如今相隔得更远，我们只能一年回一趟家；父亲说，身为宫廷画家，比奴隶稍好一些。我长成标致的男孩了，住在茨温格宫殿里的国王的宫女们经常这样告诉我。曾一度她们有五六十个（奥古斯塔斯有个绰号叫“好汉”，据说他是300多个孩子的父亲），她们从来都无所事事，因此特爱寻欢作乐。父亲把我和艾萨克看得特紧，可在艾萨克17岁后的一天夜晚——当时他比我更“标致”——直到天亮他才回到我们在王宫背后的那套豪宅。

父亲没问他做了什么事。他只说了一句：“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接着，艾萨克弯下身趴在我们客厅的那把靠背长椅上，光着肌肤接受惩罚。我只得观望，我想我肯定能调出颜料准确地绘出他那不断变着颜色的屁股瓣。可我在跟着他一起哭。不到一周，父亲辞去了他的职位。

宫廷大臣不接受父亲的辞呈，但奥古斯塔斯同意了。艾萨克和我已经注意到他在非常仔细地打量着我们，对此，我们感到





非常害怕，不过国王尊重我们的父亲，不会强迫我们留下，这对他来说是轻易办得到的事。我们坐着国王的马车，车上高高地堆着礼物，返回但泽。

终于有一天，我们一家坐在一艘高高的船上，驶过莫特拉瓦港高耸的仓房。仓房背后，宽阔街道的对面，我们能看见高耸过码头和内河桥梁的一幢幢房子荷兰式的窄门面，看见房子背后突起的教堂和但泽市政厅的尖顶，看见通向大市场和城市中心的那条皇家路上的格林城门。出了下城，右边出现的是罗佛路和花园的条条路径以及小块绿地，亚当·威伯在设计时把这花园包括在了城墙以内。我们行进得很慢，一切都很缓慢。人们停下来看着我们经过，或许仿佛是船停了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离开，驶出河流，驶向大海？

“哦，大海……大海。”我们的妹妹卡特丽娜用高地德语唱道，满怀期待。她还不到三岁，但却喜欢词的发音，已经能像我们的母亲轻声、悠长地唱出许多的单词。

母亲、父亲和艾萨克祖父在船下的舱位里。他们无法忍受这样一次次的离别。可特丽埃娜祖母却在甲板上，怀抱卡特丽娜，和我们孩子们在一起——彼得、伊丽莎白、阿贝尔和我，还有抱着小乔安娜的高个子艾萨克，我们全拥着她站在栏杆旁。

“记住这。”祖母用低地德语说道。“谁还会再看得到？”

接着，船仿佛不可阻挡似地径直驶向我们正对面的克罗恩斯托码头上的巨型船用吊臂，左边是圣玛丽大教堂巨大的方形塔楼，右边，高高耸立在房屋之上的是圣凯瑟琳大教堂针一般的尖顶。我们挤在一起，挤得之紧，我能感到大家的呼吸在一道起伏、交替，我们简直就要撞上谷物装卸臂，驶上街道了！可慢慢地，慢慢地，船向右倾斜，高高的圣约翰教堂掠过狭窄、浑浊的河水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向港口以东转去，驶向城墙和维斯图拉河。

“记住，”祖母特丽埃娜说，“1635年，你们的曾曾祖父亚当获权住进了但泽城。在这儿，过了圣凯瑟琳教堂，在他修建的瓦根城门旁，市议会给他这个惟一的门诺教徒在城墙内买地的权力，他建了三幢高房子。你们见过那些房子。”

我兄弟彼得说：“我会回来，我会把它们再买回来。”

他说这话时还不到13岁，那天我们刚刚驶进莫特拉瓦河，驶过旧城堡高耸的石墙和系在码头上以及朝东面护城城墙外抛锚的所有船只，驶离但泽。当时，我不信彼得的话，我不知道祖母信不信；我没法看她，我们驶过的地方和东西太多；可她相信。如今我想，不管我们是或不是画家，她都比我们能思考的或想像的要多得多，因为她不仅有她左撇子的信念，还有左撇子的精神。

彼得受洗后又回到但泽，因与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很有交情，他成了香料和咖啡的进口商。1722年，他买下亚当·威伯修建的三幢房子中最无人照管的那幢，一年后，祖母特丽埃娜坐船从伦敦赶来，在那幢修复的房子里庆祝他的婚礼。卡特丽娜和乔安娜跟她一起来的，在婚礼上，卡特丽娜遇见了一位门诺教徒，叫安东尼·蒙伯，他想开家咖啡店。两年后，他跑去伦敦，娶了她，然后两人一起回到但泽，在大市场旁边建起了自己的咖啡屋，附近是那幢漂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银行家们就在那儿数自己的钱。几年内，由于咖啡屋的花园美丽、饮料上佳，还有诗歌戏剧朗诵，如像汉堡的汉斯·迈尔教授^①所说：“但泽的这家世界闻名的蒙伯咖啡屋邀约世上各色人等，甚至包括波兰人、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来尽享它芬芳的饮品，胜过伦敦或巴黎献给最挑剔的品赏家的饮品。”

乔安娜没有回伦敦。他留在了但泽，因为那儿又特别需要

^① 18世纪汉堡著名教授，曾撰文描写过但泽的咖啡屋。





画家了。他给自己取名叫乔安纳·里昂纳德·西曼，十年后他为但泽佛兰芒人的门诺教长老汉斯·范·斯特恩画了肖像，斯特恩的妻子就是我们的二表姐萨拉·西蒙斯。艾萨克祖父、我父亲、我母亲都不在人世了，可特丽埃娜祖母还健在。她91岁，我告诉她时，她大笑起来。

“你等着吧。”她用低地德语说，在我们之间，我们从不说其他的语言。“他也会成为长老的。”

当然，她对了，可惜她没能等到那个时候，再和我一起大笑了。她去世后不久，我娶了豪门贵族的一位年轻女子，她教我如何在上流社会摆英国人的派头。1744年我死的时候，我们惟一的孩子保罗刚10岁，已经上公学去了。我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走进我的画室，告诉我他想当画家，像我和艾萨克伯伯一样。当时，我正要完成我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那幅为贝尔顿家族的约翰·卡斯特爵士画的群像：《卡斯特夫人与她的九个子女》。

我一生所画的作品，保存下来的都分散在各地。伊莱修·耶鲁的肖像在美国，更早的那幅《安德鲁·比瑟特上校及其家人》在苏格兰，我现在承认，这画的质量比“有些参差”的说法更参差一点。《拉普兰巨人盖安讷斯》作于1734年，就是特丽埃娜祖母去世的那年，如今这画在达尔克斯宫殿；《詹姆斯·达西伍德爵士》（1738年）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我自己的半身像，就是奥古斯塔斯二世最喜爱的那幅，是1716年画的，太年轻了。从左看去，我又长又细的手弯曲着伸向下巴，一绺卷发浪放不系地挂在宽阔的前额，厚厚的嘴唇，两只大眼充满热情。

看到这幅画时，祖母端详了半天才说：

“斜对着光，就像英国人常说的，你看上去有点‘sinister’（邪恶）。”她在笑，我用不着告诉她；在拉丁语中，“sinister”的意思是“左边的”。她继续说：

“你总是说你不愿成为门诺教徒，果然，你把自己画成什么

样了,好像你真的就不是了。”

“那好,”我说,“那我真的就是个绘画好手了。”

“可你经常谈起门诺教徒,你老是不想作为门诺教徒。”

“一个人生下来是啥就必须永远是啥吗,永不改变?”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懂了,那不是她真正的意思。在她一生中的最后两年里,我们一起孤孤单单地住在伦敦,我们谈得很多;有时候,我喜欢遐想,一想就是几天不停。祖母不能再织毛线了,她右手手指的每个关节都肿得很大,可她能把线缠在手指上,把线绷紧,用左手钩织。我们家的椅子和靠背长椅两层三层地盖着她织的精致的桌巾,而她的钩针还在飞舞。她笑自己的双手,右手粗大、费劲,左手却有力得令人惊讶。

“你看,”她说,“左边是心脏的这边。”

她把自己这漫漫一生中想要记住的一切告诉了我,对于某些事件,她的记忆惊人。在所有人当中,她懂得我们人生所包含的无穷无尽的矛盾,无法看到的结局。“我们是 Himmels Fluchtlinie^①。”她说——逃往天堂的人们,或许是英语中所谓的精神难民——不过,到了20世纪,叫法将更不合适:“精神错位者”。我让自己看起来很虔诚,但比我更虔诚的人们也许会说,她的意思仅仅是“此地的陌生人”,或者就是“朝圣流浪者”。

言归正传,在1945年2月13日的夜里,那张被端详的自画像在德雷斯顿的火焰炸弹中摧毁了。我画的前两位乔治国王的画像多存了点时间,最后也都在温莎城堡的那场火焰中化作烟灰和空气。

我祖父的作品一幅也没留下,我父亲的仅存有几幅雕版画,其中一幅是画的亚当·威伯的缆车。当然,铜雕版老早就被融化成了某场战争中的子弹。

^①低地德语,意“逃往天堂的人们”。





在我去世的前一年,我兄弟艾萨克坐船从罗马来看我,我跟他一起观看了1743年3月23日礼拜三四旬斋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皇家剧院首演的乔治·弗雷德里克·韩德尔^①的《弥赛亚》。我给妻子讲了演出的壮观场面,韩德尔边弹奏大键琴边指挥,她很后悔没跟我们一道去,当报上沸沸扬扬,谴责让“品行放浪”和众所周知有“性习惯问题”的舞台演员在剧院里演唱《新约》和耶稣的名字时,她愈加后悔。《大众观察报》质问道:“难道剧院可以作为上帝圣言的殿堂?难道《新约》可以作为消遣与娱乐的文本?他们这样寻欢作乐,难道还没有违犯第三诫,难道还没有亵渎上帝的名义?”

艾萨克笑了。“跟但泽的那一诫差不多。”^②他说。“第三诫是啥?”

我不知道,可我妻子记得她过去的英国国教。“不就是那个‘不可’吗?不可妄称你上帝的名?”^③

我们三人轻轻地笑了笑,一起笑的,就像相互爱着的人们年岁大了以后那样地笑。我们谈起我们西曼家族,曾经如此紧密,如今却天各一方。

一年后,恰好这一天,我死了。好多年以后,《弥赛亚》再没有上演过,可对我来说,有一首歌的音乐和歌词像一团被驱赶的火,始终燃烧着。低音和喇叭声:

听着,我把一件奥秘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①乔治·弗雷德里克·韩德尔(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一生创作歌剧、清唱剧70余部,代表作有清唱剧《弥赛亚》、管弦乐曲《水上音乐》等。

②在但泽,人们用第二诫来禁止绘画,这里,人们用第三诫来禁止音乐。

③《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
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
号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
我们也要改变。^①

改变了。再没有终结。祖母特丽埃娜懂得这个道理。在世上
她是个左撇子女人。

①《圣经》《哥多林前书》15:51-52。



第 9 章

摆桌子

1987 年，埃德蒙顿

他们围坐在餐桌旁，做礼拜六早晨的祷告，这是苏姗娜从意大利回来后一家人第一次聚餐。肉桂卷吃了，那是亚当像往常一样从医院回家时在面包店买的，苏姗娜移动着桌上的刀叉，好像有必要讲得更直观。

“很简单。”她说。“我去卡尔加里。”一把咖啡调羹移到了左边，“你们爸呆在埃德蒙顿，”一根叉子移到右边，“崔茜，你住在埃德蒙顿的大学宿舍，”一把餐刀移到右边并排着，“至于乔尔……”

她修长的手指摸到另一把调羹；手犹豫了，可后来她坚定地把调羹推到了叉子边。

“小乔尔，”她伸出手，抚弄着他低下来的头。“你呆在埃德蒙顿，读完 12 年级。”

乔尔嘀咕道：“我已经单独跟爸呆了 4 个月了。”

苏姗娜的手臂垂下，搂住乔尔宽阔的肩膀，一时间，作为橄榄球阻截队员的他，却只是她的乖孩子，头搁在她肩上。

“你知道，最后一学年这么晚转学，对你不好。”

“转到卡尔加里的一所中学去怎样？”

“甜心,最后3个月不能转。”

“学校灌的都只是些省级期末考试,在哪儿我都会做,轻而易举。”

崔茜问道:“你干吗现在就去卡尔加里?你不是说工作9月份才开始吗?”

透过餐厅那扇从天花板到地板全是玻璃的窗户,亚当凝望着外面。被雪覆盖的北萨斯喀彻温山谷因为河水冰冻而退得更深、更宽,每一棵树,每一团树丛,每一条公园小道,凳子和棚屋,都涂上了灰白的霜。山下远处的街道和桥梁上,微小的汽车在缓缓移动,对面河岸上,矗立着玻璃和水泥建成的高楼大厦,在深蓝色的天空下迎着旭日闪耀着浓重的银色和白光。每一块水晶般的雪与冰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天,只要有时间,他从自己房子往外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被改变一切的寒冷变得雄伟壮丽。

又是苏姗娜平静的声音。她已经把每个细节都想过了,听起来都非常的实际、明智、显而易见、最为合理、符合道理、非常实际、没有痛苦……他用完了所有的词汇,直到她叫他住口,他心里清楚她要说什么,只好停了下来,面对这一切,就这一次。

“文学院的院长给我打来电话。”此时她开始向崔茜解释。“要我去教春季和夏季两个学期,春季那学期5月份开学,我得去找间房子。”

“我以为你要坐车往返上班呢。”

“单程300公里呀!在那儿我至少还是需要一套公寓……”

“还有个办法更简单。”亚当说道,把事实摆上桌面,不过,他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绝对的合乎情理。“这工作是永久职位,假如她能找到马上就喜欢的房子,我们买下来,那是笔投资。没必要付的房租干吗要付?”

“我在付房租。”崔茜说。“一个月400。”





“你想要幢房子？”

“不，我不想。”

“想要的话，我在大学附近给你买，你住进去，给我付房租，简单得就像——”

“我不想成为投资获利的对象。”崔茜语气平淡地说。“我只想这个春天就毕业，然后离开这儿。”

“吝啬鬼今天怎么啦？”乔尔问亚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你连辆二手大宇都不肯给我买，可今天你却要给每个人买房子啦？”

“听着。”亚当说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静、理智。“我们的家庭在改变。你们俩都长大了，这个春天快毕业了，你们妈在卡尔加里大学找到了终身职位，这工作她最合适，写了两本书，在这儿教了15年的短期班，她应当成为那个系的资深教授了——所以说，我们在变，如果你们活着，你们就得变，我想说明一点，我们能够就自己要做的的事情做出合适的、明智的决定，我们也不必为了钱而担心。我知道，对我们大家来说，钱是足够的。”

崔茜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亚当停住了。他听出她不是在问钱，但他继续说：“我父亲告诉过我，要是你有了点钱，就买土地，土地很好，不会消失。可我俩——”他朝苏姗娜做了个手势，此时，正轮到她凝望窗外那亮晶晶的灰霜了。“我俩当时有很多大学的账单要付，因此一开始只能买幢小房子，首款还是向你祖父借的，可等崔茜出生的时候，医院里的一位老病人告诉我：‘要是你能凑齐100块钱，就为你的小女儿买施乐公司的股票。’于是我买了，到乔尔你出生的时候，我能凑的钱更多一些，于是买了500元的IBM股票。到1977年，我们就有了这幢房子，还有更多的钱。现在就更多了。”

“你也买了地？”乔尔问道，很吃惊。

“不，没买地，幸好没买，1981年艾尔伯塔的地价暴跌，可股票，尤其是技术股……好嘞，如今有足够的钱供你们上学，包括生活费，还有几次长途旅游的费用，你们想读到什么程度就读下去。”

“如果妈要一直在卡尔加里工作，”乔尔说，“我想在那儿读完中学。”

苏姗娜没有看亚当，对这他俩没有意见，这是他俩的共识之一。

“我没意见。”亚当说。“你毕业了，就给辆新车。”

“最高价多少？”

“看你的分数了。我说，一流的分数，一流的车。”

“那好！行吗，妈？”

“我想你跟我，但要一个多月才能找到房子。”

“不过你得去卡尔加里找哇。我可以在班夫找份夏季短工。有了车，我可以开车去那儿。”

“洗碗。”崔茜平静地说。

“那又怎么样？我就能每天爬山了。”

亚当说：“你不必工作。你可以帮你妈找幢真正好的房子，每天都能看到山的房子。”

乔尔笑了：“你以为你是什么，百万富翁？”

苏姗娜说：“我和你们爸商量好了，无论要做什么，我们都平摊，都平分，可是钱要用得合理，而且今天早晨不必安排这一切。”

崔茜眼盯着餐具在看，她说道，语气更加平静：“奇怪，今早突然之间，我们都要安排什么啦？”

苏姗娜严肃、平静地说：“我在欧洲很成功，如今，我得去卡尔加里开始工作。”





崔茜飞快地说：“我很高兴，妈，你应该拥有一份真正好的工作，终于有了。可你们两个好像……”

亚当对两个专心一致、陷入越来越长的沉默的孩子说道：“今年夏天我想度个长假。也许去日本，或韩国。”

他碰了碰崔茜的左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崔茜的手指弯了弯，顺着他的手指滑了下去。接着，她把手伸过他的胳膊，把那两把咖啡调羹、餐刀和叉子全拖了过来，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在桌上摆弄起来。有时候，她好像在摆一个圆圈，有时候，那些餐具像是由一个中心往外四射，飞向四个主要方向。

第 10 章

跨过伏尔加河

1863 年,普鲁士^① 黑伦哈根

俄国 亚历山大

我叫安娜·威伯,1842 年 6 月 13 日生于西普鲁士的黑伦哈根村。我知道对于长女,上帝是有特殊召唤的,但我从未想到没到 21 岁自己的希望会灰飞烟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上帝才知道。如果能写下来,也许离别的刺痛会得以减缓。

我母亲是去年死的。我是她的长女。150 多年前,我们家族修堤筑坝,建了黑伦哈根,威伯家的四兄弟离开埃尔宾附近的村庄,搬到三角洲的腹地。可现在,父亲说战争和国王改变律法,不论这些国王的祖辈立下什么天长地久的誓言。威廉国王在柏林任命奥托·俾斯麦^②作为他的首相,战争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战争,他说。而我们家有 3 个高大的儿子。

对门诺教徒来说,这不算多。可如今在维斯图拉三角洲,再没啥土地可开垦了,假如一个男子没有土地,他就被招募进普鲁士军队,管他是不是门诺教徒。

①位于北欧,1701 年起成为王国,1871 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②奥托·俾斯麦(1815~1898):政治家,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1871~1890),通过王朝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人称“铁血宰相”。





“把农场给海因里希。”大哥约翰尼斯说。我排行老二，比海因里希大两岁，接下来是弗朗兹，只有 12 岁的凯西，还有小玛格丽特。“我去柏林上学。”

“万一他们在那儿看到你，会把你抓起来，在国王卫队当头给你扣上熊皮帽^①。”

约翰尼斯说：“我学得出色就不会的。在大学里像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所罗门·威伯一样出色。”

“很聪明。”父亲说。“那弗朗兹咋办？”

兄弟俩都很高大，还很壮实，普鲁士将军是不可能不抓他们的。父亲说，威伯家族的人没有谁在军中死的，就连拿破仑将整个世界沦为杀戮者的时候也没有。门诺教徒总是有地的，我们得找到新的土地，为了自己的信念。

于是，父亲把我们家的农场卖给了年轻的汉斯·克拉森，他只有一个男孩活着，还有 3 个女孩。父亲给俄国大使馆寄去 350 泰勒^②，作为我们不会在路上饿死的保证，还买了长车和高头大马。我们将跟着一个车队离开这儿，到俄国去。克劳斯·艾普长老是领队，艾伦·埃沃特是车把式。

我感觉到霍布登的弗雷德里克·拉兹拉夫要向我父亲提亲，我抱了希望。可父亲说：“亲爱的安娜，你是长女。要是你不来，不做饭，那我们吃啥？”

1862 年 6 月 3 日：

在家住的最后一夜。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家厨房炉子里的大火在燃，在烧。上床前，我从小盒子里拿出我的《每日警句》。第一张卡就是《出埃及记》中的“一戒”：“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20: 2)

①国王卫队士兵戴的帽子，英国皇家卫队士兵戴的也是这种用熊皮做成的帽子。

②德国 15 至 19 世纪的银币，1 泰勒值 3 马克。

我记得教义手册上的诗句，是不是总是这样说的？还有别的什么神？

6月4日：

警句：“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5:16）

我和凯西在母亲坟上最后放上一束花。安娜姑妈和我哭着一起说了再见。这一切太伤心了，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抛弃所有的希望，履行自己的责任。大车准备好了，车夫也到位了。凯西和玛格丽特还有我在院子里来回走着。鲜花盛开，像天堂里的星辰。可海因里希兄弟心肠很硬。“该走了，傻姑娘，走，走吧！”我们沿着堤坝上的道路行驶在绿色树阴下，村上的和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走到他们的门前。我们也走过了霍布登街，可只有小利兹基朝拉兹拉夫一家人挥了挥手。

荆棘^①和眼泪，今生今世永别了。

6月6日：

警句：“一切受造之物与我们一同叹息，为了我们的身体得赎。”（《罗马书》8:23）

清晨。我们的车队沿着铁路桥跨过诺加特河，朝马林堡的城堡驶去。那桥窄得吓人，但很牢实。枕木和铁轨是黑的，铺着马匹走的木板。那些马的眼睛得蒙住，让人牵着走。城堡像座黑山，矗立在灰色的水面上。

约翰尼斯说我们的亲戚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所罗门·威伯设计并建造了那座桥，还有整条的铁路，从柏林到东面边境的艾德肯恩全长600公里。这个威伯如今在柏林是普鲁士王国负

^①耶稣受难时，头上被迫戴上荆棘编成的花环，从此，在基督教中，荆棘象征苦难。





责公共建设工程的大臣。凯西说：“我们从没见过他。”此话没错。

经过城堡时，我不忍心看。一年多以前，在4月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我和弗雷德里克在那儿走过。再也不会去那儿了。我要记住的只有每一道石头缺口上那一条条生锈的铁栅，那些缺口是用来向人射击的。约翰尼斯爬进大车，给我们讲约瑟夫·冯·艾琴多夫的故事，60年前，他访问了马林堡的城堡。当时是一个门诺教徒租用的。艾琴多夫写道：“那雄伟的大厅曾经是条顿民族的骑士们300年来召开圆桌会议的地方，如今却尽是门诺教徒的织机丁丁当当、吱吱嘎嘎的嘈杂声。”

我的小姐姐们笑了。对我来说，却没什么好笑的。约翰尼斯会讲精彩的故事，而我只听见：你得这样做。

6月7日：

警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加拉太书》6:8）

普鲁士的一条很好的道路。跨过埃尔宾附近广袤的田野，我们看见河对面树林中的艾因拉吉村。约翰尼斯说，我们威伯家族虽然有很多人去了俄国，但仍有上百人住在那儿。他们的堤坝是亚当·威伯和他的儿子们在200年前修筑的。这些堤坝仅掘开过一次，是想看看拿破仑教没教他的士兵怎么游泳。他没教。

6月8日：

警句：“可圣灵参透万事，甚至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哥多林前书》2:10）

我用下榻客栈的热水泡好早餐喝的咖啡。这地方真脏，比

昨天更糟糕。在他们肮脏的炉上,我简直没法煮啤酒汤^①。我独自一人睡在大车上,整个晚上都有人守着。从没见过厨房里有这么脏。客栈的那个女人其实自己也是个仆人,整天朝她那个愁眉苦脸的女佣尖嚷。今天太阳出来了,天边全是黑云,夹着闪电。

我们很早就过了埃尔宾。如此多的教堂塔尖,像座始终在祈祷的城市。夜晚,我给彭特卡斯特做了些甜梅,艾普长老在祷告。他坐在一把可以放平的椅子上。

奥古丝塔·埃沃特跟她的两个小孩子一同坐在地上。她结婚前,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她是跟鳏夫埃沃特结的婚,他妻子死了3个礼拜。她有4个继子,最大的比她和我小一岁。我站在她身旁。她抬起头,笑了。她的艾格尼丝有一头漂亮的金色头发。

6月12日:

下雨,泥泞。这家客栈很干净。父亲让客栈女人做早饭。有人对我粗鲁,但我感到安全,我给他讲了我的所想。

我们在艾德肯恩停下来了,这是在自己的祖国呆的最后一夜。我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长信。妹妹们跟着约翰尼斯去了火车站,很大但还没完工。凯西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所罗门·威伯了。”小玛格丽特说:“我还从没见过他呢!”大家都笑了。

约翰尼斯看上去很悲哀。就连最年长的儿子也没法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①普鲁士人喝的一种用啤酒作底料的汤。





6月13日：

警句：“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彩云围着我们，就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12：1）

一年前的今天，我们慈爱的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生日那天，我们跨过了国界，最后一只普鲁士的鹰^①。边检的时间很短，但让我愤怒。这么脏的手在我们的东西里翻来翻去。奥古丝塔·埃沃特让他们翻，好像满不在乎。她所有精心捆好的包袱全拆开了。

昨天，山峰在远处闪闪发光，今天，高耸在村庄屋顶之上的教堂在阳光中发亮。太漂亮了。可是，没有漂亮的房子，一切都很糟糕、肮脏、混乱得一塌糊涂。大多数人好像是犹太人。他们拥挤在我们周围，叫嚷着要我们付他们过境费。父亲威胁说要叫卫兵，于是他们像老鼠一样很快消失了。凯西唱起学校里的一首歌：“我们的祖国，事事多美好，处处多漂亮。”

我没时间去任何墓地。可约翰尼斯去了一处我们经过的墓地，给我带回来几朵小红花。我夹了一朵在我的《每日警句》当中。我随身带着我们家的铁烤炉，即使在路旁，在傍晚的雨水里，我也能做出好吃的饭菜。没有臭气熏天的厨房了。

6月14日：

警句：“顺着圣灵播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8）

雨一场接一场。从远处看，城镇亮闪闪的，有许多俄罗斯教堂洋葱般的圆屋顶，可是一进了城，它们却糟糕透顶。我感觉很不好。即使有了时间，可我还是不想走进路过的墓地。街道上尽是污泥和高声嚷嚷的犹太人。我们绕过了马林普尔，没有遭到

①普鲁士国旗上有鹰的图案。

抢劫。满目肮脏，一切都贫穷不堪。男人们尖叫着啥东西都在卖，年轻的犹太女人跑来跑去，衣衫褴褛，裹着的头上网着头巾。“啊，以色列，你们这群上帝的愚民，”正如耶利米^①所预言的。在维尔达，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犹太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弥赛亚^②，除了贫穷，他们还能有何期待？

父亲从一个犹太人那儿买了燕麦。道路变成了沙地和山坡，马匹走得吃力了。雨中，我跟在车后面。啊，请主怜悯我们和我们的牲口。

6月15日：

警句：“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诗篇》9：20）

安息日。我把洗的衣服晾在后面的矮树丛，在太阳下晒干。坐在岩石上写东西。虽然我的《每日警句》总不离身，但今天这书却让我想起什么。只想到男人。克劳斯·艾普长老坐在桦树下面祷告，我们坐在地上。我想起了耶稣和他的信徒。只有男人——女人们是否在听？

傍晚，我们姐妹跟奥古丝塔一起坐在草地上唱歌。接着，埃沃特家、艾普家和威伯家的孩子都来了，奥古丝塔的小儿子本杰明和小女儿艾格尼丝也来了，声音嘈杂。大家游戏、奔跑，相互叫喊着。声音响亮、甜蜜，仿佛在家一样。

“欢喜吧，贫穷、呻吟的造物。你们永远的安息日即将破晓，劳苦时日将不再跟随。”

6月18日：

警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

①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的希伯来大先知。

②犹太人盼望的救世主。





你们众人同在！”（《哥林多后书》13: 13）

今天起得很早。大车走了很久才吃早餐。我感觉很不舒服，但还是尽量走路，让马匹省点力气。我们想赶到维尔纳。地上石头很多，太阳火热。

今天，我也去一片墓地走了走。那儿没有墓碑，只有烂在地里的木头十字架。满地野草，每座坟墓都深深地陷了下去，一片颓然。我想写信，但蚊子太多。我做完饭，我们吃饭时，小艾格尼丝·埃沃特倚着我。她那头发亮的头发。

6月19日：

心啦，你还要渴盼多久？

维尔纳高高耸立在河边的一座悬崖上，高得让我害怕。总是那么遥远。一个犹太人给我们指路，但穿过一个山谷，他指的路成了沙土，我们那帮男人大为恼怒。幸好那犹太人走了，否则海因里希定会揍他，给我们惹来麻烦。可父亲说卖了匹好马给我们，把我们拖过了这沙地。

父亲走路去维尔纳寄信，约翰尼斯和我们几个姐妹去看火车站。凿石高耸。许多橡树，还有精美、白色的俄罗斯教堂，顶部是红色和流露出绿色的圆屋顶。很美但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那帮盯着我们看的牧师长长的一队，浑身漆黑，像他们的衣服一样。我们从犹太人那儿买了面包，又买了两匹好马，继续赶路。

接近傍晚，父亲朝一座高高的、荒废的城堡指了指。除了海因里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便往上爬。没有什么建筑，到处都是粗糙的石块，仿佛是那群小巨人扔的。一片废墟。没时间了，我们得跑下山，赶上车队。

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干涩，像废墟中的沙土。

6月23日：

警句：辛岑道夫^①说：“啊，救世主！让你神圣的爱火缠住我冰冻的心。”

雨下了又下。只有一条俄罗斯的邮路，沙土和连绵的山峦。我们那匹可怜的马再也拉不动马车了，系在马车后面也几乎无法行走。除了约翰尼斯，兄弟姐妹们都责备我，说我不舒服是因为吃得太多了。可我觉得是因为我总是不得不穿着湿鞋走路。

还有心事，太多的心事要担负。所有关于霍布登的希望和打算全都挂在心上，如此沉重。啊，为了那力量，这些心事必须扔掉。可它们依然像黑乌鸦一样蹲在那儿。阴郁地等待着。

6月25日：

深谷中有条小溪。约翰尼斯和凯西爬下去看。那条狭窄的路悬在山边，上上下下，连绵不断。太阳在远处的一场阵雨后面落了下去，像透过泪眼看见的光。

6月28日：

我想安静。只想面条。明斯克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今天没法走了。路上石头太多，崎岖不平，但坐在车里颠簸我好揉面团。大家都吃了，除了我。凄凉的俄国城镇，腐朽的屋顶板下是腐朽的棚屋，教堂被围在当中，在雨中发亮。一队接一队的士兵拿着枪，无所事事只是拿着枪发呆。我们找不到喝的水。很晚出发，在林中停了下来。美丽的晚霞，蚊子很多。晚上双岗。海因里希说，这是俄国内地了。弗朗兹笑道：“等着瞧吧。”他说。“还会更多，等着瞧吧。”

^①尼古拉斯·路德维希·冯·辛岑道夫(1700~1760)：德国神学家，创立摩拉维亚教会(1722年)。





6月29日：

安息日早晨，露水晶莹。昨天赶路时，我在马车里小睡了一阵，仍然无力。没有凯西和玛格丽特帮忙，我没法为早餐煮咖啡。艾普长老在念《路加福音》，念迷羊的比喻，念失钱的比喻^①。今天我们休息。对我们和可怜的马匹，这太好了。太阳很大。

中午过后，艾普长老坐在自己的折叠椅上，所有男人围坐在他周围，讨论门诺教徒的不反抗主张，讨论如何去爱自己的敌人。我忍不住要笑。每天我们都碰见这么多肮脏、尖叫、偷窃的人们，男人们对他们说话近乎于胆敢怎么咒骂就怎么咒骂。约翰尼斯看到我，我感到羞耻，因为从我脸上他看到了什么。他知道我也是多么地想咒骂。

我把那些高大的桦树指给小艾格尼丝·埃沃特和她两岁的兄弟本杰明看，低处的枝干四处展开，在松树般挺直、黝黑的男人当中柔曼得像女人。凯西走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的力气没了，但为什么我还是找不到那种柔和、顺从的精神？

7月4日：

警句：“主，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路加福音》24：29）

路如同沙漠。那匹可怜的马只得被枪杀了，再没什么可给我们的了，除了那张皮。荒原。太阳照耀时，那是沙漠，天黑后便是闪电、雨水、泥浆。雷声像酒桶爆裂一样。

我病得很重，但仍然做饭。听说很多孩子都病了。奥古丝塔家的孩子也病了。

^①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5：1-7；8-10。

7月10日：

男人们为了马跟犹太人推搡、争吵起来。我们有道理，但这没用。父亲买下了那些马，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太阳火热。我没法走路。我在车里发抖，烧得厉害。奥古斯塔抱着本杰明走过来，她在哭。她的两个小孩都发烧了，病得不轻。

7月18日：

警句：“上帝啊，在干旱疲乏之地，我的灵魂渴求你。”（《诗篇》63：1）

终于到了第聂伯河。河岸上只有一棵树，一棵高大的橡树，就像在黑伦哈根我们家院子里的那棵。我跟在马车后面沿河岸努力地往前走。黑水轰轰地从身旁涌过——这河够深吗？约翰尼斯说这条河流经上百座富饶的、有60到80年历史的门诺教徒的村庄，在遥远的南方，靠近炎热的黑海。那儿我们是不去的。成千上万的门诺教徒我们是永远见不到的。这河够长了吧？

几个妹妹发现了野醋栗丛。我吃了几颗，又甜又酸。白色的睡莲漂浮在静止的水面上。一座墓地隐藏在树林当中，可我病得很重，没法去，而且我还得做饭。我没法走去那儿。

7月23日：

如今我们远离了第聂伯河，可莫斯科在哪儿？山总是一座接一座，如此可怕的太阳、沙地，如此猛烈的暴雨、泥泞。这儿一切都是那么残酷，甚至气候。这是上帝给罪人该隐的土地^①。

约翰尼斯在松树底下找到了些蓝莓。我们几个生病的把他找到的全吃了。可对小本杰明·埃沃特来说，这太晚了，那天中

^①《圣经·旧约》记载，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出于忌妒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并作为逃犯而被判罪。





午过后，他便死在了车上。埃沃特先生从一个坐在高大马车上的犹太人那儿买来木板。天太热了。听说尸体只能放一天。

7月25日：

我们不必把小本杰明埋在路旁。离莫斯科不远的一座村庄有片墓地。

我病得太重，没法去，我们的马车围成圈，是艾普长老主持的葬礼。像往常一样，棺材掀开。《以赛亚书》26:19：“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①躺在那儿的是个头小面庞黑的陌生人，肿胀得没人能说曾经认识他。

7月27日：

安息日，生病。我躺在大车里，透过篷布的缝隙看着远处莫斯科城里洋葱模样的教堂屋顶。多得数不尽。约翰尼斯悄悄地给了我一个从市场上弄来的苹果。他说傍晚的阳光真亮，照得教堂的圆屋顶像纯金。在俄国，这里是金色的天堂，而我却不能走路。不，不，他说，不是街道，街道很脏，满地碎卵石。我的几个兄弟把一位医生带到我们营地，可一个陌生男子又能知道什么？周日礼拜。

7月30日：

我们离开莫斯科前，他们又找来了那个医生。他是德国人，眼神和善，对每个人都说话。有些男人眼光尖锐，让你感觉割痛。他轻声地问了些问题。我感觉好了点。父亲在莫斯科买了些新鲜肉，我想吃。妹妹凯西和玛格丽特虽然刚刚9岁，但她们在学，她们做饭时，我拖着身子移到炉边吃了些东西。大车装满

^①引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全句是：“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

了,但我可以单独睡在里面。努力睡着。

8月1日:

警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
(《希伯来书》11:3)

我只能为自己的孱弱而哭泣。理解地看我一眼和药片都无济于事,我昂不起头来。天热得难以忍受,母亲最厚的毯子也不能为我免除石头路上那没有尽头的颠簸和马车的咣当声。临近傍晚,天下起了雨,我很冷。啊,这凄苦的身躯能体感一切,却一无所知。啊,伟大的主,在我内心造就一个新世界吧。

8月14日:

妹妹们说我们经过了弗拉基米尔和穆罗姆,经过了阿尔扎马斯。那是什么?一座小城。从莫斯科到亚历山大,我们走了一半多路了。在亚历山大,跨过伏尔加河,门诺教徒还有我们长老的儿子克劳斯以及自己的新土地在等着我们。我啥也没说。疼痛,还有坐车的日子。我记得一路的颠簸和恶梦,夜以继日。

我记得马林堡的城堡,城堡的花园和那只我曾依偎过的胳膊。还有对我说的那些话——我想忘掉我听到的,我看到的。墙上厚实的缺口上横着一根根铁栅,人们曾经在那些缺口处射箭、开枪,可阳光在喷泉上映出各种美丽的模样,接着又变得丑陋。石墙。轻声对我说话的弗雷德里克,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6月3日我在厨房火炉里烧的那封信。我要忘掉这些,一切都成灰烬,把它们抛在俄国这片齷齪的大地上,抛在这条肮脏、无尽的旅途上,离他而去。你的一切会永远地消失在这儿的一无所有当中。

小艾格尼丝·埃沃特还在生病。现在,她和我坐在一起,坐在车上最软的毯子上。我们的肩膀一同摇晃,她的瘦腿靠着我





的腿。我们想法搞点笑。我在她的画板上画了个火柴小人，她吃力地写上她名字的字母。由于颠簸，笔画全是歪歪扭扭，绞成一团。没法认没法看。我们尽力笑了笑。我的妹妹们在外面炉子上一边做饭，一边唱道：

“这世上还有什么
能满足我的渴望？
啊，我的耶稣，让我走近……”

艾格尼丝圆圆的脸庞枯干、凹陷，几乎有棱有角了。像一只娇小的金鼠，她的呼吸真甜，可我看见她的眼睛在变大，越来越深。

8月18日：

大车停了，我听见奥古丝塔·埃沃特在嚎啕。我们在山顶上。约翰尼斯说，远处闪光的地方就是伏尔加河。他给了我更多的蓝莓。可能就是俄罗斯的那条伤心的伏尔加河，但在我看来，那河比大海还要宽阔。

8月19日：

我们把小艾格尼丝埋在路边，她的名字被刻在我们找到的最粗的树干上。我跟奥古丝塔一起坐在埃沃特家的大车里。太阳、飞云、崎岖的道路和山峦。大车碾着石头蹒跚而行，我俩可以一起尽情嚎哭。傍晚，奥古丝塔的一个年岁大一点的继子帮她扶下车。我也爬出来。我坐在炉子旁，帮凯西擀面。

8月20日：

雷雨交加，我们那些可怜的牲口在寒冷中发抖。据说这是干草原^①的气候，俄国的天气只有极端。

^①特指俄国西伯利亚一带没有树木的大草原。

整整一天,在滂沱大雨中,我们的车队搭着一艘漏水的渡船驶过了伏尔加河。在河上,我对海因里希说:“看,那边就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①海因里希什么也没说,可父亲听见了我的话。他走过去,搓揉着他新买的、最好的那匹马的耳朵。我们还有8匹马,拉3辆车,但从黑伦哈根出发时的那些马匹全死了。现在全是俄国的马,从犹太人那儿买的。约翰尼斯站在渡船的边缘,嘴里唱道:“伏尔加,伏尔加……”用比俄国人还低的男低音低沉地唱着。静静地站着,我们好像在下沉,超载的渡船吃水很深,我们能平行地看到宽阔的水面上溅起雨水。溅在我们的靴子周围,像冬日的冰水。

“这次我们过不去了。”我对他说。“我们会沉的。”

约翰尼斯说:“安娜,这不是圣地约旦。这是伏尔加母亲河,斯丹卡·拉辛^②的土地。200年前。他把自己最珍爱的抛进了这条河,作为最后的献礼。”

我问他斯丹卡·拉辛是谁,他献的是什么礼?约翰尼斯告诉我说,我已经够伤心的了,不该再问。

我告诉他,是的,我不想听俄罗斯什么可怕的故事。我只想再见到我们的母亲。

“有信念吧。”他说。“因着信,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③

我告诉他,那城墙是以色列人围着走了7天才倒的,他说,那我们已经走了多长了?

①迦南,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圣经·旧约》《出埃及记》3:8中写道:“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②斯丹卡·拉辛(1630 ~ 1671):哥萨克农民首领。1670 ~ 1671年领导农民反抗贵族,被捕后在莫斯科被当众处死。民间将其传说为英雄,相传他将自己的爱人作为祭品抛入伏尔加河。

③引自《圣经》《希伯来书》11:30:“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





8月25日：

眼下，一路全是干草原，绵绵千里的草，没有一处树丛高过膝盖。天空，闪电。在我们前方的任何一处，一团云升起、变黑，顷刻雨水倾盆。火在我们家的炉子里啪啪作响。我们把草挽成团，把炉火烧得噼里啪啦。天空。接着在西边，有条光，一条完美的彩虹。父亲说，那是应许之虹。约翰尼斯说：“那虹在我们身后，地方错了。”父亲和海因里希看他时，他笑了。仿佛他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姐妹和弗朗兹也和他一起笑了。听人说，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到亚历山大。

8月27日：

第5天没看见树了，只是平拱起的干草原。像只摊开的手掌，永远向前伸展。在一个凹陷的、草丛稀疏的小山谷里，我们找到了亚历山大。年轻的传教士小克劳斯·艾普走出自己的草皮屋迎接我们。他瘦弱、黝黑，眼泪流进了他的胡须。他告诉我们，这儿的地下水很好，不深。草皮屋是一种俄国式房子，往地下挖两台阶深，草皮垒的墙壁和房顶，看，人们用大车上的木板做成三角形的房顶，这样就强于俄国的草皮屋了，因为雨水从草皮房顶上流下来，很快就流走了。他说，屋内始终是暖和、干燥的。

小克劳斯·艾普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讲啊，讲啊。可当他看我们时，他的眼光越过我们，或掠过我们的头顶，仿佛在我们头顶之外很远的地方，在云层里，他能看到什么。

在这狭窄的山谷之外，只有干草原。我们周围是宽广的天空和完全空旷的翠绿草地，地平线像是被哥萨克人的利剑劈出来似的。约翰尼斯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他告诉我这儿将有成百上千的门诺教徒，只稍稍等些时候，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掘开

土地,像草一样生长起来。

我说我一直在帮他寻找一所大学,可在这干草原上,我的眼光似乎看不了多远。

他笑了,太阳把他瘦削的脸晒得黝黑、光亮。他说,很久以前在弗里斯兰海岸,后来在维斯图拉三角洲的 250 年中,我们的人民在洪水大学里学习,如今,俄国给了我们这所艰苦的干草大学。





第 11 章

与弗朗茨·卡夫卡^①同眠

1988 年，巴伐利亚州^②帕索修道院

布拉格^③

晨曦经浴室的镜子一折，向上斜射，高高地消失在寂寥的空气中。亚当想，像是一幅用透视法画的经典的荷兰油画：平涂的门框和门本身，光秃秃的一排地板以一扇中世纪的窗户为焦点，一边露出一只床角，一个女人赤裸的膝盖挂在床沿，一双褐色的腿坠着十根悠闲的脚趾。这世上没人知道他俩在哪儿，没人知道他俩在一起。亚当终于感到一阵快乐。在森林里空闲地过一天。

几百年来，这座由修道院改建的旅馆隐藏在多瑙河以北、德捷边境附近的这座森林里，一年中的这个时节，房间是无人租的。亚当后来会想：正是在这女修道院偌大、空旷的房间里，我才走出痴迷，第一次看清了卡伦——也许是因为她被镜子反映、投射到了远处。

眼下，他打量着自己刮净了的威伯家族的那张脸，对她叫

①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

②德国南部一地区,原为公爵领地。于公元前 15 年被罗马人占领。中世纪德国 5 个有权势的公爵领地,但是后来被许多势力和政权占领和统治。

③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及最大的城市。

道：“这样行吗？”——对着镜子努力回忆她的那些照片，那些她所迷恋的深眼窝、长拱鼻的男人^①的照片——“比如，要是我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剪得高一点，蓬松一点，像毛皮帽子？”

卡伦摇摆的双腿看不见了。她正在大声笑话昨晚饭店里那些小题大做的素食者。“这帮英国老朽，”她说，“拿自己的健康当病治！^②”

“你又在引经据典了。”我说。

也许她没听见他。她还在笑。

“我的下巴没法变了。”他大声说道。“不过，像这样把耳朵撑起，像两把大铲子招风耳怎样？”

“别闹了，回这儿来。”

她秀美的头和身体在等待。在这偌大的房间里，在他俩头顶上这片不知消失在哪里的天花板下，这张年岁古老、嘎嘎直叫的床太小了；她赤裸的身体忘掉了这幢空房子曾经拥有的培养修女的意图。在她的黑眼仁里，映出他那张微缩的脸庞。

他俩埋在被子底下，听不见房间里回荡的声音。肌肤紧贴肌肤，敞开身体让对方抚摸、进出。

“为什么你总是想要我？”

“不幸的心情。对我来说。”

“你不是指‘肉体’吧？”

“不是。”

“肉体是不是一种心情？”

“绝对是。”

亚当的头贴着她的双乳，用德文引用了弗朗茨·卡夫卡的一份工作申请：“申请人能流利地讲德语和波希米亚语，擅长讲话和写作，另外还掌握了法语，部分英语——”

①这里指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卡伦研究的对象。

②卡夫卡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





她砰地把他的头放在枕头上。“别说了！没用，你没有弗洛伊德说的那种值得你恨的父亲。”

他想说“你怎么会知道？”但紧贴着她润滑的肌肤，听着她的心跳，他却已经在翻译了：

“‘这是一架了不起的机器。’那军官对访问学者说，同时用赞赏的眼光检查了一番那架其实他早就非常熟悉的机器。^①——嘿，很疼！——是不是该把‘机器’翻译成‘死刑机器’或者是——”

卡伦骑在他身上，他的手臂反剪在背后，她把膝盖插在他双腿之间，威吓他：

“我要把你一脚踢出去。”她咬牙切齿地发着音。

“好啦，好啦，放了我吧！”

亚当正想要笑，可突然，忧伤的歌词飘进他的大脑：他母亲吟唱渴望的那首没有结尾的《还乡之歌》，于是，他低沉地独唱起了一段：

“你的新妇在等待，哦，久久等待，
主啊，等着你的——”

接着，当她迎上去，与他相拥得更紧时，他只能喘气了。

他们在布拉格旧城约瑟夫斯达特角的一条窄街上，卡伦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铁锈斑斑的锁眼。她还找到了因空气氧化而发黑的卡夫卡的半身像，以及嵌在一幢建筑墙上的那块用没法辨认的捷克文写成的铭牌，她告诉亚当，这地方曾经是卡普芬街和恩格街的街角。她解释说，这幢建筑全被拆掉重建了，

^①引自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该小说描写流放地的犯人被困在一种特制的机器上，判决书被一行行地写进肌肤，流血致死。

只剩下原先的门道,现在这门道也被脚手架给遮住了,自卡夫卡1883年出生以来,也许这脚手架就早已拥挤在这儿了,至今还滴着社会主义的锈水。理所当然,在文西斯劳斯广场,没有一位会说英语或德语或法语的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官员会承认知道丁点儿卡夫卡住的那个角落,如今那幢建筑被融进了圣尼古拉斯克切教堂的那片巴洛克式建筑群中,背后是蓝色的广告牌和高耸在铁皮屋顶之上的特恩克切大教堂^①的九顶塔。不过,就在三个导游弓着腰,围着地图寻找那条弯弯的把旧城连在一起的河道时,其中有个最年轻的压低嗓音承认说,没错,弗朗茨·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区,在那儿生活了一辈子——没错,就在这个河湾的地方——可那片犹太人区早就被全部重建了,战后重建,竖起了“全民纪念碑”,以不忘纳粹对布拉格所有犹太人的恐怖灭绝,她说,对于那些人来说,一个在1924年就平安死去和埋葬的犹太人哪能比得上那场疯狂的种族灭绝重要,不过,不像所有其他没有防卫的欧洲城市,布拉格这座城市没有遭到西方的狂轰滥炸,当然,伟大的苏联军队也没有多放一枪就从纳粹的最后那位省长手里夺过了这座城市,她用手指了指说,他就是在这条街上被枪毙的。还问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亚当弯腰去看锁眼时,卡伦没有吭声。在被闷住的门板的那一面,他似乎想看到一条昆虫的腿在无助地颤动^②。门与街道是水平的,墓地,嵌着门的那堵砖墙很长,高出他的头顶一米,但再往远处,几尊墓碑拔地而起,超过墙头,几乎与围墙那头建筑物的屋檐一般高了,摇曳的树枝遮蔽了墓碑。这里的墓碑耸得这么高,难道这个城市在被拆除、被平整、被重建之后却在下沉,而几百年前沉入地下的那些死者却在慢慢地隆起他们的尸骨?

①布拉格的一座大教堂。

②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描写的就是主人翁萨姆撒·格里高利变成昆虫后无助、悲惨的遭遇。





一座墓地由断壁残垣和污秽之地一跃而成了游览胜地，这一改变对卡夫卡自己也是值的。

就在那扇古旧的门板背后——当然没有墓地的年代悠远，否则木板会更加腐朽不堪——墓地似乎陷了下去，与他们站的这条铺着圆石的街道处于同一平面，四处没有什么大的昆虫，只有墓碑，像书柜里的文件夹一样厚，被苔藓糟蹋得一塌糊涂，刻着的字大致有希伯来文、德文，或许还有波希米亚文，每具尸骨把各自的那块墓碑使劲往下拽，东倒西歪成不同的角度。太阳很高，墓园插满石刀、长满苔藓。

“他没埋在这儿，没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俩身后说道。声音阴沉，像那张脱了水的脸。

“你说谁？”卡伦用优雅的德语问道。

“进去要付5克朗^①，不过你们找不到他。在布拉格的施特拉斯切尼兹墓地，有他的墓碑。”

她是个黝黑、滚圆的女人，一张变了形的脸被头巾舒服地裹住。“不过谁知道他有没有尸骨。”她继续说。

“我们对弗朗茨·卡夫卡感兴趣。”卡伦说。

“到这条街来”——她用牙床咬文嚼字——“还能对谁？”。她身上冒出一股生气，荡出一点幽默。“不过，我也不会去施特拉斯切尼兹看的。即使他尸骨还在的话，早就被挖出来上百次了。”

卡伦凑近她：“挖出来？谁挖他出来？什么时候？”

他俩一起面对着她，感到惊讶，几乎有点害怕这个女巫般的幽灵，她正站在这座宏伟城市巴洛克式的街道上，街上阳光照耀，满城轰响着集市、人声、汽车的喧嚣，站在写着“文化遗产”牌子的古迹当中。

^①捷克货币名称，1克朗等于100赫勒。

“嘿，都是些有组织的猎手，还有啥地方可藏住一个犹太人，不管死的还是活的？”

“什么时候挖出来的？”卡伦追问道，她抬起手，仿佛要把接下来的回答拖出来。

“要是他埋在那儿，那他的父母也就埋在那儿。”

卡伦的嘴巴微微张开，只露出齿尖。阳光十分耀眼，亚当这才明白了赫尔曼·卡夫卡怎么会一度住在这里的一幢名叫“金色屋面”的房子里。

“哪里？他们埋在哪里？”

“施特拉斯切尼兹。在那儿，你们会看到，对几个在布拉格发了财的犹太人，人们都干了些啥。”

“我们去过那儿，只是……一块普通的墓碑。”

那满脸的皱纹皱得更深，那肯定是一堆笑。也许是同情的笑，或残忍的笑。

“那个可怜的弗朗茨。只在地下安息了7年，孤独，凄惨，接着，他那位沉重的老爸又压在了他上面。”

他的老妈也这样。他俩看见的墓碑就是这样写的：弗朗茨……博士……赫尔曼……朱莉……是弗朗茨，不是弗朗提兹，正如对他来说，那条河叫摩尔道河，而不叫维柳伊河^①。面对这幽灵，他俩的觅求——不如说是卡伦如痴如狂的觅求，一个撇开她丈夫独自旅游的合适的理由——在亚当看来似乎更显得荒唐。要追寻某人一生可能的真相，你就得实实在在重新经历他们的整个人生，包括干的所有蠢事。感谢上帝这个人的一生只持续了41年，不像歌德，有83年——然而，不管他们活多久，时间抹去了真相。话说回来，卡夫卡在哪儿生活，甚至为何写作，或者他的尸骨是否还在什么地方腐烂，这些都无关紧要。时间没有

^①同一条河，在德语中叫摩尔道河，在俄语中叫维柳伊河。





抹去他的故事和小说，负责他文学事务的遗嘱执行人马克斯·布卢德在他死后居然完全违背他要无一例外烧光自己作品的遗嘱，为了出名而发表了他的全部著作。

“马克斯·布卢德！”在施特拉斯切尼兹墓地，当他们的对话再一次偶然提到那份遗嘱时，亚当诅咒了这个名字。“什么狗屎朋友，遗嘱执行人——哈，倒是个死刑执行人？”

“你才是狗屎！”卡伦对他说。“你们这帮自行其是的人，你们只见符合自己固有偏见的东西。听不进别人的话，更没有多少记忆，除了你自己，你谁也不关心。”

“干吗抨击我？我在说友谊。”

“不管文字怎么写，朋友能感觉到朋友话里的意思。”

“别问我这个。”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背朝墓碑。他几乎还要说：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朋友——但这只能证明她的观点是对的。

这时，他斜靠在布拉格旧城里的这座墓地的门边，心想：我该进去，不管怎么说我得进去，我最好把她留在这儿，留在约瑟夫斯达特，跟这个老女巫在一起，我单独进去，经过那辆停着的黄色斯柯达轿车，走到街角的那幢石头房子，然后付掉这5克朗，经过门口那个饱经风霜的看门人，她的手摊开，等着收票，人快要睡着了，我一无所知地在围墙后面那些结了硬壳的墓碑上寻找。也许他独自一人能找到什么不至于使他曲解或遗忘的东西，比如一个向下敞开、无底的洞口，一只无能为力仰面躺着的甲虫^①，一架在活人身上来回划出道道血淋淋文字的印刷机^②——或许在那儿还会找到哪个门诺教徒，当然在遭受折磨。正如卡伦一次次向他讲解的，卡夫卡就像写《旧约》的那些作者，他预示了人类能够想像的一切，因此，他所描写的所有恐怖早已作为

①详见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

②详见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

事实而存在，在某个地方正在发生，或在未来将要发生。亚当心想，当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当你像折磨自己一样折磨他人时，这尤其如此。

那个老女巫朝卡伦咯咯地笑，很古怪，毫无快意地笑着。“他的三个姊妹，”她说，“很亲近，卡夫卡家的4个孩子——艾莉跟着他去了匈牙利，最后去了波罗的海边的米里兹，还有善良的小维莉，还有最年轻的奥托娜，在他最后那个夏天几乎无法进食的时候，是她让他住进了自己的小屋。奥托娜是他最喜欢的，但他是死在朵拉·戴蒙特怀里的。”

“那么”——亚当发现自己在用德语说话——“你说他的三个姊妹埋在哪里？”

卡伦转身面朝他，瞪大眼睛。

“你看看天空。”老妇人嘶哑着说。“化作了烟雾，在奥斯威辛^①的焚尸炉里。”

“用卡夫卡的话说叫‘种族清洗’。”卡伦用英语解释说。“你知道发生的事，为什么还问？”

“我知道，可……”这么一长串的都是卡夫卡狂爱过或没爱过的女人，在20年的时间里，她们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被毁掉了。“只有菲莉斯·鲍尔活下来了，卡夫卡每5年就向她提出拒绝，不跟她结婚，而且——”

“只拒绝了两次。”

“他没死前的每一个第五年。”

“还有朵拉·戴蒙特。1952年死于伦敦，用弗朗茨·卡夫卡的话说叫‘清洗’。”

“什么意思？”

“在当时的布拉格，人们用这字指建筑清空——如今叫‘清

^①波兰南部一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在此建立集中营，关押和屠杀犹太人。





洗’。1893年后，老城的每幢房子都夷为平地了，很快建起了这仿效的维也纳。卡夫卡写道：“我们的心对于这完工的‘清洗’依然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那座令人生厌的犹太老城要比这座卫生的新城更加真实。”

卫生清洗。她平静自如、直截了当的解释搅得他心中恼怒。“天哪，卡夫卡胡乱涂鸦的每句话你都知道，连他的随笔书信！”

“你干吗不高兴？”

“干吗往你脑子里塞这些？就连他自己也想把这些毁掉。”

她的语气变了，变得尖刻。“是啊，我研究这些。那是我的工作。但我却不认为卡夫卡的话就是上帝的永恒之言。”

“见鬼！不对。”让人丧失理智的愤怒从他身上爆发了出来，让他吃了一惊。“你用不着去‘认为’，你只‘知道’就行了，然后公诸于世！”

“而且我还‘只知道’你不会跟你妻子离婚的。”

“你跟你丈夫也一样！”

“你敢不敢现在就决定？”

“你也不敢。”

“我他妈的干吗要决定？像我们这样一不做爱就你死我活？”

“放屁！”

此时，他大步走过环形路，礼拜五市场上的混乱也像他内心的情感一样，她这样伤他，用优雅、精炼的话刺他，气得他只想去狠狠地砸、扔、撞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永远彻底地断绝这关系——他的大脑、大腿、脚和手臂在痉挛，双手空空地在抽筋，他脚一抬，脚趾砰地踢到一堆鹅卵石。

石匠扬起头，镇静的眼光从打着补丁的膝盖移到他身上，手中的铁锤举在半空准备再敲一下该放在那条弧线上的最后一块石头。他围着一件擦痕累累的皮围裙，用捷克话说着什么，是不

是“同志”？亚当发现自己举起了胳膊，一块石头紧紧地攥在手里。

市政厅塔楼的那尊大钟面对着他。这尊大钟非同一般，上面重叠有许多面孔。弗朗茨·约瑟夫一世^①——确实与弗朗茨·卡夫卡同名——肯定曾扬起那蓬松的白胡须和天生的哈布斯堡皇室的下巴，身佩勋章，穿着14世纪的军服，骑着一头漂亮黑马从这钟前走过。骑呀，骑呀，走向遥远。

卡伦从他背后拿走了石头，他的手空空的很无聊。她把石头递给石匠，安放在他膝盖下的沙里，然后他又伸手去选一块黑的。他在对她说话，用的是捷克语，或许是捷克语中的什么方言，她点着头，用完美的口音和亚当知道她只会讲的几个字回答着：“是的”，“为什么”，“谢谢”，直至“再见”，仿佛她听懂了那人说的每一句话。

“这叫使徒大钟，除犹太以外的全体使徒。”她对着亚当的耳朵说。“看那边——”她温暖的手臂把他稍微一转，跟前垒起的是那圈等着石匠用粗糙的双手安放的石头，她指着石头的对面说：“卡夫卡住的那房子还在。那是他的‘小屋’。你又撞上了。”

她的所恋，他的所厌，又撞上了^②。

卡伦继续说，语气异常平静。“他的三个姊妹就在那房子出生的，一家人在这儿住了7年。就在卡夫卡在吉普赛教堂举行成人仪式之前，她们搬去了泽尔讷嘎斯。”

“吉普赛，哼，吉普赛。”他嘀咕道。“什么时候？”

“1896年6月13日，上午10点半。”

闰年里的安息日。他知道卡夫卡6岁到13岁之间曾住在这幢名叫“小屋”的房子里，当时，一生中所有新的成长的东西全都

^①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神圣罗马帝国教皇。

^②亚当讨厌卡伦迷恋卡夫卡，因此，卡夫卡住过的那幢房子是卡伦所喜欢的，却是亚当所厌恶的。



已经发生过了,当时,除了变态、重复和偶尔的理解之外,一切全到了尽头。小屋依附在其他房子边上,在拱门的上方和陡直的瓦屋顶下,有三层楼。像木然的鹅卵石一样毫无生气。从这一小堆意外保存下来的废墟中试图重新聚合起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这在他看来是完全徒劳的。况且这颗生命并不微小。

“来,”她说,在布拉格环形路上川流不息的同志和敌人当中,她用独有的温柔吻了吻他。“我们去奥托娜在炼丹街租的房子,她是卡夫卡最喜欢的妹妹。就在查尔斯大桥那边。”

奥托娜的那幢小房子:两扇古怪的窗户,一截烟囱,一扇门,背后山上是那片哥特式城堡形的大教堂,波希米亚的女王和国王们就是在那儿加冕的,要是还有这些人的话,也是在那儿埋葬的。

“我告诉过你,告诉过你。”她解释道,在修道院的那张床上,报纸和书籍把她围在当中。“他整个一生都是在那个犹太人区过的,离他出生的地方不到 200 米。出生,长大,被送到哈布斯堡没落王朝的一所德语学校,最后去了查尔斯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就在那儿经商,是他从商的叔父们推荐的,但没有呆下去。他父亲不停地把一家人从一幢房子搬到另一幢房子,在那片拥挤的犹太人区里越搬越好——到他 25 岁时,他住过的 14 幢房子中惟有‘小屋’还没拆掉。”

“是啊,有什么问题?”

“我是在说,实际上他的过去在他身后就立刻被抹去了,化为乌有。”

“我父母家住艾尔伯塔。如果回去,我连地窖的坑也找不到了。”

“上帝啊,你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要是你说化为乌有……”

“你周游全球,什么也没看见,惟有你的过去,你的祖先和你自己。”

“不过,你的眼界也只有锁眼大小。只有鲜血淋漓的弗朗茨·卡夫卡,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正如你所说的,靠绝对长期的高额残疾抚恤金度日的成就非凡的苦难者!”

“你这是在犯傻。”

“这世上谁没受过苦? 看见过谁没有? 人们在遭受战争,屠杀,灭绝营,就在他的布拉格!”

“我知道你们那群人受过苦,但我这是在谈《变形记》的作者。”回答很从容。

“在文明欧洲的每一处胜地,卡夫卡总是要跟哪位美丽的女人痛苦淋漓地死去,就像意大利的歌剧一样。^①”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是的,而且他还写了《中国长城》、《城堡》、《亚美尼加》以及《在流放地》,还有他一生胡乱涂鸦的,上千页的书稿,他曾要求烧掉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卡夫卡要求了什么?”

“烧掉他写的所有东西——要是他想烧,干吗不自己烧? 你给我看他的遗嘱。可是考虑周全的马克斯·布卢德和卡夫卡亲爱的妈妈认为他留下的东西很值钱,太值钱了,不能烧掉。”

“值钱!”卡伦发出一声厌恶。“难道你还没弄明白卡夫卡的困苦? 作为犹太人却只得生活在奥匈帝国庞大的德意志社会和令人压抑的基督教社会当中,只得用德文写作。”

他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说低地德语的半世俗的门诺教徒生活在庞大的虚无社会中一样?”

“现在,我最好不谈这个,不谈你的事。可你怎么能这样想

^①意大利歌剧中总会有美丽的女人死去,亚当借此讽刺卡夫卡。





像，卡夫卡写的任何东西，甚至他的遗嘱，就那么简单？——这件事做，那件事不做。”

“那好，也许是他太压抑了，没写那遗嘱，也许他只是签了个字。”

“那又有什么差别？”

“卡伦，他是法学博士。他的遗嘱——”

“不管他是怎么写的这份非常隐私的文件，这份遗嘱的意思是否就是字面的意思？一字一句照字典上的意思？”

亚当叹道：“我来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他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版了《乡村医生》，1919年库特·沃尔夫·维拉格公司出版的，他没有烧。书里还有一篇邮票的故事‘下一村’。我引一段1933年缪尔的译文给你听：

“我祖父常说：‘生命短得惊人。对于我，回顾它时，生命仿佛缩得如此短暂，以至于我简直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决定骑马去另外一座村庄，居然不担心常人的这样一段幸福生活的时间也许远远不够走完这样一段路程，更不用提遭遇什么意外了。’”

他停住了。她的脸毫无表情，只有全神贯注时才有这表情。他心想，对于女人，如此貌美惊人是罪过。然后低声问：“事实足够了吧？”

“你一定是个绝顶医生，这么快、这么难以置信的记忆。好吧”——她的语气变了——“这么多东西，你为啥记住了这一段？”

“因为——”在她黑眸的凝视下，他停住了。“我想记住。我喜欢这段。”

“因为它包含了你躲避的一切？生活在一座让人患幽闭恐怖症的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人人皆知，而你连最近的村庄也不能去？要是没了城市，要是你没法从一个遥远的地方立刻消失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我们需要这作为业余爱好的心理学吗？”

可她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突然温柔起来。“‘业余爱好’一词的词根是拉丁语的‘爱人’。”

“那更好。”他把展开的手放在她架起的腿上。“爱人的吐露。”

“我的你全知道了，来，给我讲讲你的。”

“我的什么？”

“痴迷。”

“什么，我的痴迷？”

“或你的叫法，那本厚书《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当众行刑那一类惊心动魄的故事。”

“你喜欢那书的标题？《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

“别说了，我知道那标题，很庄严——来，给我讲一段故事，逐字逐句地讲。”

“全是荷兰文，我只记得译文。”

“好吧，你这学者人虽讨厌，但读得不少，念吧！”

“哪一段……想不想听跟卡夫卡一样的，在囚徒的皮肤上印进血淋淋的文字？柔弱的尤拉莉娅^①在铁爪刺进两侧直至肋骨时发出的惨叫：‘看哪，吾主耶稣基督，您的名字正写上我的身体，我满怀欢喜吟诵您的名字——’”

“不要，不要，讲你以前没讲过的。”

^①基督教一圣徒。





他突然沉静了下来，想了想说：“那好，来个殉道者之歌怎样？选自最古老但仍然在唱的《基督教赞美诗集》，就是在这儿以南的帕索城堡里写的。”

“在多瑙河也有‘誓不反抗的基督徒’？”

“遍及欧洲。16世纪30年代他们中大约有60个被关押在帕索，死之前，他们写歌，这样人们就能唱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这是第17首歌，标题是我随便翻译的：‘美妙歌曲外一首，吟唱两妇人动人故事，她们以身证明上帝普天之爱胜过死亡。配的旋律是人们唱的《匈牙利国王》这首曲子。’”

“什么意思？”

“每首歌词配的都是有名的曲子，民歌或小调，甚至舞曲，这样当唱起这些死亡之歌时，人们还能稍稍感到高兴。”

“他们把自己的死亡拿来唱——真耐人寻味。”

“我不知道《匈牙利国王》怎么唱，一句都不会唱……不过，歌词这样开始的：

我留下的将是忧伤，
我将幸福歌唱……”

“接着，歌曲用9行押韵诗段讲述了两个荷兰姐妹玛丽亚和厄瑟拉·范·贝琴那一长段遭受折磨的故事。我不念说教的那部分，跳过40行：

神甫领着她走向火焰。
‘说上帝就在火中。’他讲。
可‘我的上帝不在面饼里’。
厄瑟拉的回答清脆响亮。
‘当我最需帮助之时，

面饼能助我一丝力量？’
回答完这个问题，
她爬上那堆柴火。
走进上帝不灭的荣耀。阿门。”

即使在他吟诵这段译文时，亚当的眼前浮现出了《诗集》那些满是墨水渍和霉点的橡树一样颜色的书页，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夫林县门诺教安曼教派^①的一个跳蚤市场的桌子上发现这本书的，是用皮革装订的，用哥特体德文签的字：“本书属于我，阿莫斯·M. 尤德。”他伸出手去摸卡伦温暖的肩膀。这阵子那肩膀不在那儿，过了会儿，她移了过来。

“他们管这叫‘幸福歌唱’？”

“两个女人‘坚守信念’，她们因此直接去了上帝那儿，去了天堂。”

她用吻去拱他，用舌头和嘴唇触他的鼻子。“毫不怀疑地过一生，那会是什么感觉？”

他没法想像。这歌的歌词直截、平常，他读到的是从古德语译成英语的，像紧绷的琴弦一样直截了当——可不知何故，他对这歌词没感觉。要是他能唱又会怎样？

她说：“我过目不忘的爱人。”

他的确没忘。她跑在了他前头，沿着那被人遗忘的女修道院的围墙，跑过那些上了锁、用盖板封住的教堂门，经过那个四四方方的钟塔，朝树林里的那些大树跑去，嘴里唱着不同的曲子。

“来吧，在林中奔跑，来吧，在林中奔跑……来吧，来吧。”

^① 17世纪晚期从门诺教派脱离出来的一个再洗礼派正统教派，现主要聚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





沿着修道院的围墙跑掉。他需要一面很长的镜子去观照他人生中的每一个人，在他们奔跑的时候，更经常的是在他自己奔跑的时候。只有他母亲没有跑，而是跪下双膝声声吟诵着她的祈祷。

他终于逮住了卡伦。她在山毛榉的枝干下停了下来，他俩伸展着躺在山坡上，这坡一直通向那个开阔的、树木茂密的山谷。他在大口喘气。

“就在那片树林里，”卡伦唱道，在他跟前跳起舞来，“一只小猪稳站立，鼻子前头一声响，一声响——”

“脚趾前头一声响，是脚趾，管它是脚还是鼻，我们要来吹它气。”

“你吹气还是我吹气？”

“我俩一起来努力。”

“那么我俩就一起来。”

“不行——这不押韵。”

“押韵。”她赤裸的手臂猛地一甩放在地上。“一起流，一起长，一起左右来摇晃……”长着尖尖叶子的树枝在她的黑头发上方对着天空打旋，朝他的眼睛敞开道道光亮，像星夜里的繁星闪烁。他屁股下有一根锯齿状的树枝在戳，立刻感到一阵刺痛，他想，屁股要一辈子带上这伤疤了。不过，她爬到他身上，抱着他下身，在这妙不可言的官能愉悦中，他完全忘了那痛感。

那创伤在浴室的镜子里能看见。他弯下腰，头往后，滑稽地从叉开的双腿往后看。自我检查，明显有一块发红的肉坑。

“找到了一个审视自己的新视角？”她突然站在那儿，问道。“医生，治治你那鼓起的痔疮。”

“我又没长痔疮。”他朝她走去。

“长没长我心里最清楚。整整一周，你周身的伤痛我都吻过了。”

“不是周身伤痛。”

“是吗,你这个可怜虫。”她用指节敲他的头。

“是的,吻会让我感觉好些。”

接着,她又反唇相讥道:

“我们的吻会吗?”

在这间洞穴式的房间里,她蜷缩在那把鼓鼓囊囊的椅子中,他靠着她的膝盖跪着。事后他想,要是他回头看一眼那敞开的浴室门和镜子,他肯定能看到他俩的背影,要是看得久一点,他俩也许会一道出走,可是,他的脸在她的大腿之间。只有她才有可能看见那面镜子。

奇怪,他手一推,修道院钟塔的那道双扇门就开了。两扇一齐开的,像他童年时图书馆的门。

可这儿没有矮书架,而是一块紧凑的、积满尘土的空地,满地都是稻草、老鼠留下的东西和鸟儿溅撒的鸟粪。在高高的屋梁上,鸽子用嘴啄来啄去,在冗长的夏日里筑巢孵卵。在更高处光线交错的地方,在钟塔高耸的圆屋顶里面,它们砰砰地扑腾,胡乱地搜寻,在那儿,平射的光线让更多尘埃飞扬的屋梁现了形。

他攀着固定在墙上的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靠着沾满灰尘的、好像是橡木的屋梁歇口气,紧紧抓住这柱空气般的彩虹。没错,卡夫卡式的怪诞。刚想到这儿,卡伦的那张脸像个小白点,出现在他脚下很远的地方,搁在她圆圆的、光光的肩膀上。和他倒着的脸一样无法辨认。“亚当,别爬了。”

她悠长的呼声爬上木梯,越来越弱,传到他跟前时,这声音被拉成了一个清晰的“别——”字。

在诊断室里,他的诊疗决定从来就是果断的、瞬时的,可对于他自己,他却从来没法决定是走、是了断后一走了之。这第一次地转身、离开,别人总得这样做的。而且已经这样做了。他从心底里是多么向往着爬得更高,只是去看看鸽子的背,看它们高





高扬起有斑纹的翅膀飞走。他想让她跟自己一起体验恐惧。

他手脚并用往上爬。透过有拱的窗户，他看见自己正在高过森林的树冠。头顶上没有铁钟，只有用灰泥涂抹的石头和那根钟梁。在塔楼空旷的拱顶内，他踩着木梯的横档到达最高的那根橡木屋梁，然后把脚放在上面，不假思索地朝中央更高的那根钟梁猛地一跃，飞身抓住那梁，紧紧抱住，身体像发狂的铃舌荡来荡去。可当他试图抬起双腿，准备卷身用脚钩住钟梁时，他发现自己没法做到，他的双脚远远地吊在他那突然变重的身体的尽头，而此时，身下的那根橡木屋梁又离他太远了。他一把接一把地沿着钟梁把身子移近墙壁，钟梁的棱角嵌进他的手腕，然后用双脚踩着墙壁一直爬到钟梁的一头，像树獭一样用手脚扣牢悬在钟梁上，身下是一个圆柱形的深渊。他已经再也不可能爬得更高了。

突然一阵无比的恐惧，他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招了。我的身体没法翻上去，没法爬到钟梁的上方。我只能这样吊着，等到摔下去为止。

他所做的这件愚蠢的事情使他陷入了令人惊奇的沉静。他曾轻轻松松一跃而上，在南艾尔伯塔的狂风中行走在房屋狭窄的椽子上，或在脚手架的两根柱子之间晃荡。在他垂直的双臂之间，这屋梁笔直，像悬崖。他不敢往下看。他会听到身下鸟儿飞回时的扑打声，此时的空气仿佛成了满地的针锥。他收紧肚子，手脚呈钩状牢牢地扣在某个地方的某样东西，可手脚已经没有了感觉了，肯定感觉不到那比哥特式建筑还要古老的钟梁的棱角了，啥也感觉不到了。他在歇息，在自由下落中，也有可能祈祷中：

“你的新妇在等待，哦，久久等待，
主啊，等着你再来人间；

等着你为她抹去泪水，
上帝之子啊，你何时才来？”

亚当的周围是钟塔哥特式的拱形窗户。他高高地悬在半空，下面是山毛榉林和远处空旷的德国原野，弯曲的道路，村落，还有遥远的高速公路上那持续不断的嗡嗡声。他像一只蝙蝠，吊在山毛榉的林子里，吊在布痕瓦尔德^①的集中营里。他知道自己没法回到木梯旁边的那根橡木屋梁上，此时他脑子里突然想到：与其听门诺教徒的《还乡之歌》，还不如听那个领唱者在成人仪式上唱的那些更加陌生的忧伤与献身之歌以及哀歌更有趣，清楚得像听人的秘密一样。他和卡伦之间的谈话，哪怕像“来吧”、“唉”、“天哪”、“再来”或“不”等这些最简单的呢喃，从来没有这么感人肺腑过，无论如何贴近，都达不到他俩追求的那种完美地步。

或者听中世纪那些优雅的天使在他惟一的一次婚礼上为他惟一的一位新妇歌唱。对苏姗娜那无言的记忆感动着亚当，像古老的歌曲。也许那首新妇之歌一直缭绕在这儿，在最高的树尖上细如蛛网，等着他爬上来，那没有肉体的歌曲，最终没了肉体，只有火焰的末梢。

“亚当。”

是卡伦。就在他下面的橡木屋梁上。她一只手抓住木梯的最高一格横档，伸长整个身子，仿佛在盲目地摸索着找他。她的五指向上伸出，但摸不着他，他松开一只手，两只手相互紧紧抓住，当即，他的脚也松开了，通向深渊的那个洞口从他身下翻到头顶，他的心在发颤！他猛地朝她扑去，完全松开扣在梁上的手

^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





脚，她从半空中把他一把拖过来，拖到她稳如钢铁的身旁。

“你真笨。”她对着他耳朵气喘吁吁地说。“笨得要死。”

他的手也抓住木梯的横档。荡漾的空气把他们两个，还有夏天简洁的衣服、肌肤、骨骼和头发，全都紧紧地裹住。

“你可逃不上去了吧？”

他俩被困在那根屋梁上，除了空气和那架墙梯，周围什么也没有。出于恐惧，他们相互紧抱，但他们的手和胳膊，他们难以满足的躯体却紧裹在爱的动作中。不知不觉地，她张开了大腿，不知不觉地，他把她抱得更紧。

“为什么是卡夫卡，为什么不是里尔克^①？”他低声说。

“天主教徒的痛苦太多了。”

“天主教徒至少还有圣母和圣子。”

“是的，比摩西更仁慈。”

空气成了被单，一时间，把他们藏在了尘世之外。

“我们可以去找找里尔克的东西。”卡伦对着亚当的面颊轻声说。“他们生活的时间是交叠的，他们都住在布拉格，他们从没谋过面。”

“但里尔克不是犹太人。”

她拉着他朝墙靠得更紧。“他不一定非得是。也许他是个‘誓不反抗的基督徒’。”

“你不觉得也许卡夫卡也是？”

他俩轻轻地摇着，像钟的铃舌，一段太弱、无法撞出声音的记忆。在坠落的边缘，在恐怖和极乐的边缘，紧紧拥抱。

^① R. M.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生于布拉格官吏之家,深受法国现代派诗歌和颓废生活的影响,作品充满颓废情调和神秘色彩,追求形式的美和诗句的音乐性,著名诗作有《祈祷书》、《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等。

第 12 章

陪伴新妇的圣徒们

1941 年，爱达荷州 波卡特洛

1881 年，撒马尔罕市^①

“我认识你。”祖父说。他的头发如同枕着他头颅的医院枕头一样雪白，但更硬，更浓密；73 年来，他一缕头发也没掉过。我弯下腰时，他眯起眼睛打量我，好像是在期待着对什么问题的回答？他当然认识我，我想大声地叫出来，他和我的祖母养育了我，有 20 多年了。

“你取了我的名字。”他补充道，好像是个愉快的发现。“亚伯拉罕·洛温，你 1914 年 4 月 4 日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贝西。但你不是在那儿长大的。”

祖母对我说，你得去看看他，那次中风把他给弄糊涂了，脑子恍惚了，可如今他讲啊，轻声地讲，你只能听着。你也得看看他。

“爷爷。”我用小时候他喜欢听的那称呼叫他。“你住在爱达荷的阿伯丁，你现在住波卡特洛医院。”

“爱达荷”——他那双仔细打量我的热情的眼睛陷入一种漠然的呆滞——“可当初我们来美国时，是去的俄克拉荷马，先驱

^①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一城市。





者门诺教教会，所有人，来自中亚的土耳其斯坦……对，来自卡普兰贝克，还有欧里阿塔、希瓦……希瓦。”他的眼睛睁开，飞快地看了我一眼。“我们在欧里阿塔南面的山里想建个村庄，叫吉内登索尔，可其实不能给那些地方取我们自己的村名，”他说，“一个地方已经有了名字，你就没法改它，即使你不知道那名字啥意思，即使你以为你能改。”

我只能嘀咕：“迁移时我两岁，我不记得俄克拉荷马了。”

“为躲避兵役，我们迁到爱达荷，11户人家。”——他的声音变了，但他的大脑好像是在聚集从前的力量——“我们知道美国即将参战。他们叫做‘伟大的战争’，哼！好像战争也能伟大得起来。他们应该叫‘最糟的战争’。我们有11户人家，第一批去中亚的马车队更少，只有10户。我12岁，能驾驭听话的马。当时，人们以为，如果迁去荒野，迁去沙漠，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儿子不上战场。我们门诺教徒一次次就这样迁移的。”

“门诺教徒老是在迁移。”从他那儿，我听到这话已经无数次的。我就是靠一走了之把自己迁走的——可如今，他躺在医院床上，这么平躺着，“迁移”一词听起来温暖却陌生，带着家的温馨。

“是的，迁移。”他说。“因为土地，因为土地和军队而迁移。你得找个能生活的地方，在那儿，大人们想不起你。没人想住的荒野是最好的。你记不记得那火车？”

“记得……什么火车？”

“这儿在美国，我们坐的是软座，大平原在窗外掠过。”他闭上眼睛，像是在梦呓。“真棒，这么好的土地，被上帝的手抚得又绿又平。”他微微地笑了笑，只有半张脸在动。“这平原不需要马车和骆驼，褐色的河流，斜倚的树木，在窗外掠过。”

祖父根本不像他以前那样，实际、严谨、苛求任何回答都得直接、准确。半瘫在医院病床上的他也许自由了，不再为农场的

苦役所累,不再为“身为传教士”总要严格、完美的要求所累,也许可以自由徜徉在自己的往事当中。

我朝他弯下腰。他只能稍微动一动右胳膊和右腿,整个沉重的身躯僵直地躺在被单下面,非常可怜。可如果他现在感觉舒服一点的话,我想让他好好地看看我。他真的在看,一双明亮的眼睛慢慢地、一寸寸地打量着我的脸。他想发出咯咯的笑声,大半张脸在动了。

“你去了哪儿?”他问道,声音里没有责备。

我走了4年,带着积压已久的、临走时也肯定让他们知道的那股愤怒离开了他和祖母,可是,如今他却竭力在笑。如此地无助,完全不同于我悠长记忆中的他,也许这不仅仅是因为中风,也许他并没那么“糊涂”,要是他全瘫了,或许他还会彻底地改变——变得热情、温柔、慈爱?

“我没去多远。”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他。“去了波兰。”

“流浪?”

“在那儿工作,在一家修车厂。”没必要让他烦心,给他讲我成了“巴德·莱昂斯”,讲大萧条那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村庄过漂泊的生活,或者讲我捡棉花摘葡萄的事。“我回来看看,还有你。”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你得……发生了这事。”

“凡人躲藏,上帝指向。”他对着我的脸说。这话他是对谁在说,我还是他自己?这是他作为门诺教传教士最爱用的“人生警言”,一句信口拈来的“简短训诫”,可以歪来扭去地适合他说话当时的任何目的。突然,这话听起来太像我曾经憎恨、如今依然憎恨的那些话,我猛地直起腰,僵直得像根木头。我要离开这儿!

可我看了一眼他一动不动的头,他的眼珠转到眼角看着我,他的脸在抽搐。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在努力地笑,右手打着手势伸向我。我接过他的手。





“所有善良的门诺教徒都流浪。”他说。“不是猎人追逐动物那样四处浪迹，不是，我们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那样：‘去我会让你们看到的那块地’，于是我们就走，大都是因为军队，为了离他们远些。”

“我不想要土地，我是个机械师，我能修各种马达。”没必要提珍珠港的事，提美国已全面参战，我已经加入了空军，临行前有7天的假期，然后再走，也许永远地走了。至少就他来说，他在自己瘫痪的记忆中流浪，无论漂泊到哪儿，让他去吧。

可他啥也没说，我朝他凑得更近。“我甚至还坐过飞机。”我说。“那飞机的引擎是我修的。你看得见下面的整个世界。”

他呼吸着，发出轻微的呼噜声。“我从没上过天。沙漠可能像天空，有时候只有两种颜色，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里面，两个都是一样的。”

他的眼神在游移，他的声音很弱，没有我离开时那个固执男人的一丝痕迹了，完全没了。我只能摸着他的头，听他说话。

他说：“跨过奥伦堡的乌拉尔河，就算离开欧洲了。在那儿一切都变了。能看见骆驼拉的大篷车，看见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在卡拉库姆沙漠的黑沙土上赶着羊群和长毛山羊，沙漠周围是咸海，海水很咸，很蓝，如天堂一般。我们在那些黑黝黝发亮的沙丘当中走了三周，太阳晃得我们啥也看不见，天热得像是走过融化的铁水，我们有骆驼运载大部分的食物，有驿马拉我们的大车，要是吉尔吉斯人没把我们引去他们最深的水井，也许我们过不了沙漠。11个孩子死了，4岁以下的全死了，他们不能喝那咸水。可我12岁了，很强壮，吉尔吉斯人教我怎么用布裹住头骑骆驼走路。”

这奇怪的世界、数字、名字，从他干裂的嘴唇里说出，在医院温暖的空气中升腾。面对窗外渐渐暗淡的冬日，他的记忆在燃烧，仿佛我们周围的这城市着了火。“我们10户人家一起走的。”

他说。“我们埋葬了 11 个孩子。38 个流浪者来到咸海边那无盐的泉水边，赞美上帝。”

“还赞美上帝？”我冒出一句。

他的右手微微捏紧我的手。“我们之后更大的车队来了。”他说。“有 400 多人，我们是第一批。天气好一点之后，我的朋友大卫·托维斯也带着他的家人来了，可是我们所有的小孩全都死在他们家人爱怜的怀抱中，我们明白，那个时候死是上帝的意志，另外有两个孩子是在锡尔河边的树下出生的。”

他的这故事，也是他童年惟一的故事，讲的是那些热衷于“基督再临”的门诺教徒在 1880 年前往土耳其斯坦^①沙漠的那场愚蠢、疯狂的大迁徙，这故事像棉被一样覆盖着我的人生，试图窒息我。在说教中，他总是大量援引其中的例子，如何守信，如何顺从、如何完美，如何规避无穷无尽的罪恶。也许在这儿，在他自己头脑恍惚，行将入土的时候，他终于会给我的疑问一个明白、通情的回答了。

“那么为什么？”我固执地问，但声音更低。“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卖掉自己在第聂伯河边和伏尔加河边美丽的侨居地上的大片农庄，费力地走进亚洲，走进他们一无所知的穆斯林沙漠，父母带着无助的孩子，在沙地上拖着大车——为什么？”

他的右手正在变成一把老虎钳，可我没有松手，这样，他可以扭过头来正眼看我。不过，他没必要那样做。带着我离开他时他对我的那种镇静、恰如其分的从容，他依然可以对着医院陈腐的空气宣布：

“你难道没听？我告诉过你，告诉过你。‘耶稣基督的启示录，上帝给他仆人约翰的显像，要他作为见证人，因为时刻快到了：天上现出大异像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

^①亚洲中西部的一个历史上的区域，自里海向东延伸至中国的边境，向南从里海延伸至阿富汗。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属于今天的俄罗斯。





12 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①

这些话我当然知道,没错,我在《圣经》中那篇最庄严、最无法领悟的章节里读到它们。教堂作为新妇在等待她的新郎,他将带着她奔向天堂。门诺教徒作为被挑选出来的陪伴新妇的圣徒,跟随他们的先知克劳斯·艾普,是他一个人把《启示录》和门诺教徒联系起来,并且令人惊异地发现,纯粹的门诺教徒必须把自己的所有留在身后,“抛开一切沉重的、最容易困扰我们的罪恶”,走,走得比能想到的还远,因着信念由月到年地去寻找,寻找亚洲的一处荒漠,在那儿撒旦这头怪兽将现出原形,他们能等到神圣的新郎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再临,来把大家一起带去天堂。这些话全是大写的。当时,我祖父还是个孩子,可即使成了一位住在世界另一面的爱达荷的老人,他依然信念如铁:一个真正的信徒等于是“嫁给了耶稣”,即使是突如其来的中风也无法让祖父那不怎么恍惚的头脑顿悟出什么理由来。可在流浪者的火堆边说这话,你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哈——哈,巴德,你跟耶稣睡一起,哈哈,他怎么样?”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马达的原因,你做的任何事,要么有用,要么没用,你总能想出一个办法来,真的。没有这些什么“新妇”,天堂中的阳光女人、新郎、友好聚餐^②。

我那双厚实的手紧攥在他的一只手上。手松开了,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爷爷,我得走很长一段时间。”我面对他的身体轻声说。“我这次回来就几天,看看你和奶奶。”

他没吭声,干渴地呼吸着。我拿来一杯水,小心翼翼地喂他,他歪着张开嘴,咽了一小口。

“你和奶奶喜欢我,把我拉扯大……”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12:1-2。

②基督教早期,教徒间为表示友爱而举行的聚餐。

“海因里希和埃斯特死的时候，你活下来是个奇迹。”

“你给我讲过。那场可怕的故事。”

“你是奇迹，没跟他们一起被撞死。”

“你给我讲过，我裹得很紧，很小，火车撞上来时，我飞了出去。那只是个偶然。”

“那是个偶然，但难道你不是个奇迹？”

“最后一刻的时候，也许是我妈把我扔出去的。”

他的眼睛像两块钢铁，沉得很深，要是他的头颅是台马达，我肯定会把它们钻出来修理好。

“当时他们正赶着马车。”我提醒他说。“在回家的路上，没多久他们恰恰走错了地方。”他那张粗糙的脸，那次疯狂的跋涉。“他们没打算成天沿火车道走，可最后火车来了，从他们身上碾过。”

这时他听懂了我是在讲他的童年和我的童年。“你想过这事。”他轻轻地说。

“唉，流浪的人有的是时间——我想感谢你。你照顾了我。”

“你得想好，得搞明白。没有谁比迁移的人、比流浪者更爱自己的孩子。当你离开家乡，留下你拥有的一切时，当每天你还得丢下仅有的、你认为必不可少却又不得不丢的东西时，这时只有怀抱里的孩子是你最重要的了。”

“那么……死了这么多人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还要去？”

“我们父辈说，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要留下成年的青年男子，不去沙皇军队。”

“其他门诺教徒去了加拿大和美国，你为什么不去？”

“我们还遵照‘基督的新妇’、‘基督再临’这些沙漠异像在行事。”

我又想对他说，为了这异像，你拯救了你的青年男子，却断送了你更小的孩子。可他如此安静地躺着，我怎么能用这话去





打击他呢？

“孩子，上帝给来的，上帝会带走。”他说道，仿佛听到了我的思想。“就像你的父母，给来又带走，但我们依然必须坚信他。”

我才不听这些“必须”呢！但这话没必要说出来。即使他用一只耳朵听，也和他用两只听是一样的。

“尘土飞扬、天气炎热，道路延伸。”他低沉地说，声音很远。“那路通进一座座泥土垒起的村庄，然后又通向村外，我们一道旅行，第一年我们走了6个月。在塔什干停下来过冬，想种几个菜园，可第二年，1881年的夏天，我们又得继续走，去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去了洛桑，希瓦——花了3年时间想找到合适的地方，总是在走。而且我们总是围在火堆旁友好聚餐，诵读《圣经》和聆听布道，讲述我们的遭遇，合唱《还乡之歌》。我们分享所有的食物，当我们停下来，把车围成圈，干完杂务，我和大卫·托维斯便玩耍起来。如此荒野的大地，时而有山，时而也有江河和一片大海，除了一条围着栅栏、住着门诺教徒的街道外，我们再没看到什么人迹。大卫说我的名字叫‘洛温’，德语的意思是‘狮子’，这荒漠对我来说很合适，我说，那好，我是狮子，你叫‘托维斯’，那是啥意思？他说没啥特别的意思，因此可以当成‘虎’，于是在沙地上，在河边歪来扭去的黑树下，我们玩起了游戏，老虎与狮子的游戏。”

他的右手朝玻璃杯指了指。我把杯子塞进他的手指之间，他握住杯子，举向自己的嘴边。要喝水，他不需要我帮忙，他斜着杯子往嘴里倒了一口水，含了片刻才吞下去，然后把杯子还给我。他的声音更加有力，有些尖锐，仿佛他又回到了我们在爱达荷的那座小教堂的讲坛上。

“玩，”他说，带着惊叹的语气，仿佛他喜欢这个字，仿佛想起这个字使他在自己严肃刻板的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了愉悦。

“一路上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动物、地方。马车沉重地往前拖，上面坐的依旧是门诺教徒，街上，当祷告报时者站在尖塔上吆喝时，缠着头巾的人们便跪地祈祷。那些塔都很高，总是倾斜着，快要倒塌似的，但从没倒过——这世界太奇妙了，你揉揉自己的眼睛，以为再睁眼就看不见了，可是没有，这景象还在。甚至他们的圣城撒马尔罕也这样，从褐色的沙漠上拔地而起，扩展开去，这座东方之珠有大理石的城墙和砖房，有桃子，涓涓清水沿着街道流淌，有烤羊肉串、黄瓜和杏子。我们听说亚历山大大帝^①、成吉思汗^②以及克劳斯·艾普曾告诫我们，不要忘记的那些杀人者都曾骑马到过那儿，我们听说帖木儿^③就埋在一座有蓝色圆屋顶的清真寺下面，上面盖了块巨大的黑色玉石。在撒马尔罕，我们遇见了一个中国女孩。”

“中国女孩？”

“把手给我。”他说。我把两只手给他，他拉起来凑近自己的眼睛。也许那次中风也影响了他的视力，在他看来，我可能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影子，这对他也许是好事。我的手放在他那只被油脂腻得苍白、发青的手里。

他说：“你的手一直很会干活，安装和修理东西。”他转过头，可没有松开我的双手，而是紧紧地握在他那只宽大的手中，那手很厚，农活留下了累累疤痕。但手背却柔软，布满了老人所必有的老年斑。他的触摸似乎很微弱，而且我感觉得到，很忧

①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马其顿国王,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并侵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②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蒙古大汗、蒙古汗国创建人,以武功盖世,版图扩至中亚地区和南俄,1226年南下攻打西夏,次年在西夏病逝,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元太祖。

③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创建者,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出身,兴起于撒马尔罕,先后征服西查合台、波斯、阿富汗、印度直至小亚细亚,暴卒于东侵中国途中。





伤。

“也许在塔什干住着中国人。”他说。“我记得大概撒马尔罕也有，因为那儿有座清真寺，是帖木儿建来埋葬他的中国妃子的。相传建筑师爱上了她香气飘溢的尸体，帖木儿派兵去杀他，可他爬上清真寺的尖塔，用老鹰的翅膀飞到波斯去了，也许撒马尔罕应该住有中国人。我们的确见到了他们，我姐姐苏姗娜央求你的曾祖父允许她走走逛逛，只是去看看，她快要14岁了，要是没戴面纱，很有可能会不声不响地永远消失在哪户穆斯林人家的门后。但我父亲最后让步了，叫我和大卫·托维斯把她夹在中间走，我们12岁了，个儿都很高。

“你爸让你去了？”

“母亲不在时，我和苏姗娜能说动他。那座城太美了，很干净，有树，流着清澈的水，我们每天在尘土和炎热中赶路——父亲想让我们高兴一会儿。

“在帖木儿妃子的清真寺废墟旁站了一会儿之后，我们看见了那家中国商店。在白瓦和青瓦之间长出黄色的花，一切都是那么鲜艳，当街，有个中国女孩坐在店铺前。开始，我没认出她是男是女，她身上披着一幅幅丝绸，金色、血红、蜘蛛网般的绿色，还有紫色，多彩的颜色灼伤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披的却只是肮脏的衣服和每晚睡沙地拖得更脏的灰毯。当我认出这是个穿得五彩缤纷的姑娘时，我想她是响应号角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召唤从天而降的天使。苏姗娜也停了下来，我们全都凝视着她，她却睁大眼睛，张了张小鼻孔，朝我们笑了。她用吉尔吉斯语说：

“‘喜欢吗？’

“她用手抚摸着盖在肩头和盘腿上的丝绸，在她的抚弄下，那丝绸变了颜色，像团跃动的火焰。苏姗娜发出轻微的惊叫，太突然了，太美了，我们吓呆了。

“‘摸摸。’那女孩说。她举起一幅紫色的，其他颜色的丝绸

被搅动得宛若羽毛，在她周围飞扬。丝绸在我那儿因拉骆驼缰绳而变粗变厚的手指间流动，放在我手上，可我没什么感觉，只看见我的手被蒙上了紫色。

“可苏姗娜从我手中接过丝绸，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开始旋转，把自己裹进丝绸——像这样踩着脚跟旋转，难道她以前见到过什么？她用丝绸把自己完全裹住，只露出头和脚，但那幅丝绸还没裹完。我们全惊讶地笑了，姐姐变成了一团紫色的火苗，要是我们一眨眼，她肯定会消失在空气中。

“接着，我看见……好像是触了雷电一样：要是那个中国女孩举起的是金色丝绸，而不是紫色的，那我这位站在撒马尔罕石街上的姐姐就将是《启示录》中那位身披太阳的女人^①。

“我只得在石街上弓着身子，我感到敬畏。面对我那位每日祈祷、宣讲《启示录》并以此为生的父亲，我将对他讲些什么？我能讲发生在苏姗娜身上的奇迹吗？可大卫只是笑，得意忘形，然后伸手去帮苏姗娜解开缠在身上的东西。他们把这长长的丝绸叠好，放在中国女孩的大腿上，没有碰到地上满是灰尘的石头。那个中国女孩也在笑，劝他们买下，但她能说的俄语只有‘好！好！’和‘20 卢布，20 卢布’，这是买匹马价钱的四分之一，可我们三人连一个戈比^②都没有。

“苏姗娜抬起脚，从最后一圈紫色丝绸中走出来，这时，那个中国女孩停止了笑。她扬起脸，我的腰弯得很低，离她很近，可以看见她睁大的眼睛。我发现她似乎就是魔鬼，身披飘逸的丝绸，她的美貌令人胆战心惊，眼皮包着的那双奇怪的眼睛在燃烧，也许这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描写的那个身穿紫色和

①见《圣经·新约》《启示录》12:1：“天上现出大异像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

②前苏联辅币名，100 戈比等于1 卢布。





朱红色、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女人^①！‘太长！’她用俄语嘶嘶说道，指着苏姗娜的脚，瞪着眼睛：‘太长，太长！’

“可苏姗娜很开心，没有感到邪恶可能降临。她把最后一截丝绸在女孩的腿上叠好，踩着健壮的脚步重新站起身，穿上自己的旧棉衣又转了一圈，笑道：‘好哇，好哇！’她用俄语说。‘脚长好跳舞，来，跟我跳舞！’她弯腰去拉那女孩的手，手指碰到了她苍白的肌肤，完美的肌肤，离我的眼睛如此之近——她怎么可能是大巴比伦，世上的淫妇之母^②？——她的脸突然变了，浑身颤抖，发出一声尖叫。

“苏姗娜朝她弯下腰。‘怎么啦？’她问。‘怎么啦？’

“那女孩没有回答。她们面对着面，缓慢地，女孩的手伸过鲜艳的丝绸，往下摸着姐姐肮脏的拖鞋，那双没了形状、穿破了的牛皮鞋，我们只有这样的鞋来让脚不受岩石的磨损，不遭蝎子的叮咬。她的手伸过来，大卫的脸夹在两个面对面的女孩当中，她们的肌肤、面颊和头发简直有天壤之别。接着，苏姗娜挪了挪身子，举起双手放在女孩的肩上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往前抬起自己的左腿，让身体的重量全移到右腿上，我低下头，看见女孩的右手从盖着起皱丝绸的腿上举起，看见苏姗娜的脚抬起来，女孩脱掉那双旧牛皮鞋，然后触摸她那只赤脚，指尖顺着这只汗渍渍、脏兮兮疯长的长脚摸，每根手指抚摸着脚弓、脚背和脚趾，仿佛是在勾画血脉，苏姗娜的长脚搁在她的手掌上；女孩的手掌合拢，握住那脚，慢慢地，她收起那温暖的手掌，从脚跟到5个脚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17:1-4：“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②同10。《启示录》17:5-6：“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妙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趾头感受着整只脚。

“等我睁开眼睛，苏姗娜的手正握住那女孩脚。可那哪是什么脚？在她屈起的膝盖下面，在踝关节的地方，那腿的尽头是紧紧缠着层层裹布的一块方形的脚桩。我不明白：她的脚哪去了？我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现在闭成了一条缝，一道紧皱的条纹横在脸上，一道让痛苦尖叫的缝，可痛苦不会从那儿叫出声来的。”

祖父的故事像是对我施了催眠术，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意识到他没有再讲了。

“怎么回事？她的脚怎么回事？”

“缠脚。中国男人认为，女人的脚越小，人就越美。”

“因此他们就缠她的脚，把脚缠小？”

“不是，脚是要长的，他们没法把它缠小，只要女孩活着，脚就要长，不能不长，因此，在五六岁的时候，脚趾被扳下去，脚骨朝脚根方向扳下去，用布越缠越紧，直到脚骨折断，脚趾和脚跟被迫合拢，叠在一起变成人们所说的‘莲花钩’。根本再也不想什么脚了。”

“他们把脚折断？”

“女人盘腿而坐，她们也只能这样，有的一步也不能走。”

“为什么？”

“几千年来，中国的男人相信要想美，这是必要的，缠小脚。”

“美？这是折磨。”

“是这样的。他们说，对丈夫而言，手握莲花钩，那是为妻最大的美貌。

美是一生的痛苦。

外面，下午的光线减弱成了十二月的昏暗。突然，一位古板的护士沙沙地走进屋，来到我们身边，端着一小杯水。





“小心，你记得哟，洛温神甫，喝水要特别小心哟。我们可不想再来一次小事故哟，是不是？”她说。

“我们？”真是的！我感到一股冲动，想一脚把她径直踹出窗外。就在祖父歪着头，默默无声地小口喝水时，她两次提醒我，说早过5点了，探访的时间已经早到头了。我点了点头；要是我张开嘴，肯定会咒骂这个毫无恶意的女人。最后，她离开了，我也站起身。

祖父这时很疲倦了，可他的眼睛大睁，凝望着医院空荡荡的空间。“如果有事故，那可能也就有奇迹。有些人终身都在寻找这些奇迹。”他说。

在多少年的布道中，他引用了关于那次亚洲之旅成百上千的故事，可从没提过帖木儿的坟墓，提过丝绸，提过那位遭受折磨的中国女孩。

我说：“你是不是仍然希望爱达荷是片沙漠？你是不是还在等待耶稣从天而降？”

“如果你曾经抛弃过一切，那再抛弃一切就不难了。”

我想朝他吼叫。即使你当时只有12岁，即使这么多的人死了，但克劳斯·艾普却越来越狂热，他预言耶稣会再来可耶稣根本就没来，你们全体人都跑出去坐在山上祷告等待可耶稣根本就没来，即使你在美国的亲戚终于把你劝回去，为你买了车票把你从那沙漠里拖走，从那疯子身边拖走，即使经历了这一生，你依然还在想要抛弃一切？

“我们依然是基督的新妇。”他嘀咕道。

我想告诉他：为了这，你就想要沙漠，你就想要孩子们死。可我不能像从前那样对着他吼。在医院里不能。而且除了他告诉我的，我再也没别的事实了，就只有我从前知道的那些。只有愤怒，经历了4年之后，我知道，这与愚昧一样的无济于事。

可现在他给我讲了这个奇怪的故事，美与丑搅在一起的故事

事。他经历了他的过去，他的一生，可对于我，这世界正在爆发战争。

他的右手打着手势，我把自己的手给他。他的脸有一半皱成了我知道是笑容的模样，他的手软弱得令人惊讶。他一直干活，不论是农活还是布道，带着那种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力量和紧迫感，始终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可如今他却躺在这儿，如此恬然，讲话如此从容。我弯下腰凑近他。

“我明天再来。我要走很久很久，但明天我还来，跟奶奶一起来。”

“你要走，去打仗？”

“不是军队，是航空队。修发动机。”

“唉——”他叹了一口气。

“飞机发动机。”我试图让他放心。“这样，当飞行员起飞后，一切会工作正常，他们就能飞了，不会有什么部件出故障，所有部件工作正常。”

他似乎在点头。他好像突然精疲力竭，几乎睡着了，或失去了意识。我最好提醒护士。

我会去问奶奶，大卫·托维斯是谁？他是否还活着？住在哪儿？还有苏姗娜，爷爷的姐姐苏姗娜，我那位身裹紫色丝绸的姑婆，她又怎么啦？我为何从没听到过关于她的丁点儿故事，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在那次的沙漠迁徙中，奶奶虽然不在，但她肯定知道一些事情。

克劳斯·艾普是不是飞去了天堂？什么时候？

我双手捧着祖父的手。他一动不动地平躺着，仍然在呼吸。他一定是睡着了。你还想要什么？

他给我讲了想让我听的故事。我只需离开这儿，把头钻进飞机发动机。让他安祥地歇息。



第 13 章

除了早已心知的上帝

1990 年，西北地区 小马藤湖

亚当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在这片几乎有 30 多年的记忆但却无法相信的土地上，那些漂砾候在天边的蛇丘旁，像纪念碑的碑石。有时候，在那些石头下面，你看得见水中天空的倒影，那些石头三三两两地垒在一起，宛如一座巨大的圣坛，冰川在 12000 年前就融化了，但它们却依然候在那儿，仿佛在等着祈祷——“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①——母亲，安息吧，我记住了。至少记住了那些话。如今，透过帐篷的洞眼，我只看见白色的水，还有这条沿着北极圈隆隆作响的无名的河。我们已经消灭了帐篷里所有的蚊子。我们将睡个好觉。

可突然，亚当腾地直起身——“昂！”——是不是埃里克的那台驱赶灰熊的噪音机发出的声音，在正该保护我们的时候却不中用了？亚当伸长脖子，透过帐篷的遮帘扫视河岸——危险会从

^①引自《圣经·新约》《雅各书》5:16。亚当的母亲经常说这话敦促儿子不忘祈祷。

那儿来，不会从水里来——白色的天空在明亮的夜晚发着微光——“昂！”——肯定不是熊的叫声，但肯定是动物，而且离帐篷这么近，尽管挂在肩膀上的睡袋还很温暖，但他仍然浑身打颤。他死死盯着熟睡的乔尔外面的那块尼龙布：爪子会从那儿猛地伸进来，一颗蛇形的头——

有动静，一只高大的雷鸟像帝王一样，大摇大摆地从帐篷的遮帘门前走过。机灵的头竖着，黄褐色，下身和腿白斑点点，它好像在雾气缭绕的地衣上沉浮，在北边地平线上，它的同伴们排成行躺在太阳下。“昂！”它又在巨石那边叫了。

“雷鸟跟畜场的鸡一样动作慢。”那天早些时候，埃里克给他们讲过，当时他们正在歇息，让小船自个儿漂。“而且跟野牛或驯鹿一样，肯定会寻着自己的踪迹走，不过，不要打它们，它们很美。提纳人关于女人是怎么来的故事，讲的就是雷鸟做好事。”

乔尔笑道：“比亚当的肋骨还好？”

“对！雷鸟变成女人后，就帮助男人！”

克莉丝蒂娜把他们的小船推进水流。“男人们就想让女人做这些。”她说。“干活，干更多的活。”

“只是那一只雷鸟。”当他们的船又漂开的时候，亚当听见埃里克那常有的讥讽：“故事又没说其他雷鸟干了什么活。”

“干吗都干？一只足够了。”

这是埃里克的第三任妻子，比他小差不多一半的岁数，船划得很好。埃里克是个绝对个人做主的医生，不考虑任何可能遗留的问题。他不胡扯，没有废话，病人喜欢他。他是教授，大学医院外科的头儿。他不止一次地对亚当讲，任何时候你愿意，我会让你重新上班。不急，去不去还没定呢。

透过防水的尼龙布，夏日北极的夜晚发出柠檬黄的颜色。几乎30年前，在这儿以南的几个湖泊边，亚当和埃里克、拿破





仑，还有凯西一起弯腰围在一团由三个石头垒起的火堆旁。当时，他倒头就能睡着。驯鹿在地平线上行走。

亚当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收缩，像是被冰、被这里河水深沉的声音窒息了一样，自从北极冰川缓慢融化，流遍全球海洋的那个时候起，这条河就流淌在这石头和光线当中。他摸了摸自己的手，他也在这里，还有他的儿子，正在熟睡。在另一个帐篷里，克莉丝蒂娜和埃里克会把他们的睡袋拉在一起，也许他们还光着身子。他舒展身体躺着，凝望上空。倘若这是4年前，苏姗娜肯定也在这儿跟他躺在一起，可她走了，因为他走了，不过，他俩依然相互回顾，但两人同意继续这样，分开。珍妮也走了，更轻松、更快，没来得及说声“再见”。他不会去想卡伦和她的那张大嘴、她那敏感的脑子和与之匹配的痴迷；让她跟自己那位怕老婆的丈夫呆一起吧，就这样吧，没有头疼和心疼。他躺在帐篷底下深陷在土里的两块石头之间，陷得之深，犹如里尔克的弥撒曲一样不可磨灭：

“我只想这样坚守
记住你、记住你站立的模样
把你放进、深深地放进镜子，远离万象。
可你为何变得不同以往？”

他自己的一生也在不断回顾，不断地观照镜子，但从未不同以往。

你为何变得不同以往？这是他的诗句。

他感觉得到，自己的体重在软化冰冻层。等他和乔尔叠起帐篷时，他们将在石头之间发现他俩并排躺着的身体的痕迹，这不久即将消失的身体痕迹将微微冒着气，在这冻原上，在被命名为饥饿湖和冬日湖之间的某个地方，在一条无名的河流旁边，即

使埃里克也不知道提纳人是怎么称呼这些湖的。他的睡袋暖暖地紧缠在他的肩膀上，像是被拉链拉上运回家埋葬的尸袋，不过，他从没见过战场上的尸体，更没有摸过了。“尸袋”，听起来很韵味。

他这是在北极圈以北吗？他记得，在瓦斯卡赫坎的学校里，那颗吱吱作响的地球仪把北极转过来面对他，他循着那些直线看，好像它们组成并牵动着湖泊、河流、逶迤的白蛇丘，从一架双引擎飞机往下看，这些东西简直就是一团糟。他沿着地球仪上旋转的线条寻找，发现自己正躺在与马加丹古拉格平行的地方，就在苏联的勘察加半岛的上方。在那儿，在科累马山脉那边，在尤卡吉尔高原和奥莫隆河以及科累马河的沼泽之间的那片荒芜的火山附近的什么地方，据说他父亲的两个兄弟在为苏联挖金矿时死了。还有他母亲的兄弟彼得·洛温。他在鄂霍次克海的萨哈林岛上，在日本以北——但这座岛大部分往南延伸，超过了里贾纳或温哥华的纬度。他为什么总认为萨哈林岛在北方？因为在加拿大或俄国，流放之地就只能是北方，冰封绝根之地。

据说，在外蒙古的沙漠里，冰冻层在地底下可一直往南延伸到纬度48度。

第二天，坐在小船里，乔尔对他说：“在这片美妙的、空旷的冻原上划船，你依然只想你那些死去的叔叔？”

“不单他们。”亚当说。他在想，要是苏姗娜在，她会照相的；大步走上几个小时，找只可爱的鸟做伴，找只很少飞、只扑腾几米远的。

沿着平静的湖面，他们与一条平顶的蛇丘并行着往前划。那天上午，他们一连越过了好几处能过船的急流，然后又经过了一处很长的石丛，只能勉强用手抬着小船涉水而过，最后是一处被落差不大的瀑布冲成的陡峭的石块，埃里克立在上面，像块岿然不动的漂砾，用手护送满载的小船，水摔打在他的身上、石头





上和漂浮的小船上，水花飞溅，其他人手忙脚乱地爬上岸边的岩石，试图抓住船索。

“这地方让你思考。”亚当回头看了看儿子。

“但愿能看到驯鹿。”

“往北去海洋下崽儿去了。”

“看，有蚊子。看，狗日的好多哟！”乔尔举起滴水的船桨，拍打着跟前成群结队的蚊虫。“这些蚊子跟着船飞到湖上，然后叮你，甚至就在这儿。”

“把头罩放下来，把船桨放水里。我来做这些！”

“你在前面划，我来掌握方向。”

“你要掌握方向？”

“哈哈！”乔尔笑了，很突然，爆发了似的。“你想西伯利亚的那些事时，可不要忘了划船哟。我在看哟。”

湖水像块钢板，在他们前面，埃里克和克莉丝蒂娜的小船滑过蛇丘原封原样倒映在湖面上的那段长长的斜坡。没有天，没有水，只有无情的冰铸起的两道水平线。

乔尔突然莫名其妙地问道，像划独木舟的人问话的方式：“关于西伯利亚你那几个叔叔，昂克尔·大卫·洛温都讲了些啥？”

“他讲的是萨哈林岛，没讲西伯利亚。”

“有啥差别？”

“就悲惨而言，没啥差别。他们也是他的叔叔，祖母的两个兄弟。”

“他住在巴拉圭，你住在加拿大，他怎么他知道得比你多？”

“我想，没有电视，也没商场，他们更有故事好讲了。”

前一年，亚当和乔尔飞到亚松森^①，在此之前不到一周时间，阿尔弗莱多·施托斯纳尔^②在一次政变中被他自己的军官

①南美洲国家巴拉圭的首都。

②阿尔弗莱多·施托斯纳尔(1954~1989)：乌拉圭独裁者，后被推翻。

推翻,不过,军事独裁的换来变去对亚当的那位住在遥远的查科省的叔叔大卫·洛温来说没有关系。老人和他的6个儿子围坐在那棵巨大的帕拉图多树下,一杯马黛茶传来传去。巴拉圭的夜晚稍微凉快点,虫声、蛙鸣此起彼伏,亚当蒸腾的汗水成了沙漠里的甘露,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凉快够了,喝足了茶,然后慢慢离去。乔尔跟他们不会讲任何语言,不过,那个最小的儿子比划了许多让事实像谈话一样易懂的动作,他不说话,人很单纯,他招呼乔尔跟他走,穿过阴暗,去月光照耀的田野看南十字星座^①。

“讲给我听的不是昂克尔·大卫。”亚当扭过头,在船桨有节奏搅水的咕噜声中说。“是托恩特·安娜。”

“我以为她回屋去了。”

“她又回来了。女人们不喝马黛茶,但当时她坐在树下。”

“她是最可爱的老太婆。”乔尔的咯咯笑声就像船边的水响。

“她有65岁了。”

“个小、黝黑、满脸皱纹。想必是查科的太阳晒的。”

“她一辈子都在说,昂克尔·大卫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什么?”

“在巴拉圭住了59年了,可对他们,在俄国的那些门诺教村庄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还有所有那些亲戚……死了的或者没死的,上百个亲戚中的每个人。”

乔尔说:“也许她想得更多。”

“什么?想?老大卫是个啥都知道的人,一直讲个不停。你瞧他,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从没闭过嘴。”

“我的意思是,我不懂他们,她总是做同样的事情,打扫,做饭,而他总是跑来跑去。也许她敢去想。”

^①位于南半球半人马座和苍蝇座附近的星座。



亚当停住了手中的桨，转过头去看他的儿子，跟洛温家族的人一样，他长得宽阔结实。湖水在他前面敞开了，没了边际。他低着头，船桨带着持续的节奏拍击着湖水，小船径直朝前冲去，划出一道紧绷的弧线。在他看见自己用力举起小船，把它倒扣在自己肩上，第一次扛着走过冻原之前，亚当从没想到过自己居然如此富有活力，如此强壮。

“敢想？”

“有时，想也是很难的。”乔尔说。“有些事。她说了些什么？”

跪在一艘摇来晃去的小船里，膝盖吱嘎作响，阵阵发痛，气喘吁吁的情况下怎能扭过头用几句匆忙的话讲故事？16个月以前，他还在南半球那一面昆虫鸣叫的热浪中，如今，他又在自己国家这片极地荒野上。亚当突然想到，我儿子也许像我，也会成为一个永不回头的流浪者。

“爸，她说了些什么？”

水上没法讲。可是后来，当他们平躺在发颤的帐篷里时，要讲她说过的话还是很难。他的话被尼龙帐篷紧绷的角落给捆死了，他几乎没法开口，话能把他们祖先的往事卷成一床被单，遮盖住躺在冻原上被风不停吹打的他和儿子。或许，要是他朝空旷、岑寂的天空说话……到底在哪儿你才能开口讲？

“流放……唉，他们总是被流放。洛温家族是16世纪80年代离开安特卫普的，弗里斯兰人更早，甚至连亚当·威伯，当时他可能是受到引诱去的但泽，他离开哈灵根之后的旅途便成了流放，我认为他再没有回去过。没错，他排干维斯图拉三角洲的积水造出农场，发明了缆车重建城墙……实际上，他造出了土地，就像在弗里斯兰我们的祖先围海造地一样。我猜想他可能也是围海造的地，他还挖深港口，但瑞典军队已经围在他们周围了。”

乔尔直截了当地说：“爸，你说过他修了20座打仗用的棱

堡。是棱堡，可不是麦地。”

这容易对付，像往常巧妙地应付一下就行，这是几个月分别后的亲切重逢，父子俩一起干活，轻松交谈。亚当承认道：

“没错，不过，要是棱堡的幕墙是土垒的，你可以在上面放羊。你见过荷兰堤坝上的那些羊吗？围海造的新地叫“watte”^①，那还不是田地。当“watte”修到某个程度，修到足够高度时，人们就得再修更多的堤坝来保护它不被海水冲垮，城墙就是这么来的，用于保护的堤坝。在但泽，亚当修筑土墙不是为了阻挡凶猛的海水，而是阻挡野蛮人，不让他们进城。可他还是在做自己以往做过的事情：如果他保不住这座城市，连他的流放之地也将遭到摧毁，那么，要是他们命大活下来了，那他们上哪儿去寻找新的流放地？”

“爸！”乔尔吼道，声音高过剧烈的风声，那风击打着他们的帐篷，像痉挛的鼓手。“托恩特·安娜可没讲过亚当·威伯和他可恶的缆车！”

亚当继续回避他。“我们家族的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流放。”他说。“有上百次，有时候门诺教徒自己还相互流放。我给没给你讲过我们有位亲人因为画像被流放的事？是门诺教徒干的。”

“威伯家有画家？”

“他来自洛温家和威伯家。17世纪有许多伟大的佛兰芒画家，因此在但泽也能找到几个，因为很多人逃去了那儿。这个人的名字叫老伊诺克·西曼，他母亲是亚当·威伯的孙女。他给所有市政议员都画了像，挂在但泽的市政大厅。但门诺教的长老断定画像是不对的，毕竟有那条“第二诫”，于是他把他逐出了教会，赶出了教堂。这意味着伊诺克成了孤家寡人——门诺教徒

^①德语：围海后造出的新地。





对禁令是严格遵守的,在但泽,他们把这叫作禁令。伊诺克的家人甚至不得对他说话,更不得跟他一起吃饭,因为他遭到家族的放逐,被赶下了地狱。但伊诺克是个出色的画家,他在萨克森的奥古斯塔斯二世手下找了个皇家流亡画家的位置,后来又在英国获得了永久避难,在那儿,他的儿子小伊诺克后来给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画像,还给他自己画像,那幅肖像被奥古斯塔斯二世挂在他在德雷斯頓雄伟的城堡里,一直到——”

“爸!”

“——一直到 1945 年德雷斯頓被炸。”亚当轻声地说,风在帐篷顶上屏住了气息。“你说得对。在巴拉圭的托恩特·安娜不知道亚当·威伯和画家的事。”

“妈妈说她的父亲,外祖父莱昂斯,去过德雷斯頓。”

“我看不是。他当时在法国,维护在那儿飞的空中堡垒。”

乔尔说:“他就是在那儿。”

“你凭什么这么说?”

“是你扣的扳机,不过是我装的弹药,然后给了你,那该是谁的责任?”

真是年轻人没有条件的逻辑推理。“好吧,”亚当说,“干脆说是我在厂里造的枪,是你命令我造的……这好了吧?”

肩并肩地躺在这抖动的帐篷里,躺在加拿大西北地区麦肯齐的小马藤湖中间这座不到 50 步长的岛上冰冻岩石上,还有什么可争论的。亚当心想,要是我是个奥吉布瓦^①巫师,这座震动的帐篷将是神灵前来回应我最虔诚祈祷的地方。如果可能,我将祈祷什么?为谁祈祷?——可他的儿子正躺在那儿,等着他呢。

那么,关于托恩特·安娜讲的那个萨哈林岛的故事,那个祈祷与神灵的故事,他又能对乔尔讲些什么呢?托恩特·安娜只

^①北美印第安土著民族之一,原居住于北美休伦湖北部,后迁入美国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大平原北部。

知道萨哈林岛的一件事情,但肯定不知道那岛的地图的形状,像把双头短剑,仿佛是在鄂霍次克海上用石头草草切割而成的,因为她没有地图集,59年来从没见过,除了有一幅,大概是西班牙文的,可她看不懂。此外,萨哈林岛不是她讲的故事。她是威伯家族的人,亚当父亲的第三个弟弟的女儿。她丈夫昂克尔·大卫是洛温家族的,是他把两个洛温兄弟的故事从加拿大带到了巴拉圭,因为就在亚当的母亲去世之前,他去艾尔伯塔看望了她,是她对他讲的。亚当的母亲出生时的名字叫卡特丽娜·洛温,是昂克尔·大卫的姑妈,因为她是大卫父亲的同父异母姊妹。不画张表,不画张家谱图连上线条,你能弄清楚之间的关系吗?

“我知道,都是亲戚。”乔尔不耐烦地说。“接着讲吧!”

可是,在那美丽的帕拉图多树夜晚盛开的耀眼的花朵下面,昂克尔·大卫没法开口讲那个残酷的小故事。是托恩特·安娜用低地德语大声讲的,语速很快,语气平淡,仿佛她是在给他讲罗宋汤的做法,这东西世上每个门诺教徒都会做,也许除那个被加拿大的舒适生活惯傻了的人之外。她告诉他:

“那年,我家大卫去加拿大时,就是你母亲去世的那年,她告诉他,在30年代革命者把她兄弟彼得·洛温送去了萨哈林岛的监狱,后来,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海因里希,革命者海因里希·洛温,也去了那岛,并且杀了他兄弟彼得。”

在厨房反射出的光线下,亚当看不见她头顶上那些鲜艳的花朵,也看不见她黝黑、憔悴的脸,几乎看不见她的棉衣裙。厨房里,女儿们稀里哗啦地整理盘子,她们的丈夫正扭头在看。托恩特·安娜说得尽可能地平淡,用四个字编了句成语:“Hee brocht ahm omm^①”,字面意思是“他给他使了套”,就像英语口语

①低地德语。





中说的“了断了他”。

隔着昂克尔·大卫那双大手捧住的头，她突然补充道：“据说他就带了把刀。把他兄弟杀死了。”

是戳死的。就像什么针在羊毛上乱戳一样。

他的名字就叫“革命者海因里希”。他的照片就在亚当母亲死的时候留给他的那本影集里——头，肩膀，阴郁、很帅、长着少许胡须的年轻人，戴了顶帽边下垂的皮帽，那帽在额头上竖起一个帽舌，正面有颗星，不用问是颗红的，直立的衣领上有根条纹。那是托洛茨基^①的红军军服，还是苏联的红军军服？这张纸板照片是用面粉粘在影集的黑页上的。当亚当最终把它从影集上撕下来时，在斑痕点点当中，他发现照片背后左上角有一行用娟秀的哥特式德文书写的文字，他慢慢地拼字谜一样把它翻译成：“来自你兄弟、连襟和叔叔最精美的问候，11——”可能是月份和地点（“——诺夫”……可能是“罗曼诺夫”，可在30年代，他的妹妹已经去了加拿大，他还用这个捷克名字干吗？）剩下的被浆糊和黑纸永远地撕没了。那个海因里希除了嫁给了革命，好像从没结过婚，翻来覆去地念着那个不知什么意思但恨得咬牙切齿的字以证实自己是嫁给了革命。他后来怎么啦？“去了集体农庄：一种生产合作组织。”生产啥？

他母亲卡特丽娜的亲兄弟彼得·洛温没在影集里，可她父亲大卫·洛温在，严厉、秃头，白色的山羊胡子，粗壮的大腿套在亮闪闪、齐膝盖的靴子当中，黑黑的两条伸在他跟前，他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年岁不比亚当母亲大，曾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令她吃惊的是，她嫁给了他）微微斜着身子站在他背后，没有笑容。这照片的背后没写什么。

①利昂·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革命理论家，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领导人，后被逐出共产党(1927年)，并因其反对斯大林政权和强调世界革命而被驱逐。他的著作包括《文学与革命》(1925年)及自传《我的一生》(1931年)。

戳的……据说……同父异母兄弟……革命者。纸上啥也没写,只有留在风中的几句话。

母亲给昂克尔·大卫讲这故事时,要是亚当的父亲还在,他一定会咕噜:“他们都死了,这么久了。”

接着,他母亲一定会回答:“感谢上帝。那些革命者再也不会对他们作孽了。”

然后,他们三人一定会抱头痛哭。他们的脑子没法想像萨哈林岛是个啥模样,但他们所知道的痛苦足以让他们想像:他们曾拖着自己的躯体浪迹天涯,被劳役、被低劣的食物、被担忧,最后被癌症所摧毁,他们曾一起弯腰驼背乞求祷告,求尊贵的上帝赐予怜悯,让他们最终安息。艾尔伯塔的阳光在抚弄着他们,带着温和、苦涩的嘲讽。

可是,当他母亲给来自巴拉圭的大卫讲那故事的时候,父亲早已死了。接着,亚当又想:母亲给我取名叫“彼得”,取她死去的兄弟的名,可我父亲曾给我取“海因里希”这大名。取她同父异母兄弟、那个革命者的名字。这是为什么?

他父母亲听说这杀害兄弟的事有多久了?他母亲给他取名的时候就知道这事了?还有他父亲?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父亲死时没提一个字,他母亲只讲给一个打离开俄国之后50年来仅见过一面的堂兄听。为什么是他?是为了把这事埋葬在她所能想到的地角天涯?埋葬在巴拉圭查科省的沙滩上?

“你听……”北极的风又一次在帐篷顶上屏住了气息,突然,亚当很想讲他自己名字的故事,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起过——他只需对一动不动躺在冰冻层上的儿子讲这故事最简单、最明了的梗概。“你祖母告诉我,我的第二个名字‘彼得’是为了纪念那个兄弟,因为我出生那时,他们刚听说他流放时死了。在萨哈林岛的犯人集中营里。可其他的,她从没解释,甚至连她最后住进医院,我们翻影集的时候。祖父死后,她很少说话,你还记不记





得，我们开车去什么地方时，她只是唱几句，因为耳聋而唱走调，或者背几句《诗篇》——夏天我们开到山脚时，她唱‘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①，‘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②——她再也没哭过，最后在医院里，她笑了，只是说了句一切都好，别麻烦了。她只字未提这件弑兄的事情，对我只字未提。”

乔尔动了动，坐了起来。“你把蓝瓶子放哪儿了？”他问道，声音很轻，亚当差点没听明白。

“那边。”他用手指了指。“你把衣服堆上面了。”

当埃里克开始给他们讲蓝瓶子的用途时，他们都笑了，可他们发现，无论怎么赶紧在身后拉上帐篷的拉链，他们进进出出很难不让蚊子跟着一起嗡嗡地进来，要想睡着，得把这群蚊子镇压掉。

“讨厌！”乔尔咕哝道。

“撒了吗？”

“一点点……你是怎么……？”

“我想，最好放在你膝盖上，竖着放。”亚当挪动着身子，弄出很大的响动。“喂，给我留点地方好睡到天亮。”

乔尔鼻子哼哼说：“祝你好运！”

“你灌了吗？”

“只灌了一升。”

接着，他俩又笑了一阵。乔尔伸出脚蹬了蹬帐篷遮帘，然后缩了回来。时间大概是凌晨两点了。在帐篷凉爽、清新的空气中，有一股暖烘烘的尿味，一阵个人的体味。亚当记不起了，风是何时停止了肆虐，不过，要是风不会再起的话，要是浪端上的

①引自《圣经》《诗篇》(50:10)，全句是：“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②引自《圣经》《诗篇》(19:1)，全句是：“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

白泡沫不再奔涌,不再粉碎在岩石上的话,埃里克会在三点半爬起来,5 点前他们会在小马藤湖上划船,在一片尽可能的寂静之中,沿着湖岸,从一处陆岬划向另一处陆岬。

亚当说:“沙皇已经把萨哈林岛作为囚犯隔离地。主要关押杀人犯和政治犯。”

“就像英国把澳大利亚作为放逐囚犯的地方一样?”

“没错,不过萨哈林岛是俄国海岸外的一座岛,被一条宽度刚好人游不过的海峡隔开。1890 年安东·契诃夫^①去过那儿,写道:当他第一次隔峡相望时,他看到了一幅恐怖的景象,山的轮廓,还有烟雾,火苗和狂舞的火星,太怪诞了。恐怖的烈焰在燃烧,火焰之上,一团红光在山顶上升起。契诃夫好像看见整个萨哈林岛都在燃烧。”

乔尔没有动。亚当缓慢地继续说:“有时候,我想,也许我们的叔叔彼得也看见了那些火焰。”

乔尔说:“说不定我们那位革命者叔叔想结束掉他兄弟的苦难。”

“是的,不过,他得经过集中营的那些关卡——非常危险。”

“也许他只得这样,元帅的命令。”

“有可能,不过……彼得·洛温只是个无名小卒,迟早要被活儿给累死。干吗要费事杀他?”

“该死,我怎么知道?”乔尔突然大声说道。“我只是个加拿大的城里孩子,被车送去上学、打球、学钢琴,整个生活乱七八糟,跟单亲母亲过,爸呢,为寻找亲戚满世界地跑,没跑出去呢,就满嘴谈苦难,可对于苦,我到底有多少了解?”

亚当想用一個轻快的玩笑来搪塞:“这不是在尝点冻原上的苦吗,搬运两公里的东西,抬 60 公斤的小船?”

^①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代表作品有:《套中人》、《第六病房》等。



“哦，对呀，你付了上千块钱，我就来吃苦了。早就安排好了的，三周的夏日磨难，配上冻干的食物。”

“不要挑剔自己了。”

“干吗不？爸”——乔尔突然用胳膊肘支起身体，在帐篷绿色的夜光中看着亚当——“我们坐飞机，飞越一切，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和钱，我和崔茜想去哪儿你就带我们去那儿，或者带上你想带的人……可祖母和祖父，还有你在苏联的那些亲戚，他们受了难，真的受了难。而且我敢打赌还在受难，那些从德国跑出来的人。记住他们受难的身躯和苦痛。可为什么他们遭受折磨？”

“你祖母会说，这世上有苦难和死亡，因为有罪恶，有罪，以及对罪的惩罚。”

“对呀，但在加拿大也有罪恶——照祖母说的，你和我肯定有罪，难道你亲戚的罪孽比我们还深重，因此得加倍受罚？”

“生活并不公正。”面对他母亲关于天堂与地狱那明显、永恒、必然的结论，亚当犹豫了。

可乔尔追着问：“为什么不能公正？祖母总是吻我，悄悄对我说：‘记住，乔尔，上帝爱你。’他不是爱所有的人吗？如果是，那他他就是公正的。”

“生活并不公正。”亚当还能再说一次，震撼中，他知道自己的每一口呼吸都在利用这不公。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补充说：“对这不公，我们都得感谢上帝。”

“是呀，这倒不难。那么，你对你亲戚这么说，你这么富有、huach jeleat^①？”

“你记住了那两个字，还有读音？”

“昂克尔·大卫让你翻译给我听的。”

“当时他笑了。”

①低地德语，意思是“学到那么高”。

“是笑了，不过他是那意思。他来加拿大时我为什么没见到他？”

“他在艾尔伯塔只住了3天，我开车送他去科尔代尔。你当时在夏令营。”

“夏令营，学着骑那匹笨马！”接着，像往常一样，乔尔又折回到前面一个话题。“你在德国的堂兄‘小彼得’知道这些洛温兄弟吗？”

“开始我不知道动刀的事，没问。我要问。我要劝他带我去俄国，可他依旧很害怕，要是去，他们会抓他的。”

“前苏联已经垮了。”

“我知道，但他依然不相信他们。可有一次他确实说过，彼得·洛温是罗曼诺夫第八村的教师……因此，也许他也是个革命者。”

“什么？”乔尔吃惊地问。

“30年代，要当教师，可能你必须是个党员，或至少是个宣过誓的无神论者。”

“党员他们也会逮捕？”

“逮得更多。可他们怎么会接受彼得·洛温作为党员呢？他是个门诺教徒，说德语。为了证明自己是可靠的，他得为党做许多肮脏的活，否则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他？”

帐篷在风的鼓动下又开始战抖了。乔尔对着帐篷顶缓慢地说：“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革命者海因里希·洛温也是门诺教徒。也许他去萨哈林岛就是这原因。为了证实自己。”

奇怪，亚当以前没想到这儿。

一座长长的岛，形状像把刀。哪一头是刀柄？这无关紧要，在俄国整个的血腥史中，俄国人的手总是握在一把对准自己心脏或喉头的刀刃上。也许就像彼得的手当即握在他兄弟的刀刃上一样，他明白海因里希为什么带着这把刀，来到这形如双头石





剑、被那冰海从苏维埃的海岸分离出去的岛上。

亚当坐在船首，把船桨插进小马藤湖青白色的水里，坚定地划着。他那些被放逐的叔叔们不会懂得这多余的劳役，会觉得这旅途不是被迫的，而是因为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天气，是发疯了。然而，不论是住在科累马金矿什么地方威伯家兄弟，还是在萨哈林岛上的洛温兄弟，他们都不可能忘记，他们的劳役源于一个独裁者无限邪恶、无比疯狂的思维方式。不过，金子、煤炭也好，木材、石棉也罢，无论是哪种专门的东西连同寒冷或饥饿害死了他们，也许到头来他们都觉得这与那严酷、无情的天气有关；即使是海因里希·洛温也一样，他带着那把刀走了好几周才找到那个兄弟，也许那兄弟曾假装是个革命者，为的是活下去，保住工作，养家糊口，童年时，他曾跟他同过床——即使海因里希也只好听天由命。如像在德国的小彼得·威伯说的那样，在元帅统治了10年之后，人们已经不再可能说“我愿做这事”或“我不愿做那事”或问“为什么？”了，就如同你一旦被推下桥，难道你还可能在半途决定停止坠落？

雷声从小马藤湖面上滚过。他们的身体，亚当的和乔尔的，伴着无法停息的节奏，坚定地往前划着船。

在他们前面，青铜色的湖水以南，狗肋骨山像一块花岗岩面包，隆在两座隔着一段距离的、斜横着的蛇丘之间。两天来，他们躺在小岛的背风处，被风吹打，那风吹弯、最后折断了他们尼龙帐篷的撑杆，事后他们才意识到为保护自己，他们本应把帐篷放下来。可是，第二天晚上突然平静了，出奇的静，波浪平缓，好像有只手放在上面一样，于是，他们赶紧收拾行装，开始往南划，穿过无浪的水面，划过那连绵不断、膨胀起伏、在阳光的平射下熠熠发光的湖面，太阳正停在他们身后正北方的地平线上。此时，湖面在岩石之间变窄了，到高崖的底下不知不觉地变黑了。亚当觉得这景象仿佛是加了相框似的，他认出了这是年轻的罗

伯特·胡德勾的画，名叫《马藤湖晚景，1820年8月29-30日》，在跟随约翰·弗兰克林对北极海洋第一次灾难性的远征途中画的。右边的这摇摇欲坠的岩石，像一座被巨人倾倒的巨型神殿倚靠在一座金字塔边。胡德画的就是这景象。可是在画中，这些悬崖的顶上到处都有漂砾和很有艺术间隔的驯鹿，它们的鹿角呈叶状，似竖琴，动物们凝视着加拿大船夫的大船驶过。

亚当感到膝盖下的这艘细长的小船因为儿子的猛划下在突进。他想，我们一起在行旅。

行旅，苦旅，说真的，都是相同的意思：一段旅程，一次艰辛的折磨、受难或痛苦的努力。亚当知道，他和儿子为一道度过共同的光阴而选择的这次极地旅行就是这折磨，这努力。那他们为何要选它呢？他们的旅程横跨史前的麦克尼尔湖残留部分中的一大块，那座湖是由威斯康星劳伦泰德大冰原融化而形成的，千百年来，那冰原覆盖着北美大陆东面的一半地方，他们经过的蛇丘还留有它的冰下河的痕迹。曾几何时，在往北和往西的某个地方，当这里的冰层厚达几公里的时候，亚洲人跨过白令海峡，在东西两条大冰原之间沿着狭长的冰碛走廊往南旅行。是什么样的摩西^①手握什么样的神杖为他们分开那冰冻的海水，把山一样海一般的坚冰垒成竖墙堆在两边，好让他们能踩着干燥的海底在海中平安穿过？是哪个耶和华，哪个漂泊、羁旅、无尽的行旅/苦旅之神？他的居处是移动的帐篷，他的圣坛是荒谷中的一块岩石，他总是为自己的孩子预示着肉、水、宁静和安全，然而却始终领着他们更深地走进某处神圣的荒漠。在这片极地荒漠里，雨水比西奈山^②还少，水只能靠那无法度量的寒冷幸存在荒漠的谷底里，因为当冰川变成了水，融进大洋，8000年前的

①基督教《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先知，曾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经红海时借助上帝的威力分开海水，让以色列人平安过海，回到上帝赐予的福地。

②《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





普莱诺印第安人就设计出了独木舟，在那冰雪消融的北方的河流湖泊中旅行。总是带着饥饿，总是带着恐惧，两片极地上所有的生灵；行旅/苦旅把饥饿和恐怖绑在了一起。

雷鸣。雷鸟在狗肋骨山周围的昏暗中开口了。他面前这片开阔的水域直通那块巍然压顶的巨石。关于这石头，提纳人肯定也有故事，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有一声雷鸣，雷声回荡。害怕吗？雷鸟会对一个“偏了向的”门诺教徒说话吗？他可能偏了向，但他能握紧船桨，回头观望。乔尔抬起那张被风吹得发黑的脸，咧嘴笑了，鼻子皱起像苏姗娜的一样。在他们后面，克莉丝蒂娜和埃里克以人类那种永恒的默契密切合作，划着小船跟了上来。一时间，这里没有了蚊子。

乔尔小心翼翼地跪着的地方站起身，坐回到船的横板上，活动活动自己的腿。“看那边。”他举起滴水的船桨指着说，“急流的左边，那地方露营可能不错。”

亚当弯腰去看面前压在塑料纸下的那张航空地图。这辽阔大地上的每一寸地方都有精确的地图，上面的这条弯弯曲曲的白线发出的低沉的咆哮在明亮的晚风中发颤。他感到暖意，接着，寒气袭上他的脸，他酸疼的周身。

乔尔问：“这是岩石礁？”

“我看不像——指水下有峭壁。”亚当说。“可能很陡，我们可能过不去。”

“徒步搬运要走多远？”

“大概两三百米。”

乔尔笑了笑，打消了那个念头。“只消找块平地能把那该死的帐篷支起来就行了。”他说，又跪下身去，把桨插进水里。

在湖泊和河流的交接地，小树到处林立，有柳树、黑云杉，还有一片闪闪发亮的白桦。亚当心想，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林木线了，驯鹿留下的足迹可以作为一条徒步搬运的路线，也许还会

路经一头被狼咬死了驯鹿，皮毛发白，尸骨撕碎。我们几乎到余火湖了。在那儿，我曾决心不要怕向苏姗娜求婚。我以为我有能力看到自己的整个一生完美、圆满。我当时是多么的盲目呀！

如今，他依然盲目。依然对这次与如今已21岁的儿子一道的夏日行旅感到茫然，抱着依稀的期望。礁石、急流、冻原、永恒的波浪，甚至还有危险的动物和食物，仿佛人需要准备应对的就只这些，仿佛在雷声、雨声和瀑布声中讲述的遥远骨肉的那些苦痛，都能随着那些记忆中的亲戚一道，简简单单地结束掉，远远地抛在脑后。他俩一起呆了这么些天，他愚蠢地期望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但就在狗肋骨山露营的那天晚上，半夜过后，等他们在急流旁的石丛中开辟出一小块地方，再一次平躺在自己帐篷里的时候，乔尔问道：

“你祖父有多少个妻子？”

“哪个祖父？”亚当反问道，很不在意。

“祖母的父亲，大卫·洛温。她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都是同父异母的。”

“4位。很多妇女生孩子时死了，鳏夫们得有女人照看他们已有的孩子。通常，男人老了就有财产，年轻的女的或许喜欢这些。我祖父大卫·洛温娶了4位，都不是寡妇，昂克尔·大卫的父亲母亲是他的第一位妻子，我母亲的母亲是他的第二位。”

“海因里希呢？”

“他是第三位生的。”

“太糟了，怎么不多死几个孩子？”乔尔说道，语气平淡得让亚当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便免去一两次谋杀。”突然，他接着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苦时到了。”^①

“你说什么？”亚当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①《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6:21。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耶稣说的。之所以忧愁,可能是因为她的遭遇,这婴孩将随之带来的一切麻烦,一切痛苦和忧愁。”

行旅/苦旅;亚当试图定下心来,可他的思想好像被堵住了。接着,在他旁边,在那片能把脸庞凿成骷髅的奇怪的极地光线中,乔尔用胳膊肘直起身。

“爸,告诉我,崔茜在哪儿?我那位美丽的亲姐姐崔茜在哪儿?为什么突然见不着、听不到她了?至今,我们这个住在城郊的美满的小家庭已经分离了4年,不是因为谁死了,也不是哪个革命者帮的忙,而且你也不再当医生了,你在复印机和电脑上投了那么多的资,你能满世界地跑,有时带着我,有时带崔茜,但多数是带着你那一连串的女友,谁知道呢,可我不在乎,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姐姐在哪儿?她电话也不来一个。为什么她连信也不给我写了?”

急流中,船头溅起的水花凶猛地砸向被礁石掀起的波浪,可是,与乔尔刚才的这一段话相比,那算不了什么。

“她没给你写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在旅行。你是知道的。”

“是苦旅吧?”乔尔问道。亚当没准备要回答。“就像女人生产时的那种苦?”

“她没怀孕。”亚当愚蠢地说。

“那她是不是流浪者?”

“两个月了,她也没给我来电话。我告诉过你,就在我飞到黄刀城之前,她打过。她没给你妈去电话?”

“没有。”

“她没说过要打电话,我只是猜……她告诉过我她很好,现在在土耳其,要跟朋友一起去格雷姆看那些被掩埋的教堂,然后去希腊过冬。”顺风而来的雨水在他们的帐篷顶上流淌,最后几

段急流颤动的轰鸣减弱了。“听上去她很好。跟以往一样。”

乔尔又躺下身，朝着帐篷顶说了几句亚当知道自己必须倾听的话。

“什么，乔尔，你刚才说的什么？”

在迟疑、平静的风声里，乔尔又说了一遍。

“父亲”——他的声音微弱、清晰，好像是咬着牙说的——“总是个混账东西。”

接着他补充道：“这也是我在一本名叫《死去的老爸》的书中读到的。不过，我不该读这本书。”

他们几乎到了林木线。即使这场刚来的雨越下越凶，但明天，他们将像往常一样，把三船的东西分三次驮着，沿驯鹿依稀的踪迹绕过急流，如有必要还将在雨中步行。在水流中，乔尔将稳健地划着桨，船不会偏向。最终，在余火湖开阔的水面上，光线将变宽。他记得，那景象至始至终都在那地方。

就在这个时刻，就在他遁入疲惫和睡眠之前，亚当设法在自己写日记的纸上潦草地写道：1990年8月??——太阳还没完全下去，明天我会认出以前曾见过的那地方。

而且他也相信。



第 14 章

犹太人和门诺教徒聚居计划

1941 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吉内登索尔

1863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

教堂，除夕夜，阿爸在祷告《以弗所书》^①第 4 节第 22 到 25 句的经文。他们说，伊萨克·昂鲁夫人在遭受了 22 个钟头的折磨后最终还是和她的婴孩一起死了。她结婚有 14 年了，生了 9 个孩子，只有 4 个活下来。我知道她死了。我朋友安娜坐在我前面的长凳上哭，她是她家最大的孩子。

这是在我日记中自己写的开场白。到你 90 岁时，你自个儿写的这些就像你曾认识的哪个陌生人编出来的什么故事，或像是在看一张老照片，惟一能记起的只是照片所呈现的东西，任何人都能看见，却没真正记住。但接下来，你越久看，就越有更多的记忆开始涌回，直到你想起许多支离破碎的片段和大概的东西。但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人了。

90 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1851 年的 10 月 4 日，我出世了。当然不是生在这房子里，也不是在这村庄里，但离这儿不远。我出

①《圣经·新约》中的一卷。

生在俄国的乌克兰。诺因多夫-舒尔什奇门诺教徒的聚居地。他们都叫我卡特丽娜。我是第五个活下来的孩子，是阿伦和埃斯特·洛温的第二个女儿。

我父亲阿伦是他家第二个儿子，在前面1个哥哥和11个姐姐之后终于有了他，我们总叫他阿爸。因为只有7个孩子活下来，祖父洛温很容易地在舒尔什奇为他找了座农场，就像为我大伯雅各布选的那样，无奈阿爸喜爱读书胜过那些绵羊和谷物。他成了位乡村教师。

后来，沙皇政府开始实施犹太人安置计划，门诺教徒称之为“犹太人聚居计划”，作为殖民地的一个样板，让那些无地的犹太人在政府土地上和村庄里住下来，学习怎么种地。被认为是种地好手的门诺教徒，要和犹太人一起生活、劳动，教他们如何耕作。

因为阿爸的哥哥雅各布·洛温是个罕见的农活好手，所以他们指派他作“犹太人聚居计划”的管理员。是大伯劝阿爸做乡村老师的，而且还作为模范农夫接受了政府的一块赠地，在4座新建的犹太村之一的诺福维亚布什克。

于是，我们离开了舒尔什奇，正是那个时候，阿爸开始写日记了。不单单是记天气，记谁来过我们家，还记聚居地的艰难困苦，因为做老师就意味着总是要比那些大地主穷。每天，从坐在长凳上的孩子们的脸上，你会读到艰辛，看到村民的生活。

两年后，阿爸又被选为门诺教的牧师，这时，村子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听得到。他不仅要处理门诺教徒的学校和教堂的事情，还要解决村民之间的争吵，门诺教徒之间，犹太人之间，或者门诺教徒与犹太人之间的纷争。他听得多了，见得多了，而且不会撒谎，也没法停下笔，不把这一切记下来。他经常得找一语双关的词，褒义的——以防除了他，别的什么人会看到——还有换个角度的，好让他自己记住事情的真相。





犹太人聚居地是 1852 年开始修建的，在舒尔什奇以西，坐马车两天的路程。当时，我还不满一岁。我们在三个聚居地住过，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最后才搬到吉内登索尔定居下来，那是 1872 年专为门诺教徒修的新村，在新巴拉特夫聚居地。我在这儿一直生活到 1941 年。生活、也希望死在我们阿伦·洛温一家亲手修的这幢房子里，这村子只有一条横穿小溪的街道，溪水在春天里潺潺流过。

无论是在诺福维亚布什克，还是在吉内登索尔，几乎每个晚上，阿爸都坐在我们那间大房间的桌子旁写日记。当时，他和妈妈睡的，后来是他和继母睡的那间角屋里还没有桌子。太多的孩子，太多的衣柜，太多的床铺。他用一根被削尖的长羽毛作笔，蘸着用烟灰制成的墨水写字。我喜欢这纸，翻开的、干净洁白的纸随着弯弯曲曲的哥特体笔迹越变越黑。我在学校正在跟他学高地德语。在教堂里听到大声朗诵的是高地德语，但布道用的是低地德语，当时，所有门诺教徒在家里说的也是低地德语，甚至在牧师家里也如此。和犹太人讲话，我们用仅会的一点点俄语，大人教我们孩子们，跟犹太人讲话越少越好。他们与众不同，只会领我们误入歧途。

为了写点什么，我给自己找了些纸片。纸手感很好，摸着非常光滑。学校里，我们在石板上写字。我没有阿爸那种可以折叠、可以一行一行记日记的本子，只有一支铅笔。我是在新年那天开始的，就是安娜为她妈妈哭得很厉害的那天。我们的妈妈病得也很重，但我从没在教堂里大声哭过，阿爸也没有，当时他站在讲坛上，要孩子们为母亲祈祷。我想多写点儿，即使拼错很多词。可是我没有纸，知道的也不多。

78 年了。我仍保存着这第一张纸。像阿爸那样，我先把日子写下来。这有助于开头，把你知的事情一五一十记下来。这张纸和其他的一起放在箱子底下的一个小盒子里。一位老妇人无

需再往墙砖背后藏纸了,现在没人知道这事,也没人想看了。没人想过能像我活得这样长。我觉得,在1917年以来的俄国,也没人愿意活这么长。

但正如犹太人所说的,谁能告诉上帝该做什么?90年了,我很少向上帝告解,但我却时常向他求助。甚至于……

我日记的许多句子也像阿爸的那样结的尾,用... ein Gedankenstrich^①,这是他的叫法。有时在页边划一行,长段的思绪没法写完。或者不记下来更明智。

我在我的《圣经》里找到了父亲1863年在诺福维亚布什克祷告的话。犹太人聚居地离这儿有30公里,但大屠杀和内战之后,一切都没了。只有沿舍尔塔利亚河的一片耕地。每年开初,阿爸总是很忧郁,提醒每个人小心罪孽。但从不提醒犹太人。作为孩子,我讲不出犹太人究竟知不知道或在不在意地狱是什么。似乎在我看来,阿爸提到的门诺教徒的罪孽很有可能会把每个人活活地拉进地狱,永遭火炼,但阿爸说,跟上帝打交道,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方式。那不是我们的方式,我们有门诺教徒的责任,要像耶稣教诲的那样,诚实、笃信。

在聚居地总有一些门诺教徒认为,我们不仅要教犹太人如何做农活,而且还应教他们如何做基督徒。阿爸总说,只要我们能像耶稣那样生活,那就足以教化他们了。

因此,聚居地的犹太人来找他,只是为了那些协议,他们说门诺教徒破坏了协议,要不就是钱或财产丢了。但我们4个村的门诺教徒却带着各自的罪孽来找他,告诉他每个罪孽后才开心地离去。他越听越悲伤,但总要求多听。我读了他1月1日的祷告:“你必须摈弃旧的生活方式。从现在开始千万不能再说谎,你们之间应该坦诚,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成员。即使你很生气,也

^①德语:在页边用笔划一行,表示还有更多的思想没写完。





不得犯罪。”

我不是一体的成员。那时我还不到 11 岁，还没受过洗，不过到 17 岁时会受洗的。我有什么“旧的生活方式”可以摈弃？活过童年，不像那么多的孩子那样没有活过？我不生气。我是个女孩，排在男人、男孩和妇女的后面，位置第四，我会做饭，会挤奶，会喂婴儿——他们由上帝赐予，又照上帝的意愿死掉——就像我的朋友安娜·昂鲁一样，如今，她母亲入了土，只有 14 岁的她不得不做这一切了。我是不是必须开始什么旧的生活方式，以便到时候能规规矩矩地摈弃它？我知道些什么能让我因此撒谎？

1863 年 1 月 17 日，星期四：

迪德里克·威伯是和迪肯·迪德里克·弗朗兹一起来的。我听迪德里克·威伯告诉阿爸，说他快恶心死了，是畜牲弄的。他难过了好久。阿爸祈祷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们吧，用您正义的长袍遮掩我们，好让我们赤裸裸地站在您面前。

居住在诺福维亚布什克的有 8 户门诺教徒和 40 家犹太人。人们总是两个两个地来我家串门，要么是和他们的儿子，要么是和他们的妻子，却从来不见他们的女儿，这时候我什么也听不到。他们进来之后就关上了门，要不是我当时正在堂屋里刷洗锅灶，我是不会听到大肚子迪德里克·威伯说的话的。我蜷缩着像只小老鼠。迪德里克·威伯坐下来，肚皮顶着桌子，那个大肚子比水桶还圆。都这么大的一个人了，居然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话。我记下了这些话——很奇怪的话——藏在床下一块松动的砖头底下。是畜牲弄的，究竟是什么意思？^①

^①迪德里克·威伯与奶牛发生兽奸，这里是委婉的说法，叙述者卡特丽娜因为人小，不懂这种事。

但是阿爸那“赤裸裸地站在您面前”的祷告是再清楚不过了。在祈祷或是布道的时候，那些你真正犯下的罪孽常常反而奇妙地成了你的拯救，比如用耶稣那羔羊一样的血来洗净自己的身体，然而，在剃鸡头时鸡脖子上喷出的血却使我觉得根本不干净。因此，你可以祈祷用耶稣的长袍遮盖你，让你变得既干净又赤裸。可大肚子的牲畜却不行——当时，我搞不懂。时值冬季，大雪覆盖着结了冰的地面，奶牛怎么可能满身泥浆？要么就是浑身粘满了吃春草拉的稀屎，在你挤奶的时候它们用尾巴打你，弄得你浑身肮脏。不管怎么说，大腹便便的迪德里克·威伯从不挤奶，这活只有威伯太太和他们的女儿们才做的。那他为啥说“是畜牲弄的”？

我现在坐下来，膝盖上放着装有纸片和铅笔的匣子。我朝窗外望去，看到了聚居地吉内登索尔村的街道。每天都这样，看到的大多是树。晚上，窗玻璃映出我这张苍老的脸，因为层层叠叠的往事而皱了起来，但我还是能很容易地看透这玻璃。我不会为了照亮每一条皱纹而浪费点灯的油。

我这一生种过4次树，它们又长高了，成排成行的。在1918年以后的那些恐怖年代里，我们把它们连根刨起，放进火炉里烧了。当时有4支军队随心所欲蹂躏我们。沙皇的白军，共党的红军，乌克兰的独立军和内斯托尔·马雄^①率领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者。在3家联合起来摧毁了沙皇的白军之后，他们又互相厮杀、围困，直到红军屠杀完其他2支军队，我们所有的男丁都无一幸免，甚至还包括我的本杰明……我不会去记这些。树长了又砍，砍了又长。

我在吉内登索尔这个所谓的“圣恩之谷”呆了69年。我的亲戚们写信告诉我，说他们带着这个名字充满希望地走遍了全世

^①沙俄无政府运动的倡导者。





界——西伯利亚,加拿大,美利坚,甚至还有墨西哥,巴拉圭和巴西。剩下的事我就无从知晓了,因为元帅从1937年就开始驱除我们出境,所有的通信都中断了。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50多年。又过了20个年头才搬到“聚居计划”的房子里,其建筑风格与原来的一样。阿爸说绝大多数犹太人都不喜欢务农耕田。他们都想做小商贩或酒店店主,因为白兰地很容易销售。门诺教徒教他们如何务农,但是阿爸本人除了教书、布道和倾听门诺教徒的罪过,对什么事都没时间。

大肚子威伯真可怜。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一个大男人是从不这样的,除了在葬礼上,更何况那时他好歹也是个有妇之夫。

当时,那泪水在我看来很奇怪,很震惊,就像在深夜步行穿过学校后面那片墓地时的颤栗感一样。我记得,在灿烂的阳光下,棺材埋进泥土里,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那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实在受不了他哭泣的样子。我躲到炉灶那儿,也哭起来。

一个男人,一头奶牛。如此简单的罪孽,你也可以说是“清白、秘密”的罪孽。90年来,我什么没面对过?革命、内战、无政府主义者、饥饿、马雄的刽子手、伤寒和那帮警察。有时候,你的灵魂只求最后的屠杀来得快一点。19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艾兴福鲁德-杜博夫卡就有79个男人和3个妇女被枪杀。不知多少妇孺被糟蹋。

我也知道上帝和家庭的爱。我千万不能,也不会忘记。这么多从世界的另一端飞来的书信,都放在膝盖上的这个小匣子里。有来自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也有来自巴拉圭的芬赫海姆的。

现在战争又来了。人们说,德国发动的战争,这地球上以前无人见过。地面、天空,快得你无法想像。美丽的基辅^①被摧毁

①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首都。

了。两个月以前,8月16日,在世界上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我看到德军的第一批坦克轧过了我们的街道,驶进了吉内登索尔。在咔哒作响的坦克周围,德国兵坐在摩托车上,一人驾车,一人坐在侧座手执机关枪。圆圆的铁头盔上戴着希特勒的钩形十字架。像蚂蚁一样涌进吉内登索尔。

1863年2月1日,星期五:

妈妈病得下不了床。迪德里克·威伯午夜死了。迪肯·弗朗兹把唤命符系在妈妈身上,末端系着一个装满长针的圆柱。我跑进了谷仓。

我记得我躲在奶牛和绵羊头顶上的干草堆里。即使在黑暗中,我仍然看得见那些长针。在门诺教徒所有的聚居地,人们都用这种布劳斯彻德特唤命符,是刚从德国带来的。妈妈的兄弟,奥古斯特·威伯在德国念的书,成了舒尔什奇的医生。他称这是愚昧,但人们还是用它,因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死得太多了,有时用它似乎还有点帮助。阿爸同意让他们祷告,然后在妈妈的后背上用那种唤命符,因为她已不能呼吸。那是个很粗的圆柱,有根弹簧,你摇紧手柄再松开,弹簧就能把圆柱里的针扎入皮肤。

妈妈的后背被针扎得满是乌黑乌黑的大圆圈。她根本无法躺下。两天后,她身上到处都流起黄脓,像裹着一层臭熏熏的黄布。迪肯·弗朗兹说这就对了,因为这样可以把病魔驱除出去。我用浸过布劳斯彻德特油的棉花来帮她敷在身上,病痛会散得更快。她还是能睡觉。她咳嗽时声音更微弱。

1863年2月17日,星期日:

鰥夫威伯就要娶伊萨克·昂鲁了。大家聚在一起,13个大



人,11个小孩。安娜不需再承担家中所有的家务了。阿爸念起了《以赛亚书》中的第43句:我是你们神圣的上帝,我会让河水流淌在沙漠之地,给我选中的子民送去水源。门诺教徒被选中了,他说我们必须做个榜样,无论是婚嫁还是送葬都不能对白兰地嗜饮如狂。妈妈裹着毯子躺在那里,她既想干活又求速死。

那时,没有哪个成年人会告诉孩子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的妈妈除了有病,还有了身孕。阿爸坚持认为所有的生灵无论是生病还是康健,都是上帝赐予的一份礼物。一份厚礼。

1863年3月22日,星期五:

我们是第一批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的人家。雅各布叔叔的犹太工人帮了我们。晚饭时阿爸说75年前的今天,在1788年,在与我同名同姓的女皇卡特丽娜二世的邀请下,首批门诺教徒离开了但泽。祖父洛温那时只有8岁,他给阿爸讲了许多令人伤感的流亡故事。阿爸说,记住1788年,50个门诺教徒赶着牛车去了里加,然后又去杜布罗夫诺过冬。春天时,他们和来自但泽的1000多位教徒沿着第聂伯河来到舒尔什奇,63年以后我就在那儿出生了。

叔叔奥古斯特医生今天下午来过了。妈妈的后背好了点儿。她呻吟着,但还不能走动。

1863年4月1日,星期一:

今天米勒·亚伯拉罕·雷默躺在阴沟里。阿贝尔看见了他,并告诉了阿爸。他喝醉了,只要他想要,叶卡捷林诺斯拉夫街上的旅馆主人利庞就会把白兰地卖给他。

1863年4月8日,复活节星期一:

我们的妈妈死了。她终于和上帝、天使在一起了。亚伯拉罕·雷默赶着马车从我们家旁边的街角飞快地转过来,车子一歪散了架,马匹拖着车的前半截跑了。他们一家八口尖叫着掉到了阴沟里。在地上,雷默太太狠狠地揍他,这就是你喝酒的代价。阿爸说,在万能的上帝跟前,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也没有悲哀,只有金色的光芒。

1863年4月24日,星期三:

阿爸把我们最后的小麦卖给了犹太人斯蒂培尔,亚伯拉罕·雷默的伙伴。磨坊的纠葛是他摆平的。我和格雷特熬奶油好让阿爸和杰哈德拿到克里沃罗格的集市上去卖。我们收到了一封信,里面装有11块银币……

妈妈死了之后,我们几乎没吃了,但阿爸说慈悲的上帝会给我们吃的。我记得上帝的给予大多是通过我们的亲戚,尤其是叔叔雅各布·洛温,还有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海因里希·埃斯。唐蒂·安娜·埃斯是妈妈的姨娘。昂克尔·海因里希被称为是“普鲁士人”,因为他是作为路德教会的一员来到舒尔什奇的,与“逆来顺受”的门诺教徒生活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躲避拿破仑的军队。他比大多数门诺教徒还要热爱和平,而且他是一个仁慈和蔼、天资聪颖的老师。他创建了许多学校来培养师资,但是《旧约》经义认为他教给学生的太多了,门诺教徒不知道的话会更好。因此在他白发苍苍之时,他们举家搬到了叶卡捷林诺斯拉夫。俄国有钱的贵族们都高薪请他来教他们的儿子。他热爱俄国并用俄语为孩子们创作诗歌,在他访问诺福维亚布什克的时候还教了我们一首。这歌一开始就很有节奏,我们都会唱:





尊贵的大不列颠英国女王陛下，
参谋却都是些骗子和说谎家……

这是我最早知道的俄国单词。克里米亚战争^①爆发时我只有6岁，但是我对尊贵的大不列颠英国女王陛下还是记忆犹新，她很年轻，也很会撒谎。昂克尔·安里克·埃斯称她为“维多利亚”。

1863年5月23日，星期四：

彭特卡斯特。11个男孩和13个女孩受了洗。我们听说鳏夫贝尔纳德·克拉森想跟他第二个老婆的女儿玛丽亚结婚，他的第二个老婆已经死了。玛丽亚16岁，还没受洗。阿爸斥责我们说在人背后评头论足就是罪。委员会会把她送到另一个村庄的亲戚那儿去的。

1863年6月21日，星期五：

我们又是第一批收燕麦的人。收获不大，这个夏天太旱了。雅各布叔叔雇用了15个犹太人一天之内就收割完了。他付给每人半捧谷物，另加一顿中餐。阿爸记下了名字和号码。

在犹太人聚居地的那些年月，我们在6月份收割燕麦。今年6月我们听说德军入侵了俄国。阿道夫·希特勒，如今却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吸血鬼”。不到两年时间，他就撕毁了“永久友谊”的和约。

“虽然我们毫无准备，”元帅的声音如雷贯耳，“我们却永远不会交出一寸土地！现在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承担规定的双倍

^①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与英、法、土等国间的战争。

的工作任务。”

吉内登索尔的集体农庄是个诺大的奶牛场，这意味着要上交双倍的牛奶。那个自称爱国的共党兼工头在向东逃跑前就命令要喂给牲畜双倍的饲料，我们这些在谷仓里干活的门诺教徒当然是惟命是从。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一星期内，200头奶牛中有21头死于腹泻。人民内务委员部认为这分明是个阴谋，那些没有赶快逃掉的工人都被送上了黑色的囚车，消失了。

自从光荣的十月革命，门诺教徒就被称作德意志人种。要在苏联境内旅行就必须有一张印着“德裔”字样的护照，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外出旅行。我们当然没有说高地德语的教堂，但我们互相聊天时用的都是低地德语。当我们听说有大军正在朝我们逼近时，谁晓得应该想些什么？士兵们会做些什么？他们会相信我们是德国人吗？

犹太人比我们更会为自己着想，脑筋转得比我们快。他们开始消失。朝四面八方跑了，逃离即将成为德军前线的地方。

1863年7月2日，星期二：

今天阿爸带着自己的新妻子从诺因多夫-舒尔什奇回家来了。朱迪什·威伯还没结婚，她比杰哈德大三岁。她吻了我们每个人。现在她也是洛温家族的一员了，我们叫她“妈妈”。

妈妈是任何一个孤儿家能有的最优秀、最能干、最有条理的人。12年里她养育了6个孩子而且全都活了下来，她还一直照顾我们的父亲，直到1888年他过世。几年以后，妈妈决定举家移民到加拿大，这样或许会更好，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去了。10个孩子除了我之外，不管是成了家的还是未成家的都跟着她去了。我也很想去，但她的侄子、我的丈夫本杰明·威伯想收购我们的农场。我的妹妹朱斯坦娜1919年写信说，妈妈死了，享年79岁，





她在一个叫萨斯喀彻温的地方住了7个月零27天。死于因战争而传开的流感。朱斯坦娜写道,战争无处不在,即使在加拿大那又深又遍布岩石的灌木丛里。

1863年8月11日,星期一:

万能的主啊,阿爸说,他和妈妈星期六驱车去舒尔什奇,那儿的一个叫奥斯特威克的村子被烧成了平地。房屋、谷仓、新建的学校,还有所有的谷物和饲料。70多幢房子。无人死亡。星期天,阿爸在一片果园里念《彼得后书》^①中的祝祷文:你们是上帝选中的子民,一个神圣的民族,上帝自己的民族。妈妈说每个人都哭了。

火真恐怖,我们经历了许多场火。我们的房屋和谷仓是建在一起的,屋顶是草铺的,绝大多数烟囱是木制的。院子里还常常垛满了干草堆。但这场大火是最凶猛的一次。大地早被夏季的干旱烤焦了,中午又来了一场东风。约翰娜·蒂利斯基夫太太正在热猪油做煎饼,她爬上阁楼多拿点儿面粉,炉子上的平底锅就着起火来。她下来的时候,整个房子已经烧着了。接着是一场大风。火立即蔓延到了整个村庄。

我看了看《彼得后书》中的诗句,在末尾读到这些句子:“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②在这恐怖的时刻引用这样的篇章,我们心无邪念的阿爸怎么会这样呢?

1863年8月16日,星期六:

海因里希·佩内的母牛跑了,被犹太人斯蒂培尔逮住了,然

①《圣经·新约》中的一卷,分前后两部分,相传为使徒彼得所写。

②引自《圣经·新约》《彼得前书》(2:10),不是《彼得后书》,可能是作者的笔误。

后以抵押价卖给了彼得·泰希鲁。佩内太太气疯了，用鞭子抽彼得。还是阿爸解决了佩内夫妇、泰希鲁和斯蒂培尔之间的这场纠纷。他说他们和好了，全都和和气气地离开了。

1941年8月16日，德军雷鸣般地涌进了吉内登索尔。我听见坦克隆隆地在桥上行驶，他们来了，那些可怕的机器踏着铁蹄向我们驶来。周围的士兵开着车井然有序地注视着每一处院子和房子。但俄国兵和所有干活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剩下我们这些原来的德裔举着白旗站在门口。一位军官让司机把车开向我；他的枪对着天，我用高地德语同他讲话，请他不要朝任何人开枪。

“别担心，老妈妈，”他说。他的语气仿佛是位在学校教书的先生正在念着课本。“我们有足够的俄国人来当靶子！”

6星期之内他们逮捕了17个人，但德国兵在吉内登索尔没有枪杀一个人。一个也没有。

1863年10月3日，星期四：

阿爸、阿妈还有我赶了两天的路，风尘仆仆地来到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昂克尔·埃斯的家。沙皇的长子、王位的继承人尼古拉斯·亚历山大，坐着火车从圣彼得堡赶来。他骑着一头弓着脖子的黑马来到了波将金^①元帅的宫殿，成千上万的人高呼着“万岁”。街上的拱门灯火辉煌，看上去像是一片熊熊火海。

1863年10月4日，星期五：

昂克尔和唐蒂·埃斯带我们来到波将金元帅的宫殿，为了迎接沙皇的长子全装修了一遍。我看到了与我同名的女皇卡特

^①波将金(1739~1791)：俄国国务和军事活动家，陆军元帅，1762年宫廷政变的组织者，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宠臣和亲信，俄土战争的俄军统帅。





丽娜二世的石像，坐在公园里宽大的石制宝座上。沙皇的长子骑着一头白马，模样很帅。昂克尔·埃斯摇了摇满头白发的头，沙皇长子太瘦了，罗曼诺夫家族的人总是这么苍白，这么瘦骨嶙峋。在公园里，他边散步边唱着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为孩子们写的歌：

但俄国的沙皇很虔诚，
一点儿都不怕发怒的毒龙，
拔出闪光的宝剑向前冲……

他唱我也唱，唐蒂·安娜和妈妈大笑了起来。只是阿爸看起来很悲伤。

噢，我第12个生日。12岁。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原因就在于我的姓名和生日。妈妈说，每个孩子一生中一定有那么一天是特别不同的，日后的受洗之日和婚嫁之时不在其内。那就是我的特别之时。不到两年，英俊的沙皇长子死于贫血。或许这对他而言是个仁慈的结局——他不必看到父亲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被炸弹炸飞的一幕了。不过，他父亲躲过了前9次袭击，据说，在发生爆炸的地点又建起了一座大教堂。他的弟弟成了亚历山大三世。人们常说罗曼诺夫家族那些面容苍白的人对门诺教徒很好，但是他们都被杀了，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被杀了。可怜的俄国。

今天是1941年10月4日，星期六，我已经活到90岁了。孤独得太久了。自从1919年的无政府运动，丈夫本杰明·威伯就去了，之后，3个儿子阿伦、伊萨克和丹尼尔也于1937年被杀了，其他所有的孩子、孙子和重孙也都长大成人，离我而去了。我和两户乌克兰人家一起——现在已经逃走了——他们让我住

在阿伦·洛温家族以前建的老房子里，那是将其他村庄的部分谷仓改造而成的，那时舒尔什奇聚居地的门诺教徒们在1872年从里普因王子手里买下了这片土地，并把这个有35户人家的村庄命名为吉内登索尔，俄语叫做沃德雅那亚。圣恩之谷。我才不去加拿大，去萨斯喀彻温——管它们在德语或俄语中是什么意思——那倒不是因为我曾经不肯去。另外，埃利·斯蒂培尔住这儿。

诺福维亚布什克的埃利在父亲死后成了磨坊主，留下来的那对嗜酒如命的雷默夫妇也搬到了加拿大。他干这个磨坊主干到1928年，那时元帅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改变了整个世界。埃利·斯蒂培尔比我大一点儿——大多少我不清楚，因为犹太人在许多不必要的事上比门诺教徒更神秘——今晚埃利来看了我。

每年他都在晚上来看我一次。我们总是谈起我们的父亲。他们彼此尊重，或许甚至相互喜爱，还有他们都死了50多年了。我把装有日记的小匣子放在膝盖上，我一直在回忆。

但是今晚埃利对过去的一切只字不提。提起以前我们生活在同个村子却互不认识的孩童时代，他也不再发笑了。他说道：

“我听说，两星期以前的9月19日，德军闯进了基辅的克雷舍察蒂克。他们的将军立刻就搬进了豪华的大陆旅馆。”

不必问他是如何知道的。该知道的他总知道，虽然他们强迫他捣毁了那个大的石磨坊，因为莫斯科给吉内登索尔集体农庄下的命令只说生产牛奶，不是粮食。管你饿不饿死，那都是莫斯科的命令。在大清洗的野蛮年代里，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当内务部的人突然来敲前门、后门，或二者齐敲时，他总知道该如何离开。现在，德军的宵禁定在日落时分，他就天黑回来。我们喝着茶，关起窗，玻璃灯里还有些许的油。倘若德军的晚间巡逻队敲门，他又不见了。

克雷舍察蒂克。他在说的是基辅古时候的中心，他说这是



地球上最美丽的城市。我从未见过这座高耸在第聂伯河畔的城市。我的出生地诺因多夫村，离流淌的第聂伯河有 20 公里，但是我记得自从我们搬入犹太人聚居地后，我们洛温家的人在舒尔什奇岛上的橡树下有过两次野餐。阿爸说：“河水在我们四周流淌，它用胳膊围护我们。”那时妈妈还给我们做夹着黄油的烘面包干吃^①。是的，正如埃利所言，第聂伯河一定是最美的河流。

“上个星期三，”埃利说，“当他们全都安顿好，开心地享受洗劫来的战利品时，第一颗炸弹爆炸了。位于普罗里兹那亚街商业区的德军指挥司令部也爆炸了。第二颗炸弹像天女散花似的将大陆旅馆抛向空中，第三颗……”

“是内务部干的？”我问。

“当然了。”

“像为拿破仑烧了莫斯科那样吗？”

“不全一样。内务部没有警告过任何人，在克雷舍察蒂克他们杀的俄国人比德国人还多。”

“是啊，如果我们在附近，我们就不是爱国者。我们只配做垃圾。”

“是吗？”他边从牙缝里剔着茶叶，边看了看我。他的牙龈还是那么结实，至少前排的牙齿是。他品茶时发出嘶嘶声。“那么你在这儿干吗？德军从 8 月 19 日以来就一直呆在吉内登索尔。”

“你在干吗？”

“啊哈。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或许就是这儿。在跟一位老太太聊天，她的德语说的比俄语还好。”

“是啊……是啊，”他那瘦削且苍老的脸——这么好的骨骼和肌肤，这么些年了一直在笑着——像我父亲很久以前那样，皱

^①常用鸡蛋、甜面包烤成的一种面包片。

纹里深深地埋着悲伤。“9月22日，最后一批苏军离开了基辅，他们中许多人不带武器就跑了，两天后克雷舍察蒂克就烧了起来。大火一直把市中心烧得精光，9月29日，上个星期一，他们开始枪毙犹太人。开始他们用棍棒和枪杆子打他们，后来就把他们剥个精光，5个5个排成一行，机枪一扫他们就向后倒在第聂伯河畔的沟壑里。倒在巴比湖里。”

“巴比湖？”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

“巴比湖。记住这名字。第一天他们枪杀了7000犹太人。”
一个令人无法想像的数字。人们成群成群地倒下。

“倒在第聂伯河畔的沟壑里。”

他点点头。“基辅的每一个犹太人。但是一次5个花费的时间太长，白天毕竟只有14个小时。第二天他们一次枪杀15个，3个火枪队每隔10分钟就调一班。他们一分钟平均枪杀5行，一行5个人，每12秒钟5个，一行，还有7位带手枪的军官在沟壑里巡逻，踩着尸体看有没有活的。共有21000犹太人被杀了。”

这个数字或许比地球上门诺教徒的数目还要多。我活得太长了，世界变得难以想像。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在敖德萨和基辅，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那会儿，沙皇还活着，虔敬派^①祷告时的最后一句总是：‘上帝啊，万能的主啊，祝福你，没让我成为一名异教徒。’但现在我不明白了。我们不是异教徒又是什么呢？如我们的犹太学者常说的，‘上帝选中的子民？’”

我忍不住笑了。“哼，门诺教徒也时常那样想。我的阿爸一生都在祷告，祈求上帝饶恕他的罪过，选中他，祈祷能严格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事，活在恩典中，他被选中了。”

突然，房内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也没有。

①犹太神秘教的一个教派。





我们两个喝着茶的老人。说了许多话却没写下一个字。写下的字比子弹更糟糕。我们所了解的世间的一切就像我桌上的小油灯，一直在静静地闪烁。然而，不久我们可能也会像雅各布·维尔勒斯那样被炸死。一枚炸弹落在了这里，在吉内登索尔，来自一架撤退的俄军飞机。或许是为了击中正在前行的德军——谁知道？——它落在了维尔勒斯的房子上。穿过房顶又落在了桌子上，一家人和他们收留的逃难的人正在吃饭。一大家子被炸了个粉碎，没人知道该造多少口棺材，只知道装了满满的3个筐子。不过，还有比这一爆炸更糟的，一声敲门声还将引出更慢、更没完没了的痛苦。

埃利端起茶碟啧啧地品了几口。突然，我感到应该问候他。他一进来便在我的双颊上来了个俄式吻以示问候。我起身绕过桌子也亲吻了他。

我们一起站起来。我的双手捧着他的脸，他的双手也捧着我的脸。他那双温柔而粗糙的手因关节炎而肿胀，但却温暖有力，他那双乌黑的眼睛注视着我。慢慢地，我们笑起来。像平时一样轻声地笑起来。

“为了我，”埃利·斯蒂培尔说，“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分享上帝的爱……”他犹豫了一下。“但不知道你还行不行？如果行，你是不是想尽享这份爱？”

第 15 章

海里的贝壳

1991 年,萨努尔 巴厘岛^①

他们说,所有的生灵都来自大海。那么,理所当然,所有的生命也一定会回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亚当独自一人坐在棕榈树下,有时他也会坐在炙热的沙滩上,头上是宽大树叶遮盖的小草房的房顶;有时,他会盯着海湾远处两座直冲云霄的火山默想些什么;有时,他却听着赤脚走过的声音发呆。沿着与海滨平行的礁石边缘,缓慢起伏的海面时涨时落,墙一样的波涛时断时续地从左至右坍塌下来;海浪涌起又落下,起始与终结的地方消失在极远处,他无法看到。有时他会想,在 1987 年苏珊娜刚搬到卡尔加里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这理所当然。有时,只有一两座锥形的火山穿出云层,强调它们还是根植于大地的什么地方;肯定在那儿,理所当然在那儿,在远处或水面上。

所有的大海都是一个,而崔茜已经走了。亚当跑到了环绕巴厘岛的海边,因为他和崔茜从未来过这儿。海面上出现的生物总是不一样,而海里的却总是一样,真让人奇怪。春来暑往,海中的家族会分成易变的两半,又分成 4 份——4 年了,难道 4 不是大

^①印度尼西亚南部一岛屿,度假胜地,有“东方明珠”之称。





自然的轮回期吗?——那年夏天,在他们乘坐的从本州岛到北海道之间的班轮后面,总有些海豚一次次地穿行于船尾的余波间,崔茜好像还看见它们在船边嬉戏。她和亚当一起看着那些黝黑的、像鱼雷一样的生灵,它们来来回回地跃进轮船的航迹里,白色的肚皮拱起。有一次在加利诺亚岛边上,他见到过一群杀人鲸露出的黑亮后脊,随后大海就吞没了它们。到日本沿岸时,尽管船在颠簸,他也能看到远处跟在后面的海豚——是因为船的颠簸?——船把它们抛在了后面。船上有几百名身着蓝白相间服装的日本学生,衣服就像军队的制服一样。这时,他们都聚在了崔茜身边,想试试他们初级的英语。“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你住在哪儿?”他们围住她,她的金发在一群黑压压的脑袋之间游走。她如名人般在课本上签字,在片片纸头上签字,站在她身旁,他仿佛身处旋涡之中。他们恳求她收下一些小礼物,那是他们打算游学后带回送给父母的。没多久,几个身材苗条的女孩伸出纤细的手指,想摸摸她白皙的肌肤和金色的头发。灰白色的海豚这时仍在船后远处的余波间逐浪前行,只是无人注意。

醒来吧——是不是因为大海也沉睡?轮船会不会将它唤醒,像那些游来的生灵?4年了,他一直沉湎于沉睡,想想吧——有时他想——现在我们都成人了,我们是一家人,生活变了,我们已分道扬镳,但生活还得继续,IBM和施乐公司给我们大家攒的钱足够多了,按你的预算去上学读书,去做你想做的事,你的兄弟、母亲还有我会做我们乐意做的事。噢,对了,他现在很快乐,非常快乐——特别是吃了安眠药后才可入睡的片刻。

两个夏天前,他和崔茜游览了威尔士的月牙形海滨。在13世纪爱德华^①奴役威尔士人后留下的巨大废墟中,她和他看起来一样,都没办法全神贯注起来:自从家人分开以来,他们共同

^①此处指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239~1307),他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占领,并曾短暂占领过苏格兰。

的忧伤使他俩比以前亲密多了。当时他觉得，她时不时的低声吟唱似乎在说她是开心的。这歌声对他而言，曾经总是意味着一丝快乐，而他肯定也能带着些微快乐跟她一起唱。

“噢，是首民谣，它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转悠，你知道的，就是那旋律。”

但她的确知道歌词，至少知道一行。在阿贝里斯特威斯城堡^①遗迹的内室中，3个中世纪音乐家打扮的年轻人打开了他们的乐器箱，当他们演奏起她一直在低吟的曲子时，她突然沉默了。这时，响起了一个痛苦中透着甜蜜的声音，唱歌的是位农家装束的纤弱女孩：

有一个幽远的山谷，
一个山谷如此幽远——

“嗨！”他叫起来，“那是你的……你现在能听到歌词了。”

但她的脸却变得茫然了。霎那间，她脸上的表情就如同他们身后倚靠的那堵坍塌的墙，一堵被克伦威尔^②的大炮炸裂的墙。那一年，克伦威尔在消灭着最后一批抵抗的威尔士人，而当时，亚当·威伯正在掘土筑壕来保护但泽。落日的余辉从圣乔治海峡的海面上反射过来，照亮着她小脸上的每个细微之处，那是自她刚刚出生、他把她抱在怀里时，他便仔细端详过的小脸蛋，也是他一直所关心、一直都喜爱着的脸蛋。

“那些歌词不一样。”她说了这么一句。

“这怎么可能！”苏珊娜在电话里吼起来。

^①中世纪时建于威尔士北部的古老城堡。

^②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





但在两个月里，不管她再怎么诅咒，不管私人侦探如何帮她，她也没什么新收获，她发现的都是他已经知道的。基本上一无所获。

但他要去找的地方可能会有所不同。除了眼瞳，没什么可看的了，最后只会是酸楚的泪水。浪在坚硬的礁石上咆哮，无休无止的涛声凝在风中，成了阵阵的断裂声，潮汐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海滩。

“先生，想再来一杯吗？”他耳边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

“来杯混合果汁吧。”他并未睁眼。

急救中心当值的这几年，他有无数支离破碎的周末，他变得讨厌酒精的气味了。如果挣脱了这份厌恶，他就永远停不下来了，他会钻到桌子底下去掉眼泪。服务员悄然无息地离开了，黑色的脚在铅灰色的沙滩上褪成了白色。不用睁眼，他就能听见女儿在大声唱着没有歌词的歌，歌声飘向空中，如同火山的圆锥形山峰，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隐隐约约藏在云端。他该问问服务员：要是毁灭来临了，其实毁灭一定会来，到那时，你愿意它怎么样来？如你所知，它会是从大山坚实的肋部、总被雾霭环绕的隐秘之处来呢？还是从大海上你总能听到的地方来？大山的肋部时不时会动一动，过一两代它会耸耸肩，烈火与熔化的岩石便会朝你们扑来，毁灭是在这时候到来吗？或者还是从海上的波涛之间，从那些踩着白浪、带着恐怖的人那儿来呢？他们可是和火山一样，不会给你什么警告：一千年前，先是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然后是中国人，然后又是阿拉伯人，他们依次带来了屠杀、新霸主和新宗教，接下来是基督徒络绎不绝的侵略：葡萄牙人和罗马天主教，荷兰人和加尔文教派，英国人和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后是日本人想要毁灭亚洲，而屠杀的原因仅仅只是为了权力。每次都是毁了又建，建了又毁，来自海

上的侵略反反复复持续了千年之久,他们用大刀、长矛、弓箭、加农炮、机枪、手榴弹和轰炸机,而现在,这世界的上空又有了设计复杂的洲际导弹和原子弹。

一天天地他会坐在这儿,回忆个人的生活,掰着手指计算着。如果有一天,如果你全部的心灵都被一个消失的人所占据了,你又如何能去想、去理解发生在千百年间的事,如何能去想、去理解发生在千百万人身上的事,或者仅仅是一个家族不同分支间的遭遇呢?

毁灭的方式有无数种:砍死,钉死,撕碎,烧死,斩首,撞死,枪杀,活埋,还有淹死,地震,炸死,焚毁,被滚下的、熔化的岩石压死。渴望如针刺般无法抑制。还有分离。愚蠢。

崔茜的声音,这首歌她不会大声唱:

我将永不出嫁,
不会嫁给人家。
我将独自生活,
独自过完……

她从不逐字逐句地唱;他也听不见她那样唱。她总是用他母亲那样的高音来哼曲子,有一次是在哈勒赫城堡^①西北角的瞭望塔上。7个世纪以来,沙丘已经把城堡巨大的内墙和白色的海岸线分隔开了。他们眺望着对面的小型铁路、高尔夫球场、露宿营地,还有窗户边和墙脚下租房度假的游人。在瞭望塔上,她小声哼着些什么,卡特家族^②的什么“伤啊”“伤啊”。

①位于威尔士北部的一座古堡。

②卡特家族是美国著名的家庭式音乐团体,由以演奏美国乡村音乐而闻名,下段提到的梅贝勒、萨拉和 A. P. (阿尔文·普莱森特)等人均是其中成员。





她离去之后,所有这些碎片就漂在了他记忆的水面之上:当年,在瓦斯卡赫坎的矮房子里,跟着装干电池的收音机中播放出的旋律,他忧郁的母亲就哼唱着卡特家族的歌,卡特家的吉他手们会即兴铮铮地来上一段,接着是节奏声中一段低婉的旋律,然后是梅贝勒或萨拉的独唱,或是两人合唱,或是再加上 A. P.,他的低音会让她们平滑的嗓音变得悲伤起来,就像是有把温柔的利刃切进了肝肠之中。第二天,你会发现自己心里面空荡荡的,尽管还能难过地四处走走,但五脏六腑已经被掏空了。

让人奇怪的是,那个夏季卡特家族怎么又时兴起来了?

这儿有漂亮的棕榈树,可是,如果你想祈祷,你应该跪在哪儿呢?稻田静静地歇在山间,如同画出的邮票……无论是大山那儿,还是海洋那儿,都没有一丝毁灭的征兆,而你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有这样的征兆。你总是在希望着——信仰和爱可以保护你的心灵,只有希望才可以保护你的头脑。你不愿承认严酷的事实,但它终将会把你压碎,到那时,到那个地步,你还能祈祷吗?她不愿家人分离。为什么,妈妈?看在上帝的份上,爸爸!苏珊娜也没预料到她会如此愤怒。当他们协商春夏季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安排时,还有当他们都知道会继续分开时,事情变得更僵。无论是崔茜还是乔尔都不能完全理解,尽管他觉得最后他们还是合情合理地解决了一切。他们过得越来越独立,不需要留下什么愚蠢的精神创伤,不必为钱争执,也没有什么哭哭啼啼的事。对4个聪明的成年人而言,一切都应该是理所当然,相互平等,理由充分。尽管几个成年人有时感情也很丰富,是的,有时也会有争吵,有莫名的情绪爆发,偶尔还有些眼泪,但都有清晰而成熟的理智。不像这样。

多风的海面上没有海鸥;没有谁扔下什么东西可以让海鸥去争抢,像巴厘岛这样的天堂上没有垃圾。可是在他父亲犁过

的地上,在家乡那片翻过土的灰树林之上,盘旋着成百上千只海鸥,等着有机会来啄食地里的虫子。对他而言,父母对灌木丛的虔敬变成了浸满罪恶的包袱,必须赶紧甩掉的包袱,他得逃走。离开之后,他发现他能给孩子们只有民间传说、油画、古典音乐、芭蕾和冰球。女儿熟睡的身躯躺在他臂弯里时,他随着勃拉姆斯^①的旋律摇着她,还有深沉却有些含糊了的(对他而言却如此美妙)俄式和声。哥萨克人^②歌唱他们对信仰的追求,歌唱他们身处异乡、远离故土的苦痛,那苦痛之深,使他把唱片都砸了。但女儿那小小的脸庞,还有那纤细的手指弯曲着贴着脸,还有他记忆中她的哼唱:

我将独自生活……

独自过完这一生

梅贝勒·卡特唱这些词时像一根绷紧的弦;他的大脑在躲着剩下的歌词。在皮卡迪利广场^③上一块可口可乐的标志牌下,他找到了卡特家族的唱片,就是那首崔茜在阿贝里斯特威斯城堡时哼过的歌,但以后再没唱过了。

他找了她几乎整整一年,现在他注视着每一群人:城市中这么多的人,成千上万、数以百万计的活生生的人。如果他站在多伦多的影岛或布鲁尔街,或是在东京饭丰山地铁站的早稻田天桥上,或是久久地坐在伦敦莱斯特广场上的餐厅窗户旁,他毫无疑问会看见她:有这么多的人,其中一个一定是她。

①德国作曲家,代表作有交响乐四部、合唱《德意志安魂曲》等。

②北欧部分的俄罗斯和亚洲交界处的一种人,以其骑兵,尤其是沙皇时代的骑兵著称。

③英国伦敦一个有着戏院及娱乐中心的繁华区。





有时他确实看到了她，即使是在雅加达和新加坡那黑压压的人头中，即使是在利马、吉隆坡、圣保罗那令人难于辨别的面孔中：一个轮廓，一个闪过的背影，一件夹克或是一缕金色的头发，还有侧身而过的肩膀，他的心会因为某种失望而发颤。那最先与她样子不符的细节总会把他的希望碾个粉碎——走路的姿势不对，腿或鼻子不像，手太大了等等。跟她同一天出生的有成千上万的人，而她只有一个，他要寻遍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找遍每一个人，他感到不幸，但他要找到她。他意识到了，从她消失以来，除了那些跟她长得有点儿像的人以外，他眼里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其他人。可有一天，他最终不得不告诉自己，她已经消失了。那天，他有意地穿过埃德蒙顿花园，那儿有许多年轻女孩在跑来跑去地玩着，也许是在玩曲棍球，而他无法从她们身边走过，他蹲在一棵树下——她们跑着，大声笑着，如果她在她们当中，他是绝不会漏掉的，可她们全在。一个女孩走过来碰了碰他，用他熟知的那种女孩子的轻柔，他几乎没办法拒绝她。

但是，在皮卡迪利广场的商店里，当他把耳机戴到头上的时候，他找到了那些歌词。它们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无论他走到哪里也摆脱不掉：

深水中的鱼儿
从我头顶游过。

所以他再一次来到了海边，是爪哇海。他从没和谁来过爪哇海，既没和家人也没和情人。不是秘鲁。在秘鲁时，有一次苏珊娜和小乔尔安稳地坐在火山圆石的旁边，看越过太平洋的海浪像山一般翻滚过来。海浪急速地冲刷到海滩上，无论是崔茜孩子时的小腿，还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他，他们都跑不过海浪的

速度。不是科帕卡巴纳^①。在科帕卡巴纳,海底暖暖的逆流嘶嘶流过,被突出的悬崖和显眼的建筑物所挡住。不是圣胡安^②。那晚,圣胡安旅店的窗下有海浪的撞击声和嘶鸣声——那时他仍去参加了医学会议——崔茜经过长时间的飞行后筋疲力尽,“我要睡觉,爸爸,睡觉。”不像那些美丽的大海,这里的大海不会让他想起她。

每年,她都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像爬在一块石头上一样。他给她换掉沾满屎尿的尿布,还把她放在小摇篮里,抱在胸前满屋子溜达,身边响起的是韩德尔、维瓦尔第^③、克里族的鼓声和舒伯特的乐曲。就在两年前的夏天,她领他穿过了哈勒赫^④、卡那封、博马里斯、康维、路德兰和弗林特每一间要么整洁、要么凌乱的大厅,还有那儿的墙缝。他们去了博马里斯两次,因为它修建得如此对称,保存得如此完善,虽然它在历史上没有多大价值。还有被摧毁了的阿贝里斯特威斯城堡。在夜雾笼罩下,他们走到那儿,可白天他们又神差鬼使地去了一趟。要是他们没有再去的话,就永远不会听到那3个音乐家的歌声,只会看见经历了300年岁月的草坪,还有照耀在炸碎了的石块上的阳光——瞧,我们的祖先亚当会教威尔士人,如何只用泥土来抵挡炮弹。无论他们去哪儿,她对精神的、家庭的渴求一定越来越强烈,他该死的眼神哪儿去了?

但在那些城堡间,她却是那么敏捷,迅速,还有她的笑声,最亲爱的上帝!他是多么渴望看到她这样子,4年了,哪怕是一点点痕迹,听,她终于哼了,哼起了一首歌!

①位于巴西的度假胜地。

②波多黎各的首都及最大城市。

③安东尼奥·卢希奥(1675?~1741):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以充满活力的协奏曲而出名,尤其是一组小提琴协奏曲《四个季节》(1725年)

④哈勒赫和以下提到的卡那封、博马里斯、康维、路德兰和弗林特等均为威尔士当地的古城堡名称。





当时,在阿贝里斯特威斯城堡里,那些中世纪打扮的歌手们开始唱的是同样的调子,“有一个幽远的山谷……”她停下来。“那些歌词不一样。”她说了这么一句。她曾哼过那些忧郁的曲子,却从未唱出过歌词,而那些歌词现在却在他的记忆里盘旋。

海里的贝壳啊
是我死后的居所;
深水中的鱼儿,
从我头顶游过。

他这大半生住过的空旷草场和大草原总被比作海洋;大地,天空,大海和歌声:大海一定在某个地方留着她。

他们最后一次共同旅行是到荷兰的弗里斯兰海滨,那是威伯一家门诺教徒开始创业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低地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是如何让大海慢慢变成了土地。

“冬季里的暴风不错,它们让陆地露出了海面,”一位年轻的弗里斯兰向导认真地说,“狂风把泥水堆在海边,还有——”

“风怎么能做到呢?”崔茜打断了他的话。

“当然是冬天那不断的寒风,日复一日,”向导在11月刺骨的寒气中说着。他带着口音的话飘荡在风中,寒风把他们的头发都吹到了眼睛前边。“那是风对水的摩擦作用,摩擦力把水向堤坝和滩地的斜坡上推去。我们把堤坝以外的地方称为滩地,一旦风停住,水自然会流回去,那便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滩地上种上一排排歪歪扭扭的矮柳树和芦苇,水一流走,水里的淤泥就会沉淀下来,淤泥在柳树行里会越积越多。你看见了,日积月累泥土便留在了这儿,成了陆地。”

就像风中的雪会被草原上的灌木和篱笆留住;但在这里,水

就是风，而故意伸出的树叉是为了留住流动海水中的泥。不经意间，充满泡沫的海水里露出了一条又细又长的垄和沟，海水不断在它上面冲刷。

“所以经历二三十年的光阴之后，腐烂的柳树会像那边的那样被覆盖起来，然后海草生长有了足够的地方。海草会留住高潮时的泥沙，暴风雨带来的洪涝甚至更好。然后，很快就有了羊群，你瞧那边，羊在吃草。这儿只有冬天才有非常大的暴风雨，你看，这土地还在增加。当然不是盐碱地，盐分已过滤出去了。”

她正透过年轻人的灰发斜视着海上的光。“这里一行行的都这么……笔直，”她说，“都是直角。”

“工程师说直线排列能最有效地拦住泥沙。”

海上的光像她的嗓音一样冷冷的。“但如果这里的海水有太多的泥沙，那一定是从其他地方冲来的。”

“对，当然了，海水总会在某个地方冲刷，但也从海底深处——”

“还有海水要比陆地多，最后就只有海洋，到处都是。”

“是，”他大笑起来，有些诧异，“有这么多大块的土地，还有群山。”

“最高的山脉总是最接近深海，喜马拉雅山与三达海沟和菲律宾海沟，安第斯山脉与智利海沟，整个地球会……”

亚当和那个苍白的年轻人在注视着她；他想起他当时在想些什么，我们把她的名字起错了，她才是个真正的门诺教徒，总是如此文静可爱、举止端庄，但她会在你不经意时狡黠地设下陷阱——噢，苏珊娜，我到处都能找到祖先，我们能再重逢吗？——看着真正的门诺教徒崔茜在冰冷的海风中弯着腰，他眼里的泪水不仅是因为有海风。糟糕的决定。

崔茜说：“一定会，当海水摧毁了世上一切土地时，整个地球会在水面以下 200 英尺处。”





那年轻人轻声答道：“那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里——”他朝下伸出手，如果她是那种任何男人都能轻易触摸的女人，他那时可能会抓住了她的胳膊——“这里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来自深深的海底。”

他的手指抠进泥泞的粘土里。他们站在一行被埋起的、交叉相错的柳树上，翻成田埂一样的淤泥延伸到远处，延伸到几乎是无法分辨的灰暗海洋的边沿。

“很多贝壳，很多很多的骨头，都磨成了碎片。”他说着，把一团泥像一页纸一样铺展在了手心里。

他手里什么也没有。记忆中她最后的声音是——“我在帕特雷^①，我要乘船去亚得里亚海岸。”——然后就什么都没了。1990年11月16日以后，她的银行账户上就再没取出过一分钱。无论怎样，她从不给他写信，也从不寄张贺卡，只是偶尔一声甜美的“嗨，爸爸”突然让他知道，她还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苏珊娜告诉他崔茜曾对她说过的话，苏珊娜仍旧在卡尔加里，还在她自己、亚当、崔茜还有乔尔之间互通着信息，无论他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有一次，亚当在罗马的街上打电话，苏珊娜从梦中醒来抱怨道，“上帝啊，我成了一个卫星通讯器了，现在是凌晨4点，1小时前乔尔刚从墨西哥打了个电话，我要找台机器让你们互相传信！”

但那时她并没那样做，现在也一定不会那样做，崔茜已经离开一年了。

“嗨，接线员，给我接天——天——堂，”在威尔士时，她用卡特式的鼻音熟练地唱着：

^①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岸一地名。

因为我知道，我奶奶就在那儿；
那儿有天使在等候，
等候在金梯上！

“歌里不是‘奶奶’，”亚当说，“是‘妈妈’”。

“我知道，”她说，“但妈妈还没跟天使们在一起，是奶奶。她每一秒钟都在‘上面’看着我们。”

“求你了，别胡闹。”他央求她。

“也求你了。”她说着，要走了。“行行好，拜托了。”

最后，他注意到了她慢慢积聚起来的悲伤。他们刚开始一起旅行时，他还没意识到，在他们的家庭破裂之前他也从没注意到——或许他那时太笨了，而她年龄也还小。明天，10月25日，她应该是26岁零3个月大了。

“18岁就够了，女孩子该嫁人了。”他父亲总这么说。在加拿大，这句俄国门诺教徒家传的至理名言常常是没用的，更是糟糕的。

3个星期前，就在他要再次逃离空空如也的埃德蒙顿^①的前夕，在他穿过拥挤的音乐会大厅时，他认出了一个背影，是个跟他有工作关系的熟人。他知道他妻子因为癌症快死了。他已经知道这事好几个月了，但总能轻而易举地躲着他，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突然间他来到了他身旁，拍了拍他，弗雷德迅速转过身，他们拥抱在了一起，他们身处在音乐会中场时闲聊着的人群中。“我一直都在想着你的事，”亚当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在想着你的事。”大厅里有小提琴在演奏，奏出些莫扎特音乐的精致韵味。弗雷德在说一种显微镜，他详细地解释着，他说这种仪器就像橡皮管头上有一只眼

^①在埃德蒙顿他既无家人也无亲戚，他孑然一身，因此对他来说这是座空城。





睛,医生用它就能看到放大的癌细胞,他用手指在肚皮上的白衬衫处比划着,就在那儿插进去,他们已把所有的全切除了。可那却是肝脏,手术刀也没办法。我知道,亚当说。

他们似乎很满意地站在一起,发现谈这件事要比谈冰球比赛容易得多。在这大厅的嘈杂声中挤在一处,他们看上去像是一对亲密又能相互理解的朋友。亚当还记得他在弗雷德耳边亲了一下。他还记得,他们互相拉着手,谈论着那些清晰的事实,那些支离破碎、医疗方面的事,假如再说得快一些,那些事不会有什么别的寓意。

现在他想起来了,他俩都提到了“神迹”,几乎是同时,那个既老掉牙又极不常用的单词从他俩的嘴里脱口而出,仿佛按照逻辑,这个词早已潜伏在那儿,就等到他们在嘈杂的大厅里给说出来。

他一直在寻找神迹。最后他知道,不出现神迹的话,他不会找到她。在那个反常的冬春季里,他还是没法不去想,他把笔记本、文件资料、大使馆和政府的报告整理在一起,还雇了警官、翻译和私人侦探,他寻遍了亚得里亚海岸,从佩特雷^①到杜勃罗文克,到斯普利特到的里雅斯特,甚至漂洋过海到巴里和安科纳,不用说威尼斯了。在冬雨中,那儿是一片无数凌乱的岛屿,在有确定的历史之前和以后,数以千计的岛屿和港湾被人居住,又被人毁坏。山坡上爬满了一排排的房子,到处都是有同情心的或是善解人意的人。虽然这些睁大眼睛看着他的人们会说二十几种不同的语言,但却都只是说没有,从没见过,没有。那些石灰岩的悬崖峭壁,无论在雨中还是在无情的阳光下都闪耀着白光,四处的石灰岩被海浪冲得掉入大海中。

他记得春天晚上那道低低的光。或许就是它,他还记得他

^①佩特雷、杜勃罗文克、斯普利特、的里雅斯特、巴里、安科纳和威尼斯等均为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名。

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掉转租来的小汽车离开海滨公路，穿插在田间的蜿蜒小道向上行驶，田地是在隆起的岩石中开垦出来的平地，一座用墙围起来的小村庄突然出现在那儿。沙滩和深蓝的地中海海水在下方闪烁，远处地平线上的大海好像在洗刷着天空。他走出来，锁好汽车——他知道这没什么用。他有两次都被洗劫一空。所以，所有重要的东西他都放在衬衫下面，放在各种各样带拉链的口袋和背包里。他步行到了村庄。在刷白了的巨石间，四周是围墙的街道非常狭窄，若是有人跟他一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一个跟着一个走了。

他没遇见一个人。凸凹不平、尚未被磨光的鹅卵石似乎是昨天才堆在地里的。石头领着他步入了黄昏的微光中。一定是晚饭时间了，透过敞开的窗户，他能听到锅碗瓢勺的撞击声，窗户太高，他瞧不进去，但夜晚的凉意却可以进去。他感到皮肤在经过整天的暴晒之后轻松了一些。然后，转过一个墙角，他看到了下面远处肯定有人暂时过往的地方，他正走着的这条窄街在那儿与另一条交叉了。当走到那儿的时候，却还是他一个人。

房子与房子之间有一个极小的交叉口；又细又窄的街道从5个方向汇拢过来，形成一个鹅卵石铺就的圆形场地。亚当穿着凉鞋的脚趾头顿觉凉爽了很多：就好像其中一条放射状的小街从海面那儿引来了一阵风似的。

“我能给你照张相吗？”

过了一会他才明白，有人在跟他说话。在听了几个月自己不懂的语言之后，他听到的是一口地道的加拿大英语。墙角处站着一个矮壮的男人。亚当意识到，跟他讲话的一定是这个人。一架四四方方的照相机——真是木头的吗？——那相机对着他，黑布的一角遮住了那人的臂膀。

亚当说着，想把他赶走，“这儿照相太暗了。”

“不。”





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在他沿着无边无际的海岸寻找时便一直跟着他，渐渐地把他推入了绝望的深渊；他猛地站直身子，瞪着那人，或许还想骂人。就在他要迅速转身离去时，他看见木制机箱中心的那个镜头闪了一下。

那人伸出左手，递上一张纸。

纸是张照片。亚当看见自己的黑白全身照，他站在街道上的房角之间，刚才他就是沿这条街道来的。他毫无戒心的表情很坦率：像往常一样，他又走神了。但是，在同一水平线，在他肩膀上方，他影像身后的石径上还出现了其他的什么。夜晚中，他往下迈了一步。在照片上，有一个很清晰的身影在他身后，一个修长的身躯，纤细的胳膊和腿正要伸进水中，还有金发——的确是金色的长发！他看得越来越清晰，头发在她身后平铺开来，盖着她那裸露的雪白的肩膀，还有黑色的泳装，她在那儿！她在狭窄村庄石街下的海中畅游。

世界一下子变得如此黑暗，他身后的街道都几乎看不清了，但街上的确还是静静的，还是空无一人。他只能站在那儿，几乎无法呼吸了。

那人站在他身旁，瞥着亚当手里的照片。“不，”他又说了一遍，弓着背好像要钻到墙里逃掉，“不好，不好。”

她好像是在他身后和头顶上那层叠的岩海里游动着。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拍。”那人在谦卑地、自相矛盾地道歉。他脸上堆着痛苦的神情，声音很轻，好像是在乞求上帝饶恕他一样。

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悬崖峭壁上，像这样的村子有成千上万，亚当原本从没打算来这儿。他得去的里雅斯特，去渡船停泊的港口，去那儿询问那些守着轮渡跳板的官员，车钥匙只消一扭，汽车就会立刻把他带去那儿，总是把他带去那些令人失望的地方。但在这儿，这张照片就在他手里。

“她在哪儿？”他急切地问道。要是他有把刀，刀现在一定已经架到那人脖子上了。

他转身环视着街道，然后又转过来，伸出双手要抓住那人，但那人已经消失了，照相机也不见了，照片从他手里滑落下来，在那些白色的建筑之间，只有渐渐浓重的夜色，卵石一圈一圈地铺在脚下。在狭窄的交叉路口处，亚当跪下双膝搜寻着，他的双手拂过每一块石头，而后，他沿着车轴般散开的街道上一条条地找过去，最后跌跌撞撞，挨家挨户地敲门。他没法替自己解释，他做着“闪光灯”、“照相机”的手势，然后是“拍照”，但似乎没人能懂他的疯样子。他在车轴般散开的街道上奔跑，直到找到通向他车子的那条路。他开车驶向里耶卡，找到一个会说点儿英语的图书管理员，然后又赶了回来。但是在石头之间，手电光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村民们坚持说他们从没见过什么木制相机，更别提一个会说英语的矮壮男人。在他们门口暗淡的灯光下，当翻译的图书管理员像村民们一样看着他，脸上一副彻底茫然的表情。

他站在爪哇海里的一块礁石上。珊瑚礁出奇疯狂地四处生长，在他的双膝周围反射着一圈圈粉色的微光。可能是他穿着夹趾拖鞋的双脚搅起的涟漪，有一只紫色的海星趴在沙滩上。透过海水，他看到自己的脚趾接近了那海星，越来越近，一下把它翻了过来。扬起了些流沙。现在它肯定是头朝下的，可还是一动不动：在突然的翻转之前，它一定是蜷缩成了一团，把自己的嘴保护好了；或许它一生都是这样，在绝望中等待着这个突然出现而且残忍的加拿大人。

五脚朝天的海星一动不动。亚当移开视线，望着空旷的大海。他没有看波涛或高山投下的浅影，而在凝视海天相接的一线。慢慢地数着。目光第三次往水下瞥的时候，他知道那海星最





上方的左腕准备卷曲了。往下。第十次时,他看到在小水涡的帮助下,那海星的右腕也折了起来。11分钟之内,那海星几乎把它的另3条腕都折在了自己的身体底下,然后,涌起的波浪把它直直地掀起来,翻了过来,平了。

他臀部四周的海水在哗哗响着。翻滚一下还不行。再来一下。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镇,他躺在古老的胡苏姆旅馆的床上,这里就是伯尔·施笃姆^①创作《白马骑士》的地方。他正在读的新版小说里有很多剧照,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里的画面。崔茜穿过两个房间中的门,坐在他床边。他给她看画上那匹强健的白马,而她只是点点头。在瓢泼的雨中,它正在水渠边饮水。

“你知道我不喜欢马,”她说。那时,她还没为旅行把头发剪短。

“乔尔也不喜欢。你怎么啦,艾尔伯塔人和你都不喜欢马。”

“你也不喜欢啊。”

“那些是我们家养的不中用的老马,我得骑它上学,但这是一匹漂亮的白马。”

“要是大海能造出陆地,”她说,“我们就能沿着海岸修堤坝、建滩地、开荒地,一直开到北海海岸。”

但他的思绪沉浸在施笃姆那铿锵有力的德语里,还有那天他们站在高高的堤坝上看见的新拓出的大片土地,那些地就像是波涛汹涌的海中驶出的艘艘船只。后来,她又说了一句:“要是你觉得你能读《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来追溯所有的祖先。”听到这话,他才明白她谈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①德国作家,著有小说《茵梦湖》和《双影人》等。

“什么？”他问道，不大明白。

“你应该去海牙，去马克姆，去安特卫普，还有弗里斯兰岛，去威伯家族创业的地方，去他们被烧死的地方。”

“我们要去哈灵根，”他很快插了一句，“下次，还要去但泽，我保证。”

“那俄国呢？”

“当然要去。告诉你，我得说服我堂弟带我们参观去奥伦堡，但他还是很害怕。”

“现在是戈尔巴乔夫^①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小彼得曾被抓过3次，你不能怪他——”他停了一下，突然高兴起来。“你想和我一起去俄国吗？”

“不，”她说道。她靠在旅馆窗户的窗帘，他看不见她的脸。

“对不起。”她突然说道。

“为什么？”

“嗯——”她挥挥手，像要把他们在说的事挥到一边。“你说有位祖先叫阿德里安，他们从哪儿想出的这个名字？从亚得里亚海？”

“或许是拉丁文，”他有些困惑地说道，“我不知道它的含义。”

“没事……对不起。”

对不起。一分钟之内讲了两次，她是很少道歉的。

亚当想起那个为他们解释“滩地”的人，那个皮肤白皙的弗里斯兰年轻人——或许他就叫阿德里安——如果他还能在灰暗的海上找到他，他们可能会弓着身呆在一起；在一起时，她的手指接受了他递过来的小块稀泥，他们还会把滑溜溜的手握在一起。“到下个世纪，”阿德里安会这么说，“我们要在这块曾经仅

^①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对内推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主张对话。





有海水的地上种小麦。这块土地上会长出一切。”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逃亡。

但是很明显，她并不关心什么硝烟战火。她手里塞满了贝壳、贝骨头之类的东西，她在用纤细的手指把白色的圆贝壳捏成碎末。北海的海风吹拂着她的秀发，头发又长长了，飘在她脸上。

“那最容易做了，”年轻人说，“尽量把滩地修直。当然，海水总把它冲弯。”

“崔茜？”亚当问，“崔茜？”

但她没在听他说话。或许她正在笑，像门诺教的小天使一样。

涨起的潮水中，亚当依然站在礁石上。他身后的远处，岸边狭窄的沙滩融进了棕榈树的黑影中，融进了饭店高塔的影子里。枝繁叶茂的山林衬托着白色的饭店，林中是昆虫、鹦鹉和猴子的叫声。但他把脸扭到一边，他在看着前方平静、反光的海面。他轻轻低下头时，下额和鼻尖可以碰到海水。他的身体，他的双腿，他穿着凉鞋的脚折射在珊瑚丛和左右摇摆的海草间，像切割的水晶一样清晰。在这个光彩夺目的奇幻世界中，此时此刻，会动的生物看起来却一动不动，虽然他眼睛睁得很大，却丝毫也辨认不出。随着时间流逝，大海自然会揭示一切。只是亚当必须知道，在何时他应该这样俯看它，记住它。

第 16 章

西伯利亚之行

1945 年，东普鲁士 诺加特河上的马林堡

我出生在 1903 年 1 月 28 日，星期天，是在巴拉特夫聚居地当时的一个名叫吉内登索尔的村庄里。后来，约瑟夫·斯大林元帅决定把这个国家叫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叫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威伯，我母亲也叫伊丽莎白。她告诉我说，生我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有真正伸展开。她说她流了 7 天血、发了 7 天高烧才活着把我生下来。但是她活着又生了后面两个更难生的儿子，伊诺克和阿贝尔，在这之前，妈妈出血流产过好几次。

我记得母亲总是柔弱苍白的样子，她就像是从秋季果园飘到房里来的一缕晨雾。在她那些被她称作“我那种日子”当中，她会头朝墙躺在床上，慢慢地呼吸着，轻柔得连身上的毛毯都不会动。她秀美的头发披散下来，让我心里充满怜爱，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唱着一支歌，那种幸福是在我看着她美丽而憔悴的脸庞时没法完全体会到的。

我知道我父亲亚历山大·威伯也能感到她的美丽与痛苦。他曾用工作室的大照相机给她拍过照片。在最好的一幅上，她斜着身半跪在一把椅子上，她的左腿要比压在身下的长裙长一





倍。她双臂交叉放在椅背上，散落在身后的几缕长发垂到腰间，而垂在胸前的头发把镶有花边的罩衫都遮住了。她看着右边，平静得如同身后挂着的油画背景布上的玻璃杯，她抬起的眼睛仿佛在期待着天堂上的美景。是的，它快来了。她的嘴唇敬慕地微微张着。

直到我当了一名护士，我才知道她患了子宫脱垂，而炎症和小产也破坏了她的生殖系统。在她那个时候，许多女人都要承受这些；她47岁就死了。1931年，正是元帅的货车开始拉着“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北上到沃尔库塔^①的时候，正是送他们到那儿的矿井和森林去被奴役至死的时候。我们以前不知道沃尔库塔这个名字，但是，很快这个名字我们提都不敢小声提了。或许那时是父亲残缺的右臂救了我们，救了我们全家免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逮捕。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个为政治警察起的古怪名字，我们把他们叫做“格伯乌”。要真是少了的右臂救了他，他总会说就算是丢条好的胳膊也值，起码全家都不用坐上拉牲畜的车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但他也总说，我们母亲的痛苦确实也救了她，没让她生更多的孩子。他说女人生孩子就像男人服兵役，都很危险。他感激上帝赐给了他们三个强壮的孩子，而且一起相亲相爱地过了27年。

“还有她所有的患难？”我问他。

他沉默了，突然他独臂一挥，便把我的问题甩在了一边，似乎我的问题比一只苍蝇还卑微。他的右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齐肩给截下的，当时他正背着一个俄国兵往安全的地方撤，一颗炮弹打穿了他的胳膊，把俄国兵打死了。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②这是他最喜爱的

^①前苏联位于欧洲部分北极圈内的一个城市，为容纳30年代的大量劳改犯而建。

^②引自《圣经·旧约》《约伯记》(5:7)。

《圣经》中的一句。“在俄国你听说过有谁没有受过难吗？”

我把少年时的日子记得很牢。“在我14岁前,在你不得不去打仗前,我们从没受过苦。除了她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一直不错。”

“我在说的是有生之年,我们不是约伯^①,我们只是门诺教徒,我们不与上帝争论。”

我的父母都是威伯家族的人,正如他们取笑我的那样,我是一个“双威伯”,我的名字是根据我祖母、外祖母的名字起的,但我只认识她们中的一个。我的中名^②自然是公主啦、纯洁啦的意思,但第一个的意思是“献身上帝”,而我也终生未嫁。我15岁就当护士,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十月革命的时候,受伤的人多得顾也顾不过来。我很快意识到,干了护士这行,我就可以不用呆在集体农庄作苦力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看起来是诚诚恳恳在“为上帝奉献”,在照顾着他人。作为一名门诺教徒的单身妇女,不管看上去有多么不幸的原因,我都没能献身于对女性最崇高的召唤,其中最危险的也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了。都42岁了,我好像还在奉献,真是公主,真是纯洁。

1945年1月,看来马林堡所有的德国人都离开了。马林堡曾经是波兰的,或东普鲁士的,可能现在又是波兰的了——在战争期间,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国家,过一两天又在哪个国家,战争期间是绝没时间去想“这儿”是哪儿的。晚上,东南方的地平线上闪着光,无边无际的火光中是阵阵尖厉的声音。人们可能会觉得,这隆隆声是漫漫夏夜一场不寻常的暴风雨,但是今晚地面上有的是积雪,现在温度是零下25摄氏度,我们知道这道光是“游牧部落”——这是德国人的说法——是苏联红军逼近

①基督教《圣经》中的故事人物,历经磨难仍坚信上帝。

②该章主人公名为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威伯,“伊丽莎白”源自希伯来语,意为“上帝的誓言”;“卡特丽娜”一名为“凯瑟琳”的变体,源自希腊语,意为“纯洁的”。





的信号。借着西伯利亚的严寒,加上美国的钢铁,他们正把德国的国防军杀得节节败退,希特勒那疯狂的命令也失了控。

古老的马林堡已经设了路障,四周是阻挡坦克进攻的壕沟,那是饥饿的俄国战犯用手挖出来的。替国防军说话的党卫军军官们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城堡附近城镇的人们说,红军永远也不会闯进这片国土,他们一到诺加特河东岸就会被遏制住,因为按德国贵族的命令建造的巨大堡垒,700多年来抵抗住了任何围攻,它过去没有、也永远不会被劣等的斯拉夫人占领。我可没去提醒他们,让他们不要忘了瑞典的古斯塔夫斯,或是拿破仑曾打到这儿过(他们被认为是基督徒,也多多少少算是金发碧眼)。我只管在冰雪覆盖的大坝上,从磨房流过的水沟处尽力装满两桶水。我提着水桶,绕过蜿蜒曲折的反坦克沟,回到米伦格拉大街34号。我一到楼梯口,门就开了:埃里卡修女在那儿,她微笑着把手伸向一只沉重的水桶,于是,我走进了马林堡门诺教养老院温暖的气息中。

我们的房子就在城堡干涸的护城河和石头城墙外面。是幸运还是不幸,时间很快会告诉我们。因为被当地的纳粹地方官和国防军骗了,我们没有像其他德国人和门诺教徒那样,他们已经向西跑掉了(有波兰人和俄国战犯为我们干活,他们害怕即将到来的占领者,甚至比对纳粹的憎恨和害怕还厉害)。

在最后两天里,我们向主管撤退的当局求了3次,告诉他们我们照顾的有13个老太太和1个老头,其中有4个相当虚弱;求你了,我们求你了,用卡车或马车带我们走吧,或是帮我们送到火车站,或坐上牛拉的车也行,这样我们就能逃到西部,越过遥远的奥得河到达德国,让我们赶在大批逃难的人塞满所有的交通工具之前吧。纳粹地方官坚持说他永远不会违反现有的命令,他还对我叫嚷,说红军会被挡住,会被赶回去的,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是间谍、是可鄙的叛徒吗?

他那双受惊的小眼睛瞪着我；他甚至像他疯狂的元首一样留起了小胡子。自从1943年11月29日以来，我就没用俄语说过话。那时，从快撤退的国防军前面，我和其他门诺教徒都从乌克兰逃了出来，我在又被德军占领的瓦尔特成了一名德国公民，还给我发了几张德国少数民族的身份文件。只有埃里卡修女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她说她默默地感谢了上帝。

第二天，1月25日，我们的防空机枪还没来得及赶走它们，两架俄国飞机就俯冲下来，往马林堡扔了4枚炸弹。一枚落在纳粹地方官的办公室旁，他开始大叫起来：“全体平民撤退！”他冲在了其他人的前面，因为有谣言说，他3个星期以前就将戴姆勒汽车和情人“打包”好了。国防军的军官们让埃里卡修女相信了，他们不会扔下任何一个平民（他们确实很有经验，5年多的战争，加上从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向后撤退的3000公里），不必担心，绝不会扔下一位老人。但是，尽管有无数各式各样的车辆经过我们门前，还有无数疯狂叫喊着的人向西边的大河逃去，军官们却没有带来任何交通工具。

今天正午，我们看见了最后一名德国兵，是1月26日。战斗机和炮弹在空中咆哮，轰炸机嗡嗡地向西飞去，甚至都没有一挺高射机枪的声音了。3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走在肮脏而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这时，埃里卡修女和我为了防止着火，正在摘下窗帘。

“你还在这儿？”其中一个对我们喊了起来，还用他的机枪摆了个姿势。“快点走吧，红军就在后面了。”

“求求你了！”埃里卡修女叫道。“求求你了，上帝是慈悲的！给我们辆卡车吧，一架手推车，什么都行——我们这儿有14个老人，他们连这条街都走不过去！”

他们3个难过地看着我们，但他们都没停下，甚至没犹豫。最年轻的那个走过去时还举起了右手，他手掌向上，五指分开；





那不是行给希特勒的礼。

“耶稣基督，”他说，起初我还以为他在诅咒，但后来我明白了，他在说“昨天与我们同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

“阿门，”埃里卡修女祈祷着。她转向我。“我们得把他们转移，藏到楼下弗罗·海因里希的房间去，到防空掩体后面。”

我们晚间的祷告只能用她的小本子《圣经》：其他所有东西都在楼上房间里，我们不敢去拿。我们16个人在房间里围成一圈，14个坐在椅子上，有最年迈的唐蒂·热特吕德，90岁了，还有最虚弱的昂克尔·乔安娜，74岁了，他斜靠在沙发上。街上的装甲车在开着火，砰砰声和嘎嘎声响个不停，窗户震得瑟瑟发抖，就在这时，埃里卡修女把乌黑的卷发拢在后面，读了起来：

当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

我們好像做梦的人。

我們滿口喜笑，如沙漠中的泉水，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①

“听！”弗罗·海因里希小声说道。“他们在楼上！”

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大家吓得不敢说话，一扇扇的门撞开了，我听懂了他们在用俄语怒吼着，还有他们的命令声。我们都没动，可这间屋的门锁和合叶就被撞断了，门向里面倒了下来，一个接一个的人闯了进来，都是戴着皮帽、穿着棉军衣的军人，数都数不过来，宽大粗糙的手里都握着枪。我原来曾见过太

^①《圣经·旧约》《诗篇》(126:1-6)。

多这样的枪口，但是现在，泛着蓝色的枪口就像鼓起的钢嘴，在一双双可怕的手中到处搜寻着——那个头头瞪着我们，铁青的脸庞上是一双细得好像睁不开的眼睛，脸色比冬季没法融雪的阳光还惨淡，我要不是坐着，一定会瘫倒。

我跟自己说，这真是惊奇。我是怎么了，我本该早料到这一点，一年以来我都在静静地照顾着老人们，可你难道忘了战争总会带着更多的恐怖回来，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吗？那时，如果他的表情没有告诉我这些，他的声音也告诉了我。

“德国佬，听着，你们这群德国佬，”他结结巴巴地吼出记得的每个音节，“我们来这儿不是为土地，土地我们多的是。我们是为了报仇！”

他闪电般地举起手中的枪，对天花板开了火，我们的脑子里炸开了3声枪响，然后他厉声下了命令。所有呆立在一旁的士兵在他前面拥挤着出去了；我们听到他们粗重的脚步声，听到他们走在楼梯上、穿过防空掩体时的叫喊声。他们走了。

“噢，最亲爱的上帝，天上最亲爱的上帝啊！”昂克尔·乔安纳祷告道。

埃里卡修女慢慢站起身走到他跟前。“当然，上帝会保护我们的。”她说，声音竭力想找回往日的镇定。“瞧，枪声很响，但没损坏天花板，这些横梁已经有200年了。”

“我也有91年了。”唐蒂·热特吕德跟着解释了一遍。谢天谢地她没有明白眼前的这一切。

我们用椅子把破门板支回原处，把从楼上房间带下来的被单铺在稻草上，把被子和毛毯盖在我们所爱的老人身上。没有电，但是弗罗·海因里希的炉子里还有些捡来的煤；如果你直直地看，还能在炉子的小窗格间看见闪烁的火焰。房子不再抖动了。外面，夜晚也暂时安静下来。埃里卡修女和我一起躺在门口处的地板上，我们身下没有稻草，不过我们有两条被子，一条羊





毛的，一条羽毛的，我们两人用一个枕头。在温暖的石头地板上，呼吸声和窸窣声包围着我，我快把这世界当成可以安睡的地方了。

一刻也睡不着！黑暗中，我伸出手，碰到了埃里卡修女的脸，她的鼻子，我的指尖碰到了她的太阳穴，我转过身，嘴唇凑到她的左耳旁。

“今晚我们不睡了，”我轻声说，“我们要把一切都告诉对方。”

她呼出的气触到了我的下巴和喉咙。“是，”她声音很轻，只有我才能听得到。“我今天在看着你。你认识那个俄国人吗？”

“他不是俄国人，他是鞑靼人，从高加索来的。他们是穆斯林，要是有人碰了鞑靼的女人……那些黑皮肤、吊眼睛、戴面纱的女人，在国防军眼里她们根本不是人，他们扯下她们的面纱，把她们当牲口，当妓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伊丽莎白！”她转过头来，冲着我的嘴发出嘶嘶声，“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房里很暖和，但我却在发抖。好像那枪声还在屋里回响，那些蓝色的枪口在搜寻，闪光的步枪好像是从那些可怕的手中长出的铁树一样。它们让曾经不可能说起的事变成了绝对要说的事。我不得不问：

“你被玷污过吗？”

“没……没有。”

“那么听好，”我说，“愿上帝怜悯，但是听着，我跟你能够逃走，但这些老人……我们只能做两件事。这是些嗜血如命的士兵，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在杀人，在这4年的侵略和反击中，谁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女人都出了些什么事——到现在，你还没出过什么事，但我曾在泥泞中跋涉过两个月，在俄国人打来之前，我从乌克兰撤到了瓦尔特，所以我知道——这些士兵会一间房一间

房地搜遍这儿，城堡也不会放过。他们闯进来过，我们没地方能藏起来，只要他们乐意，他们随时都会回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抵抗或忍受。事情会来得很快，就像他们破门而入，就像他叫嚷着朝天花板开火一样，你的脑子会一片空白，会不知所措，所以你现在必须趁事情还没发生前就想好，两件事，抵抗还是忍受——”

“伊丽莎白——”

“听着！我们是女人。打仗的时候，女人对士兵只有一个用处。当他抓住你时，你尽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话，说话，尽可能长地说话，就算他不明白，这也是人的声音，人的话。要是只有一个还可以，可要是一群士兵的话，他们就不是人了，他们成了训练有素的杀人机器。除了恐惧，他们没有思维，没有良知，没有理性，你吓不走他们。听着，对于一个前线的士兵来说，女人就只是一个用来发泄的洞。当他们撞倒你、压在你身上时，趁你还清醒，要立刻抓住一切能杀了他的东西来反抗，不管是枪，是刀，还是棍棒，别迟疑，别多想，抓住它就往身上打，头太小又结实，就打身上。当他压着你时，最好是打喉咙、腋下或肚子，只要能够得着，但别犹豫，如果有机会就戳他的眼睛，那样很好……但是很难……”

我哽咽了，不得不停下。她靠着我，她的心跳得很平静；难道她不明白？

我想更镇静些地轻声说：“即使你制止了一个，杀了一个，独自杀了一个，甚至两个，也没什么用。他们成群结队，只会更加恼羞成怒地到这里，他们甚至不会浪费子弹，无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会用刺刀、手指、阴茎来撕裂我们的老人，他们会炸……”

埃里卡翻了个身，把左臂放在我脖子下面，用右手拉我靠近她。我们紧靠在一起，她的身体柔软而温暖，我的脸贴着她的胸





脯——但我得聚精会神，为她准备！

“嘘，”她小声说道，“够了。马林堡还有 200 名德军，如果他们能杀出去，他们就会带我们西逃，越过诺加特河。”

“打仗只会为自己活命，你以为他们会拖着 14 个老人走 400 公里去奥得河吗？”

“是但泽，”她说，“船正在从但泽撤人。”

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伟大城市。我们的祖先亚当·威伯曾用一堵墙来护城，150 年中没有哪支军队闯进去过。父亲告诉我和我的兄弟们，但泽的市中心美得出奇。他说大市场两边那些高大狭长的建筑正面都有台阶，就像阿姆斯特丹运河旁高耸的楼房一样……埃里卡搂着我，她的声音很平静。我在养老院呆的这 13 个月中，我已经知道她总是很镇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也总抱着无法被泯灭的希望。她也不是傻瓜。

我在哆嗦。“是。你和我能到但泽。”

她松开手臂；她小声说着：“你能。”

我说出那地名的时候，她已经从我的声音中明白了我的渴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远没有爆发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那时俄国门诺教徒的世界像夏季一样总是充满阳光，我父亲到德国去学习照相技术时曾路过但泽，他是坐火车去的。他说，那条路先是由工程师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所罗门·威伯建造的，可能是另一位祖先。现在，战争把我逼到了马林堡，离但泽不到 70 公里。我可以步行穿过一些村庄到但泽。那些村庄是门诺教徒把三角洲中沼泽的水放干后建起的，现在他们也都逃掉了。我可以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走到但泽，只须过两条河。

“那个纳粹地方官，”埃里卡在我耳边小声说着，“骗了我们，现在你必须自己救自己。”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躺在石头地板上的身体知道的似乎比我现在盘算的还要多。我搂着她结实的身體，两个女人尽可

能地紧抱在一起，一起呼吸着。过了片刻，屋里仍是背祷文的沙沙声，她鼓起勇气对我说：

“你被玷污了。”

我也能鼓起勇气说出来。“是的。”说出来后，我又继续说道：“战争的时候，男人很勇敢，他们会被杀死，女人也很英勇，也会被人强奸，被人杀死。战争和强奸总是一起从嘴里说出来，可我们不需要用战争来把我们变得冷酷，一个女孩也会挨打、受辱、被强奸……”

我停了下来，因为埃里卡把我搂得更紧了。她在我耳边说：“回头再告诉我，如果我不反抗，那会怎样？”

“为了战争，他们训练士兵怎样杀人，怎样麻木地看着伤员和尸体，但是没人为这个训练女人。”

“嘘，”她捂住了我的嘴，“不说那个，不是现在。”

我听见了旁边弗罗·海因里希的鼾声，很好，半屋子人身下的稻草在辗转反侧中轻响着，不同语言念出的祷告在祈求上帝的怜悯。啊！救世主，只有你能拯救我们！

于是，我抱紧埃里卡，开始告诉她：“他们会轮流，一个接一个。如果你挣扎，想要反抗，他们会压倒你，坐在你脸上，会把你双腿扯开，会让你跪着，如果他们鸡奸你，他们会觉得他们……一些人会像畜牲一样咆哮，他们的手会在你身上到处乱抓，他们毫无人性，尤其是他们的笑声，你必须祈祷离开，走得越远越快就越好。”

“你会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这些，不要挣扎，不要僵着身子，也不要硬撑，那样你只会伤得更厉害。要让自己顺从，你必须马上这样做：只要他们抓住了你，只要没了希望，赶快找个地方，去那儿。”

“什么……地方，去哪儿？”

“去个旮旯、角落，要是有个柜橱或是火炉后面有空地儿，就





去那儿。别去屋顶上的角落，因为在那儿你什么都看得见。什么地方黑就往什么地方去。”

“像……咱们花园里的浆果丛下面？”

“对对对，好，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下面，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躲在里面，一片绿色，去！你身体柔软，跑得又快，钻心的疼痛会让你打退堂鼓，但是别理它，要集中精神，一个名字能帮你，‘主啊，主啊，主啊，’如果你能在此开始之前把自己弄湿，或许就没那么疼了。”

“弄湿？”她咕哝着。

这叫我怎么说呀？我只好对着她的皮肤哼了一声，这也太愚蠢了。想要把身体里那些将会永远存在的东西说出来，像血液、像癌症一样的东西说出来，这样的窃窃私语，好像你已经准备好要被疼痛所碾碎，而除了耻辱，你的身体已经死了，这只会是你自己的错，说这些既没用，又愚蠢。

“伊丽莎白·卡特丽娜！那些士兵就在这间房里！”

“不是我们把他们带到这儿的！”

“这是战争训练，告诉我！”

“好吧！你怎么才能把自己弄湿？”

“唾沫？”

“也许。但那时我的嘴是干的，这招不行。”

“眼泪？”

“对了，眼泪、汗水或是血液。不要反抗，你很想反抗，但是不要，他们会更快些。记住，对他们来说，女人就是3个洞，每个他们都会用。”

“什么？”

“是的，3个。如果你必须吞下精液或尿，都没关系。要是可能，你就吐出来，但那也没有毒。只管离开。”

“噢，主啊！”——她的声音一下子变了——“求你了。”

“埃里卡。”我只能搂着她。

“噢，主啊，主啊，我们的主啊，”她冲着我的脖子断断续续地说，“你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山川诞生之前，在大地形成之前，日日月月，月月年年你永远是我们的主。”

我没法跟她一起祈祷。在痛苦的记忆和预感中，我开始哭起来。天啊，天啊。

我们从筋疲力尽中醒来，外边还是枪林弹雨。我不敢冒险出去提水。我们挤在一间房里，有太多东西需要清洁，存的水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储藏室仍旧上着锁，塞得满满的：面包，干面条，罐装水果，还有几根烟熏的香肠。我们从不讨论自己在包围中能维持多久，我们考虑过，但这是战争，我们又不能想，今天就是今天，够绝望的了。在地下室紧挨着我们的那个小角屋里，我们需要水把我们的粪便冲到排水沟里去；万一那儿要是堵住了，埃里卡和我就不得不用桶把所有的一切都拎到大街上。房子吱吱地颤栗着，子弹嗖嗖地穿过，世界在我们头顶上要碎裂了。但是我们依然打扫着，依然吃着东西，我们背长长的祷文，或是尽我们所能低声吟诵。我们躲在屋中最安全的角落里，战战兢兢地靠得更近。

“是啊，靠在一起，”埃里卡说，声调平静得好像她在换晚上用的被单，“要是房子倒了，他们也不用挖那么多地方来找我们。”

弗罗·海因里希开始唱歌，她声音轻轻的，像只飞翔的鸟儿：

“我们在去天堂的路上，
去我们天上幸福的家乡……”

到了合唱的地方，其他人的声音也想跟上她的高音：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等我们完成了考验，
我们会走在回家的路上。”

昂克尔·乔安纳的嘴唇在动，但却没有出声。

中午没过多久，我们听见楼上的门撞开了。静了一下，随后是踏进来的脚步声。吵闹声、咒骂声之后，是一声咆哮的俄语命令，还有脚步声，士兵们又都冲了出去。我们刚松了一大口气，便听见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渐渐走近，好像是在警告我们。门被一拳砸倒了：进来的是个军官。

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有好长一阵，我只是盯着那双齐膝高的、锃亮的靴子看。总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红军军官都可能是阿贝尔，那会既欢喜又恐怖。但他当然不是，不是我那个失散的革命者兄弟。

两个挎手枪的士兵紧跟在他后面。他弯腰进了屋里，两脚叉开站在那儿，军装整洁而笔挺。惊吓之余，我看见他把那顶尖帽子从宽大而有些谢顶的头上摘下来，很礼貌地行了个礼——他的头是照着领袖的理的吗？

“有人会说俄语吗？”

我们已经计划过。虽然半屋子的人都会，但只有弗罗·海因里希愿意说。埃里卡修女事先对每个人都说过我的警告，不要说跟俄罗斯有一点点牵连的话。弗罗·海因里希自告奋勇。她说：“我都 87 岁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们祈祷她能安然无恙。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注视着那位大吃一惊的军官，对他那一刻表面的礼貌存了一线希望，但却没有信心。战局要求把德国士兵从马林堡的每一幢房屋里清

除出去,要是我们死了比活着对他更有用,那我们就会死。

马林科夫少校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伤害老人。只要我们保持安静,不藏匿德国兵,我们就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弗罗·海因里希控制不了自己,她指着我们这群畏缩的人向他恳求道——昨夜7个士兵闯了进来,看,这门,这天花板——我不得不用德语提醒她,除了他所说的话之外,不要问问题,也不要提供任何信息,只作简单回答即可。

马林科夫的目光好像要看穿我一样。埃里卡修女和我都用破旧的披肩裹紧了头发,我们像棍子一般躬腰站着,但我们不敢装得太过分,我们掩藏不了我们的肌肤和眼神。那时,他的俄语如此平和,如此富于教养,要是没在打仗,他很可能是个教授。他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如何忍受着煎熬,对每个人来说战争都很恐怖,对老人更是如此。但是,两天之后前线就会推进过去,我们将会身处在红军无微不至的关怀中。红军是不可阻挡的,而他也会下达命令,命令任何人都不得骚扰我们,无论是要吃的还是其他,什么都不行。他会派一名士兵在门口站岗。弗罗·海因里希欣喜若狂,她和其他所有人都拼命地感谢着,这时,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身后两个头戴钢盔、瞪着我们的蠢蛋先出去。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冲我笑了笑。我知道,我的脸出卖了我,它把我自己和我巨大的恐惧都泄露给了他。

的确,我披着围巾拎着水桶冒险出去的时候,那两个蠢蛋士兵就在门口。我回来时甚至还有一个给我开了门,但我知道,虽然我裹得很紧,可他们年轻、饥饿的眼神每一步都在跟着我,仿佛我使他们想起了什么,是这血腥而肮脏岁月里的一道村庄奇景——瞧,提着水桶步行的女人!——他们一天一天地生活在这无聊和赤裸裸的野蛮中。

“我们感谢上帝,噢,谢谢您,我们又安全地过了一天,”晚上祈祷时埃里卡修女说道,立刻,他们便一起开始感谢了,如此深



情,如此让人同情,甚至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唐蒂·热特吕德也感谢起来,他们虚弱的声音渐渐变成了精疲力竭的重复,就像他们整日的叹息声一样。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在虔诚地祈祷着,”埃里卡躺在地板上轻声对我说,“上帝一定会回报他们。”

我们背对背躺在一起,很暖和;我不敢把我的害怕说出来。水桶盛得满满的,但除了疼痛,我的肩膀和胳膊再没有感觉了。或许,像父亲那样,丢只胳膊便能救了我?丢条腿会不会更好?不,不,一条腿的女人只会更糟——不,如果我能找到些话,我就能跟父亲解释解释了,而他曾给我说过,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广袤的大地就给了我们门诺教徒一个避风港,它让我们营建自己的聚居地,让我们变得富足安康。俄罗斯的土地上有难于尽数、各种各样的民族,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俄罗斯也有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历史,是一小撮人为了超乎想像的财富、美色和权力写下的,对其他所有人来说,这历史却意味着奴役。

听着,爸爸,一条腿的女人,两条腿的女人,还是没有腿的女人,你四肢健全还是没有四肢其实都没有意义。一根枪管架在我耳边的时候,我看见婴儿们、祖父们和曾祖母们被一团的人兽奸了——听着,这些畜牲们不会去干我曾看到过的男人们做的事。战争把男人们驱赶在一起,让他们变得残暴,让他们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片刻工夫你就可能送了命,因此,在你有力量的时候,你会用你学到的每一种残暴的方式把它刻在敌人身上。报仇。那个破门而入的鞑靼人知道这些。早在还没有我们门诺教徒的时候,他们的蒙古祖先就已经纵马从中国杀到了维也纳的城墙下,他们砍下的人头可以堆成金字塔。

是的,我父亲会这样说。权力会强加在你身上,进入你身体里。这个士兵会出其不意地骚扰你,威胁着要开枪打你。他会这样向你灌输,“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随后他的长官进来了,有

礼貌又有人情味,你想着也许……但你知道吗,鞑靼人之所以会说那些德语单词,都是因为像马林科夫这样有教养的军官教过他,教他说700年来他所熟知的东西:暴力孕育仇恨,仇恨缓慢但却是持续地被碾成了恐惧,经过时光精细的打磨之后,恐惧变成了报复。你明白吗,我最亲爱的伊丽莎白·卡特丽娜?

明白了,爸爸。现在,我能看张照片吗?

哪一张?

是伊诺克和阿贝尔的,我两个英俊的弟弟。不是那张,那张上的他俩一个4岁,一个6岁,都戴着镶黑边的大帽子在张望,他们的小手紧紧抓着小溪上的假桥栏杆,你那阳光灿烂的工作室里并没有小溪;不是那张,不是他们戴着水手帽、坐在纸船里的那张,那张上的大海是画在纸上的。不是,我要看最甜蜜的一张,我看过你和妈妈一起精心设计过的那一张。那张的右边背景是一片灌木丛的影子,左边是曲折向上的宽台阶,台阶上铺满了鲜花。伊诺克那时3岁,他穿着带条纹的薄衬衫和短裤,眼睛直直地看着远方,还抱着身边的一个大瓷尿壶。在他的目光下,面朝照相机、光着上身的是小阿贝尔,是漂亮的阿贝尔,那时他才1岁。他又着两条圆鼓鼓的小腿坐在那儿,还踩着个又圆又小的瓷尿壶,那只瓷尿壶原来是我的,后来是伊诺克的,现在归他了。阿贝尔的眼睛真大,茫然的脸上还带着静静的悲伤,像个小动物——噢,我的弟弟们,噢,伊诺克,噢,阿贝尔,阿贝尔,我失散的弟弟阿贝尔……

第二天早上,1月28日,门口没有哨兵,街对面的修道院起了火。一对年迈的修道院看守带着他们不信教的兄弟到了我们门前,还有6个穿着修女衣服的女孩挤在他们中间。埃里卡只是说:“进来,快,快,”便领着他们下到了我们这间拥挤的小屋。我们打开了对着后院的两扇小窗户,外面的空气让房间清新了一些,但天气很冷,我们的老人可支持不了多久。埃里卡把这9个





新成员塞在门后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安排我们的人围成半圆挡在他们前面。

我们所爱的这些人坐在椅子上，挤在一起，他们年迈的身体肿胀，因经年累月的劳作，因曾有过的孕育，因已高的年事，他们的身体都变了形，他们在颤栗，有几个都已经糊涂了，真让人难过。

“好了，”埃里卡对我们藏起来的客人说，“我看不见你们了，一点也看不见。但是你们千万别再哭了，你们别出声。要是有人进来，千万不能哭。”

过了一会儿，他们真没再哭了。其实，一整天都没人下楼来。从外面的声音来看，从城堡那儿来的枪炮声和还击声来看——就算在地窖里，我也能听出不同武器的声音——战争的混乱笼罩着他们外面的每一个人。晚饭我们吃了一点儿面包和罐装水果。我们点起了蜡烛，把它放在餐桌上。埃里卡修女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可爱天使”，这是唐蒂·热特吕德对她低声唱到的。埃里卡把《圣经》放在温暖的淡黄色烛光下，弯腰俯看着，她双手交叉放在额前。我父母也从没设计出这样感人的一幕来。

我们头顶上，面朝街的大门被撞开了。那对夫妇、他们的弟弟和那6个女孩赶紧趴在地板上，而为了遮住他们，我们也把周围的椅子挤得更近了。其实，我们没必要这么快。不知道进来的是谁，至少有10个或12个人，他们先砸了楼上剩下的一切东西，然后顺楼梯下来了，我们胆战心惊地挤在一起，有人砸坏了地窖的门，那是我们存食物的地方。我们听到了他们在笑，在叫喊，在砸碎玻璃，在推倒架子。埃里卡修女心怀一线希望地望了望我；或许他们填饱自己肚皮以后会忘了我们。但是我遭受过俄国人的折磨，我了解他们的猥亵。

他们来到我们房里，喝醉酒似地嚎叫着，我们的食物从他们的手里和嘴里掉下来。他们在灌着酒，粗野地你推我搡，等不急

得像要快打起来一样。

但他们不信教的弟弟卡莱尔跟我们在一起。他打来水，从废墟中为我们的炉子取来木炭；没有士兵理他。老人们比以前更可爱了，尽管弗罗·海因里希唱不成歌了，其他几个也只能嘟哝几句祷文。年迈无助的他们蜷缩在开始腐烂的稻草堆上，但有几个人身体还可以，还能帮我们洗洗。他们能做的其实只是坐在围成圈的椅子上，让我和埃里卡修女能在他们背后洗洗自己的身子。温暖而纯净的水，一杯水触到你身体的那一刻，你会什么都不觉得了，你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如雪一般洁白。弗罗·海因里希解开我们的头发，卷成一个利索结实的发结，那是吉内登索尔的老祖母卡特丽娜经常挽的发型；我小时候、还有以后大一点儿的时候都给她梳过头，我把她的头发梳成垂腰的长卷，而她总是那么耐心。埃里卡和我把围巾系得更紧了，然后去干活，不停地干活。只有在梦中才可以暂时遗忘，但我们却没法入睡。

“‘杀了我’用俄语怎么说？”

“*Ubeyte menia.*”

我们两个都这样说，但他们不会。每天晚上，还有下午的任何时候，士兵们会张着臭气熏天的嘴，挺着坚硬粗糙的身体到这里。在寒冷的清晨，我们在黑暗地板上的肌肤已经经不起触碰了。我们只能互相诉说着许久前曾承诺过的事，我们边听边说，回忆、说起重回到眼前的破碎往事。她说起她在黑伦哈根成长时那些金色的夏天，那是片位于诺加特河和维斯图拉河之间的沼泽地，是威伯家族的人先在那儿筑坝排水修出的。我说起我们家一千年前在俄国的情形，说起绿色的吉内登索尔和明亮的工作室，说起逃到莫斯科时的恐慌和后来的返乡，说起苏珊诺瓦的奥伦堡，还有集体农庄和肃反运动，那时父亲丢了的胳膊都没能救了他，也没救了伊诺克。我会再说起吉内登索尔，说起在吉内登索尔的废墟中只剩下了我和我祖母卡特丽娜，国防军的坦





克来的时候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跑光了。但我们门诺教徒是德国人，我们欢迎他们。

埃里卡抱紧我，现在她已经不怕了。

“你有孩子吗？”

“死了。总会死的。”

祖母飘起的头发，村里街上石头和木头的小桥，小桥下面流过草丛的小溪和光滑如镜的石头，事情多得说都说不完。虽然我们以前从没听过，但我们却理解彼此的故事，故事清楚得如同我们跃进了一池温暖纯净的湖水中，是我们一直渴望的，那儿温暖、清澈而隐秘。

爸爸，给我看张照片。

哪一张，亲爱的？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你把我逗笑了，他笑着说道。我拼命摇着布罩下面的相机。你和格里塔^①·伊萨克都打扮成身材修长的年轻小伙，你们穿着长裤打着领结，戴着平沿帽和夹鼻眼镜，还留着两小撇胡须，真帅。她穿一身黑色，你穿一身灰色，她站在那儿斜靠着你，你坐在有圆靠背的椅子上，左腿搭在右膝上，你们指间都优雅地夹着一根长长的香烟，那其实是张卷起的纸，这么标致的年轻人。

格里塔·伊萨克。埃里卡·威伯修女是我们第七代或第八代前搬到了黑伦哈根的亲戚，要是她知道我们，要是她在1917年来到吉内登索尔，她一定会是照片中第三位再年少点儿的年轻人了。

但现在是1945年。我为格里塔·伊萨克祈祷，现在她改名叫佩内，我祈祷她和她的4个孩子能安全地生活在德国的某个地方。可是，在她家族的土地上，“上帝赐给我们的可爱天使”在

^①格里塔是玛格丽特的昵称。

到了能关心别人的中年时,自己却越来越虚弱了;对于她所承受的一切,我轻声说的有关战争训练的那几句话根本不够。

第四晚的时候,有男人突然尖叫了一声,声音扭曲成了吼叫,是俄国人的咆哮,然后是一声枪响。有人被刺伤了,伤口很深。有人从我身边跑开了。靴子重重地踏过,摇晃着走远了。当我能爬的时候,我爬过被毁的房屋,在断壁残垣中摸索,最后找到了她血淋淋的尸体。我摸到她太阳穴上有个枪眼,眼下的脸像是被坦克碾过似的。或是靴子踏的。

弗罗·海因里希给我拿来还暖和的被单,我把她的尸体裹起来,还有我自己。卡莱尔帮我把她抬进屋。我们挤在她的尸体旁哭起来。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意识到,马林科夫少校正在门口看着我们。

我用俄语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们不需要他的士兵给她挖墓穴。但女修道院墓地的地面冻得实在太硬了,在被火烧过的废墟一角,卡莱尔和我只能用些碎石来盖住她身上的尸布。

第二天,6匹瘦马拉着两辆车停在了我们门口,车是照俄国样子套起来的,可只有一个车夫,就是那个年轻的鞑靼人。他说他接到命令来转移我们,红军的先头部队要打过这里了。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把老人抬上了车,还拿了些能找到的吃的和盖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坐上小舟跨越诺加特河之前,就有两个已经昏迷了。河上根本没有桥留下来。两天以后,我们到达维斯图拉河东岸的达迈尔鲁镇时,已经死了4个人。

鞑靼人赶一架车,我赶另一架。即使是在已被摧毁的维尔达那里,他还是有办法让饥饿的马匹活下去,那儿发了洪水,现在是冰天雪地。他有马林科夫少校的命令,我们想去哪儿就把我们送到哪儿。所以在达迈尔鲁镇时,我告诉他我们要向北走,要去但泽。他笑我,那座城市还在德军手里!





确实是,我说。但你只要脱掉军装,我就能帮你混在数以万计的难民中逃脱,你就能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战争的目的。年轻人能看看世界,能逃到美国去。

他又笑起来,但这次不同了。我知道他不相信有个那样的世界,有个他不用对别人俯首帖耳的世界。但是他说,他为何要抛弃战友呢,跟他们在一起他可以杀德国佬,还可以玩他们的女人。所以我说,要是明天他敢帮我把马车赶到再离但泽近些——现在离但泽也只有30公里了——然后他就可以返回军营。作为回报,我会让他玩一夜。

这让他有些困惑。“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他说道。“我认识你。”

维斯图拉河上的桥全被破坏了,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波兰人,他有一艘平底船和一支长桨。我们用两匹最好的马跟他做了交换。急流打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昂克尔·乔安娜被抛出了平底船的上舱板,我和鞑靼人赶快爬过去帮他。我抓住他的胳膊时,他说:“不要……不要了。”他紧闭双眼,早已看够了这个世界,所以我摸了摸他那柔软而爬满皱纹的脸颊,转过了身。我再次往下看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二月的阳光下,宽阔的河面像白灰一样翻腾着。

卡莱尔消失在了但泽。但是我和6个马林堡来的女人,其中有弗罗·海因里希和唐蒂·热特吕德,我们都在所有“我军”和“敌军”的炮轰中活了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没什么不同。后来,苏军在3月29日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那时,我们已经远离了主战场,也出了城。我们躲在国防军快要被摧毁了的防线后面,身后就是但泽湾。在那儿,无数的难民们沿着沙丘挤在一起。轮船仍能停靠在暂时修起的码头上,和那儿的小船一道把难民们渡到丹麦去。4月16日,戈亚号回来执行它的第五次撤退任务,有人说它是海上最快的轮船。在它驶进的时候,我们看

见有两架俄国飞机攻击了它,它被打中了。但是,很快飞机就被赶走,船上的火也扑灭了。立刻开始装人了。我把6个老人送上甲板,没过两小时,这艘船就塞满了人,到处都是,每层甲板上都挤满了人。两艘扫雷艇护送着它,我们看着它绕过了赫尔半岛,然后就消失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被落在后面,在绝望中哭喊。

两个月来,我一直吃捡来的东西,但泽已经毁了。春天温暖的天气带来了难于忍受的气味,那是在废墟间没被发现的尸体,现在腐烂得更快。在屋顶已经塌下了的大市场,在圣凯瑟琳大教堂和沿谷仓的那些船坞的残垣断壁间,到处都是尸体。只有圣玛丽教堂的高塔和克罗恩斯托码头上的船用吊臂还耸立着,但是你不敢靠近它们,石板和砖墙会出其不意地倒下来。几个世纪以来,但泽的城墙抵御了一次次来自海上和陆上的进攻,但对从空中来的却没办法了。石头建筑的废墟像折了的棍子一样立在那儿,毕晓普斯山的山坡像被折皱的纸一样。我一直在找,却没有找到亚当·威伯最初修建的城墙。伟大的城市被毁了,碎石下面成千上万的尸体在春天的空气里散发出阵阵恶臭。

诺加特河畔的马林堡也成了废墟,我回去时它早已被红军占领了。不过,城里有许多我可以藏身的地窖。我挖出埃里卡修女的尸体,把她安葬在了教堂墓地里。接着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4月16日的午夜,两枚俄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戈亚号,7分钟之内它就沉入海底。冰冷的波罗的海海面上被救起的人不足200个,7000多人死于历史上最惨的海难。

我站在朋友的墓地边,大声叫着我所知道的名字:

“热特吕德·迪克,91岁

阿涅斯·海因里希,87岁

玛格丽特·法斯特,81岁





乔安纳·菲格斯,79岁
安娜·克莱森,78岁
玛丽亚·伊萨克,72岁。”

我想起了维斯图拉河上的平底船。河水也肯定已经把他带到大海里,我又说道:

“乔安纳·伊萨克,74岁。”

明天我会去找黑伦哈根,看我能不能在洪水泛滥的维尔达地区找到它。如果能看见水面上的堤坝,应该就只有12公里了。要是那个鞑靼人能活下来,能活到与他的战友列队穿过柏林的废墟,他也快要被逮捕、被枪毙了,因为他为了帮我们而开过小差。我也会被抓起来。或许就像我父亲说的,我会坐上拉牲口的车被送到西伯利亚去,或是寒冷的沃尔库塔。

我小心翼翼地抚平埃里卡的墓穴,让人认不出来。我手下是松软而饱经风霜的土地。然后,我取出从她裹尸布下拿出的小本子《圣经》,牢牢地抓在手里,竭尽全力地念道: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爸爸,给我看张照片。

在第聂伯河畔夏日野餐的那张。右边是妈妈,戴着一顶宽大的帽子,身穿白白的长裙,后背斜靠着峭壁;你的5个朋友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靠在你们中间的岩石上;你坐在左边,在野餐篮旁,身边还有毛毯和茶炊。除了你之外,每人都举起一只杯子,向你伸过来,好像是在干杯。爸爸,你为什么要抱着吉他,弯

着右手手指像是在拨弄它？你弹过吉他吗？你会弹吉他吗？你会唱歌吗？

但是他没回答我。最后，我得自己继续下去。我告诉他：我也在这张相片上，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你看不到我，甚至妈妈都不知道。我在她的心底里，我藏起来了，摸不到，但是很安全。



第 17 章

旁观者的耳朵

1992 年，多伦多

在打开的橱柜间，电视屏幕上一个干瘦的女人和一个壮硕的男子正在谈论着，他们在解释沃伦委员会^①所调查的结果为何不能成立，为何不能说明约翰·肯尼迪总统^②是如何被刺杀的。如同往常一样，亚当喀哒喀哒不停地调着台，他怕自己无聊，会想起自己的事来。这时，这幅图像闪现在屏幕上——在堆满文件的桌子后面，两个面无表情的人呆坐着交谈——只是业余水平的家庭录影带。是这幅图像让亚当正调台的手停了下来。看到这两个人之前，他已经跳过三个频道了，是这两张呆板的脸把他吸引了回来。他想起一个词——叫什么来着？——叫电视的“非自然常态”？

屏幕上有张图表，是张侧视图，一条线串起的点绘出了那颗“神奇子弹”的飞行轨迹。这是那颗子弹现在的叫法，男声的画外音在解释：“神奇子弹”是打出的第一颗，但不是致命的那一颗。

①美国政府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名称。

②约翰·肯尼迪于 1961 ~ 1963 任美国第 35 任总统，1963 年 11 月 22 日被暗杀。

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①的步枪中射出后，那颗子弹肯定飞过了6个不同的方向，先是穿过肯尼迪的身体，然后穿过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最后停在了康纳利左腿的大腿上。可是，子弹却不是从那儿发现的。标着小点的线显出那颗子弹砰、砰、砰地跳开了——什么时候政客的身体变成岩石般坚硬了？——接着切换到俯镜头，看那颗子弹可能的轨迹：子弹从总统飞向州长，却全然没有伤害到近在咫尺的总统夫人。那颗子弹必须自己转弯从1.7英尺的侧向飞过，然后进进出出总共弹出7个伤口，最后才从两个男人身上飞走。

很明显还没完。镜头切换到了“神奇子弹”，给它来了个大特写，这是幅从没出现在《沃伦委员会报告书》中的画面。在打穿了肯尼迪的脖子后，子弹又打进了康纳利的身体——他的胸，肋骨，胳膊，最后是手腕——这颗子弹曾在康纳利的大腿上歇了一会儿。活儿干完了！也许是它方向转得太漂亮了，它最后叫人发现时也是那么的莫明其妙——医生们只在康纳利的大腿上找到了它留下的最终的那个空洞。1小时后，人们才从达拉斯医院的地板上看到它，也不知它是不是从哪付担架上掉下来的，还可能让谁给踩了一脚。

真是莫明其妙。啊，神奇子弹，到处飞来飞去地破坏，却不曾真正打死人。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先生，还有其他6位先生在他们亲手签署的报告中提到了你：而你只是颗子弹。他们可都是受人崇敬、手握生杀大权的人，这样完美的结论可以让每个电视上轰动一时的大案随着广告时间的到来而结束。可这儿却没有答案。

悦耳的男声还在耳边响着，这个小小铅块的右侧还有一线微光——突然无声的镜头前出现了白纸。男声在回忆起这个即

^①据认为是刺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凶手，遭警察逮捕后被一夜总会老板枪杀。





将完结的世纪时变得特别低沉起来,快到新的千年了,全球任何种族的人们都一样:这是否比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奥斯卡颁奖礼和橄榄球超级杯决赛加起来还重要、还伟大呢?可这枚美国制造、邮寄购买的铅弹却成了本世纪无法捉摸的谜。成了永久的象征。一阵突如其来的长长笑声把这些都冲走了。

就像他曾经笑过自己一样。亚当放下了手里的书,遥控器好像还在右手里握着。他能感觉得到。

那干瘦的女人在说着。她冷静而自信地坐在那男人旁边,他在解释那颗无法解释的子弹,而她在播报证人的姓名、年龄和家庭住址,还有自愿作证的很多人。不容置疑的数字作为证据在电视屏幕上滚动,像天气预报一样,虽然快得让人没法念,但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总共 552 位,是,亚当听到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解释过后就过去了:有那么多的人曾聚集在休斯敦和埃尔姆之间的拐角,这里正是 1963 年 11 月 22 日车队拐进达拉斯的地方。有那么多的人曾和别人说起他们愿意到沃伦委员会去作证,可是只有一小部分(有多少?)被真正地询问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只是被随便问问了事,没有录音,有的甚至都没往本子上记过。令人惊异的是,在这 500 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多大?)到 1992 年时已经死了。死的人当中,死于非医学原因的百分比要比可能的百分比高很多(高多少?):死因有个别的车祸,自杀,火灾,打雷或是龙卷风;飞机失事,塌陷;他们离开家,消失了,甚至他们的至亲都无法寻得一点踪迹。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曾经计算过,在 30 年间,对于偶然聚集在一处的这么多人来说,发生这样接二连三失踪事件的概率为 17 万亿分之一。

刚才是谁在笑?一个摄像机没拍到的观众?17 万亿的确很可笑,但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就不可笑了。

亚当躺在旅馆的床上,目光顺着伸出的腿看着仿橡木柜中的电视,他想到了消失。这也是一种决心。

不,忘了那些吧,只要把镜头从那两个在说话的普通人身上移开两英寸,你就不再会相信眼见为实这种幻想了,把镜头移到坐在这儿的我身上,可能就会拍到我的阴茎,我手里拿着的棍子,这就如同把镜头移到那个时刻,那个我第一次听说那失踪的地方一样,哦,不,应该是枪响的地方。

或者像那个委员会说的,有3枪。或是像各种各样的人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4枪还多,虽然官方一直不相信他们的说法。很巧,1963年11月22日的时候,亚当正好在美国。他正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参加一个为期3周的内分泌学研讨会。他正在办公室里和一位资深教授交谈,是科学家之间那种平静的信息交流,他们都知道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实验室,他们谈论在美国的保留地上,北美土著人复杂的荷尔蒙分泌状况,那时他们被称作印第安人。当时,亚当满脸雀斑、一头红发的实验室助理一下子把头伸进门来,气喘吁吁地说道:“他们枪杀了我的总统!”就像这样:“他们枪杀了我的总统!”说完,她哽咽着跑开了。

那时他还微微地笑了,真傻,他觉得这可能又是个学生编的笑话,他可能还真笑了。他仍然记得自己清醒时的第一个想法:你们这些美国人!为了想让那个挺上相的人享有亚伯拉罕·林肯一般的声望,你们竟然不惜要谋杀他。他的美国同事在盯着他,他那时肯定是笑了,要么更糟,他肯定把自己的想法给大声说了出来。他知道自己是在接待室的人堆中,看着人们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无助地探寻着历史,看着毫不重要的细节和情况摘要被一遍遍毫无意义地重复,还听着沃尔特·克伦凯特那沙哑的声音。他还看见那播音员摘下自己沉沉的眼镜,然后看了一眼画面外的摄影棚里的钟,听见他说“……38分钟以前,”这时,他相信了。男男女女、教授学生都一样地大声哭了起来。

3个小时之内,电视机前最可怕的谋杀,作案的凶手,整个过程中带特写镜头的相片,步枪和完整的美国海军中的个人档





案,都暴露在了屏幕上。不要错过纽约的晚间新闻?正式起诉是在当地时间11月23日凌晨1点30分。亚当返家的航班及时抵达了埃德蒙顿,让他可以和苏珊娜一起看接下来的发展,这时的电视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两个警察中间被人开枪打死了。苏珊娜刚买了他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因为她告诉他,她不想错过看总统的葬礼。亚当突然想起,那晚,我们赤裸裸地做了爱,就在浴室的垫子上,四周都是立着的镜子。好像要把我们的身体延展到无限之中。

现在,在旅馆床上,他身边放着的只有一本书。书从他左手滑落下来:《待售之枪》。那天下午,在布鲁尔街联合教堂大厅的旧货市场上,他从一箱子书里把它翻了出来。当时,虽然书脊上还有“G 311”的序列号,但书皮上已经盖满了大写的“处理”两字,书是从多伦多的乔治·布朗学院实用艺术与技术图书馆,还有克萨罗姆校园图书馆来的,最后的归还日期是1986年4月1日。6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是本画着耷拉着耳朵、身上已是橙灰色的企鹅版的书,开头几句话就像是打无从忆起的远方传来的,阴森之中透着诡秘:

对雷文来说,谋杀并不可怕。它只是一项新工作。你必须谨慎,你必须用你的大脑。这不关乎仇恨。他曾经见过部长一次……一个邋里邋遢、没有朋友的老男人,据说他热爱人类。

格雷姆·格林^①56年前创造的讲述者的声音。恐惧、拙劣的谋杀和运气让讲述取得了语言上的特殊效果,另外还有长着兔唇和戴着防毒面具的人。有位教堂唱诗班的舞者(是个名字

^①英国作家,尤以表现作者热情的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如《权力和荣耀》而著名。

里面带个 e 的外国安娜) 被人绑起来, 堵住嘴塞进了壁炉烟囱里, 想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 可她却没死。唱诗班里顽强的安娜尽管被人塞在黑黝黝的烟囱里过了好几个小时, 但看起来却没有因此留下幽闭症的阴影。小说同时在两个方面展开, 探索了犯罪行为和商业领域、军队和个人领域中无道德的黑洞。副标题为“一种娱乐”。

教堂大厅后面旧书摊上的那个矮男人不断吆喝着: “嗨, 我叫亚诺德。”亚当觉得跟他的名字太接近了, 他觉得不自在。他站在那儿, 胸前捧着《待售之枪》, 耳边似乎还有这样的声音: 这儿还有我要的其他书。接着, 他看见自己的右手已经放在了另一本书的上面: 《阿道夫·希特勒之死——来自苏联档案馆中的未知文献》, 作者是列夫·贝兹曼斯基。书的封套有些起皱变脏, 但书的硬皮完好无损, 上面没有“处理”或者其他任何标记——一个都没有, 甚至连图书馆也不愿承认曾有过这么一本书——1 块钱就可以买下。书在他指尖如同一口揭开的陷阱: 一幅黑白照片上, 一颗可怖的人头, 不大, 双眼紧闭, 嘴上有瘀伤。人头被一双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扶着下巴、拉着头发托起来, “在柏林验尸之后的海尔加·戈培尔^①”。在扉页上写着“戈培尔家人的尸体, 他妻子和他两个孩子”, 图片颠倒着, 这样一来, 成年人烧焦、可怕的残骸便位于了照片下面。在图片上部, 没有烧到的孩子并排躺着, 纤细的胳膊和腿从白色睡衣中伸出来。最小的是个小女孩, 头侧向一边, 只显出鼻子和黑色的眼睫毛, 她的左脚微微地搭在右脚上。

拥挤的教堂大厅内, 喧闹声让亚当浑身一阵颤栗; 就好像所有闲逛的人, 还有爱书的人都已经一动不动地站在了他身边, 手里都拿着一本散了架的书。这头禽兽跑到地狱里去了。

^①纳粹德国宣传部长, 极端忠实于希特勒, 曾利用各种媒体反对犹太人和其他团体, 德国战败后杀掉全家后自杀。





“不错的一本书，嗯，买下来，星期三看看？”

从他张开的嘴，好像“嗨我叫亚诺德”在说话，声音小得就像是个加拿大人在道歉一样，但却很清晰地在他疙疙瘩瘩的毛衣间回荡。那声音低低地烦扰着他。箱子里塞满了书脊上落满灰尘的书，杂乱地堆放在折叠桌上，那些桌子本来是该摆上咖啡和不怎么新鲜的面包圈，招待蜷缩在多伦多街头什么地方的纸板箱里无家可归的人。亚当觉得自己踩到了一本书，书的边缘在他脚下滑过。他抬起脚，把那书踢到了一边。

“我是说荣军纪念日，下个星期三，那个畜牲^①”——他冲着那个用方框框起的红色名字做了个手势。

“哦……称他畜牲还不配。”亚当微微觉得有些荒谬，他轻轻把书合上，盖住印有那些恐怖照片的一页，好像它们会压坏似的。卖旧货的这些小子应该闭嘴，应该把书好好整理整理，谁愿意让人看见自己化作尘土^②？11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用砖和混凝土垒起的墙上，公园水泥墙的角落里堆放着流浪者仔细清理出来的垃圾，沿布鲁尔街的北边小心翼翼地试着走走就已经够了，在慈善大厅里他不必发出比呼吸更大的声音，也不必装出自己来这大城市是什么理由——那个说“嗨阿诺德”的人哪来的胆量叫出这么一句话来？难道他错误地碰到了他的眼光？无意地碰上了他的眼光——或者你会不会碰到谁的耳朵？偶尔听到什么？

亚当拿着他的两本书，站在收银桌的左角边。他把书放下，又在书堆里翻查起来，好像在找寻什么……他发现自己正埋头于一堆无聊的爱情书籍。桃色、温柔的章节总是这样结尾：埃里

①指希特勒。

②这里作者有两层含义：一是暗指希特勒的神秘死亡，没人看见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二是援引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的名著《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书中认为人终归会“化作尘土”的。

克或其他什么名字的家伙用坚定而温柔的手抚摸伊莎贝尔或这类女孩的什么敏感的地方，啊，如此温柔。呸，狗屎——他转过身，看见一个穿条纹衣服、皮肤黝黑的人，那人可能刚才曾站在他身边，现在他正把一本贝兹曼斯基的书向收银员递去。难道这本书有两本？他是不是不要了？他自己的书已经不在那儿了，没了，当然，他也想再回去找找看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本——他的心脏跳得很快，好像快窒息了一样。那是上天的安排，我不去追它，它被人拿走了^①，在他手里，他又看见了另外一本平装本封面上喷绘的女人，她应该叫里甘·鸥法蕾尔，胸衣要被叫阿什利·达灵顿·克罗克福德三世的人解开了，书名叫《野火春梦》，是个叫梅根·弗兰德斯的人写的：

昨夜，一个炙热的吻，一个永无完结的时刻，他粗大的双手紧抱着她柔滑的皮肤，把她贴在他坚实的身体上，她觉得自己好像要融化了，她温暖地敞开着，像是教堂蜡烛上燃烧着的蜡。

好啊，里甘，才是第17页啊？在29页就已经带着“这种想要融化的欲望”，好啊，好啊，那你怎么能（“她知道他会带领她”）到了第189页（“像是根烧红的铁棍一般在挺进”）还没被刺穿？看看34页：“第一，我们得小心些。你不会怀孕吧？”一种心理避孕套。

《永远浪漫系列图书》编号5A3Z8。收银员身旁没人，绝对年轻的她正用自己纤细的手把那本《阿道夫·希特勒之死》推到一旁。穿条纹衣服的人走了，没买那书。或许是他挑书的时候没注意把它和自己的旧书混在了一起，付账的时候又看见了，然后他

^①关于希特勒的那本书既吸引亚当，又使他害怕。因此，当书被人拿走后，他自我安慰，认为那是上天的安排，因此不去从那个人的手中追回。





说：“我不要那本。”收银的女孩是不是太年轻了，这书对她没吸引力？她把那书推到几个装钱的塑料盒后面，盒子里装着卷了角的纸币，手指下摊开一大堆的硬币。这就是对待钱的方式：不加区别地把钱放在可回收的塑料盒里，堆在你面前，仔细分清楚，怀着对数字的崇敬把数目和税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算出来，然后又堆成一堆，把给你的挑出来，最后，一股脑儿把纸币、硬币、塑料盒和灰尘从桌子上的那堆脏书当中扫进一个袋子里——亚当放下手里的书，把那本希特勒放在了最上边。

“这本也要。”

“太好了！”那女孩叫道，其兴致没法打断。她只是个柜员，她揭标签的手挥舞着。“精装本的一块，简装本的两本一块，总共两块，谢谢先生，祝您今天愉快！”

不用交1毛4分钱的税。他点着头，想把她看得清楚些，可他的双光眼镜却对不准焦距：要是想把她看清楚，他刚才就应该把眼镜取下，把头伸到离她那红润的圆脸蛋儿不到18英寸的地方，或许还应该用力托着她的肩膀把她举起，那他的眼睛就……你不能在公共场合碰一个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她甚至都没在看他，她嘴里说出的好像也正是他所听到的。祝您今天愉快：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过你自己的去吧。到了街上他才看清第三本简装本的书，他拿在左手上给忘了：封面上的人有些谢顶，脸色阴郁而怒火中烧，书名为《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这本书要比其他书大两倍，其实，有对开本那么大。

不经意间的偷窃，偷了5毛钱，可他没有回去。等他意识到自己偷了东西时，他已经走到罗切戴尔学院的院墙下了，这可是在60年代被隔离了的福地，所以拿一本旧书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几乎要大笑起来：他在政治上左倾得很正确，偷了本诺尔曼·白求恩的书！

亚当坐在旅馆床上，他的腿伸着，眼镜放在他身旁，眼镜旁是本揉旧的小说，就是格林写的橙色封面的那本。下午的阳光斑驳地斜射进房子里。电视里那个壮硕男人的声音还在嗡嗡个不停，亚当按下遥控器的静音钮，声音消失了。他记起来，在神圣的布鲁尔街联合教堂的砖混大厅中，曾为小说家玛格丽特·劳伦斯^①举行过盛大的追悼仪式。为什么善就不能隐藏在旧书堆中呢？在老砖头和裂了缝的水泥墙后，在被小便浸透的拐角处，绕着那些脱了皮的、向一边倾斜但却是存活了下来的树木，为什么不可以耐心地等着一月的葬礼，等着这葬礼可以使你变得纯洁，变得关心别人，变得心中充满永不消逝的感情，让你可以至少与自己小小家庭中的几个成员重归于好，这是人类都在祈祷的善，在你意识到它之前，你的胸中会像忍受痛苦般被它所涨满，你能让自己抵御住它执拗的诱惑吗？他以前一直都是个懦夫，在善的面前，他一直都是个头脑混乱的弱者。把自己隐藏在工作中，或者找借口，或者——躲起来；若不是藏身于空虚之中，就是躲在那些总会被人在痛苦中遗忘的死者之中。

他已经把那本希特勒翻到了第51页，看到第12号文献中令人无法理解的残酷：

关于一具男性尸体进行的法医尸检……遗骸……因火而无法辨认，火从木盒中燃起……火烧后尸体严重炭化，并有恶臭……身高165公分（5英尺4.35英寸）……面部与身体部位皮肤全部烧毁……亦缺少部分头盖骨……柏林书，卷8，1945……上颚处9颗牙齿被一黄色金属物（黄金制）连接……心脏肌肉坚硬，看似块煮熟的肉……下颚共有15颗牙齿，其中9颗假

^①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加拿大著名作家，著有《石头天使》、《上帝的嘲弄》等作品。去世后她的葬礼就是在布鲁尔街联合教堂里举行的。





牙……阴囊虽已烧焦，但仍保留，其中只发现右侧睾丸。左侧睾丸未发现……有苦杏仁味……左脚缺失。

这样的极右翼分子，右得连左脚和左边的睾丸都没了？是不是左边的头盖骨也没了？这可真有意思。

有敲门声。又一下，如同倔强的记忆。在敲他的？没人知道他在这儿。又是一下轻轻的敲门声，还有更清楚的钥匙的哗啦声，他叫了声：“谁呀？请进！”

他听见门开了，是旅馆的服务员。她裸露双臂，但她臂上和脸上的皮肤并不像她纤细双腿上的黑长筒袜那么黑。她的头发美极了，但还可以再黑点。

“噢，对不起。我想来收拾一下床铺。”

她可能是这样说的。他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她向他走过来，站到两张大号床之间，离他很近，她把一块用锡纸包着的长方形巧克力放在了电话机旁，电话在他胳膊肘前的桌子上：两块。她是不是觉得他在等什么？她背冲他，从他没有坐着的床上拿起床罩和毯子，把它们叠回三角形，熟练地压在白床单和白枕头的下面。她用手指内侧把边沿一下子捋直了，她手指内侧的皮肤是灰白色的。

黑色布料下如此苗条的腰肢；如此紧绷。他从她制服腰间的缝隙看见了一线肌肤，他看着那缝隙说。

你想不想再多挣点儿？

她直起腰，有片刻的犹豫，然后转过身。两张床放得太近了，他快碰到她了。在他近视的焦距处，她右手指间拿出了一个塑料包装袋。一只避孕套。

你得再加上 7% 的优良服务税。

他双腿向她伸去，她现在正站在他两膝之间，站得很近，他的鼻子可以碰到她制服上的扣子。灰色的扣子从她胸前系到了

深色的V字领下，下面系到了她大腿中间，一条上下笔直的线，5粒纽扣只为了解开方便，系上方便，进攻方便，在她的手指下，纽扣一个一个解开了，从上到下，他不用动他的头，他能听得见，她里面什么都没有穿，他能听得见，她只穿了连裤袜，比闪着微光的肌肤还要紧绷的黑色织物；她的躯体就在眼前。好像它曾理所当然地一直在那儿。

我们身上自有奇迹，但我们却在身外寻找：我们身上有非洲，还有她众多的奇迹。^①

这完全是托马斯·布朗爵士的白人神学。亚当看见自己灰白的手挥了挥，她向旁边稍微侧了一下身，用细长的手指（她右手的指间还拿着那个塑料袋）在腰间拉开了连裤袜的皮筋，把它从臀部褪下，从她修长的双腿上褪下，连鞋子一起都脱掉了，先是左脚，然后是右脚。

还有什么？

她无尽的黑色肌肤似乎在迎着他的双眼。他想向后靠一靠，想看见她的脸，而她立在他的面前，她的高山幽谷都在他面前，这让他没法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不要紧，因为她正在做着只要他想着自己可以，自己就会想像的事：她抬起双臂，双手托着自己的乳房，样子无以言表，她的乳头凸起，她的乳房丰满，脖颈细长，要是她把头弯向他，她就可以用自己湿漉漉的舌头卷住乳头，哪一个都可以，好像她正把不可能的可能说给了他的眼睛，在他的耳边数着。

还要吗？

他在动摇，或许在退缩，可她的手还在把乳房托高，从肋部

①引自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名著《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书中他没有像许多白人那样，把非洲作为黑暗、邪恶的象征，而是把她作为奇迹的代表。





扯起，已经完全变形了，她像脱毛衣一样把双乳往上拽，拽过头顶，把它们一声不响地扔在身后，她的手很快，如水一般滑过肌肤，滑过髋部和臀部，滑过大腿间的阴部，滑过大腿（那一小片塑料时隐时现），然后伸向她的腹部，她的腹股沟，正中是长满黑黑卷毛的小丘，自从她面朝他，那小丘就在那儿，离他的脸只有一个舌头的距离，然后她不见了，成了那东西。一旦她可怕的手摸向她精致的脸庞，谁还能说站在这儿的到底是不是她？这可怜、赤裸、叉开的动物。^①

“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先生？”

她站在门口。也许是因为亚当摇了摇头。门呻吟了一声关上了，他瞥了床一眼，想看看她有没有落下她脱掉的东西。什么都没有。

在橱柜间的电视机屏幕上，那一男一女还是静静地呆坐着，还在说着什么。这个电盒子可以给亚当送来所有的脊背、脸庞、乳房、手、撅起的屁股、乳头、膝盖、阴部、胳膊肘、头发和大腿——加拿大的旅馆可以提供人体的任何部位，除了插入的阴茎和屁眼以外——整个的或是部分的人体，在一小时又一小时无尽的承受中呻吟，喷绘出的颜色一点也不像布朗迪德国种牧羊犬尸体上强化出的色彩与密度，那狗是德国牧羊犬的一种，它们的领袖，导师，主管，司令官——神。跟着那6个戈培尔家白色、灰色和黑色的孩子：希尔德，海尔姆特，希罗德，海达，希德，海尔加，名字都是字母H开头的，为了表达他对那位先生无以言表的敬意，也随着第三帝国的坍塌，他们齿间还留着长眠前唱的颂歌：

合上你们的小手

^①其实以上这段仅仅是亚当头脑里的思绪，作者为了表达他的意识，对女服务员的话没用引号，以表示旅馆房间里的那一幕并没有真正发生。

低下你们小小的脑袋

想想希特勒^①

合上你们的小手,低下你们小小的脑袋,想想希特勒。用英语表达不出其中的意义。所有孩子的尸体都被苏联验尸官仔细地解剖过,两个中校,三个少校:每个孩子的大脑,每个孩子的舌头,每个孩子的肺,还有他们带着苦杏仁味的肝脏。

每张小嘴里都有碎玻璃。这只是欧洲百万具如山般尸体中的几具,是他自己曾抱在怀中,又让他们去死的;他自己的。这6个无辜的小生命,再加上4个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的大人,揭示了这样一个人人都已经知道的道理:除非把尸体放在科学设计过、且能充分供给燃料的炉子里,或必要时堆起,不然人体会很不好烧,烧起来会很不充分。要一个个依次放进,然后还要在里面小心地翻个个,要小心地劈开,小心地添加木柴。

亚当觉得胃里一阵翻腾,像生病一样胆汁在倒流。他盯着另一张床,盯着上面叠成三角形的崭新被单。

他身边,在其他书的下面放着那本最大的:他不经意间从教堂大厅里拿出来那本。苏珊娜会这么说,这就是你,你的潜意识会让你去挑那本书上的脸,那是张愤怒中透出些可怕的诺尔曼·白求恩的脸:有些人隐隐约约觉得他是个好人,可他却一直是、整个一生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混蛋。嗯,亚当会这么回答,但不是照领袖的说法。领袖又知道什么,他只见过白求恩一次,连他的一封信都没回过。好啊,可他的确是牺牲了自己,而在那时没人要求他这样,没有一个国家要求他这样,他原本也可以变得很富有。也可能是他知道自己快死了。我们都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他病了。可他面对死亡的方式总归要好一些,很

^①原文用的是德语。





明显,他变得越来越好了,可他从那个坏疽处流过的血液却让他的全身开始腐烂了,一直到手指尖。这只是官方的纪录,很有可能他的龟头也腐烂了。你会觉得要是一个人即将在痛苦中死去,他的肢体末端开始慢慢、慢慢地腐烂,他会有可能在最终时变得善吗,有这样的可能性让他变得“至善”?希特勒决不会的,他变成了碎块,头发,牙齿,大脑,他是变得更坏了。所有这些,都是从一个睾丸开始的,你在经历着濒死的痛苦吗?

亚当躺在床上,他想笑。他想跟她说,不行,他的睾丸没问题。别的地方也不行,尽管这是无可避免的。痛苦啊,在这个舒适得让人慵懒的加拿大旅馆里,刚有一个高个女人给他整理了床铺,还留下了两块精致的巧克力:他觉得空虚和孤独,但是——很不幸——他从长期的经验里知道,这不是通向死亡的痛苦。在这间被人遗忘的房里,他的指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或是让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但要是苏珊娜在这里,跟他一起躺在这张床上,或是在浴室里哼着歌——或是崔茜躺在旁边的房中,或是乔尔——他在多伦多有些认识的人,有男有女,但这趟行程,不管得花多长的时间,只是他自己的“空虚之旅”,要保持这种空虚,他得去听场音乐会或看场喜剧。去看约翰·坎迪主演的滑稽片。或者跑去中国。

他原本可以,他原本可以为了“大跃进”自己到中国去,到中国向领袖展示另一个甘于奉献的加拿大医生可以在另一场革命中做些什么,这次是1965年,是“文化的”革命。他的年龄正好适于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他原本可在政治上和医疗技术上做好准备——可他那时已经结婚了,苏珊娜当时快要生崔茜,他正要开创自己一生的事业,他不想依靠医疗保险。一个解放了的门诺教徒,当他可以在辛勤工作后变得富有的时候,会去选择文化和革命?崔茜曾有一次问过他,他差点儿就去了。

幸运的白求恩。继承了社会地位和财富,有一大堆的情人,

人又聪明，一次失败的婚姻很快就完了，没有孩子，10 年当中为了逃避参加了 3 次人们广泛参与的革命，俄国的，西班牙的，中国的，都是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都是在地球的另一面，都是在自己有幸不会说的语言当中：你对所谓的“拯救生命”感觉很好，尽量多看些受伤的士兵，然后把他们再健健康康地送到战场上送死。从 1938 年 8 月 21 日中国那座与世隔绝的五台山上，你最终这样写道：

长期以来，我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开心。我很满足。我在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我怎么会不开心呢——看看，我的财富中包括……人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同志是真正属于革命的战士——是布尔什维克。平静，镇定，聪明，耐心；不可动摇的乐观；温柔但却勇敢；苦里有甜；大公无私，态度坚定；他们的仇恨无法遏制，他们却热爱这个世界。

如此平静地描写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们的恨与爱，温柔与勇敢孕育了想要去统治整个世界和世上所有人的梦想。谁是他们的领袖？这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从成吉思汗那里就遗传下来的意识。说得唐突些，白求恩娴熟的手术刀只是暂时的，可他把字母顺序如此巧妙地重新排列过，却不是每个医生都可以辨识出的：“那身体是多么美；每个部位是多么完美；每一下移动是多么精巧；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撕裂后是多么可怕。”可要是焚烧了，还会美吗？“那小小生命的火焰[!]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在一闪过后，熄灭了……如同是一根熄灭了的蜡烛。静静的，柔柔的。它曾抗争，熄灭，顺从了。”哼！

……4 个日本犯人。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





体中没有敌人。把身上血迹斑斑的制服剪下来。把他们抬到其他人旁边。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和兄弟一样！……

如此残酷和愚蠢之后的原因又是什么？百万的日本工人来到中国，来杀害百万的中国工人，来斩断他们的肢体……从中国工人的死当中，日本工人得益了吗？没有，他能得到什么？……那么，看在上帝份上，谁会从中得益呢？怎么可能去煽动日本的工人来侵略……他身处贫困之中的兄弟，他身处悲惨境地之中的兄弟呢？

但是，当然精神上白求恩会坚信人人皆兄弟，所以他可以去中国，然后做好事死在了那儿，他可以去那儿，做好事还在看着：发生在那儿的一切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当然，他理解也深深同情着——亚当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1963年那个躁动的11月，在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讥讽让他知道自己正在重新评价自己——在远处，我总可以孤单地写写家信，可我回到家以后，我却无法忍受那些蠢货们，他们觉得仅仅知道我就可以把自己想像成我的朋友，但他们却想不出来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我已不是原来那时的只言片语中的我了。我也可以跑到这世界上我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中国的五台山，我已经听说过它的名字了，可我却没办法开车沿着公路从埃德蒙顿到卡尔加里，然后敲开那家的房门，里面的那个女人现在和我仍然是法律上的夫妻，就算她开了门，我也不能和她打招呼，不能拥抱她。

有时她的声音会和他的声音相遇，但却不会碰到。我们的儿子离开了，我们的女儿走了，而过去的镜子却无法打破。

我是怎么了？

电视上的两张嘴还在动着，看不出什么表情来，大概还在解

释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样一个性格懦弱的人是如何被所有他见过的人所利用了——被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组织，有政府的，也有非法的，有美国的，也有苏联的，也许甚至还有古巴和墨西哥的——他们在解释，这样一个独自行动的瘦弱之人是没办法计划和执行得了这次刺杀，他要杀的人可是处于世界上最严密的保护之下，又取得了如此辉煌而难以后继的成功。其实，他碰巧能在德克萨斯州教学书书库大楼的6楼得到份暂时的工作，他能够用一支连发式步枪在不到6秒的时间内打出3或4发子弹，子弹又是如此准确地打中了正在离他远去的目标，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射出的最后一颗子弹打烂了约翰·肯尼迪的头，当时杰奎琳·肯尼迪张着嘴却叫不出来，她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慌忙地向汽车后部的行李箱那儿爬去，想把那些血淋淋的碎片拾起来。这里有一个科学上的问题：如果那颗致命的子弹是从车后方打来的，那么那些头骨碎片还会落到它们后方的汽车行李箱上吗？

那个壮硕的男子和那个消瘦的女人正坐在桌子后面说着这些，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亚当不用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一动不动的身体就已经把看不见的话都说出来了。他现在坐着的这间屋子就跟其他任何大城市里的屋子一样无聊：听得见车流的嗡嗡声、水管和暖气管子的声音，20世纪白天的噪音萎靡地消失了。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流泪的，没有什么值得哭泣的，这里只有悲伤记忆带来的颤栗。如常一样，尽你所能避开最坏的；寻找空虚。

在电视机上，琐碎的事件片段还在以无法停止的线性顺序缓慢行进着。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总是喜欢书了，书有特殊而不受时间约束的独立性。可以很愉快地拿在手中：开始，中间，结尾，只要你愿意，可以回过头看任何人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在这里，用不着镜子。亚当拿起了书，于是：





《希特勒之死》:

尸体如 15 岁女孩外观,营养较好,身着浅蓝色带花纹镶边睡袍。身高:158 厘米[5 英尺 1.6 英寸]。从乳头处量得胸围为 65 厘米[25.4 英寸]……尸体表面未见外力伤害痕迹……嘴中……玻璃碎片。

《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毛泽东,延安,1939 年 12 月 21 日)

《野火春梦》:……一本白痴浪漫小说知道火是什么?可不是老掉牙的爱的意象——全是燃起的火焰,烤焦了的身体冒起烟来,尖叫起来。亚当把那书扔到了地上。

《待售之枪》:

“噢,我很抱歉,”她说道,“我以前说过的,没有吗?如果我把你的咖啡给洒了,我会说对不起,可在这些人被杀害之后,我现在得说……”她哭起来,但却没有流泪;就好像是输泪管给冻住了一样……

“一样的,”安妮说道,雷文用短外套盖在了她身上:雷文摸着她冰凉的手说:“我失败了。”

“失败了?”马瑟说道。“你是最大的成功者,”有那么一阵子,安妮觉得这种失败感可能会永远留在她脑子里了,会对她今后哪怕是一点儿小小的幸福产生影

响；这应该是她永远不该去解释的：她的爱人也永远不会明白。但随着他的脸不再忧伤，她又要失败了……

亚当把那本“娱乐”放在了床上——这书只有在格林自己的小说里才会这样叫。他僵直地从揉皱了的床单那儿站起身，走过无声的黑色电视机旁，电视里还在播放着拍下来的没用照片——可是，从这里你有时还能找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计划自己生活的人；相信着有负责行为的人；有些人还真相信那些控制着世界的体面人物，相信着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相信他们可以为这世界做出决定。谁可以一方面还相信着自己不断摇摆的希腊式的理性头脑，一方面又隐约地觉得有个希伯来式的上帝，还可以从他那儿得到希望，希望那神可以帮他们做出向善的抉择。

浴室的门开了一角，里面都是镜子。镜子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灰白色的头发乱糟糟的，一件旅馆的浴袍系在身上，两条腿有点向外撇着。

亚当转向了他身后的镜子，还有他的手——他想确认一下。他把帘子拉到了一旁。在他四周，层叠的都市建筑已经变成了一片灯海。

他想这样就很安全。就像是格林那本书里的安妮，他想着，哦，我现在到家了。他原本应该把那书扔到布鲁尔联合教堂的大厅里，他原本应该顺着台阶走上教堂的中殿，那儿有高高的玻璃窗和环绕一周的木制走廊。在那儿，他可以听得见风笛进来时吹出的悲伤的曲子，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回荡在鲜花丛中，那声音在玛格丽特·劳伦斯的悼念仪式上一定是这样说的：知道他们需要上帝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了；还应该能听到这样的歌声：“欢欢喜喜到他的面前”，而唱歌的人是因她而聚集到一起的





不寻常的群体。如同劳伦斯笔下的夏甲^①，他想到：真该有人知道这些事。

他身下的 27 层楼下，有一个影子正顺着这座大楼的地下室移动着。我失败了。就好像他可以听见脚步声一样；或许还有一下敲门声。哦，我很抱歉。

他把自己的耳朵贴在了窗户上。它在那儿，很凉。

^①夏甲为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小说《石头天使》中的主要人物。

第 18 章

我的哥哥万亚

1980 年，弗莱登什安第四村

巴拉圭 芬赫海姆聚居地

就像我跟他说的，加拿大来的亚当·威伯是我的一个“颠来倒去都是亲”的双亲表兄：他是洛温那边的第三代，威伯这边的第二代。为这个我们都笑了。他又跟我说，说他很愿意听我说话，说他自己差不多飞到了这个世界的底儿上，他来这儿不是为了听自己说话的。我告诉他，我听说世界是圆的，我觉得他住的北边要比我住的南边偏得多，或许他才是住在底儿上。我们又都笑了，有太多的话要讲，10 天可能只够开个头。

“我出生在 1925 年 11 月 25 日，名字叫大卫，是为了纪念我爷爷洛温。我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是星期天，是在俄国奥伦堡城区北边的门诺教徒聚居地，当局把它更名为恰克洛夫。我生在一个叫罗曼诺夫第八村的村子里，村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沙皇起的。我母亲玛丽亚告诉我，那天大清早我出生得太快了，要是那时他们还有一辆马车，我父亲就会有时间驱车把我们母子送到第五村教堂去。确实，她说我轻轻松松地来了没什么好奇怪的，11 个孩子中我最小，包括我，只有 6 个活了下来。

“奥伦堡聚居地曾经很富裕，但是经过革命和内战之后，到 1925 和 1926 年之间的冬天，我们村已经没有什么了，我母亲说





只剩下空空的肚皮和快死的孩子。当时,这两样都太多,也没人在那时能够想得到,我的生日会和我们以后在巴拉圭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奥伦堡的门诺教徒们那时是否听说过巴拉圭,或许他们连南美洲也没有听说过。但是,这儿的门诺教徒把11月25日作为我们被迫离开的纪念日,就像感恩节一样庆祝。这天我们庆祝1929年逃出了魔掌,也纪念成千上万离开了我们的人们,就像她的约翰,也是我们的父亲约翰·洛温。想起他,我们心里总会觉得很温暖,想起他,我们总会觉得很难过,泪水会涌出来。

“我不记得见过我父亲。一点都不记得。虽然我曾经试过,曾经盯着他的那张照片使劲看过。我对任何事物最初的印象都很清晰,所以那一定是在他离开之前。太奇怪了,我把这事想了很多年,但说不出一个字,甚至对我亲爱的妻子都不曾提起,她用胳膊搂住我的时候,我还在想。最后,直到我坐在快要死了的母亲床边,我才意识到。那第二个记忆跟第一个一起来了,那时我还很小,我在一位黑衣的女人前边,她正坐在椅子上。她怀里抱着个婴儿,我觉得那婴儿的脸正贴在一只光滑的白瓜上面,那白瓜从她敞开的衣服间伸了出来。我问她这婴儿在做什么,她说他像其他婴儿一样在吃奶。我觉得好奇怪,一个婴儿怎么能那样吃一只这么硬的瓜,而且是在冬天。虽然我以前见过不少婴儿,但却从没见过这种样子。我们是在卧室里,卧室床上堆满了来访客人的棉衣。我伸出手摸了摸那瓜的头,它没有一般的瓜那么硬,它软软的,像我用手指摸到的稀饭一样暖暖的,就是有时早上被一勺舀起、在饭碗里等着我的稀饭。噢,那时我在想,要是我们每天都有稀饭喝那该多好!我对她说,是你,婴儿在吃你!但她笑了,不,不,你看,他吃我的奶水。她把婴儿的光头靠到一边,我看见了黑黑的奶头,中间白色的一滴快变成浅蓝色了。这时,婴儿生气地叫了起来,双手到处乱抓,她又把他

搂紧，哭声止住了，他咯咯地叫着。我看见婴儿的小嘴紧紧贴在那儿，很快地吮吸着。只有和‘瓜’连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最初的记忆——为什么以前我从未看到过？难道不傻吗？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的乳房？”

亚当·威伯是我的表亲，但又是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他有张宁静、贯注又是医生模样的脸。我怎么会把这些事告诉他呢？这可是些男人们都不愿承认自己想过的事。但是他的表情，他的目光没有变，好像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事情，是有更多的事。

“她的乳房，我是说我妈妈的乳房，并不像我看到的这个年轻女人的那么丰满，我只记得她皮肤的皱褶在我眼前和拳头那儿移动，我的小脸贴着那皱褶，碰到了她的肋骨，在她躺在那儿的时候，就突然记起来了。我抓住她的手哭起来，在她躺在床上的最后时光里，我没法把自己跟她说明白。你不能对自己的母亲说那些。”

“奇怪的事，”亚当说，“在死人的床边人们总想些奇怪的事。通常都是美好的事才能让我们觉得舒服。”

他说的低地德语总是以n结尾，和我的一样，很好地继承了舒尔什奇的传统。但还是听起来有点儿不同，或许是更陌生的英语影响了他的低地德语。我们在一起感到很轻松。

“我的老妈妈，”我说，“那时给我讲的大多是他们早年在巴拉圭的日子。在医院里讲的最多，以前她从未这样过。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还想告诉我更多的事。那时是在1967年夏季的酷热中，但是奥伦堡的一月却总是非常冷。在巴拉圭生活的人想不到，那儿的河流都结着冰，地面硬得像石头，而且他们总在挨饿，那时还在苏联，我们的父亲还没有离开我们。生活很艰难，我母亲不得不熬了40多年，她说只能默默承受。在俄国，她喂奶水把我喂到了差不多两岁，而她也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我前面的彼得和安娜死于内战的时候，还不到一岁。1925年夏天，我们





的最后一头奶牛也死了，他们没钱再买一头，甚至也不能吃肉，因为那牛有病。所以，他们把它给了还有头猪的人家，家里只有最后一堆粪可以晒干后放到炉子里烧了。”“我的约翰”——妈常这样叫爸——和我大哥万亚把牛皮鞣了以后换了些谷物，能拿些来煮粥。那年冬天我们吃的就只是燕麦和大麦粥，有时也能吃到用点儿油煎的小麦饼。

“你就是最后一个孩子了，我一直都知道。”妈妈摸着我的头说道，她的手因为关节炎和无休止的干活变了形。只有我和她在一起，我42岁，很强壮，结了婚，还有一群健康的孩子，而现在这儿的一切也还能糊口。有时，我不敢去想她就要离开我们了——离开了——我把脸埋在她薄薄的床单里，外面的人就听不到我哭了。“大卫，大卫，你是个漂亮、强壮的孩子，就像高大的威伯家人和粗壮的洛温家人一样。在我结婚时，我们就相信上帝会给我们一群健壮的孩子，我祈求上帝让你活下去，让你能长得像万亚一样强壮。”

“就像他们说的，仅仅是‘约翰’这个名字就能说明他是个门诺教徒了，他们也得用俄语叫他，既开心又简短。我母亲说这个也在喊万亚，那个也在喊万亚，世上没什么东西能让他灰心丧气，14岁时他就很强壮了。他和父亲一起鞣了牛皮做鞋子，以后有好几个冬天，他们又把旧布和羊毛蒸压在一起，做成皮靴里的毡垫。就在我出生的头一年夏天，他们又搞了一个榨油作坊榨葵花油，开始是用邻居的马拉一台踏车。第二年春天，万亚赶车去了一趟奥伦堡，带回了一台小小的蒸汽式榨油机。来年夏天，他们又买了一台打谷机，然后，人们种了更多的向日葵和谷物来吃。过了几年饥饿的生活之后，整个村庄、整个聚居地的情况慢慢好了起来。可那时领袖死了，1928年搞集体化的那些人拿着元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了奥伦堡，他们带来的是灾祸。嗯，父亲是在第二年播种之前离开的，我21岁的哥哥就成了家里的男

人，他静静走到母亲身边说，‘妈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要去加拿大吗？昂克尔·尼古莱·威伯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看，托恩特·特恩和她家的亚伯拉罕也觉得有可能。’”

“那是我的父母吗？”亚当问我。“1929年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动身去莫斯科吗？”

“是，他们知道，到了29年7月大家都知道了。我母亲说你父亲亚伯拉罕·威伯听说了村里的一切，还有你母亲，她脑子转得要比犹太小贩数零钱还快。‘万亚！万亚！’我母亲临死前还在念叨着她的大儿子，而她已经没有眼泪了。很久以前到巴拉圭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哭干了，她说那就像是一把刀插在了心上。但是，29年时已经没别的出路了，只能想办法离开，想办法逃走。可是，就算她离开了，她能忘记了她的约翰已经埋在坟墓里了吗？她能忘记去祷告、忘记了哭泣吗？”

“1929年1月3日晚上，警察也就是‘格伯乌’来过，他们把我们的父亲拖到奥伦堡去审问，然后他就消失了。为什么？就算比那再早几年，布尔什维克也不会解释为什么。把榨油机和打谷机带到村里之后，他就成了个‘富农’，可他们一把他带走，反倒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把我们从集体化委员会最可怕的做法中给救了出来，他们当时并没因为家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惩罚全家，后来他们才这么干的。我们从没被划成过最好的‘贫农’，可他们把他和榨油机带走以后，他们把我们登记成了‘中农’，这比‘富农’好多了。一个秋天晚上，我们知道他们的划分以后，我大哥万亚找到了当地农庄的头头，跟他说我们想去莫斯科，那儿现在有3000多门诺教徒想逃离这个国家。万亚没说莫斯科这几个字，当然，也没提到我们的安娜和她丈夫，没提到她丈夫那边的彼得·威伯全家和你父母托恩特·特恩和昂克尔·亚伯拉罕，没说他们都已经到莫斯科了。万亚只是说：‘你不想让我们呆在这儿，给我们通行证我们就走。’”





“我母亲说，这个集体农庄，也就是俄国人说的‘kolkhoz’^①的头头隔着桌子看着他。万亚没跟他再说更多的话。他是我们的表亲尼古莱·威伯，与万亚同岁，都22了，我们都叫他科里亚。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村子里还有学校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去学校。科里亚经常在白天到我们的榨油作坊干活。他是威伯家里最聪明的那种，他是雅各布·威伯八个儿子中的老二，老威伯12年中都被选为奥伦堡门诺教聚居地的头，而现在科里亚实在是幸运：他家很穷，政府把他安排在了大桌子的对面，那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印章和文件。”

“所以，”亚当慢慢说道，“在1929年，有个叫科里亚·威伯的当上了罗曼诺夫第八村委员会的头吗？”

“是，是集体农庄的头。是你父亲最小的弟弟尼古莱的儿子。你的亲堂弟。”

“他们可真会拆散家庭，不是吗？”

“比谁都在行。他们像魔鬼一样聪明。”

亚当和我站在我们果园里的一棵树下，他在挤我递给他的一只桔子。起初，他还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在同一时间，树上既有闪着光的嫩叶，又有明媚的花朵，既结着青桔子，又结着熟透了可以吃的黄桔子。我告诉他巴拉圭很少有奇迹出现，但很幸运，奇迹总是和吃的东西有关。他沉默了许久，我最后问了一句：

“你父母跟你讲过他们是如何到莫斯科的吗？1929年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

过了一会儿亚当说：“我记不清那些故事了，我会再问问我母亲。我知道我威伯家的两个叔叔，还有他们家人从莫斯科被送了回来，送回了奥伦堡。”

①俄语集体农庄的意思。

“是，”他停下时我说。“是彼得·威伯和尼古莱·威伯。”

“是，是他们，但我父亲从没提起过他们。他不想说。他曾说过我姐姐，就是玛格丽特，他们在他们逃到德国难民营时还是个婴儿，她老是生病，可没人知道为什么那些加拿大医生每次巡视时，总给他们家盖上‘健康’的戳子……也可能他们都跟我说了很多，也可能是我太笨了，没听清。我现在就问我母亲。”

“有时人们老了以后，他们会说得更多些。”

这个亚当·威伯只比我小10岁，蒙主的恩典和怜悯出生在加拿大，做了医生。他受过那么多的教育，人也那么聪明，生活也富裕，只要他愿意，有天他就可能当上整个国家的总统，他们那儿从没像巴拉圭这样有过独裁者。我们听说加拿大是个避难的好地方，他们说只要你聪明勤快，那儿的一切就会很容易，只要干活就行了。

“那些加拿大的医生一定都去过默尔恩，”我告诉他，“在那儿的难民营里，德国和加拿大政府的人会在汉堡的船前边把难民们分成几等。”

“你在那儿，你记得吗？”

“我那时4岁，身体很好，也讨厌加拿大医生，是我妈妈说的……”我得笑笑。“没有像你姐姐玛格丽特那样的奇迹！我让那些医生很容易地就说了不行，这个不能到加拿大。要是我还记他们的仇，就用50年热带的太阳把它从我这儿烤干吧。”

一个门诺式的好笑话，亚当跟我一起大笑起来。要是他愿意，他的脸也会很温暖，甚至还会看起来很友好。他在捏软了的桔子顶上咬开一个小口，把果汁挤入嘴里，吮吸着。

“味道真好，”他说，“很甜。所以，大卫，我们的表亲科尔亚·威伯29年就是一名党员了，一下子就成了罗曼诺夫苏维埃政权的头头了？”

“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信不信革命，但是他在为他们工作。”





许多人都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科尔亚是尼古莱·威伯的儿子，或许就是因为他，尼古莱家才在29年被从莫斯科送回了奥伦堡，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没能离开。在那些科尔亚和我哥哥万亚还是学生的夏天里，他们常在远处8号山上放村里的奶牛，山是从公墓那儿向南延伸的。那儿空旷的草原上什么都没有，在随风摇摆的草丛中，你能看见的只是周围的青草和头顶上湛蓝的天空。在云里，他们也许看见过轮船、火车，也许看见过像门诺教徒曾修过的那种磨坊：风中转动的巨大扇页可以把水从坝下泵上来，或者也可以碾磨谷物，然后奥伦堡聚居地上23个村庄里他们认识的每一个人就都有吃的了。或许他们还看见过双翼飞机，他们会想像，有一天，他们也能像小鸟一样在上帝的自由空气中飞翔。但是，对那些他不得不用沉重的印章，科尔亚却什么办法都没有。从莫斯科的头头那儿来的命令就跟小乌伦河中的圆石一样——如果你躲不过，或是从中找条道绕过去，你就会葬身其中。”

“我没有到莫斯科去的印章。”科尔亚告诉我哥哥。

“那么给我一张通行证，让我去看看我父亲的坟，”万亚说，“为了全家。”

“有人告诉我母亲说，父亲已经被定成了富农，已经被送走了。等等看，玛丽亚·艾布拉莫芙娜，会有人告诉你怎么给他写信。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和他一起坐牢的两个人的家人那儿知道了，那两个一个是第七村的，另一个是第五村的。一天早上，在奥伦堡的基洛夫街上的灰房子里，他们认出了父亲血肉模糊的脸，那时，正好一张桌子上的单子滑落了下来。他们说在地下室里，清早时总会有尸体躺在血已经干透了的单子下面。”

“我那时3岁，对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我们只有一张在罗曼诺夫第八村拍的小照片。父亲在右边坐着，万亚在左边，中间是妈妈和我们4个小家伙——最大的玛丽亚不

在这儿,她已经嫁人了。我是个小光头,坐在妈妈膝盖上。我父亲 50 岁了,跟我差不多一样秃,只有耳朵根子上面还有一缕头发。但我哥哥的头发却是刚剪过的,他的头发像毛皮一样浓密而有光泽,铺满了他瘦长而憔悴的头顶上。”

“科尔亚隔着桌子对万亚说,只有格伯乌的人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你父亲的坟在哪儿。”

“有吗?”

“我发誓,万亚,我不知道。我不能问,特别是为了亲戚。”

“那就给我一张通行证吧。”

“我跟你说过,什么地方我都不能写。”

“好吧,”万亚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处去找坟墓了。就这样写,约翰·洛温家人,母亲玛丽亚·艾布拉莫芙娜·洛温·威伯,与其 5 子共 6 人,获准探望其父约翰·洛温之墓。只要盖个章签个字就行,没人能认出你的签名。”

“从章上能看出来是奥伦堡,一杆枪就能让你站住。”

“大不了我们被枪打死。”

“不对,”科尔亚说。“最糟的是把你们全塞上火车运到北方,到梅津河畔的沃洛格达森林去。或者更糟,送到沃尔库塔去。”

“你也可能去?”

“难说。”

“1929 年 9 月,尼古莱·威伯家的小科尔亚就知道这么多了,太多了。20 年后,我们从经历过二战的难民口中知道的一定是真的:还没到 25 岁,他也消失了。”

“但是,”在巴拉圭的果园里,亚当跟我说道,“他把通行证给了你哥哥吗?”

“他一定给了,我们去了莫斯科,逃到了德国。”

“但是科尔亚一家人也去了。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我妈妈说他没有。她从没听说过尼古莱·威伯一家人是如何去那儿的。但在11月25日之前，格伯乌就把他们送回了罗曼诺夫第八村。”

“彼得·威伯一家人也一样？”

“是。”

突然间，从他的神情中，我知道亚当对我们家族的了解远不止他告诉我的这些。像我们中每个人一样。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万亚活到了几岁？”

“没有科尔亚长。1930年12月24日，22岁零11个月1天。”

“但那时你们已经到这儿了，除了你父亲，全都安全地在巴拉圭了。”

“是啊，安全逃离了那些迫害者，但地球上还有别的。”

他的声音有些怪，“总有些‘别的’让门诺教徒们继续受折磨。”

我理解不了他的口气。“是斑疹伤寒，”我告诉他。“在查科的第一年，不到350家人就埋了94个人，其中44个是孩子。”

“死了94人，一年之内？”

“我姐姐玛丽亚的两个孩子也在其中。发热和痢疾，43人死于伤寒。有一家人全死了，父母，3个小孩，那么多孤儿……他们说查科这儿的气候干燥，不容易得伤寒，是我们把它带到这儿的，是我们。”

“啊——啊，”亚当说。他看了看夹在他修长手指间的桔子皮，他的手指这么苍白柔软，他这一生肯定都没有碰过铁锹。受折磨？他抬头看了看，微微笑了笑，然后我告诉他：

“查科这儿没医生。人都开始死了一个月，他们才从亚松森带回了一位，他说从阿根廷乘船来的人有时带有这种病。”

亚当点点头。“传染型伤寒症，虱子携带病菌，再加上污水。”

“我们的族长只是祷告，只能读《圣经》。我妈妈说，对于那些从加拿大来的、保守的门诺教徒们，1927年时痛苦又一次来了。他们到查科是为了躲开那个大世界，让他们的孩子有自己的学校，照自己的想法在村庄里生活，但在这里，他们最先得到的却是乱草丛中的一座座坟墓。”

亚当说：“我还没去过他们的聚居地，我应该去看一下他们吗？”

我微微笑了笑。“如果你想找特别特别远的亲戚，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住在那边的几户人。那是真正固执的威伯家和洛温家的人，他们是在一百多年前搭船离开俄国的。”

“不，不，”他很快地说道，跟我一道笑了起来。“但他们也有伤寒，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直到今天，那些门诺们还把那段时光称为‘黑色死亡日’。几个月间，在草棚里等着从巴拉圭河畔到查科的时候，100多人就死了，50个都是不满两岁的孩子——比我们死得人还多。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查科的加拿大门诺教徒们总会说，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在1930年的那些葬礼上，我们的族长也是那样祷告的，他们祈祷的时候总会失声痛哭起来。我母亲还记得他们经常读到的一句赞美诗：‘大卫王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便止住了。’我妈妈说，我们是俄国或加拿大的门诺教徒，我们当然不是国王。但是，经过长途跋涉、艰难险阻才到达了查科，我们的确已经奉献过了，到瘟疫最终被止住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奉献过了，而瘟疫的确被止住了。”

亚当慢慢地说：“我想那不是因为你们走了多远，你们总带着……带着那些。但是牺牲孩子……这样的磨难？难道族长说





这也是上帝安排的？”

“他们说，所有的生灵都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受苦是因为有罪。”

“但是，说起那大卫王的赞美诗，我想他在祭坛上杀牲畜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我想他是因为跟女人睡觉或欺骗大伙而惹恼了上帝，我记得不确切了——但是你们这儿的人又犯了什么大罪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逃走了，也许是让我们在这里也要偿还，因为我们留在俄国的亲戚还在偿还。”

“偿还？我的父母也逃走了。偿还什么？”

“邪恶，偿还世上的罪，亚当的罪。”

加拿大来的表亲亚当在盯着我，好像我说的人就是他！我说：“是伊甸园，是那条蛇和夏娃。”

“我明白，”他说。“但有些人‘付出的’似乎比别人要多。”

“就像我妈妈常说的，谁又能跟上帝争辩呢？”

“要是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就敢。”

“谁愿意做犹太人呢，他们不信奉新约。”

他在喉咙里咳了一下。“新约上说十字架上的耶稣已偿还了人间所有的罪恶，为什么我们还要再付出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我妈妈也不会知道，这个问题她想的要比我时间长得多。就算她知道，她也从没告诉我。我只能问亚当：

“在加拿大你拿什么赎罪？”

“哦！没什么。艰苦的劳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全家住在间还没谷仓大的小木屋里，他们像奴隶一样干活——但是没饥饿，也没迫害，当然也没伤寒或——”然后，他笑了起来，我听得出他的思绪在笑声中有了变化。“也许我的债正算着利息呢，等我该还的时候，谁知道这笔债会有多大！”

我们一起笑了笑，就像人们对于无趣的事无话可说时一样。

“但是你的兄弟，”他说，“那不是伤寒。”

不。不是伤寒。我们相处的10天里，我给他讲了我们最幸福也最哀伤的故事，那个让我们从1930年起开始生活在了巴拉圭的故事，那时我们已没有父亲了。我在支离破碎地讲着，这样我才能承受。我们边说边走在身边尽是仙人掌的沙子路上，那路曲折地连接着8个门诺教聚居地的村庄。他说我们要搞确实，在那儿的6000多居民中再不会找到亲戚了，那些家里有时可是会有15个甚至18个孩子。

在我们到这儿的两年后，在博克龙水边的绿洲上，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军队曾在可怕的炎热中打过仗。在双方都没取胜的战斗中，3000多士兵被打死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谈论蹂躏我们的查科边境之战，而这时我们自己的村子还没建起来。我们说起母亲们在圣诞节时烘了面包送给两边的士兵，他们朝天放枪表达谢意，还跳起了舞。我们的年轻人把他们快要死的马带回家，喂它们饲料和水，让使它们恢复过来，这样双方的军官又能再次驾驭它们了。我母亲曾对我说过，你逃到了世界的尽头，可你最先碰到的还是战争，是在荆棘和沙漠中的战争。

但是，亚当和我又回到了我哥哥的故事，他是不会让我跑题的。

我告诉他，我母亲曾说过万亚有坚不可摧的意志。他是一家之主，必须劳动。无论是酷暑，还是野草和荆棘丛生的沙地，无论是成群的蚊虫，还是无休止艰苦的劳动都阻挡不了他，他要在这陌生而空旷的沙漠上兴建起我们的村庄。蒙上帝的恩典，我们逃离了那块恐怖的土地，而他现在要像我父亲一样为我们修起一个家，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但我自己在查科记得的第一件事却不是他劳动的样子。我





们院子里有帕拉图多树，树上开满黄花的时候，那样子就像上帝对摩西讲话时燃烧的灌木丛。我记得还在树开花之前，在我们炎热帐篷里的垫子上，我看见了哥哥头上绑着绷带躺在那儿。他脖子和头上缠的布条是妈妈最干净、最洁白的被单，上面已经浸满了血渍。他的头和脖子被牛车上的轭压了。那轭是用红色的坚木做成的，那种树的木质非常坚硬，所以又被人叫做“破斧树”。放到水里的时候，它会像铁块一般沉下去。我们村民犯了个错误，拿这种木材做了个轭，因为他们想要最结实的。他们没有听聚居地里那些加拿大门诺教徒们的意见，这些人已经在查科呆了3年，他们更了解情况。就是那轭伤了万亚，他倒在了畜栏后面的地上。我们的奶牛就在那儿，那头牲畜非常野性，我们得用绳子把它的头和脚都捆住，把它两条后腿叉开绑在两根栏杆上，这样才能挤出一小瓶泛着蓝色的牛奶。我母亲说万亚一天去挤两次奶，牛奶是为我和我们家的第三个小弗莱达准备的。但是那天，我们到这儿的第一个圣诞前夕，在可怕的夏季酷热中，她听到了他的声音，她知道没有一头奶牛能让他这样尖叫起来，她听见红坚木发出的“砰！砰！砰！”的声音。她哭喊着他的名字就从我们的帐篷里跑了过去，跑到了畜栏那儿。

“什么？”亚当问我。“发生了什么？怎么了？”

50年了，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也没跟人问过，芬赫海姆的人也从不跟我说起这件事。门诺教徒知道，他们理解沉默的含意。现在这个“颠来倒去都是亲”的双亲表兄是从加拿大来的医生，他有一双柔软的手，他的钱多得足以绕地球旅行，他还可能跟那些大人物都聊过天，那可都是些控制着这个世界的人物。他们可从没听说过我们，也没听说过巴拉圭查科恶劣的生活环境。他们不会知道，要在这儿生存，你得像头公牛那样几十年几十年地干活。就算北美的门诺教徒给我们筹了100万美元的款子，给我们买来种棉花的机器，给我们修建了通往亚松森的

公路，好像我们不再需要用马车了，不再需要狭窄的铁路了，不再需要用肮脏的船把棉花和花生运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一条铺好的公路直达横跨巴拉圭河的大桥和首府，可你还得像牛一样干活——他们问，你为什么不开，到加拿大去，那儿没有像这儿一样拦着你的警察，近50年来逃离施托斯纳尔独裁统治的人比住在芬赫海姆聚居地的居民还要多。你应该像他们一样离开，他们一借到或讨到足够的钱就离开了。乘上汽车，坐上飞机，两天之内你就能到上帝祝福的加拿大，或者用不了一天时间，你就能到热带的巴西、阿根廷或乌拉圭去，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

亚当·威伯是一个人从天上来的。虽然他有个家，他却从不告诉我他家里的一切。他戴着个戒指，结婚都快20年了，但是只有两个孩子，因此他不会再有孩子了。他对我们家族的事一定知道了很多，即使他并不是出生在俄国，他也去过莫斯科。他说如果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他，他会记住的，但是他怎么这么不明白呢？他的家人年复一年彼此都在说些什么呢？他的父亲去世了，但母亲还活着，他的低地德语讲得像我一样轻松，他在听我说话。他可以呆在加拿大，跟那儿的众多门诺教徒聊天，他也可以周游全世界，去那些舒服的地方，可他为什么要跑到这片荆棘横生的沙漠里来呢，为什么要汗流浹背地站在这个小棚子里呢，为什么要弄脏脚下昂贵的鞋在这里吸桔汁呢？

几天之后他便会离开。说起他不断增加的罪孽，他微微笑了笑；为了偿还这笔债，孩子被奉献出去了。我觉得那对他来说，只是说说而已，要是他女儿死了，他还笑得出来吗？他给她取了个英文名字，叫帕特丽夏，15岁，他妻子是美国人，有个儿子叫乔尔，是《圣经》里的一个名字。看着他有时笑的样子，我希望他的几个孩子都不用再受苦了。像我们的父母希望的那样。但我认为即使是加拿大也未必是天堂。该来的始终会来。





只有上帝和宽恕能结束痛苦，我母亲躺在病床上还这么说。每个人只能救他自己；我们不能救赎其他人。虽然在天国里我们或许会那样做。倘若我们能到达那里，我们都会得到净化。

“大卫，怎么了？”

亚当正带着那种威伯家的忧郁在使劲看着我，好像想从我眼中找到万亚。我可以告诉他，我跟我哥哥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我像妈妈这边威伯家的人，有长长的鼻子和浓密的眼睫毛，他应该看看我的耳朵。在罗曼诺夫第八村拍摄的那张照片上，我知道我们兄弟两人的耳朵都很像我们的父亲，就算我那时还是个坐在母亲膝盖上的婴儿，你也能看出来。我的两只耳朵又宽又大，向外张开，如果我们只有头的话，我们准能飞走。

我告诉他：“我哥哥的脖子和肩膀，还有左边的头颅是被砸伤的。那时芬赫海姆聚居地还没有医生，只有海因里希·昂鲁曾在一战期间在医院里当过卫生员。他懂得如何包扎伤口。可怕的伤痛让我们炎热的帐篷翻了天。我记得他的脸包起后还在渗血。三天后他就死了。”

“上帝！就是牛车上的轭？”

坚木做的。我母亲说，那时在弗莱登什安的4号村庄，我们只有两辆牛车，就这两辆牛车还要分给25家人用，这是他们还在德国的默尔恩时每个农民都同意的。那时，他们最后知道了哪些家庭因为有沙眼和肺炎去不了加拿大了。一辆牛车分给学校南边地上的人们——那时还没学校，他们刚开始修房子——另一辆分给地在学校北边的人用。他们还在努力，想把巴拉圭当地的牛驯服，给它们架上轭，让它们好好拉车。万亚为村里到铁路车站那儿送货去了，他刚回来。在还没有横跨查科的公路之前，我们只能把船上的货物卸到牛车上，然后沿着铁轨赶到火车站。每次都是两三个星期时间，要走200多公里，要穿行在沙漠、荆棘和野蔓丛生的地方——若是老天下雨，便是一望无际的

泥泞。而在经历了几个月 45 度的高温天气以后,雨水总会像瓢泼似地倾泻下来,这儿的世界总是在两极之间。万亚最终还是把那坚硬的轭套在了牛脖子上,把它们拉到了一起。我母亲说,他只用悄悄跟牲口说上几句,就能让它们安分地干活,只是除了我们的第一头奶牛。那人举起那轭的时候,它还是温的。

“谁?”

我们村里的一个人。实际上,有 3 个人跟万亚争了起来,冲他大声吼叫着。他们与他的年龄相仿,只有一个呆在这儿的时间稍长些。他身体很强壮,可以把那红色的坚木高高举起,而且是在气急败坏的时候把它举了起来。他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母亲临死时我还在问她,告诉我,你从没说过什么,而且我听说那人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事情发生后,他去了乌拉圭,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所以求你告诉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

她没有睁眼,也不会告诉我。或许她也不能告诉我。上帝赐予了她怜悯,让她在宽恕中把最坏的记忆洗刷得一干二净。甚至连姓名——谁能顶撞自己垂死的母亲呢,谁又能强迫她,让她找出自己早已遗忘在身后的东西呢?——她只告诉了我我早已知道的事。我死去的哥哥躺在了一截掏空的树墩中,是邻居们砍下后从荆棘丛里拖出来的,我们这儿的树林里都是荆棘。他们把树锯开,用铁铲和锄头把树干中的树浆挖掉,在太阳底下晒干到没有气味的时候,女人们用被单把他裹起来放到了里面,男人用锯下来的木板把他盖上了,所以剩下的只是一根水桶一样嵌满荆棘的死木桩了。我母亲说,在她看来,他们好像要把一块查科这儿荆棘丛生的土地放下去,要把它深深地埋在查科的沙漠里,要用这块可怕的土地把这块土地自己埋葬起来,但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他们没法让所有的门诺教徒都安静下来,让他们在这时感受不到丝毫的痛苦,即使他们永远祷告下去、永远挖下去





也做不到。打死我哥哥的那个人跪在墓穴边上，当他们顺着墓穴把棺材放下去的时候，他在低声哭泣着。沙子滚下来盖在平躺在了那儿的粗大树木上。他们把洞穴填满，它高高地堆在学校那里的地边上，我们的地旁边。她告诉我说，有个巴拉圭军队的长官曾在万亚去火车站的途中碰到他，他带着士兵来参加了葬礼，他对她说，他会用巴拉圭人的方式好好收拾那个凶手，但我母亲阻止了他可能的报复。不，她不愿听这样的事。她告诉他，她必须按耶稣的教义饶恕那个哭泣的人，她还邀请那人到我们帐篷里来坐客。哭了一星期之后，她最终还是全心地那样去做了。

她还告诉我，那个可怜的年轻人那时是如何为我们干活的。每天他会从弗莱登什安第四号村庄的南部，从他父母的院子那儿走来。他帮她把卧室和厨房盖了起来，为盖房顶割了很多荆棘，还拉着套上了轭的牛在我们地里耕作，那牛已经驯养得很好了。我们学会了如何栽种蜀黍、巴拉圭豆、甜土豆，还有棉花，因为门诺教徒聚居地已经修起了个榨棉籽的作坊。3年里，他一直替我们家出工，干村里分给我们的活儿，像修篱笆、修路、修学校什么的。虽然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总是自己带着一天的干粮。是他和我们的新家——那时我5岁，长大些后才能挥锹干活——是他和我们家里剩下孩子，其中最大的也不过是不到16岁的姐姐，是我们一起拆了以前建的第一个畜栏，在地后面给我们的巴拉圭奶牛修了一个更大的。几年后，我们学会了以后，还在查科开垦出了自己的果园，种上了杏树和浆果。再后来，还种上了柠檬树和桔子树，就是在我们原先帐篷和畜栏的地方上，当时那事发生的地上。

我母亲再不肯多说了。在她看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海因里希·昂鲁还活着，他也80岁出头了，他一定记得什么可以告诉我，但我母亲说为什么要问他呢？毕竟，如果上帝是仁慈的，

你是可以原谅很久以前发生过的几件事的。这样，在你一路跋涉到了天国的时候，在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拖着它们了。她说无论怎样，上帝早都知道了，他什么都明白，而在我们渺小的心中，我们又为什么要把那些知道一丁点儿的事盘算来、盘算去呢？为什么又要把自己一无所知的事也盘算来、盘算去呢？让它在沙漠里歇息吧，这儿的沙漠够给我们每个人用了。

亚当问我：“你已经原谅了那个人？”可他马上又接着说，“对不起，请、请原谅我。”

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地说：“那的确是《圣经》里的第二个故事。亚当和夏娃两个儿子的事。”

“我知道，”我告诉他，他灰色的眼睛现在非常平静。我心中隐隐觉得，他知道什么是痛苦，或者他也很快就会明白。“我时常读它，可我还是不明白该隐为什么要杀死亚伯。”

“《圣经》说是因为上帝，是为了果品和绵羊。”

“我们没有绵羊，我爱桔子胜过喜欢牛肉！”

我们又微微笑了起来。什么也没说。

“不是因为上帝吗？”他问道。

“我觉得人们不必为了上帝而自相残杀。他能照顾好自己。”

我们再次来到桔树下。像我在照片上看到的威伯家人一样，亚当也有张长方形的脸庞，但黑白照片可显不出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显不出他在许久望着你后所露出的坚强。我告诉他，我们就站在原来第一个畜栏的地方，就站在那事发生的地方。

他朝下看了看那双光面的鞋子，现在因为查科的沙地已经脏了。你不管在这儿的地上种上什么种子，只要你能找到足够的水浇它们，就会有奇迹出现。真是伊甸园，要是4条小河从





中流过就好了^①。他最后问：

“出了那样的事以后，你们怎么还能在这儿生活呢？”

“要是你早 13 年来这儿，你就可以问问我母亲了。”

他笑了，无奈地抬起了他医生的那双精细的手；我看出来了，他只要愿意，他比我还能含糊其辞。所以我告诉他：

“我很高兴。到目前你是第一位远道而来的亲人，来到查科的亲人，好极了。来吧。”

我们从那个地方走开了，走过桔树和柠檬树之间，穿过铁丝绑的门到了校园里。巨大的角豆树下有 6 个金发碧眼的孩子——我数了数，4 个穿短裤的男孩和 2 个身裙子的女孩。在硕大的豆荚间，他们晃着赤裸而结实的小胳膊小腿，像群白猴子一样倒挂在树枝上，互相笑着，吵闹着，他们讲的是西班牙语，其间还混有低地德语。有 4 个是我的孙子。

亚当说：“我妈妈老了。假如你能去探望探望她，她会很开心。我也是。”

“我觉得我在加拿大的亲戚要比你在巴拉圭的多。”

他笑起来。“你能把他们全都探望一下，起码你想见多少就能见多少。”

“德国有消息说，苏联当局又让一些人离开俄国了。或许有一些亲戚。”

“你听过他们的名字吗？”

“有封信说，德国有个叫彼得·威伯的一家人，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但很早以前是从奥伦堡过去的。”

“奥伦堡的彼得·威伯！”

“不可能是我们的叔叔。”

我们走过土砖砌成的学校，那也是我们的教堂，来到 12 月

^①《创世纪》中记载伊甸园中有名为“比逊”、“基训”、“西底结”和“伯拉”的 4 道河。

夏季白炽耀眼的阳光下。村庄草原东面高高的天空中，几只兀鹰像往常一样张着巨大的翅膀盘旋着。很好，要不是它们在那儿的空中，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一头牛死了。我们旁边，平滑的围栏铁丝穿过坚木桩子上的洞，围起了一片地，有 5 匹马还在清晨的热气中休息着；一匹长满斑点的灰色母马正在喂它的小马驹。围栏拐角的地方，在牧场和学校之间，立着我哥哥万亚的墓碑。





第 19 章

桦树和丁香

1995 年,南艾尔伯塔 科尔代尔 莱斯布里奇

突然间,这是记忆中的河山。在亚当汽车车盖的前方,公路倾斜着,沉入深谷绿茵茵的斜坡,然后又拐了个弯,前面是那条老人河。河上有座新的水泥桥,平平的、灰灰的,插着限速标牌,横跨在棕黄色的水面上——原来那座被螺栓密密匝匝铆紧的有三孔铁拱的黑桥不见了。

孩提时代,他看到的这条河好像是从河边的泥土和干枯的山峦中劈出来的,就像《圣经》故事中的施洗者圣约翰^①一样,站在荒野齐腰深的河水中,举起双臂喊道:“看哪,上帝的羔羊!”^②一只闪光的鸽子飞翔着,在耶稣头顶上盘旋,他踩着山涧的河水走来,水稠若泥土,可以在上面行走。“是我,”那个神圣的声音在说,“不要害怕。”抬腿,走吧!可仿佛有条带刺的铁丝网阻隔了这些无法实现的渴望,亚当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彼得”^③,从来没勇气迈出那不沉的第一步。

①犹太先知,《圣经·新约》中记载,是他为耶稣施的洗礼。

②《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③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借助耶稣的神力可以在水上行走而不沉没。

这条春天的河流依然存在，依然夹着高山、丘陵、草原的泥土在涡旋，浓如颜料。此时，亚当驾驶着功率强大的轿车朝它冲去，他能看见河水在依然笔直的河岸边打着旋，像无数条老人河在迷人眼目的暮色中翩翩起舞。

顷刻间，就在他驾着呼啸的汽车向左拐上最后一段坡路，公路在他背后变弯了，车下发出空洞的声响，像水泥路面突然悬空了似的。停下，他得停下来。

他已经跨过了河。在夕阳寂寥、低矮、平射的光线下，高处的草原被切成有棱有角的阴影。山谷从西南方伸展开来，像头顶上掀起的风，带着五月的气息和鼠尾草、狼柳的飒飒声。他知道，这河里的涡流一直漩到河床的淤泥当中，但尽管如此，黑脚族人^①曾从这里的什么地方涉水过河，还有库特内人^②，阿齐纳人^③和萨斯人，以及许多其他部族、野牛和马匹，还有后来运煤的船从这儿过了几次，还有牛仔们赶着驯服的牛群和牛崽，这浑浊的水下或错乱的冰下，始终暗藏着交错的礁石。在他头顶上——在前方——有一面刀削一般的山崖，像记忆中的一样清晰，在那儿出现过恐龙化石，首先，一块椎骨露出了一小端，紧连着的是另一截椎骨，然后又是一截，他能摸到第三截，喂，我找到了什么！他光着手在刨，直到山崖松动，他被埋进干土当中，埋没了肩膀，多萝茜朝他俯着身子，轻声一叫，从他身边一滑而过，像踩着污泥一样滑，她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脚，得救了，没坠下山崖。

我将与主面对着面，

①北美印地安人中的一种族，居住于落基山脉以东。

②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南部、华盛顿州东北部和爱达荷北部的部分地区。

③美洲印第安人，早先居住于蒙大纳北部和萨斯喀其万南部的平原地区，现在人口主要分布于蒙大纳中北部。





讲述故事,被圣恩所救!

男声四重唱时他从不乱来,只是唱道:“嘿,圣恩何在(格雷丝何在)^①? 我需要拯救!”

然而,艾尔伯塔恐龙可不是什么小孩子的玩意儿:“我们祝贺你们在老人河沿岸挖出了第一具恐龙化石。”艾尔伯塔大学在信笺上对他们写道。但那个据说是他们中学自然老师的老里迪格却拒不承认,他只相信他的《司可福注解圣经》^②,相信刻在第一章《创世纪》头上的日期:主前4004年,或是刻在之上的那句话:“《创世纪》中记载的事件历时2315年(据厄谢尔主教^③的推算)。”于是,多萝茜把那些化石一个个地摆在老里迪格的办公桌上,用她每次上课必带的《圣经》敲着那些石头。

“这些就是在那儿找到的。”她坚持说。“我们在土里找到的。一头曾经活着的动物,骨头变成了石头,亚当挖出来的,山崖上还有很多,看,司可福是这样写的:‘造物的第一件事,即“起初神创造天地”,指的是没有日期的远古,是各个不同的地质代。’因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

他的远房表妹多萝茜·洛温非常固执,在科尔代尔门诺教高中一丝不苟地争论,没有哪个女孩像她那样。“《创世纪》中,在第一篇和第二篇之间存在着一个地质断代,这些化石就是在那时形成的,深埋在河上面的泥土里,我们用手能握住。我们得握住,因为它们就在那儿。”

他那段沉湎于远古的青少年时代过去了。这宁静、发蓝的

①“圣恩”的英语是“Grace”,该字同时也可用作女孩子的名字,即格雷丝。作者在此运用的是双关语,表达亚当年轻时候的调皮,唱圣歌时也不忘挑逗女孩子格雷丝。

②美国公理会牧师司可福编撰的有注释的《圣经》,1909年出版。

③詹姆斯·厄谢尔(1581~1656):爱尔兰阿马主教,都柏林三一学院副院长。他以为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认为上帝是故意把化石放在岩石之内以考验人类的信仰的。

傍晚——有光，有天，有水，有土，第三天完成的伟绩^①——足矣：风很静，云朵和大地层层叠叠，像肌肤一样，矮小的仙人掌花也许早在山谷口开出了黄色，周围是那条静静的、打滑的河流，无论他找到哪儿，都忘不了这河，即使走到小乌伦河，他是在俄国奥伦堡以北沉陷的大草原上，在罗曼诺夫第八村的圆山之间看到那条河的，威伯家和洛温家在那些山上放牧，说不定还在五月新长出的草上躺过，说不定男孩子们一边看着春天的牲口相互交配，一边等着姑娘们在炎热的中午提着水和面包出现在天边——即使在那儿，他看得到这老人河转来转去，像是在把他的手指偷偷伸进大地隐秘、潮湿的缝隙当中。

试图忘掉这些是愚蠢的。除了这，他来这儿还为什么？参加葬礼，他惟一的、最大的姐姐的葬礼；除了回顾，葬礼还会是什么？

从河边爬上山谷的那条弯曲的长路成了直通南面的一条干线路，就像以前一样，这一片片巨大的棉白杨防风林像大海上的艘艘油轮一样耸立，烙在了他童年的记忆中。每隔半英里依然是那些农场的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农场”被风吹雨淋得发灰，前面是60年代更换的“更现代的”灰泥平房，或是农场的那些笔直的小型谷仓——用广告的话说是“现成品”——全都是些垂直的木板和披屋，跟淘金热时巴克维尔城里的圣公会教堂一样单薄、凄凉。大约在1919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设计者也许就考虑过把这块土地留作拜牛之用^②——他从没试过在如云的蚊虫当中给奶牛挤奶——因为这些孤岛似的农场，他的脑海里冒出串串记忆：在炎热中拣青豆，在夏季那轮巨日跃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上帝到第三天创造了光、天、地和河流、高山等。

②亚当此时在遐想，把那座圣公会教堂想像成崇拜金牛的地方，暗喻《圣经》故事中异教徒不敬上帝，改敬金牛的事。





出缤纷的朝露、爬出淌水的泥沼和大地时收割绿色的豌豆；收玉米棒子，直到绿色的汁水黏黏地在双臂上流淌；还有甜菜，春夏秋三季永远面朝着甜菜，疏苗、锄苗、拔根、去叶……对他来说，这地方的细节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他应该一路呼啸往南开去，直到他开到蒙大纳、怀俄明、弯弯的墨西哥，也许一直开到危地马拉，那儿有冒烟的火山或蒂卡尔^①的舞厅，还有一条条狭窄的路径通向深山中的石头金字塔。

最近你去哪儿了？在回家参加的这个葬礼上，苏姗娜会问他；他们会瞻仰遗容，几乎一个月没说话后，她声音里有以往那淡淡的好奇。那边就是科尔代尔，很快，就在他的车越过一条灌溉筑堤的时候，红色的土地上冒出一个谷仓的圆顶，大草原上的路箭一般直，直指那座城市，这路一度泥泞不堪，后来铺了沙砾，现在成了艾尔伯塔光滑的柏油路面。

没去哪儿，亚当会告诉她。我告诉过你，今年不走。

你终于不动了？

我又没死，只是想换个想法。

过去常说换个想法就是改变信仰。

不知道，也许现在也是这样。

科尔代尔的四周向外铺开，边界比他记忆中的更加明显，树林带更宽，一片片屋顶沿着莱斯布里奇冰湖那条空渺的天际排开。上大学时，在两个学期期间的一个春季，他一连几周围绕整个城镇丈量土地，每三步用量杆丈量，为加拿大食糖有限公司把承包的种甜菜的土地分成许多小块。20世纪20年代，这么多的门诺教徒从俄国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这里有灌溉的农田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甜菜种植业——一个冬天的夜晚，他们聚在一起讨论：“门诺教徒是不是生来就是种甜菜的？”但没有得出什么更

^①危地马拉北部的一座玛雅废城，曾是玛雅城市中最大也可能最古老的一座。

进一步的结论,只是认为他们过去在俄国村庄的麦地、奶牛和羊群对他们没多大指导。不过,像以往那样,亚当的父亲离开自己在北方灌木林乱石丛中的家乡到这儿,来得太迟了:到1946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原有的全部土地早已被人所有的,仿佛俄国人的长子继承权在加拿大也同样是绝对的,因此,他一块地也买不起了,只得作为劳力,给雇用他的谁打工。

Na oba mien Jung^①。他母亲的低地德语听起来非常诚挚,在这方言中,“男孩”、“儿”和“年轻人”都是同一个词,而且她要拯救他永恒灵魂的热情始终不减:可我的儿呀,我最小的孩子,你去上学,成为好医生,你去门诺教高中上学,那儿也教《圣经》,不像镇上的那所不信神的学校,否则你会错失永生的。最最亲爱的母亲呀,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儿早已错失了吗?相去甚远,甚至触目惊心。年复一年收音机里响着查尔斯·E. 福勒在《再读圣经》节目里喋喋不休的讲道,插播乔治·贝弗里·谢伊唱的歌曲“我宁要耶稣,不要世间万物”——噢,不对,是声如雷鸣的新手比利·格雷厄姆^②吼的——但肯定是长滩市政会堂,鲁迪·阿特伍德钢琴伴奏;他可爱的母亲在天堂注视着他,肯定会对他这半个世纪以来所错失的一切一目了然的。

驶过一片防风林,在他的右边,田野一下子开阔了,像翻开的一页书,这里曾经是科尔代尔门诺教高中的校址,犁过的田野正等着要种点什么,茫茫一片,就像他这么些年来没做医生后的头脑一样茫然——不过,他还没完全忘掉自己是个医生。学校那堆凑在一起的旧房子一幢也没了,包括1926年雷迪梅德地区门诺教教堂,又长又直,是大家用一天时间把三座小谷仓打通钉起来的;钻石形状的棒球球场没了,露天冰球场没了,被犹如祷告

①低地德语:真的,我的儿。

②比利·格雷厄姆(1918~):美国著名的福音传道者,正统派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





一样没完没了的西方吹来的砂砾埋没了,还有那吟唱的声音“哈利路亚!全能的主……”也没了(甚至连音乐大师韩德尔也没法让他那副生就的瘪嗓子唱出好听的音乐),学校的痕迹全没了,埋进咸盐似的彻底地没了^①。我亲爱的姐姐海伦去了,回“家”去了——可那座古老的门诺教兄弟教堂的大屋顶还在,过去他常开多萝茜的玩笑,说这里“姐妹免进”。他曾在这里听过上千次的说教,可一次也记不起了——不过,那些歌,那由领唱人起唱的没有前奏就唱起的《还乡之歌》,那句被上百张喉咙集体唱成和声的歌词,却在他心中滚过,比以往更加激动人心。后来,教堂搬到镇上去了,这里卖给了一家用煤渣做砖的厂,偶尔用作关狗的狗屋,如今,破裂的屋顶板下有几株枝桠乱长的树。这里,在教堂背后的墓地,是他父母“安息”的地方(用英语是这么说的),但在低地德语中人们说“回家”,在他们的晚年,他曾用自己“高雅和博学”的行为,把两个老人搞得越来越糊涂。

像大多数门诺教父母一样,他们并没有想要生活在盲目、无知的生活当中,而是始终认为,无论他们的孩子去上什么学校,那不仅是为了要在这美好的加拿大更加见多识广,还为了要继续用以往一模一样的方式想着自己的“灵魂拯救”,以往,在这偌大的教堂里,他们的孩子听见的只是重复了无数次的“再生”,或是尊敬的英国牧师查尔斯·E 大人,或简称查尔斯·滕普利登,或是鲍勃·辛普森或比利·格雷厄姆或欧内斯特·C. 曼宁^②,他们每周都要在加拿大艾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市中心的预言基督教大学里嗡嗡地唱上一次——这些父母充满希望,却又困惑、担心,接着是越来越深的焦虑,无言的,有时是绝望的。但他们依然爱着你,祈祷着要给予你足够的爱,用主无法解释的仁慈将

①公元146年罗马帝国灭迦太基时,为彻底灭掉该国,用盐把土地埋上,让这片土地变成了不毛之地。

②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艾尔伯塔省社会信用党负责人。

你送上人生永恒的天堂，他们知道那天堂正等着他们，将你送上辉煌的天国，不论你是多么的博学多才，不论你想去还是不想去那儿。

他们被埋在这堆教堂背后那片看不见了的墓地里。不是一家人埋在一块地，而是死后平等地埋在成百上千座只有10英寸高的墓石之下，平平安安地回了“家”，或下了地狱；或许有那么几个，在永远地遭受着可怕的煎熬，在主眼里一切都是平等的。

海伦肯定去了天堂，早已在那儿，“等在金色的台阶上”，崔茜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海伦埋在哪里？十几年前，崔茜和乔搬去了莱斯布里奇，去了英国人的浸礼会教堂。

这座灰泥墙面的教堂被人遗弃了，被可悲地褻渎了，一扇扇哥特式的窗眼很小，男女分开的入口拱着高高的门，弯弯的拱门外面有一片塌陷了的台阶，断裂的水泥阶梯就像他在俄国看到过的楼梯一样。在那条男人走的台阶上，有一次在听完周日两次布道之后，一位他几乎不认识的教会“兄长”把他拉到一边，用非常轻的声音说：你很聪明，要是想上大学需要钱，你来找我。

当他收到那封信和帮他完成学医的最后一年学业的500元钱时，苏姗娜对他说：作为一位门诺教徒，你真幸运。门诺教徒相互帮助，他们是好人。

对，亚当说，约翰·马廷斯的确是个好人。

那……你为什么还老是抱怨他们？

在夕阳的阴影下，亚当看见那堆空寂的教堂注视着他，从身旁渐渐地远去。

多萝茜把咖啡杯举到自己薄薄的嘴唇边，亚当只是在想：她有没有过情人？有没有过丝毫没法回避的想法，想拥有一个？这问题他是不可能大声对她说的——她的头发盘起，紧紧地扎着，自从……自从他俩离开高中的那天就这样扎着，此后，他只见过她几次。





“你的那个漂亮儿子现在在哪儿？”她问。

他知道她会先从他家人问起，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关心起“漂亮”来了？

“我是说乔尔。”

“在温哥华。”他回答，笑了笑。“至少那是他说的，他在那儿。我还没收到账单。”

“好哇，至少他还来电话，对方付费。”

她的声音渐渐低了，眼睛却抬起来盯着他，即使过了45年，那眼睛却像他记忆中的一样犀利，他想，现在她要问苏姗娜了，不，自从有了崔茜，她便自己给苏姗娜写信了，甚至给她打电话，或去看她，她细心多虑得无人能比，不会来探究我和苏姗娜的关系的，而是径直谈起我们共同的表亲，巴拉圭的大卫·洛温。或谈起俄国之行，问一些最普通的话题，如“去年夏天你去了俄国，情况怎样？”她绝不会说我们相见的惟一时刻是在葬礼上……可她的目光打乱了亚当愚蠢的思绪。在科尔代尔门诺教高中，他俩能读懂对方，就像他俩能整本整本地读懂书籍和地图册一样。

“我老是在接对方付费的电话。”他说。“不管是从哪儿打来的。有一年圣诞节的早上，电话早早就响了……”她的专心致志让他讲不下去，他突然有一种把事情解释清楚的欲望，想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某些细微的情节，想毫无畏惧地深深触及自己难以称心的破碎人生当中尚可如意的那部分，他知道，她会以她深思熟虑的细心和理解回答他，是的，很好，是的。自从上次见到她之后，不论过了多少年，她总是这样，率直、深沉，体贴周到——发觉了这一点，他只能笑笑，挥了挥手，他得把开始讲的话说完：“——我接到从火地岛^①打来的电话，是崔茜——她打了

^①南美洲南部从大陆被麦哲伦海峡分开的群岛，由智利和阿根廷分占，该群岛的其他小岛由这两个国家分别管辖，费迪南德·麦哲伦在1520年最早发现该岛。

一次,圣诞节早上5点半,当然我还在睡觉,跟——”

他让自己住了口,没有解释当时他是在跟谁睡觉……天哪,他怎么把崔茜也扯进这顿早午餐?

但她理解他,理解他不把细节说出来。

“是在阿根廷吗,在乌斯怀亚,在猎犬海峡?”

此时,好像他俩不在莱斯布里奇旅店的餐桌旁了,而是在科尔代尔门诺教高中狭长的图书馆里,趴在一本地图集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她已经找到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而他还在读着乌拉圭,于是他问她:

“为什么叫火地岛?”

“‘烈火之地’。”她笑了。“在地球的最末端,大地在燃烧,也许西班牙人以为那就是地狱!”

“不,不,当时麦哲伦正在环球航行,为什么叫火地岛?”

“住在那儿的亚罕格人几乎什么也没穿,但他们总是在海滩上燃起大堆的火,捕鱼时独木舟里也燃着火,女人们潜入冰冷的水里去找贝类。海峡很窄,山上的积雪径直掉进水里,这些一丝不挂的土人,他们的身体涂着海豹油,在火光中闪闪发亮,真的把欧洲人给吓住了,西班牙人之后,英国人也给吓住了。”

此时,他只能看着多萝茜,洛温家族的这位相貌平平、排行老四或老五的表妹,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他曾一度发疯似地幻想着要娶她,要同她白头偕老。在那个时候,“娶”就意味着偕老。

“你去过那儿,是吗?”他问。她的头发往后梳着,挽了个结。他想,像我母亲。崔茜从不那样梳头。

多萝茜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在巴拉圭传播门诺教时,我忍不住去了。我请了两周假,飞到乌斯怀亚,那是坐落在湛蓝的猎犬海峡上的一座绿色的城市,周围是白色的高山,非常漂亮。”

“是查尔斯·达尔文说的那种‘猎犬’?”





“对，就是整个高中期间老里迪格尽量避而不谈的那个伟大的达尔文。1834年，他说亚罕格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要比野兽和家畜大得多。”

“喂，”亚当问道，两个人俯着身子，相视而笑。“你还在看那本全英的、白人至上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不怎么看了。”她笑了笑。“莱斯布里奇大学图书馆的书更多。亚罕格人和纽芬兰的贝尔萨克人一样，全死了。病死的，被猎杀的。”

“被猎杀？”

“猎人的生意。英国人说他们袭击了那些土人的放羊的牧场，用一英镑就换一对亚罕格人的耳朵，一对对的换。”

他只能说句“恶心”。

“现在还为人所知的只剩下他们的那句俗语：‘惟有风照刮’。”多萝茜说道，然后饮了一大口凉咖啡。“那儿的风比莱斯布里奇这儿的风更厉害。一个名叫布雷吉斯的英国传教士花了毕生的时间为地球上最后这群亚罕格人编了本亚罕格语词典，34000 个词。”

“有人会说吗？”

“没人。就像以前那样，我正在看地图，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

这又是他俩儿时的把戏；他朝她咧嘴笑了，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感到这把戏是如此的久远，如此的伤感。

“我已经啥也猜不出来了。”

她的眼睛领会了他的渴望。“纬度。”她说。“这地方在南纬54 到 55 度之间。”

“啊，刚好与瓦斯卡赫坎相反，在克里语中，瓦斯卡赫坎是家的意思，我上学的第一天，辛斯顿小姐写了这地名，就在北纬54.4 度上。”

多萝茜笑着说：“可惜那天我不在。要不我也会跟你一道钻桌下去。”

想起他上英语的第一天，想起那群吓人的飞机，他俩都笑了。她把最后一块本尼迪克特鸡蛋松饼^①放进嘴里，这时，女招待提着咖啡壶出现了，给他们的杯子重新加满咖啡。外面，五月的风把山谷直到老人河边那长长一片的枯枝吹得随风摇曳，把曾经是街道的那片绿色的嫩草吹得一起一伏，这里曾有许多妓院，等待着那些帽子低低地扣在鼻梁上的矿工、牛仔和城里所有的男人。

此时，他俩默不作声，像朋友的微笑一般自然；可接着，多萝茜打断了这沉默。

“大卫·洛温从巴拉圭给我寄过两封信。”

“我一直写信说要给他寄张机票去，”亚当说，“叫他来艾尔伯塔，再来看一次，可他说自己年纪太大了，我说，大什么，就飞一天？他说现在他想飞去的只有天堂。”

她把一个信封放在他盘子旁边。“他听说了很多关于大卫·洛温兄弟的事，萨哈林岛上的事，是俄国的亲戚告诉他的。”

“他？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对我说过，她正在从克格勃^②那儿寻找更多的信息，但是她信中什么也没提，没提他们的事。”

“我看也许他们听到的是假的。”

“假的？她绝不会说假话。”

“不，不是她——你看看这些。我给你复印的。”

他伸出手时，碰到了她的手指，十根手指握在了一起。他发现，她灰色的眼睛在凝视着他，带着如此深厚的关切。这些信件将告诉他事情的另一面，他将飞去那儿，穿过在一个世纪以前契诃夫曾看过的监狱，仔细打量萨哈林岛上那些火焰山的轮廓，跟

①由烤火腿、水煮荷包蛋和荷兰酸辣酱做的英式烤松饼。

②即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同名的叔叔从牢房的窗户也能看到那些山，而他的另一个同胞叔叔，海因里希，革命者海因里希——当时他大约就是乔尔的年龄，26岁——为了找到他的兄弟，跑了4000英里。

多萝茜的指尖紧紧地掐住他的手指，说：“她还是找不见？”

他感到自己毫无防备，当头被敲了一棒。只有门诺教亲戚才敢毫不客气地问这样的话。多萝茜的脸依旧是那样安详、温柔，就像他最美好记忆中的那样，可他同时又觉得她头脑太简单了，她的率直生硬得就像压在你喉头上的大棒，他无法想像青少年时代那可笑的欲望怎么可能会瞄上她的这些脾性？

他好不容易才咕噜了一声：“还不啻是‘找不见’。”

“你找到了什么没有？”

“没有丝毫踪迹。”

“那你怎么会知道？”

“她买了张船票，从帕特雷到科孚，再到杜布罗夫尼克和威尼斯，可她哪儿都不下船。”

“你一直在跟踪。”

“调查的档案有两英尺高。”对这家外观乏味的饭馆而言，他的声音太大了，那些形状好笑的棕榈树竖立着，玻璃和天窗为它们挡住了奇努克风^①。“用了1703天，你还想不想精确到小时？”

“亚当。”

“我这么傻，围着地中海转，满世界地跑，可还是搞不懂她的话：‘算了吧，爸，我已经死了。’”

多萝茜没有畏缩。她抬起摊开右手，向他伸去，说话像是在发誓：

“我不相信。”

^①从落基山脉东坡吹下的会引起气温迅速上升的干燥暖风。

“你是不肯去想自杀。”

“难道自杀比‘爸，我不想被你们找到’更加容易？”

“她为什么会这样冷酷？”

“不知道。”多萝茜轻轻地说。“不过，如果是自杀的话，干吗不把尸体留在你能找到的地方？”

“有时候，我只能祈祷那是场事故。”

“事故通常是可以追查的。”

亚当的心硬得像石头。“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说完，站了起来。

三个印刷纸板做的盒子。亚当掀开最长一个的盒盖，他感觉得到，盒子的边沿已经被母亲那双干活磨糙了的手摸得没了棱角。父亲死后的那些年，无论他回家的时间有多短暂，这些盒子总时不时地出现在母亲厨房的桌子上，放在罗宋汤或油炸的汉堡包之间，里面的照片在她上一次翻弄了之后就那样乱七八糟地堆着。她手里捧着那些在加拿大的威伯家族的照片，多数都是穿着周日的衣服拍的，很少有干活时照的，他们生活中的那些被捕捉到的姿势，当时她是不可能注意的，如今，她终于能仔细凝视了。如今，亚当捧着这些照片，坐在姐姐海伦那张老式的镀铬桌子旁。海伦“回家去了”，留下这些零碎的、谁愿意都可以拿走的家什，还留下了她的丈夫乔·坦圭，住进了老人公寓。乔坐在桌子对面，双手捧着毛发斑白的头。这个身板硬、个儿矮的铁匠带着他那稳当可靠的起搏器，也许会活到下一个千禧年。

家里的这堆老照片。最上面是他又矮又壮的母亲，双脚叉开，双臂交叉着放在围裙跟前，背靠着一堆齐肩高的木柴，这堆木柴从照片的一头一直延伸到另一头；他自己坐在柴火堆上，在他脚下面，海伦和艾布拉姆还有玛格丽特站在地上；约翰肯定是在照相。海伦的儿子雷蒙哪去了？还有她的两个小女儿朱莉娅



和格雷丝？那是在春天，亚当记得自己9岁，那天艾布拉姆带着他坐着那辆奇妙的火车回的家，他在埃德蒙顿总医院住了两周，阑尾穿孔动了手术，差点要了他的命，科格兰医生说，他们把他弄去医院已经太迟了。不过，照像时亚当高高地坐在被劈开的白杨木柴火上，他的脸在一顶灰色帽子的遮挡下曝光过头了，成了白糊糊的一团，在那件扣住的夹克衫下面，那条用手术钳和线结缝合的伤痕粗粗的，将慢慢愈合，跟着他的肚皮一同增长、变粗。在他靴子的右边，飘着玛格丽特的长发，一脸热切、坦率的表情，衣袖挽到了肩膀，露出胳膊。他又在想了，他常这样想，妈怎么让她像这样站在外面？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明媚的阳光下，靠着这白色的柴火堆，玛格丽特身体壮实得这么快，快得逼人，我可不想老是生病！然而不到一年，一家人却要在教堂里被人们围着，却要站在玛格丽特的棺材周围，她得了风湿热，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克拉森小姐问他上学为何这么迟时，他对她说：“昨天晚上玛格丽特走了。”于是，她让他把头埋进趴在桌上的双臂里，整个教室寂静无声，好像大家都放学回了家，直到8年级的一个叫奥尔佳的女孩突然抽泣着发出声来。那是50年前的那个四月，那是在瓦斯卡赫坎门诺教堂的墓地，很早以前，为了得到木材，这座教堂被人拆了，教堂的地板也塌了，陷入底下的地窖。

耶稣非凡的仁厚
宽容我罪孽重重；
我将用何语言？
我将从何赞颂？

玛格丽特在教堂的唱诗班唱歌，当时16岁，到了足够埋进女人那排墓地的年龄了，一侧是男人的坟墓，沿着教堂的外墙，一侧

是孩子的墓地，靠着白杨树林。

“很多时候，海伦总坐在那儿，在那儿看。”乔双手捧住脸说道。“真的，她很喜欢这些旧照片。”

“我也喜欢。”亚当说，而且他是当真的。这架黑色勃朗尼相机的边缘是银色的，长方形的一面中央有个孔镜，连着一根咔嚓作响的弹簧，一边还有两个小一点的目镜，你对准那张脸，盯着那个看着你的人，肚子顶着机箱，看见影像后，屏住气扳动快门。三周后，等邮件来的时候，照片也寄来了，这 8 张快照也许会在你残碎的人生中被渐渐遗忘，但不会完全消失。

除非你把它们放进火里。就像殉道者一样，化作了空气。那也是可能发生的。

在第一堆照片的下面，亚当找出了那张摆好姿势拍的照片，勃朗尼相机是照不出这样的照片的，那是他去年从俄国带回来给海伦的，她记不得是否见过这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穿着长长的黑裙子，系着扇形的白领圈，在椅子上几乎站不起来，靠抓住一个年轻女人的宽腰带才能站稳。“是的，那是你母亲，带着你姐姐莉娜^①。”在苏珊诺瓦的奥伦堡，年老的伊丽莎白·卡特丽娜·洛温告诉他说，感谢主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仁慈，让她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在马加丹集中营度过了 10 年，又被永远地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矿山小镇，她曾容忍了那场战争，容忍了革命，如今她还经受了如她所说的“天下大乱”——“要是主不让你死，让你过我这样的生活，难道这就是他的仁慈？”

“这照片是我父亲亚历山大·威伯拍的。”她告诉亚当。“他是个了不起的摄影师，唉，要是那些照片全在多好哇。一战时，你父亲在安那多尔的沙皇护林队时，他从没见过莉娜，他们给他寄了这张照片。可他没收到，要么是寄丢了，或者被偷了，或者

^①即英语中的“海伦”。





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家里保存了这张拷贝。”她很固执,“是的,是的,那是莉娜。”小彼得也肯定了这一点。亚当也知道那可能就是海伦,孩子太小,无法辨认,但一开始,他无法相信她旁边的那个年轻的女人可能就是或肯定就是他母亲:她衣着黑色,裙子垂到地上,手腕上袖口紧扎,衣领高高地耸在脖子上,脸上带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忧伤——那双眼睛大大的,鼻子长长的,嘴唇宽厚,如此一位靓丽、几乎令人敬畏的中亚美人。他又在想:48年来,我熟悉她肌肤的每一次触摸,每一条皱纹,可为什么我从没看到这一点?埋藏在苏联那段痛苦之中的这美丽?

这美丽,海伦是不是也有,就是那个可爱的小莉娜?她到加拿大时15岁了,是他母亲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在她死后还活着的女儿。有没有谁——比如乔——见识过这美丽?也许在激情中突现出来。亚当努力在想像自己父母做爱时的样子,在那幢木头房子里他曾经听到过却听不懂的声音。在黑暗中,那一定是可能的。

盒子里的照片一层又一层。他翻弄着,有一张拍的是瓦斯卡赫坎的灌木丛和鹅卵石砌成的教堂,艾布拉姆和利奥娜穿着婚礼服,站在台阶上阴沉得像冬日,有的是一家人在科尔代尔和莱斯布里奇的公园里,有的是田野里的奶牛,还有房子的屋顶,夜晚,他曾躺在那些椽子底下,从老远的白杨林也能看见这房顶,有一张是菲拉巴格湖,他的兄弟约翰领着新娘从水里走来,还有一张是他6岁时拍的,嬉笑着坐在那条懒洋洋伸着舌头的黑狗卡尔洛的尾巴上,假装在骑它,背后是畜棚上面那片平整的草皮屋顶,每次下雨过后,那屋顶总要滴上一天的雨水。所有这些亚当都看过了,早看过了,如今坐在这儿看真的有点蠢——他知道,如果再往下翻,他会看到自己和苏姗娜在结婚那天的笑貌。不过,乔始终缄默无语,他所能忍耐的就是那样坐着,亚当还不想读多萝茜给他的那些信,60年都过去了,再多等一天也

无妨，接着，在这堆发灰的照片中，出现了一张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写着一首赞美诗的单页，页码是94，从书上撕下来的：“胜过母爱”，当然，他记得这诗，全是从中学唱诗班那儿学来的，人人都唱，即使像他这样嗓子单调、知道自己不会唱歌的人也唱：

你是否知道，你拥有的那爱
胜过万物，胜过母爱……

很奇怪，他始终记得以“胜过母爱”结尾的那句诗，可是好像阿尔弗雷德·H. 奥克雷在1915年确实写过一首诗，歌颂超过母爱的那种绝世之爱，完全可以作为个人财产所拥有的那种爱，有人或许称其为“资本主义式的救赎”：

你是我的主，
在你面前，我虔诚俯伏。

好了，乡巴佬，为了你的主，你的爱，垂首俯伏吧。亚当举起那张单页递给乔。“瞧这儿，海伦喜欢这诗吗？”

乔仔细看着那张纸。去参加葬礼前他得刮刮脸，可亚当进来时他依旧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没有动。雷蒙马上就要来这儿了。

“不。”乔缓慢地说，声音饱浸泪水，他把那页翻过来说：“她真正喜欢的是这首。”第93页，“博爱无垠”：

基督将会给我帮助，
我决不俯伏，决不俯伏。

这是J. 霍华德·恩特威斯尔在一首歌中写的一句：不为基督垂





首俯伏。在科尔代尔门诺教高中，这首歌是所有男声四重唱中最受人喜爱的。如果你能在其中唱男低音或男高音，那你就会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有时候在学校举办活动时还会获准坐上教堂的乐队指挥台，跟那排阴沉的传教士坐在一起。不过，到加拿大后，海伦一天学也没上。他们刚到时，她就去农场干活了，她说那些农夫、雇工总用手抓她，于是妈说，那干吗不结婚？18岁已经够大了，小雷蒙把他一年级的读本带回家时，她自己学着读英语，她的一生就在劳作和孩子当中无休无止地重复着。

“她真的很喜欢这首。”乔说，然后哼起了最后一行：“‘博爱无垠，博爱无垠。’”

他在哭。亚当发现自己的手指摸到了伊丽莎白·卡特丽娜给他的那些难忘的照片，是很早以前她父亲在苏珊诺瓦的奥伦堡拍的，其中一张照的是小莉娜在大约两岁的时候，站在果园树下的一条长凳上，身体前倾，两个小拳头攥着搁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上。她的右边站在高大的小玛丽亚。小彼得告诉亚当，那是你的姑妈，二战期间在特鲁塔米，在乌法煤矿的劳工队里，她是被累死的，她是你祖父大卫·洛温跟他的第三任妻子生的长女。

那么左边的那个头发剪得很短，嘴巴紧闭的男孩是谁？

那是小玛丽亚的兄弟，你的叔叔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

就是那个参加了红军的革命者海因里希·洛温。

他这张带着红军的尖顶帽、穿着红星军服的照片，亚当这辈子看到过，还有那冷酷的、手从背后优雅一挥举起来的“同志的”敬礼。亚当问过他在德国、俄国的亲戚，不管在哪儿找到他们后他都问，为什么海因里希成了革命者？

他们都告诉他，海因里希是洛温家第6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大卫·洛温跟他的第四任妻子小莉娜·彼得斯没有生任何

后代。亚当说，她是我母亲最要好的朋友，跟我母亲同样年龄，可祖父却让母亲管她朋友叫“妈妈”；这个她忘不了，即使50年后，在加拿大。是的，人们说当时有这种事，年轻的女人嫁给老头，因为他有很好的房子，有土地，成了人的孩子，如果他很老的话，你还能死在他后面，正如小莉娜那样；大卫·洛温只有54岁，但他们两个无论如何也生不出孩子。亚当说，他们结婚的那年也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1914年，母亲把她第一个孩子取名叫莉娜，她干吗要这样做？她不是很讨厌叫她朋友“妈妈”吗？亚当问。于是有人告诉他，你应当问问她，还有其他人，也许她父亲叫她这样做的，还有其他人，你父亲是老雅各布·威伯的第8个儿子，不是老六，1929年他跟着他们一家还有上千的门诺教徒逃到了莫斯科，但大多数人被“格伯乌”^①遣送回了奥伦堡，境遇比他们离开时更糟，因为他们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而且革命者知道了他们想逃出苏联。不过，你们一家逃出去了，甚至找到了加拿大，而不是巴拉圭。这个我知道，亚当说，我就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可海因里希，他结过婚吗？他为什么成了革命者？

哦，对了，海因里希是大卫·洛温最小的儿子，因此他是继承不了任何土地的，也许这救了他，没被逮捕，也许是因为他叛逆——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有用的，21岁时他肯定识字了，等元帅把托洛茨基追杀后，等他进行了他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海因里希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军官了。但即使在军队里，要生存下去，你就得照着“格伯乌”所“建议”的那样做。当时在俄国，没人问理由，他们怎么建议的，你就怎么去做；但获准长途跋涉去萨哈林岛，即便对一个身穿军服、带着齐备证件的军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而且是在冬季！是的，是在冬季，亚当的亲戚说，这样有谁会知道你在毡靴里缝了什么铁家伙？

^①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可为什么,为什么海因里希要杀他兄弟?

他们说,因为这就是革命者做的事。

站在苏珊诺瓦墓地丁香花丛中,年迈的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弓着腰,却非常硬朗,她还告诉了亚当一件事:“我都91岁了,你又从加拿大来这儿,主已经知道我们不会再见了,因此这话我们可以大声说了,这里没人会听见我们。我给军队写过信,给克格勃写过。我在西伯利亚遇到过一个流放的军官,在军队时他认识海因里希·洛温。他把自己叫作格恩里希·洛夫,‘洛夫’在俄语中是‘狮子’的意思,就跟‘洛温’在德语中一样,30年代,他想了个什么办法逃脱了元帅对军队的清洗,1945年便当上了团长,帮助占领了但泽,可在那年的4月,在柏林西区的一条街上,一个德国狙击手射中了他。我在写信,说不定能了解得更多。”

“柏林西区,希特勒最后的掩体就在那儿。”亚当缓慢地说。

伊丽莎白·卡特丽娜折断一小枝紫色的丁香,举到自己的鼻孔前。“我只去过但泽,在45年的时候。”她说,深深地吸着气。“马林克切塔只剩下一半了,还有克罗恩斯托码头高大的龙门,城墙像断了头的烟囱或柱子一样。唉,我可以给你讲些故事——”她停住了,眺望墓地前方的村庄和远处的小山。“你到俄国来,我们大家都给你讲故事——讲我们的真实故事。”

亚当的手里捧着自己娇小的姐姐、小玛丽亚,还有海因里希,这是他们在春天果园里拍的照片。1917年,奥伦堡的罗曼诺夫;孩子们一本正经,脸上看不到一丝欢快或期待。信是必须要读的。过去仿佛是一条冰冻的河流,表面沉寂、静止,但冰层的下面,水流总是在涌。虽然看不见,但它总是伴着时间、伴着距离、伴着不朽的祖先持续不断地在流。

不过现在不读。现在是回忆他可爱的姐姐的时候。

耶稣对我的钟爱，
博大无垠。
我听到他甜蜜的召唤，
盖过世间万物。^①

他双手捧着这张老照片。他姐姐海伦圆圆的婴孩脸蛋上长着又扁又圆的小鼻子，露在白色的衣领外面，非常可爱，但同时已经带着深深的忧伤。小玛丽亚个儿高，修长，站在右边两个孩子的头旁边，看上去很安静。她是不是已经看见了冻原上的煤坑？海因里希站着，比长凳上的海伦稍高一点。他7岁，一脸顽石般固执，像是命中注定似的。

老妇人弓着腰，背朝墓地那片丁香花，双手把这张照片放在他手上，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在科累马河^②上，在冰封火山对面的采金地，那双手被磨成了粗糙的钩。他发现自己的哭。

在第七大街浸信会教堂里带坡度的过道上，他旁边走着的是苏姗娜。他们两个一起跟着海伦棺材后面的队伍，乔和雷蒙领头，其他6个子女和他们的夫妻率领孙子辈、曾孙辈跟在后面，还有约翰兄弟和他的新婚妻子艾米莉，大家一道走进由电子管风琴奏响的哀鸣之中，那音乐是范尼·J. 克劳斯比^③写的天堂之乐的曲子。即使这样，亚当还是感到心中涌起一股幸福感：他姐姐终于从凡人的忧愁和肉体的痛苦中解脱了，而且此时此刻苏姗娜离他这么近，她的袖子摩挲着他的西服。这是三年来他俩第三次排队参加葬礼了——她说，这是不是成了我俩每年

①原文中只有后两句，为了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意思，译者补全了该小节。

②前苏联远东地区北部的一条河流，发源于科累马山，大致向北和东北流入东西伯利亚海，流程约2,148公里，上游交错流经储量丰富的采金地。

③19世纪末美国著名福音歌曲作家。





必有的仪式了？——第一次是他的大哥艾布拉姆，然后是约翰的前妻艾莉卡。迄今他俩已经分居了8年零3个月了，他又在想或许不久他俩可以商量来点什么白天话访。“话”即法语中“诺言”的“言”，去年夏天她在电话上问他是不是“诺言”的“言”，口气中连丝毫幽默也没有。

我们干吗又要重新一同生活？

我们是结了婚的……我们很孤独……

那是你自己说的。

我是孤独。

那就坚强些，别朝我哭诉。我的朋友很棒，学生很棒，还有好多我喜爱的事要做。

老实说，难道你不再爱我了？

别对我提“爱”这个字。

不对你提？

“爱”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指“一同生活”？

还有决心。

那这一次你的决心能持续多久？

教堂里，在他们前头，棺材被抬着从所有哀悼者的面前经过，走到走廊的尽头，在讲坛底下转向右边，然后停了下来。

他们周围一排排的长凳旁全是人，头低着，双手交叉，他感到苏姗娜在轻轻碰他的手。三根冰冷的指头在扯他。在他前面，约翰转过身，接着是艾米莉，走进为他们留出的座位，他也跟了进去。

站在他们上方讲坛上的，是那些名叫“比尔”的牧师当中的一位，他们甜美流畅的嗓音通用于任何场合；他朗诵了《圣经》中那段标准的诗句，插了些莫名其妙的语句，然后对着麦克风驴叫似地领唱每一首赞美诗（他的名字是不是就叫比尔·驴叫？），他的嗓子被扬声器放大，压倒了管风琴的声音；这人像胸无大志

的呆子一样乐呵呵的,要是他在煮罗宋汤,也许比现在更懂规矩(这个打着领结的傻瓜肯定不知道怎么煮)——天哪,这些想法真可笑。

他可爱的、值得尊敬的姐姐的遗体躺在长凳前面的那口被擦得发亮的棺材里面。在家里的每次葬礼上,亚当都记得自己手指触摸玛格丽特那口扁平的方棺材的感觉。那棺材是用黑布盖着的,每条边都是阿伦·海因里希太太手缝的;艾布拉姆·费尔先生把在约翰·罗布先生的锯木厂锯好的云杉木板两头切成斜角,钉在一起,棺材所有的角都是斜角连接的;瓦斯卡赫坎学校的女孩子们用绉纸折了许多玫瑰,盖住了玛格丽特裸露的手臂,撒落在敞开的墓坑里,当时,男人们在艾布拉姆和约翰的带领下,正摇摇晃晃地把棺材举起,放在入墓的木板上,然后盖上棺材盖,仔细地钉好。缝纫小组^①的妇女们用绸缎垫在她的肩膀和脸庞周围,那脸被死神慢慢煎熬得不成样了。她的黑发卷曲,披在肩上:亚当感觉到手中的梳子被挂住了,在他们吃住的那间房子一角的帆布小床上,她起来坐了一会儿,他的草稿本放在她怀里,刚才他想让她看自己是怎么做长除法的,他要去除的数字是 227,玛格丽特让他一步一步的解释清楚,剩下来的数字又怎么办,然后,就像每天晚上要做的那样,他帮她梳理那长长的头发,整个白天躺在床上,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头上冒汗,那头发全缠在一起了,他努力地梳着,不扯痛她。阿弟,阿弟,小心点,那儿头发打结。

“天堂点名的时候,我会到场的!”比尔牧师朝着那堆嗡嗡低吟的哀悼者愉快地吼叫道;天堂是间用原木垒起的教室,你每天早上都去点名。

苏姗娜拂了拂他的左手;他意识到那手正攥在那块遮住她

^①北美地区妇女自发组织的团体,为慈善事业而定期聚会。





右膝的灰布下，在他饥渴的手指的触摸下，她的腿还是他喜爱的样子，他没有注意到。

我的天，亚当！她的愤怒在电话里炸响。看看你自己。我干吗还要相信你？

牧师正念着一篇颂词，全是甜甜蜜蜜、幸福美满的天堂小故事；亚当第一次瞥了一眼《哀悼仪式》，意识到葬礼快要完了。主持人的这通陈词滥调不温不火，其结果是：在真正了解海伦的人当中，没有谁能在她的棺材前说句钟情的话。艾布拉姆和艾莉卡的葬礼也都一模一样：那些个人的轶事是后来人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围着小桌子时才提到的，是在他们的遗体被远远地抬走埋掉后才提到的。突然，亚当觉得这荒唐可笑。他能看见的每双眼睛都是干的，放着光，沉溺于这稀粥般索然无味的吟诵之中，这稀粥冲淡了原本美好、尊贵的一生。最后一首颂歌，比尔牧师和那台响个不停的风琴领着众人唱到最后一行“那将是多么辉煌的一天，”这时亚当碰了一下苏姗娜的大腿——他不敢看她——然后站起身。艾米莉和约翰吃惊地抬起头，但还是挪了挪双膝，让他挤过去，站在走廊当中。他朝前走去，经过棺材，走上讲坛的阶梯。

比尔牧师睁大眼睛看着他，第一次住了口。他微微屈了屈身，但没有丝毫示弱的迹象，亚当打了手势说：“对不起，”然后在他面前斜着身子，把一个黑肩头挤进讲坛。

“对不起，我……我并不想打扰”（这扩音系统真好，他只需轻轻说话）“打扰谁，可我叫亚当，是海伦最小的弟弟，我觉得……我们家人应当讲讲她的事……在这儿讲讲我们的好姐姐、好妻子、好母亲、好祖母，我们曾爱着她，就像你终身、一辈子爱着谁一样。”

他差点去看乔那张朝他抬起的白脸，他知道那脸很白，去看他身旁的雷蒙，可他集中精力盯着他们之间的那口棺材，就在他

跟前，发亮的木头上撒着花朵，把手是银色的。

“海伦是 1879 年出生的，差不多 80 年前，在俄国奥伦堡附近的大草原上，准确地说是在门诺教徒修建的一座村庄里，他们叫作罗曼诺夫第八村。15 岁时，也就是 1930 年，靠那次取道莫斯科的“奇迹般的逃亡”，她到了加拿大，我们的父母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了那次逃亡，即使是我这个在加拿大出生的人，也要始终牢记，终身感谢主。海伦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取的是她去世的祖母莉娜·洛温的名字，对于我这个家里最后出生的孩子，海伦总是个大人。小时候，我和雷蒙一起玩耍时——我俩的年龄相仿——他母亲海伦好像不仅是我大姐，还是我的母亲，只是更年轻些，更好玩些，因为她会坐在地板上跟我们一起玩结绳、玩积木和汽车。

“可我……我想给大家讲关于我大姐海伦的一段记忆；对我来说，这记忆比任何全家福更清晰可见。那是 1945 年 3 月的上旬，一个冬天的半夜，当时，在埃德蒙顿以北的瓦斯卡赫坎，我们家里所有煤油灯全点着。我们全挤在我姐姐玛格丽特的周围，她躺在房子中间那个房间的小床上，她在那儿已经躺了整整一个冬天了。我妈、我爸、我兄弟艾布拉姆和我都在那儿，约翰坐在玛格丽特的背后，用手把她扶直，这样她能更容易呼吸。她不停地辗转，头扭来扭去，长发抽打着他的脸，发着高烧，汗水从脸上、从嘴里淌了下来，在痛苦地尖叫，那叫声变得虚弱了，我想，她已经烧了好几个小时了。

“海伦跪在她跟前，双手紧紧握住玛格丽特的手，我们都在哭，可她却非常镇静地说，她是坚强的，她一遍遍地重复着玛格丽特最喜爱的耶稣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





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①”

亚当抹了抹自己的眼睛，终于能抬起头来。一团团模糊的脸庞变得清晰了，半圆形的教堂挤满了人，连窄小的楼厅也挤满了，大约有 400 多人，他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认识自己这位默默无闻的老姐姐——如今关于她，他到底知道些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她和乔还有他们的 7 个孩子，名字叫坦圭、汪、罗佩兹、波提厄斯，还有他们当中的那个孤独的洛温，还有那些古老得犹如垒石的俄罗斯故事，要是《哀悼仪式》上的名单可信的话，还有她的几个人到中年离了婚的孩子和所有再娶再招的媳婿，以及 22 个孙儿孙女和 11 个曾孙。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他：这个癫狂的叔叔干吗要打断葬礼？他曾当过医生，但他很有钱，根本不必当医生，他成天无所事事，满世界乱跑，鬼知道谁在跟他一起在跑……这是为海伦，你们这帮傻瓜小儿，对着她的遗体说几句吧，她曾经也是人，你们不是最了解她吗？说呀！

“我并不想打扰任何人。”他轻轻地说道，感觉他的话在第七大街浸信会教堂的每一处裂缝中轻轻地回响。在他下面，在正对着他的长凳当中，有一张泪流满面的脸在笑，肯定是在笑他傻乎乎道歉时的那种语气；那是苏姗娜，于是，他更坚定地补充道：“请大家原谅，我只是想讲讲海伦生前的事。”

亚当下下了讲坛，走进走廊，没有一丝迟疑，可一只手捉住了他。他那无言的侄子雷蒙站在棺材的一角，跟他一般高，一样老，他用双臂抱住他，紧紧地抱住他。

多萝茜说：“这是我父亲的墓。”

①《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4:1-3)。

尼古莱·阿伦·洛温

1906 ~ 1991

生于俄国奥伦堡 卒于加拿大科尔代尔

亚当看了看这块灰色的碑石，眼睛抬了起来：这是他母亲的父亲的叔叔的儿子，因此，多萝茜顶多是他的远房表妹，甚至更远。墓地平坦，犹如修剪了的土地，连着远处科尔代尔平房边 5 月的那片灌木丛。他想，奥姆·雅各布·威伯应该是住在这儿，紫红和深紫色的丁香花会怒放在道路两旁和石头之间，高大的西伯利亚桦树会在这暮色中亮出春天的绿色，就像在苏珊诺瓦的奥伦堡，雅各布的坟墓周围一片耀眼的野绿中那挤在一起的白桦一样，拨开树枝，你找不见任何名字的痕迹，原来的木板早已朽掉了；甚至连小彼得也记不得了，只有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凭着记忆给他看那凹陷的地方，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上看到那日期，或许还能辨认出古斯拉夫语的字母：

雅各布·雅各布·威伯

1879 ~ 1962

在加拿大门诺教徒聚居的地方，这平放的坚硬的石碑是经得起割草机碾压的，停车场对面是那幢被人遗弃的教堂的高大框架，没被革命者强行关掉，但却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在加拿大，独立的企业可以把教堂改了——即使是那座 1939 年用了夏天两个月的时间村民集体修建的有纪念意义的门诺教堂——改成一幢狗屋。

苏姗娜站在他们之间说：“1992 年。”

她细长的双脚穿着黑色的无带平跟女鞋，黑色的长筒袜；她说的那一年是他们伤心的女儿离去的那一年，甚至连一块平坦





的碑石也没留下：

安妮·帕特丽夏·威伯

1965

加拿大 埃德蒙顿

要是为她立块碑，无须再加什么日期和地点；可这儿没她的碑，别的地方也没有。

多萝茜的手握住了苏姗娜的手，他看见她俩紧紧攥着，指节都发白了。多萝茜说：“我告诉过你，我不信。这世界太大了。”

亚当的心里涌动着愤怒，但突然间，苏姗娜转过身，把多萝茜抱在自己怀里。这不是葬礼上的那种举动，苏姗娜在吻她，先是一边面颊，然后是另一边。

“嗯——”她对着多萝茜捋到耳朵背后的头发轻声呢喃，就像她曾经说过的情人的呢喃细语，亚当觉得她几乎是在惊奇地问：“你的门诺教父母在哪儿给你找的这么甜蜜的名字，‘多萝茜’？”

多萝茜笑了，吻了吻她下颌的地方。“是我母亲汉娜取的，他们1925年到了加拿大，两年后她终于能上学时，因为个子高，她坚持要上5年级，为了证明自己，她自学英语，大声学着朗读《绿野仙踪》！^①”

她俩相互拥抱，笑着谈论着这个有趣的故事，此时，亚当站在一旁，头脑一片空白。从这个女人那儿，他从没听过这件事，而他却总自以为对她的童年了如指掌。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叫他，叫他的昵称。

“喂，阿弟！”

^①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弗兰克·里曼·鲍姆（1856～1919）写的以虚构的奥兹国为背景的儿童读物。

约翰拄着拐杖站在砂砾路上，他的新婚妻子高高兴兴地挽着他的另一只胳膊。

“我忘了。”约翰因为耳聋，声音很响。“妈的墓在哪儿？还有爸的，我想让艾米莉看看，她想看，大概就在这儿，嗯——在哪儿呢？”

亚当打着手势，参与到他们的寻找当中，“这边走，”于是大家结伴一跛一跛地穿过一排排墓碑。就在片刻之前，他们还都站在敞开的坟墓边，看着海伦的棺材被沉下去，在一片低垂的头之上，约翰的头高高昂起，闭着眼睛面对阳光灿烂的天空。当时，亚当心想，他是在想他的爱妻艾莉卡，差不多一年以前，她的棺材也是这样沉入地下不见了，如今，亚当扶着他的拐杖，对准他的助听器说道：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日子很难……你们怎么样了？”

约翰笑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在墓地里爆发了出来。“啊，我再怎么感谢主也不够哇！他给了我这样两个好女人来爱我，开始是艾莉卡，如今是艾米莉！我太感激了，阿弟，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我简直没法说，艾米莉她人好，我怀疑自己配吗？主太好了！”

在亚当童年的记忆中，他的哥哥约翰阴沉、无语，没完没了地干着苦活；在过去的50年当中，他躲着约翰，结果错失了什么？如今，他们只是一起欢笑，他和约翰，还有艾米莉，很显然，她被夸得满心欢喜，就在一个小时以前亚当才认识她，时间很短，当时全家人聚集在教堂的门廊内，跟在棺材后面走下走廊，在埋着自己亡妻亡夫的墓地里，大家又因为这和煦5月里泛起的幸福感而一同欢笑，在他们身后的什么地方，姐姐的坟墓依然敞着，停车场里，汽车发动了，碾着沙砾路面开走了。他看着约翰，然后看着艾米莉，对她说：“真好，你对我大哥真好。”

从她道道皱纹的母亲般的脸上，他看到了许多，比他自己想





知道的还要多。“哦，这不难，他对我也好。”

约翰用肘轻轻碰了碰她，嗓音突然高了。“嘿，你妻子苏姗娜，她也来了……那太好了，你们又在一起了吗，现在你们之间好了吗？”

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个你在葬礼上而非婚礼上两年见一次的兄弟才敢问，他耳聋得啥也不知道，话响得让跟在后面的人个个都听得见，连跟多萝茜在一起的苏姗娜也禁不住在听。亚当一样大声地回答：“苏姗娜就在我们后面，她住在卡尔加里，在教大学，我住在埃德蒙顿。你问她吧。”

即使拄着拐杖，在春天里的矮草上走也很吃力。约翰费劲地呼吸着，亚当仿佛能听见他的机械膝关节在吱吱作响，他肯定不会再往前走了——这时，他哥哥没看他，而是执著地问：“那你儿子住哪里？”

亚当克制住自己。“他的名字叫乔尔，26岁，在温哥华当计算机程序员。看，爸的墓在这儿，妈的墓在上面三排，在那边。”

约翰低头看着那块灰色的小石板，呼吸深沉；接着，他急急地说，仿佛他的这些话全积在一起，等着相聚的这一刻对亚当说，在20年前垒起的父亲的坟前向他倾吐。

“我想，主真是对我太好了，在加拿大，我上了不到3年的学，然后就一直放牧，每年春天给母牛接生，艾莉卡也很在行，我们的孩子全结了婚，都信奉主，都有美满的家庭，住在我们周围，主给了我这么两位仁慈的女人来关爱我，艾米莉的孩子也都结婚了，工作很好——”

“约翰。”艾米莉大声喊道。

亚当无话可说，只是在想，要是艾莉卡还活着，约翰是绝不敢说这些不加思考的话——她会比艾米莉更果断地叫他不要这样大吹特吹——不过，关于我，他这辈子肯定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我把自己富有、顺当的一生给弄糟了——也许上帝对我的

这位兄长、这位自足自满的家伙还要好，他一直很勤劳，一生对《圣经》字字深信，因此现在他认为自己美满的生活是应得的——上帝呀，他可千万别提崔茜——

“抱歉，”约翰赶紧说，用拐杖碰了碰亚当的肩膀，“这话不中听，可我不是那意思，我们都有痛苦，我有过痛苦，我们全家也有过，抱歉，我知道你正在感受的痛苦，我是想——”“约翰，”亚当对着他的塑料耳朵大声说：“我的感觉你知道个啥？你只消感谢主吧，他对你这么好，然后再去喂你那些该死的公牛！”

“嘿，阿弟，你可不要骂人。我不是……”可亚当把他俩甩在一边，跨过父亲的坟墓，出于直觉找到了那块黑石板，这是他真正想要看的石板。

卡特丽娜·威伯

1898 ~ 1982

AUF EWIG BEI DEM HERRN ①

我在此安息，你也将安息在此，与主同在。

苏姗娜和多萝茜在他身后。苏姗娜摸着他的手，没说什么，可多萝茜却忍不住帮着说几句：“瞧，约翰不是那意思。”

“没关系……他总那么想。”

亚当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呜咽，他感到愧疚，两个年迈的兄弟站在父母青青的坟草旁发火，真是蠢得难以言表。他眺望大草原起伏的地平线，看见奥伦堡牧场一直伸到湛蓝的天边，村庄的那些茅草屋顶几乎隐藏在淌着泉水的山谷里，还有他年迈的奥姆·雅各布叔叔，飘着白须，长着威伯家族的长鼻子，弯腰使着铁铲，在种一排排的桦树和丁香。“啊，信徒啊，干活并希望吧，”

①德语：永恒/永远与主同在。这句话常刻在墓碑上。





这是《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一书里的告诫，但愿千百年来在这个血腥的世界里有人会听；苏珊诺瓦的这些高大的桦树上，白色的枝干发绿、翻皮，在明媚、和煦的风中，灌木丛泛起耀眼的紫色，掩盖了一座座塌陷的、隐藏的和无名无姓的坟墓。

“干活并希望吧，”亚当大声说道，“在这大草原上，或在牧场上，我们属于这地方。”

苏姗娜碰了碰他。她和多萝茜站在他旁边，站在他母亲的墓碑旁边，艾米莉和约翰也走了上来。他需要为自己解释，需要在这儿说些好听的，于是他提高嗓音好让他兄长也能听见。

“我们父亲的长兄靠一把铁铲在苏珊诺瓦的奥伦堡干活，种桦树，一直干到78岁，大家叫他奥姆·雅各布。可1937年，当时他还住在罗曼诺夫第八村，元帅颁布了新宪法，接着又是大清洗，公开审判没了，成千上万的人莫名其妙地遭逮捕，一天晚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察来抓奥姆·雅各布。他们的黑色囚车总是等在村外，天一黑他们就慢慢地开进街道，没有开灯，他们已经这样抓走了昂克尔·彼得。他们押着奥姆·雅各布往南翻过山，开到奥伦堡城，三辆囚车挤满了从门诺教村庄抓来的男男女女，他们才不在乎留下来的小孩有没有父母照顾，他们只是完成每晚的指标。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告诉我说尽管车窗是用黑帘子遮住的，但当车驶进如今依然矗立在奥伦堡基洛夫街上的那幢灰楼里面时，车上的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去年夏天，她带我和表弟小彼得·威伯去过那儿，他和他们一家过去跟我们家一起住在莫斯科，但他不敢单独带我去——她得陪着我们——因为后来他被关进那儿好多次。铁门砰地一关，囚车上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他们到了哪儿。他们让这些人在大厅里排成行，一个个地领去登记，那天晚上的人真多，奥姆·雅各布最后坐在大厅的一把椅子上，一边祈祷，一边等着，但没人叫他。他

在底楼，二楼以上是办公室和单人监狱，他听见了‘审讯’的声音，听见下面地下室有人在催着继续走，有时候他听见长长的尖叫声，他只好捂住耳朵。可没人来叫他，他在祈祷时，身穿灰制服的警察手拿文件，在他跟前来来去去，最后，他开始一寸寸地移动椅子，移近外面的那道门。三个小时之后，他依然在那大厅里，但移到了门旁边。当然，那扇门锁着，他精疲力竭，差点栽倒，这时，有个男人从地下室上来，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于是那男子吼道：‘你怎么能坐在这儿睡觉呢？滚出去！’然后他开了门。

“我们就站在那扇门的街对面，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告诉我说奥姆·雅各布不认识那人。小彼得说直到临终时奥姆·雅各布还相信，那人就是上帝神圣的天使。

“他走出那扇门，走进自由的空气当中，太阳出来了，上班干活的人都把头扭到一边，没人对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是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幢灰楼里走出来的，即使现在，那幢楼房的百叶窗依然关着，铁门敞得更开，好让卡车开进。四天四夜，他走了 60 英里回到了罗曼诺夫第八村，他小心地躲着，在大草原上没人见到他，第二天他和妻子便不见了。往西翻过第八号山到了苏珊诺瓦的奥伦堡，在那儿他蓄了胡须，但用的还是自己的名字，因为在任何一座门诺教村庄里总有四五个叫雅各布·威伯的人。每个集体农庄都接到命令要种树，沿着道路、铁路种，在田野之间种，于是苏珊诺瓦公社选举奥姆·雅各布作为种树的头儿。如今，在村子里，地里，牧场上和河岸边，无论你走到哪儿，到处都是白桦树，在道路迎风的那一边，在山与山之间，种了三四排。我和伊丽莎白·卡特丽娜还有小彼得走到那儿，下雨时坐在那些树下。有些树有两英尺粗，跟棉白杨一样高。”

亚当用手指了指半英里以外科尔代尔那边地平线上的棉白杨，停止了说话。他看见一大群人跟着他围在他母亲的墓前；他





们好像是在倾听这段来自世界另一头的家事。而且他还感到在南艾尔伯塔吹动的那永不停息的风,那风吹得更猛了,在低垂的夕阳下,空气几乎凉爽了。

“亚当叔叔?”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说,他认出那是扶棺的一个孩子,海伦的孙女,叫尼古拉·汪,脸庞像东方的一幅画。“你去过俄罗斯,跟你姑妈伊丽莎白·卡特丽娜谈过?”

亚当笑了。“是呀,感谢上帝我会说低地德语!她其实不是姑妈,是远房的堂姐,在二战期间被抓了,后来苏联红军又把她从但泽抓回俄国,判了她苦役,就像小彼得一样——实际上他是最亲的堂弟——元帅死后,她判的刑被取消了,她……”他停住了。

要讲的太多了,在这空旷之地,在这风中没法讲,这个家族的人太多了,加上他们所有那些真实的故事,他朝尼古拉笑了,看着她认真的黑眼睛笑了。围在她周围的那些脸在认真地打量着他,带着愁容,也带着好奇。这户人家有的是故事好讲。

“我们回去吧,”他说。“回莱斯布里奇,去喝咖啡,我会给你们讲更多俄罗斯亲戚的事。”

“你录像了吗?”一个非常年轻的人问道,肩上搭着一个更年轻的女孩。

“没有,我带了相机,是照片……走,我得喝咖啡去!”

渐渐地,等大家全都仔细看了曾祖母的墓碑,包括上面的翻译文字:

永恒/永远与主同在

卡特丽娜和亚伯拉罕·威伯这一大家族在加拿大的这支后裔三三两两、松松散散地穿过墓地,走到停车场。同在俄国的近亲相比,只有他们一支才逃脱了1929年元帅的清洗。亚当看见他们

在边走边说，他心想，我们应当成为驯鹿；我们浪迹天涯的生活不就是在永远地寻找能维持我们生命的食物？糟糕的是，我们没有铲形的鹿蹄，没有自然酶消化青草和苔藓，我们闻不到埋在雪下的极地的青苔；因此，只有善良的狼群会追逐我们。

约翰一跛一跛地走近他，抬起不需要拄拐杖的那只手，搂住他肩膀。亚当把手放在哥哥的手上，感到那手抓紧他，大而有力，因为干重活而青筋鼓起，指节被滑落的扳手砸得满是伤痕，他们就这样搂着走了一会儿。两个身影合成一团，两颗头颅映在前方的坟墓上。

多萝茜在他身旁问：“那个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威伯现在有90了吧，是不是在乌克兰的吉内登索尔出生？”

亚当在努力回忆。“她说她91了，她好像提到吉内登索尔^①……大概每个聚居地都有一个。”

“我在画一张家谱图，”多萝茜说，“我认为她祖母出生在洛温家，住在犹太人聚居地，嫁给了一个叫本杰明·艾布拉姆·威伯的人。”

“又是一个艾布拉姆·威伯！”

苏姗娜说：“又是一位尊贵的万众之父。”

大家笑了。“就这两个家族，”多萝茜说。“威伯家和洛温家，尽是些生日呀，地点呀，婚姻和死亡，”仿佛这些就能编出世上最简单地故事。“我想也许在舒尔什奇旧聚居地，可能找得到她祖辈跟我们的关系。”

多萝茜钻进苏姗娜银色的宝马车；苏姗娜走到驾驶座位那一边，亚当跟在她身后。

“不想留下来喝咖啡？”

“去卡尔加里要两个小时，我不想在天黑后开车。”

^①门诺教徒每迁徙到一个地方，就用这个地名给自己的村庄命名，这名字的意思是“圣恩之谷”。





可亚当感觉到了她的犹豫，他赶紧补充道：“这是最好的机会，见见我们家更多可爱的亲戚。”

她瞥了他一眼。那双绿色的眼睛——当他们做爱时，那眼睛曾经变得深蓝——在对他说：你可能会可爱几分钟，可接着你会开个玩笑然后一走了之。或撒个谎。不过，他心里真切地感到，他俩是不会相互不爱的。

于是他非常严肃地补充道：“如果天黑了，我宾馆房间里有两张大床。我只睡一张。”

她打开门，坐在方向盘面前，把穿着黑袜的腿收进车内。汽车发动了，车门猛地一下关住了，像一声判决。

第20章

罗曼诺夫第八村的群山

1995年，莱斯布里奇

又一个旅馆客房的夜晚，但已经很不一样了。狂风从老人河河谷刮上来，猛烈得像要在窗户上打出洞。

亚当说：“小彼得最后还是带我去了俄罗斯，现在那儿非常安全。其实他和海伦是孪生兄妹，同一天生的。他家在第八村里有幢石房子，就在学校对面——人们把他们叫做‘石头威伯’，虽然这个名字起得倒是更合我叔叔的个性——海伦是在村尾我父母的工人房里出生的。这石房子依旧——”

“听我说。”苏珊娜说道，屋里一片漆黑。

刚才，在对面那张床上，她钻在毯子底下，像以往一样蜷着身子睡着了。亚当读着读着最后也睡着了。但那时他醒了，因为她到了他床上。苏珊娜在他身后，用指尖抵着他的肩膀，好像要和他保持些距离。他转过身来，他们隔了有半米远，中间放着睡衣和一张床单。

“你的托恩特·伊丽莎白，她住在那个叫苏珊诺瓦的地方？”她问道。

“你想干什么？”

“问你个问题。”





“要我的诺言？”

“跟你参加了半天的葬礼，难道不能给个许可？是不是近亲？”

“加拿大社会矫正服务署^①可从不签发床上许可。”

“较近的亲戚？”

亚当想着，慢些，慢些；他在她耳畔温柔地说道：“她叫伊丽莎白·卡特丽娜，是很远的表亲。苏军打来、德军从但泽撤退时她活了下来。”

“那个村子叫苏珊诺瓦？”

意识到她的反应，亚当有些开心了。“的确，门诺教徒的村庄用了个女人名字。1911年的时候，奥伦堡有个叫彼得斯的，他在草原上给他5个儿子和3个出嫁的女儿买了块地。在他们盖第一个农场时，他妻子苏珊娜去世了。所以，他就以她的名字给这个村命了名。”

“有意思。”她说。

“真难想像，50年后很容易就能到那儿——只需一天工夫。从法兰克福搭飞机到奥伦堡，再花50美元雇辆出租车翻过那些小山就行了。她有间用铁路枕木修成的小房子，一股沥青味，但他们也只能用沥青来修房子。她91岁了，经历过……你不会相信她都经历过些什么。”

“她信教吗？”

“她说她祈祷，也信奉上帝，那就是她活下来的原因。在德国时，她曾当护士照看过老人，为这，她在劳改营里呆了9年。她说她现在让过去的都过去了。”

他们并排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

“她说，这世上总还是有仁慈的，虽然在你最需要时通常看不到它。”

^①为加拿大一政府执法机构，旨在看管与帮助监外执行的违法者，协助其重返社会。

“‘上帝的仁慈奇怪得吓人！’”

“谁说的？”

“格雷姆·格林书里的一个牧师。”

“啊。”亚当想起来了。“《马场杀手》^①，最后是那个女孩。”

“是露丝，”苏珊娜说，“就在她步入恐怖的深渊前。”

“‘诅咒上帝就要死。’伊丽莎白·卡特丽娜说她诅咒过上帝，有好几次，但她永远不会死。”

“为什么没有？”

“跟我去苏珊诺瓦，你就能问问她了。”

“我不会说低地德语。”

“我来翻译，你便能看到她的答案。她很硬朗，背驼得像弯曲的铁棍，有张削瘦、刀刻似的脸……我得说‘神圣’了。”

“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跟你失散已久的亲戚说话。”他们之间涌起一股无法抑制的伤感，但他忍了下去，仍然高兴地说着。“母语，”他说，“是最好的礼物。她和小彼得讲的故事我都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把一些译成了英语。”

“这里有吗？”

“我给多萝茜带了一盘他的。”

“给我读读。”苏珊娜说道。

“读一读会让你想起我们以前在床上做过的事。”亚当边说边翻身起来了。

“你想让我走？”她的声音生硬得像冰块。

“对不起，不，不……”他摸了摸她裸露的肩膀，“求你了……”然后小心地从她身上伸过手去拿文件袋，“只是太悲伤了。”

“这很合适，我们刚参加了一个隆重的葬礼。”

苏珊娜总是有办法把事情都联想到一起去，而就算他还断

^①《马场杀手》是英国作家格雷姆·格林的作品，露丝是一起谋杀案中惟一的女证人，但却嫁给了杀人凶手。





断续续地记得一些，但他们在一起时的那么多事情他都已经忘记了。相伴一生，多么美好的字眼，即使她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离他那么远，他仍能感觉到她的体温。但她还是躺到他身边来了。他打开床头灯，翻了几页，想告诉她矮小的小彼得的故事，他站在奥伦堡大街上的故事。“1月9日，基洛夫街的一角，找到了，”80岁了他还不敢看那灰色的建筑。“我曾在里面，”他告诉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和亚当，“1930年时在3楼，41和48年时也在。还去了地下室8趟。很多小房间，等着轮到你，你能听到他们对人都在干些什么。还能闻到。”

亚当找到下一页，读道：“‘……俄国没什么上帝，但有人民内务委员部——他们不停地更换首写字母，开始时是格伯乌，后来又成了克格勃，但他们做的事都一样——人民内务委员部让我们相信，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你想像不出恐惧是怎么控制着你，不过在星期三晚上，我们村民照样关紧窗户，聚在一起读《圣经》。我有本《圣经》，房间里很挤，我用德语朗读，我爸爸彼得的《圣经》是罗曼诺夫村里惟一的一本。1948年，他们来了，在晚上，当时我正在大声念着约翰福音第1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接……”

“接着是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他们一向这样。要打开我们的门得费点时间，我们通常让最壮实的男女站在门边，这样他们就不能很快进来。听到敲门声，我便把《圣经》放在墙上一块石头的后面，然后离开了房子，像前两次一样快。但这次他们聪明了点：我打开厨房门时，看到两个壮汉等在了那里。“别担心，我们只问一些问题，没什么的，公民贾斯蒂娜，晚上他就会回来。”当然了，但是是在哪个晚上？5年后，元帅死了以后，赫鲁晓夫^①

^①赫鲁晓夫(1894~1971)：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1956年苏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

作了个“个人崇拜”的报告,说了些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接着他又重新审查了1000万或1100万,也可能是1300万个政治犯的纪录,过了7年我才获释,我甚至还算不上个“自由流放犯”,他们不能呆在离家方圆500公里的地区内。我能走,能回家了。

“我还活着是因为我个儿小,我会记账。即便整日坐在暖气房里的凳子上,年复一年你也只能得到一点吃的,我这样的小个子都很难填饱肚子。但是,如果你得在严冬天里在煤矿或林子里干活,像你这样的大个子,连一个月都撑不了。小个子总能活得长些,有时几乎是半年,但他们总是很开心地用黑面包喂我,有时甚至还会在汤里加个鱼头,因为每个劳改营的头头都得有个记账的,得帮他提前打理那些没完没了的账目,以防他的头头突击检查,那些账得放在营里,要不然他也会被逮捕。每个芜菁皮的重量都要称过,然后记下来,必须要有个既老实又懂记账的人,很好,每个头头都会吻我,少了我他们还会大喊大叫。蒙上帝的怜悯,25年的刑期我只呆了7年,居然还活着,分给我的食物跟在齐腰雪里砍树的人一样多。得成天地算数,那些数字在你脑子里就像变绿的树林一样,累得你眼睛都睁不开。得把数算得准,得比那些拿电子计算器的检查员都快,账簿堆到了天花板上,感谢上帝让你一年一年的脑子里塞满了数字,还有就是不能承认,就这些了,“不,我没有……不,我从没说过……不,我谁都不认识……”

“问题会在任何一个晚上的任何时候冲你过来,通常是在午夜以后,可只有数字是不变的,跟石头和冻了的云杉一样硬,它们堆在那儿就像尸体一样,等着春天来后被埋起来。”亚当停了下来。在记忆中,他能跟上小彼得的声音,可一下子却看不到他写的字了。

“太可怕了。”





苏珊娜说：“你译得很精彩。”

“我想问题就在这儿。这样的故事你讲得越精彩，看起来就越不可怕。”

“别那么深沉。”她说了一句。接着又一句，“他真回来了？”

“很突然……让我读完，”亚当说着，整了整又读道：

“……‘最强壮的人总是死得最早，有时女人活得长些，但我个儿小，我在屋里干活，熬了7年，熬到元帅死了。我在普拉托夫卡下的火车，搭上了几辆卡车，走过绿色的第八山，最后看到了罗曼诺夫这儿的房顶，都低垂在天边。我走在夜色中，呼吸着春天的空气，到了那片墓地，那儿盛开着丁香花，香气好像是从天堂里来的一样。我母亲就葬在丁香花的下面，没有墓碑，只能靠记忆找得到。接着，我走到了村中心的十字路口，打开石房的门，就是在这扇门前，1937年他们带走了我父亲，把我也带走了三次。又是个星期三，莱斯·彼得斯放下了手里的书。她把父亲的《圣经》还给我，我打开便读了起来，就像我从没离开过一样，就像我还在那间屋子里，就像我还面对着那些沉默的面孔一样，尽管我知道他们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我大声读着耶稣的话，‘那常跟我连接，而我也常跟他连接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一旦脱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

泪水从亚当眼里流下，一直流到鼻子旁。那么让人觉得安慰的话，同时却又那么骇人。在他眼中，今天他为姐姐感到的短暂而静静的悲伤，还有苏珊娜如梦般最终又回到了他身旁，这一切就像是一棵正在生长的树，在午夜的房中被风吹打着；每一根枝条，每一根茎蔓，每一根藤须都在床下勃发着，都在灯泡上缠绕着，都在沿着天花板的边沿攀爬着，在痛苦中抽出的枝叶严实地塞满了整个房间，把他和苏珊娜紧紧绑在了一起，绑在了这绿色中，绑在了先辈们永无停歇的苦难中。

“不是你的错。”苏珊娜对着他的脖子喃喃道。

她那么近，他几乎能摸到她；但他不敢。他只能说：“小彼得……到结尾了，这儿……‘那时是我第三次还乡，但我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了。他们在1937年带走了他，而元帅又活了16年。’”

苏珊娜叹了口气。“好了。要是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就太好了。”

“到他们够老的时候，有些人可以。”

她关了灯。“是，当痛苦能慢慢散去的时候。”

亚当突然生起气来，快得如同放了手的弹簧。“该死的多萝茜，我早该在墓地里把她掐死。”

“为什么？她那么和善，又善解人意。”

“我们早都在墓地里了，为什么还要把崔茜拖进来！”

“她知道我们在想谁，她在跟我们说，‘我还有希望’。”

“希望！”

苏珊娜平静地说：“她从不装出好像崔茜从没存在过的样子。”

“我的天，你认为我在装了？”

“不，我觉得对她你很诚实。但大多数人都在假装，更简单些。什么也不说。”

“好吧，我们可不能不想她。”

“我们俩都知道的。”她向他挨近了一点。“告诉我小彼得爸爸的事，就是29年从莫斯科被送回来的你叔叔。他死在监狱里了？”

她的呼吸声很轻。亚当的思绪渐渐松弛下来。“不，”他说，“他们说死了。1960年克格勃给他家人来了封信，说他1944年在劳改营里死于心脏病——想想吧，16年后！——但他们在撒谎。”

“他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1990年克格勃的档案被公开了，他的一个孙女写信问到





了这事。他们收到的回信是这样说的，她祖父彼得·威伯 1944 年死于心脏病一事‘与事实不符’。”

“他们说没说什么才‘相符’？”

“噢，说了。他是在 1937 年 2 月 13 日被捕的——家里人当然知道这个——8 月 13 日他被宣判，这家里人却不知道，他被认定曾与一个‘反革命的法西斯组织’一起工作过，被判了死刑，1937 年 8 月 15 日就被枪决了。他就从没离开过奥伦堡监狱。他们甚至还给家人寄了张他受审时的照片。”

“上帝！”

“克格勃那儿保留着详尽的纪录，以防‘自己屁股夹屎日后倒霉’。”

“他们说他葬在哪儿了吗？”

“不，不过很明显。就在奥伦堡那儿乌拉尔河的对面，沿着宽阔的山谷下去，那儿现在是个城市公园，有座吊桥横跨水面，还有高大的树木。小彼得和我陪着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到过那儿。37 年的大清洗中，晚上的时候，他们拉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挖了许多既长又深的沟，然后在沟里枪杀了他们。”

“就在公园里？”苏珊娜哽咽着说。

“37 年那儿是个军事基地，之后改建成了公园。10 年前，人们发现了他们脚下踩的竟是堆堆尸骨，然后他们便种上了排排白桦，就在这万人坑上，每一棵树上还挂了铭牌。小彼得给我们看了写着他父亲姓名的树。”

“一棵白桦树。在长着。”

“已经长成绿色的树林了。伊丽莎白·卡特丽娜说，‘他能很快地死在这儿也不错。他肯定在天堂里等着我们呢。’”

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这共同意识在这不知名旅馆的房间里淹没了他们。他们知道，巨大的悲伤正包围着他们，对他们这因为痛苦、因为折磨、因为信仰、因为饥饿、因为元帅、因为上帝、

因为希望、因为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惟一的女儿而结合在一起的身体，他们自己已难于承受下去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也必须紧紧地靠在一起。她的唇如同撒过一层的蜜。她进入了他，而他也进入了她。“慢……慢点……”她的舌让他静了下来，他也一样。在这超越了记忆和梦想的静止中，他们好像是第一次重新认识了对方；但却在哭泣。

风吹打着玻璃。“亚当。”苏珊娜喃喃地说道。

“苏珊娜。”

他们仰面躺着；他们脑子里空空的，却很安逸。用低地德语说，他们可以“从这儿走到月亮那儿”。

苏珊娜静静地说起来，“我去过萨斯卡通，是个加拿大的文学研讨会。那儿有个女人，她跟我说了些我父亲家的事。”

“也很可怕吗？”

“不，不像你们家的那样。”

“什么事呢？”

“我爸爸的祖先也来自俄国。他真正的名字叫洛温。”

亚当躺在那儿，仍在惊异之中。如果他曾把巴德·莱昂斯与门诺教徒联想起来，那他很有可能会偶然发现巴德·莱昂斯这个名字与德语中的莱昂·洛温有联系——去年夏天他才听说，他那个在苏联的叔叔把海因里希·洛温的名字改成了俄国名字格恩里希·洛夫——他只能对苏珊娜傻傻地说：

“你和我可能是亲戚。”

“10代或40代之前可能是。年长的贾斯蒂娜·托维斯告诉我，说她祖父和我父亲的祖父在俄国时曾是朋友，她祖父就是在20年代帮很多门诺教徒移民到这儿的大卫·托维斯。”

“大卫·托维斯，加拿大门诺教徒移民会的会长？”

“是——我想你认识他。”

“多亏了他，我们家才能到加拿大来，是他说服了肯麦齐·





金总理^①和加拿大铁路公司。”

“我一直都在跟你说，门诺教徒是好人。”

“有时候——至少对自己人是。她怎么知道大卫·托维斯认识你父亲的祖父？”

“通信呗。他们在北美时就互相写信，一生都这样。孩提时他们就是朋友，那时是1880年，他们的父母跋涉到了一处亚洲的沙漠，准备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到来。”

亚当盯着旅馆天花板上的灰色石灰泥。就是在他最忧郁的梦中，他也梦不到她说的话，要是小彼得一定会这样说。

“你们洛温家的人跟着那个疯子，那个盼着千年到来的克劳斯·艾普？”

“疯子？谁是克劳斯·艾普？”

“在门诺教的历史上，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从它裂缝里长了出来。你跟着到过爱达荷州吗？”

“没有。”

“好吧，卡尔加里大学图书馆里有本《门诺教大全》，可以让你好好了解疯狂的‘亚洲艾普’。”

“你认为他们疯了，而父亲却瞒着？”

“不，不，别这样说，大多数家庭早都离开了艾普，早在他把他们召集在山上之前，在他预言耶稣会降临的那一刻之前，耶稣当然没有出现了。”

苏珊娜沉默了，亚当继续说：“想让我查一查，追寻一下你的莱昂斯/洛温家族吗？”

“别管了！”她在他怀里扭了扭身，突然有些生气。“或许我不想知道。我父亲这一辈子都在跟我说，想让我知道那些他想让我知道的事。如果他想让他的过去都随他而去，这也有可能，

^①肯麦齐·金(1874~1950)：加拿大第一任自由党总理，其政府因未能解决经济困难及反对保护关税而垮台。

如果我爱他,我应该不要去管了。”

“好吧,好吧。另一方面,我母亲也会说,那些上帝保佑的灵魂已经在天堂了,在那儿他们会知道一切的——但这也许能帮我们,帮我们了解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那样说过吗?”

“没有,但她相信‘证人’总在天上,在看着我们这些地上的人。”

“那么这就是你一直想做的,到处拼命打听,然后一步跳上天堂?”

亚当哼了一声。“也许我去不了天堂,所以我还是在这儿知道为妙。”

“我可受不了你的那些玩笑。”

“对不起。”亚当抚摸着她。她把一只优雅的手递给了他;现在,那手感觉起来更瘦了,但在他手里却那么温暖。“我年迈的姐姐刚下葬。但你只要一开始,就有那么多——才找到一点儿威伯家族的东西,现在又是你父亲——我还没敢读那些说洛温叔叔的信。”

苏珊娜对着黑暗说着:“或许你应该开始为你妈妈想想。如果她现在在天堂里看着你,会看到你都做了些什么呢?”突然,她激动地坐了起来,膝盖紧紧地在床单下夹着。“死了这么多人——我想知道伊丽莎白·卡特丽娜是怎么活下来的!”

亚当无话可说。她曾给他无限的温柔,那么突如其来,但在这个灰暗的房间里,她的语调让他长久以来的调查只是成了为自己而做的;只是在追查着残忍的暴行:还有更可怕的事让我发现吗?还有更多的谎言吗?与此同时,我却在掩盖着自己的错。

“还有那个彼得斯,”她说,“和他的村庄苏珊诺瓦。”

“你……你想用你的名字命名什么吗?”

“你有什么可以的?”





“也许可以是瓦斯卡赫坎那儿的老房子。”

“噢？你不是一直在说，你再也不会走近‘那个偏僻树林里的泥坑’了吗？”

“我改变主意了。”

“真的？”她又和他并排躺在床上，又和他保持了些距离；她的语气不无讥讽。“那又怎样？”

“他们把那儿全部清除了，现在的山头只不过是一处光秃秃的空地。”

“光秃秃的山。你可以种白桦树啊！”

为了所有死去的人。他自己还从来没有想到过。

“是啊，”他说，“最后是‘工作和希望’。”

他们的手脚互相抚慰着。她浑圆、修长的身体让他再次颤抖起来。他的坚硬掠过她的大腿，但她没有动。

“我能用你的名字吗？”

“给谁？”

“老房子。就叫‘苏珊诺瓦’。”

“那是你出生的地方，”她又接着说道，“我可不想死。”

“嗨，我不是这意思……”

但是，还在他的大脑弄明白之前，她轻盈的身躯就能让他理解了，让他的身体理解了她所说的话。不管他们分开住得有多远，不管他们分开住得有多久，除非他们可以共同经历过，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彼此间无形的爱恋，也无法理解其中的痛苦。但这需要勇气。

他对她的想法做出了回应。“多萝茜不会相信。”

“她也这样对我说。”

他们都8年多没有做过爱了；如果她不向他转过身来，他就又够不到她了。他们谁也没有睡过这张床，在这样一个编着号的公共房间，在这样一个总是陌生人才会短暂停留的房间里。

甚至他们放到一边的睡衣也是陌生的：只是在此时此刻，他们才了解了自己，才了解了对方，才了解了他们裸露的身体和他们多年前在一起的生活，只有在这棉布床单和记忆里。如此的分离。

如果他问她，你为什么要和我上床，她会回答，不要让我为此而后悔。

苏珊娜说：“你姐姐们的故事真感人。”

“那个笨牧师……不过后来我道歉了，他——”

“嘘。”她说。如此的分离。过了一会儿，她说道：“《日常祈祷用书》里有‘海中用的祈祷词’。你们3个一直在周游世界，所以每天我都念给行者的那一段。然后我想，我们现在都在陆上或天上旅行，所以我就自己编了一段。”

她的手指摸着亚当的脸，他等着它们经过他的眼睑，他的鼻子。她的手指碰到了他的嘴唇，他边听边回味着她的祈祷：

“噢，上帝！我们的造物主，你无所不在。你说话时，弯的可以成直，巨浪亦可歇息；你以云为车，以风为翅。噢，仁慈的造物主，为我保佑这些远在他乡的旅人，他们是我的爱人。无论我们在哪里，请把我们平安地送到终点。”

如果苏珊娜和亚当是在一起，他们一定睡着了。



第 21 章

阿塔卡马沙漠^①之骨

1995 年，智利

我出生在 1965 年 7 月 25 日，星期天，在艾尔伯塔大学医院的产房里，那个医院在埃德蒙顿。这给了我成年时最有用的东西——加拿大护照。

25 岁生日那天，我没做任何庆祝，在土耳其的格莱姆沙漠上，我做出了一个已经考虑多年的决定：改名字。把安妮·帕特丽夏·威伯改成安·帕特丽夏·威尔逊，这样我的名字就属于了毫无色彩的英语世界，这样在过境时，尤其在机场，就再也不会有人问你那些躲不掉的问题，当然更没人会多管闲事地跟你瞎聊，问你是不是门诺教徒了。要么更糟，他们会问你的至亲好友是否逃亡过，是否散居在地球上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史密斯”或“布朗”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可我觉得，对于简单而又并非是要欺骗谁的隐藏来说，它们显得太随意了。“威尔逊”比“威伯”这个姓更靠近字母表的后面：在列名单或点名的时候，在叫到我的姓氏之前，我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那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①位于智利北面的一处荒漠，据认为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

7月25日是我的圣徒纪念日,即安妮^①的纪念日。根据东正教的传统,圣安妮是约阿希姆的妻子,拿撒勒古城中圣母玛利亚的母亲。我需要做的就是从绿山墙上把e扔掉^②。

西班牙语是南半球最重要的第二外语,而对想躲一辈子的人来说,南半球足够大了。

“为什么不是别处,偏偏要在澳大利亚学西班牙语呢?”乔治问我。我笑了笑,把这问题抛在一旁,反问他一句:“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教西班牙语呢?”他低沉地说。“这很简单,被我们伟大的总司令皮诺切特^③赶出来了!”他教我的西班牙语已经够用,已经让我可以听出他玩的谐音把戏,他总把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名字念成“皮诺鸡屎将军”,我们都大笑起来。虽是在悉尼一月节^④的港口酒吧,笑声也显得非常响亮。

但今天是在十二月,一定要来的节日是圣诞节。我现在正在圣地亚哥,而只要那位将军还活着,乔治就不愿意回到这儿来。一本叫《孤独星球》的旅行指南上说,阿修迈达大街是“首都最主要的步行街”,在这儿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当中,我在一个街头报亭里选了一本智利的地图册,选它是因为它名字叫《旅行中的美景——智利旅游图》。一本为这个狭长如匕首的国家出的小册子,其底端深入南极洲的冰雪腹地。我想看看美景,可能这儿就有。为什么之前我从未来过智利呢?为什么只是到秘鲁和厄瓜多尔,甚至还有阿根廷的边缘极地?(门诺教徒居住的巴拉圭很容易就躲过去了)我数出2900比索——等于10个澳元或加元,不过加元对我还有什么意义?这时,我感到有人用指尖碰了碰我的胳膊:是一个顶着烈日站在街道上的女人。她细长的手

①据《圣经》“外传”记载系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②绿山墙是指加拿大小说家蒙哥马利的作品《绿山墙上的安妮》,其中的小女主人公叫Anne。

③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智利1973~1990年间的军事独裁者。

④悉尼在每年一月举办的全球性艺术节。





递给我一张纸。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看她,便强烈地感觉到,再盯着看下去她的脸色就会变灰白了:

“我最亲爱的约瑟法。”纸上的那句简单的英文写道“我最亲爱的约翰”如今已到家了,也不能从美国回到她身边了。真是够“最亲爱的”了!这个女人乌黑漂亮的眼珠里含着泪水,泪珠快从她象牙般的脸颊上滑落下来了。“对不起,”我赶紧给她道了歉,把那张纸递回去,“我只会说德语。”

宽阔的圣地亚哥大街上车水马龙,满是嘈杂的声音,柴油发动机的轰隆声和排出的废气弥漫在整个十字路口,小商贩们在卖着永远都会有的可口可乐和肉馅松饼。熙攘人流边上的塑料棚子下面,街道画家们在画布上熟练地涂抹着,他们在画些白雪皑皑的山川和田园般的树林。一处路障的墙上涂着:“皮诺切特是杀人犯”,下面还有一句,“克林顿和皮诺切特都是杀人犯”,一直涂到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这是些从没在《信使报》或《时代报》上公开过的初级政治辩论。越过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我只能隐约认出古典西班牙式的兵器广场^①:广场公园的一角裂开了一道大口,里面进进出出挤满了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他们用水泥和黑色钢质弹簧在慢慢填着那口子,这是修地铁延伸线用的材料。但在这破坏场面的上面,苍翠的大树下广场喷泉依然喷涌如旧,或水珠四溅,或涔涔渗出。喷泉的周围有许多圣诞老人,他们坐在套着木制驯鹿的纸板雪橇上,腿上抱着汗津津的孩子。高大多瘤的胡椒树上结了许多豆荚,像挂着许多黑檀木的耳环。伴着得克萨斯—墨西哥式的节奏,响起了“红鼻子小鹿啊,鲁道夫——”的歌声,真是躲也躲不掉——我连拥带挤地绕了出来。

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旁边,稠密的人群围着一小块地方:两个

①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内著名建筑。

马普切^①的老奶奶正静静地敲着一面手鼓，无休无止的节奏就像时钟一般。她们的标语牌裹在块久经风雨的塑料布里，上面写着“还我们的土地”。1541年，她们的祖先差一点消灭了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②的军队，差一点摧毁了他选址建起的、有这么多西班牙广场的城市。但就像乔治说的，对于西半球的欧洲人来说，“差一点”是永远不行的，不能“差一点”消灭。甚至有时“全部”消灭都阻挡不了他们无可避免地卷土重来。

他告诉我，没什么什么是永久的，甚至时间也不会。

接着，我找到了一处让人感慨的静谧。圆拱形的大都会教堂如同巨大的岩洞，它建在被成为“圣地亚哥的新终点”的地方，这是块曾剧烈震动、曾让人动摇信仰的土地，而在1745年^③，这个名字还在用着。这里远离圣地亚哥·孔珀斯特拉^④那块西班牙的朝圣地，因此你必须穿越火地岛四周险恶的海洋，穿过地震频繁的地方；要惊恐地活在上帝无常的战栗和无底的愤怒中。

不管怎么说，1995年圣诞节前一天的下午，地板并没有突然断裂，高大的柱子也没有倾斜或崩坍。我只听到了一个婴儿的笑声，轻盈得就如同是一串散落的珠子，珠子四散在这近于黑暗的世界，而我已经搜寻到了它的尽头；我开始感到害怕了，无助的恐惧。也许我的确是走得太远了。沿着教堂交叉通道的前

①“马普切（Mapuche）”是发源于智利南部一个古老文明，其名称中“Mapu”为“土地”之意，而“che”意指人民。

②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1498～1544）：西班牙征服者，于1541年率领西班牙军队到达智利，并在目前圣地亚哥的位置开始建城。

③智利因其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而属于地震频发国家。此处所提到的大都会教堂曾在历史上多次毁于地震，现存的建筑始建于1745年。

④“圣地亚哥”一名源自为纪念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所起，全世界有多座城市均名为“圣地亚哥”。此处的“圣地亚哥·孔珀斯特拉”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孔珀斯特拉（compostela）”的拉丁文原意是“繁星照耀之地”。传说在中世纪时，此处的人们在一缕星光指引下找到了雅各的尸体。千年以来，此地成为了天主教朝圣的三大圣地之一。





方,瓷制的圣母玛利亚塑像在闪烁着,她洁白无暇的面容被金色的十字架衬托着,她怀中的耶稣即将加冕,长得跟母亲很像,眯着眼睛,撅着嘴唇,长发卷曲,锦缎的长袍盖到了脚上。他们头上有一道长长的横幅:

“玛利亚,我们慈父上帝最甜美、最钟爱的女儿”^①

是的,玛利亚,玛利亚,最甜美、最受上帝钟爱的女儿——你母亲的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是否因为这个,我们就成了女儿、成了姐妹?——祈祷吧,请祈祷吧,别停下来,请你和你怀中无瑕的婴儿都为我祈祷,他在这傍晚的微光中看起来更像是个女孩,她纤细的右手食指永远都会指向天堂。哦,为我祈祷吧,为至今为止我一无所知的事,也为我尚未坦陈但确实需要的事。

在点有7根金烛的金色圣坛右边,彩灯在前方闪烁着,勾勒出一个呵护着那婴儿的巨大屋顶。驴子、骆驼、人群和静穆的羊群都比实际的要大,电子的彩灯忽明忽暗,就像记忆中埃德蒙顿的11月一样。然而,在这里惟一可当做白雪的是棉花,马槽里还是空的,只有等候着圣婴降临的干草。今晚的弥撒中,一个石膏或塑料的婴儿将降生在那儿,并寄放于那儿。

突然,在洞穴般教堂的中殿和侧廊上,扩音器尖声响了起来,声音又低了下去,传出的是伍利兹^②管风琴奏出的“耶稣是人类欲望之欢乐”的乐曲声。人类的欲望,的确。不绝于耳的巴赫^③音乐伴我挤过十字架下一个个的祭坛和一幅幅的受难图。在边上一个祭坛下,一幅“古代圣马克利姆殉道者”的画罩在玻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

②美国一家著名的乐器、电唱机生产厂家。

③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家,曾创作有大量宗教题材的乐曲。

璃下,画中人赤裸的双腿呈棕色,就像抛光了的木头,半裸的躯干扭曲得像被吊着一般。另一个祭坛是献给“洛斯安德斯的圣女特蕾莎^①,1900-1920”的,她如同得了厌食症一般的面孔被祝福过了——是钉在墙上的那封信里说的——在1993年3月24日,是被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巴赫乐曲中的金属敲击声此起彼伏,不屈不挠地宣告着,即使是别人都没得救,耶稣的鲜血至少救了他,让他获得了自由,永远的自由!

走过阿万尼达·奥希金斯大街,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制作精美的铁艺制品,那些都是仿制的中央火车站模型,是古斯塔夫·埃菲尔^②的作品。25分钟之内,我就回到了今天早晨到达的地方:中央机场。我指着地图第一页那个印得最大的地名。“那是伊基克^③!”那女人大声说道。我背着背包,不用出示护照。飞机飞在了太平洋上落日的余晖中,鲜红的光芒渐渐往澳大利亚的上空散去,而我们牢牢地系在飞机的座位上,正在朝北方飞去。我仔细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伊基克仅位于南纬20度^④偏北的地方。飞近以后,我注视着下方荒凉阴郁的山脉,下面有黑色的巨岩和金字塔,闪着金光的河流蜿蜒如织,这景色足以让任何一个贪婪的西班牙人心醉神迷。突然,落日的余晖切进了起伏不定的层层波涛中,一切好像凝住了一般,但我知道,波涛正在猛烈地撞击着海岸。大海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却绝无尽头。从这里的天空坠落下去,去摔个粉身碎骨,在火山过后的沙滩上,去和爆发的余烬交融一处,难于辨别,就像乔治所祝福的诗人巴勃

①原名朱安妮娜·费尔南德斯·索勒,1900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1920年在进入修道院一年后去世。1993年3月被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封为圣女。

②古斯塔夫·亚历山大·埃菲尔(1832~1923);法国工程师,闻名世界的埃菲尔铁塔设计者。

③智利北部城市名。

④伊基克位于南纬20度12分,西经70度8分。





鲁·聂鲁达^①在《我会回来的》诗中写下的那样：

后来，当我不在尘世，
看这儿，到这儿来看我，
在巨石与海洋之间。

多么幸运。

“Wohl mir! Jesu Christi Wunden”^②——智利的红色火山灰让我脑海间的歌暂时停了下来；然而，它却无法抹去我的记忆。妈妈，妈妈，我太清楚了，有两首完全不同的诗可以和谐地配在巴赫的曲子上，因为是你告诉我的，你真是一个懂伴奏的文学教授。你曾非常清楚地解释过，说那首古老的诗是“Jesu, meiner Seelen Wonne”^③，这是连绵不绝的冥想，是灵魂神圣的狂喜，是耶稣在瞬间赐予的，但却可以经久而不忘。但另外一首，虽然也用同样的旋律，也可以配得很和谐，却总有铁链束缚和无法抚平伤口的感觉。你说过，“用英语歌唱的时候，人们多唱灵魂在狂喜中穿过永生的光；但用德语歌唱的时候，却总和血淋淋的罪相连。明白吗，它们之间惟一的不同就是调门的高低。喜悦的 G 调代表‘耶稣，欢乐’，而这个却是阴郁的 F 调。”

然后，你坐到钢琴前面，俯身看着我，把那最后几行的旋律重新演绎得如此忧郁：

罪恶的孽债，我灵魂的恐惧，
让我如同死—死—人般活着。

①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②德文，意思是“于我有益，耶稣的伤”。

③德文，意思是“耶稣，我的灵魂有福了”。

妈妈,为什么要让我明白这些?光这音乐就够了!

我左胳膊肘放在机窗上,西边是灰暗的天空和漆黑的海洋。除了在东方,没有留下什么了;也许就在那个方向,穿过那片狭长的大陆,再越过远处的海洋,最后能到非洲吗?如果不断地向东飞只会让我回到西边,那怎么会有终点呢?飞机的起落架在南回归线上滑行起来,到了安托法加斯塔^①城外的“棕色山丘机场”。在机场上最高的建筑下,我离开了等待登机的队伍,向左转躲进了黑暗中,我在等着。最后,飞机又轰鸣起来,飞向了北边的伊基克。如果有人追查我的机票,他会知道我已经降落了。但没人会查它。

寂静。感谢上帝,那群群在夜幕中的白色昆虫我都不认识。我可以抬头寻找星星。天上的星星我都辨别不出,连我觉得应该在那儿的南十字星座我都没找见,好像是我从没仰望过夜空似的。正是圣诞前夜。或许我还挺幸运。

第二天早上,我的《孤独星球之个人旅行生存须知》还能用得上:

在智利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女人单独旅行会引起好奇。你得回答许多问题,诸如你是否是从父母或是丈夫身边跑出来的,当然这都是出自他们的关心。对于斯堪的纳维亚^②的女性(或是看上去像斯堪的纳维亚的女性),她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智利男人会觉得她们对性会很随便,也会把她们与色情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我看上去像斯堪的纳维亚女人,但昨晚一整夜,在安托法加斯塔我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没遇上那种智利男人(他

①安托法加斯塔为智利北部太平洋沿岸一城市名。

②北欧地区名,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等地的泛称。





们可能“非常沙文主义，但很少在公众场合对妇女动粗”），那种能让我用还记得的西班牙语去“激烈反抗”，去让他们蒙羞的男人。也许在圣诞午夜的弥撒之后，他们现在都在睡觉。要么就是喝醉了。也没有一个人，甚至就连科隆街上最婆婆妈妈的女房东也没问我是不是自己跑出来的。她那十几岁的女儿已够她喊叫的了。

圣诞节清晨，空荡荡的汽车向东北方出发了。汽车吃力地爬行在 200 公里长的山路上，慢慢开进了阿塔卡马沙漠的阳光里。我们在跟随着一条狭窄的铁路行进。从司机肩膀上看过去，前方的公路就像是一条黑色的柏油带，弯弯曲曲地绕在一幅由灰色、褐色和红色山脊组成的巨大抽象画里，一直延伸到绝壁、高原和山脉中。它穿过用沉重的土砖和岩石砌成的集镇，集镇在风沙侵蚀下已没了屋顶，风在稀疏的阳光下悲泣着。最后的城市卡拉马^①被逼得往山坡上一点点地移动着，而在山脚下，那里巨大的洞穴是地球上最大的；即使在圣诞节，铜灰依然从这儿飘向东边的天上，绚烂得如同天国里无法企及的云朵一般。从尘土飞扬的卡拉马上面的公路看去，安第斯山脉流下的里奥河把城市灌溉成了绿色。司机侧着脸告诉我，直到 1973 年，这里长达 400 年的干旱才结束，然而干旱很快又会卷土重来了。

1973 年。“他们会让你听到尖叫声，”乔治告诉我。“从运动场的座位底下，特别是晚上。你不得不呼吸这种恐怖的空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教得真好：折磨首先应该从心里开始。”阿塔卡马是片完全的沙漠，没有下雨的云，一根绿色的枝条都看不到。尽管有人说，只要有点儿晨露就能让灰色的枝干立刻开花，但也只可能几年里在什么地方有那么一两次。在安第斯山脉绵延的山脊上，利坎卡布尔火山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海拔 6000 米

①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地区的重要城市，以铜矿而闻名。

的火山锥顶白雪皑皑。在第一片也是最后一片绿洲上，绿树庇护着圣佩罗德·阿塔卡马村。汽车停在泥砖砌成的博物馆后面，博物馆的土瓮中放着一具具蜷曲的骸骨，绷着皮的膝盖紧紧顶着他们绷着皮的胸骨。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亲人在找他们呢？他们还记得谁？在征服者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的土屋和刷成白色的圣佩德罗教堂之间，生长着与兵器广场上一样的巨大牧豆树和胡椒树，圣佩德罗教堂深色波浪状的牧豆树椽子上盖着浅色仙人掌的木条。

圣诞酷热稍稍凉快一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手挽着手地在街上散步。酒吧里都响起了得克萨斯—墨西哥式的音乐，街道角落里的狗互相亲昵地嗅着，有时还在围观之下迅速地媾合起来。只有狗、男人和小孩，没有匆匆忙忙的女人。我上了一辆去盐湖的小巴。气温是39摄氏度，无云的太阳下是42摄氏度，平坦的盐池里水约2厘米深。膝关节好像是长反了的火烈鸟走在水里，就像踩在透明的皮肤上，它们捕食时火红的身体和影子碰到一起，黑色的喙啄进水中，如同在向自己鞠躬一般。我跪在那儿，珊瑚礁状的盐池里凸凹不平，盐水在我棕色的膝盖下微微闪烁，白得让人睁不开眼，比雪还要白……上帝濯我，我将更白……他们说盐水非常接近人的血液，要比——是谁告诉我的？——我开始慢慢往回走，朝空无一人的巴士走去，边走边注视着空旷远处的火山，但我才是裸露的，胳膊和腿上的皮肤已经灼伤，脚踩下时地面影子里渗出了深色的盐水。我只能走快些。

“什么事都会发生，”乔治说，他的胸、腋窝和大腿内侧都有一圈圈坚硬的圆疤，像是被用参差不齐而又烧红了的螺栓固定后又拧紧过似的。“而且它会留在你心里，像一根刺，或是生锈了的钢。更糟的是，它永远不能愈合。”

“那么，该怎么办呢？”

“你问我？”





“有些东西人是无法决定的，不是吗？”

他对着我，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们的手臂和腿纠缠在一起。

“你和你加拿大式的‘决定’，”他说，“你得深入自己心里，把它砍掉。要么就用硬壳把它包住。”

“什么？”

“你留着它，但得把它锁好，裹住。”

“英语中的医学名称叫‘压缩密封’。”

“我的话更短，更有力。”

乔治是这样说的。但我只知道走，一直走，要离开。我穿过那片荒芜的沙漠，走过成排的绿树和纵横交错的灌溉水道，这些水道像用铅笔在沙漠上划出的印记。山羊在颜色略深的岩石间踏出了小径，岩石也堆成了城墙。我高高地站在曲折的圣佩德罗河谷上——这儿的每个名字都是惯于征服的彼得，每块坚硬的岩石都能钉上另一个耶稣——我站在一座小山上，周围都是石墙。在1540年，就在这儿，印加/阿塔卡马人对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率领的侵略者进行了最后的抗击。山下是一堵堵的土墙，村庄的屋顶在绿洲的林间隐约可见，平坦的沙漠一直延伸，最后融入了远处地平线上起伏的火山群。在月夜中如同圣坛一般。不，更深一些……像正站起身的祷告者。只要他们是。

我对母亲说。“对的，”我说，“就是一首写给身受重创、虽生犹死的门诺教徒的赞歌。”

“崔茜，崔茜，”她那时急切地说道，“这词不是门诺教徒写的，它是——”

“像部该死的好莱坞电影，”我打断了她的话，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明白了我应该知道的一切。“唱：‘活着的死人——门诺的夜晚’。”

明亮的月光下，徒劳无用的堡垒在我身旁的山上延伸开去，像一条厚重的深色印加织物。现在你就在这里；他们也在；他们

一定会征服你。该怎么办呢？

我母亲苏珊娜·莱昂斯·威伯手里正拿着一本书。我靠在她膝上，看着这本书慢慢在她指间打开：

燃起深情的生命之火；
沉溺在莫名的欢乐中。

我的记忆在蓝色的月光中也慢慢开启了。

晨光从孤寂的远山后面亮了起来。我只能往东北方向走，沿着狭窄的河谷往上，走到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的安第斯山脉间。黑脸的绵羊带着它们的羊羔出没在高高的剑草丛中，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里饮着水，旁边有几个牧羊人等着它们。有一个身穿黑裤的女子，一条很敏捷的黑褐色的狗，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在看着它们跨过那水流淙淙的岩石。一个小时后，我看到一个敞开的石羊圈，角落里堆着一些树瘤突起的枯枝，高原上还有一座不大的塔。空旷的原野上有一座土坯砖垒砌的教堂，红色的墙顶和我的头平行，圆拱形的门是从里面闩着的。白塔四角通透，里面悬着座钟。我俯身进到里面，拉动了绳子，单调的钟声沿着山谷响起，回音中带着微弱的铁的撞击声。不是佛教徒祷告时的那种绵延而浑圆的声音。又回来了。

崔茜·威伯。

我听到了我的名字。我等着。在肆虐的骄阳下，我仔细地绕过这个红色的小教堂。我的名字叫安，你听到了吗？我叫安·威尔逊。

一切静止。我背上背包，沿着曲折而难于辨识的小路爬上另一处高原。我爬得太快了，教堂渐渐变成了一个红白闪烁的亮点，除非我眯起眼有意地找寻，教堂就看不见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放慢脚步，为长途跋涉做好调整。最后，那个小教堂终于





完全消失了。我周围只剩下连绵起伏的沙漠和风蚀过后层叠的沙砾山，空旷得像一张揉搓过的纸。

天空。久经风化的悬崖峭壁在正午烈日的烤晒下热气逼人，这里有荒废的卡塔皮堡垒的围墙。印加人曾在这里筑造城墙，他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盯着这条山谷。他们对阿塔卡马人的征服与镇压，比起西班牙人后来对他们两者的压迫，也只稍逊一筹而已。在人类无休无止受难的历史中，恐惧的中心旁只有少许惬意，多得更多的是痛苦。狭窄的峭壁向下裂开，我顺着裂缝手脚并用地爬了下去。富含矿物的火山墙闪着微光，这儿有羽状的花纹长石，而在我身旁，还有一道岩石运动和水流冲刷形成的裂口。再往里，最里面，黑色的岩层倾斜在一起，阳光从罅隙里透射进来，照在一些奇怪的碎片上，不像石头，碎片是白色或褐色，还有点弯曲。

是骨头。一定是的。我扔下背包，靠近那道裂口，把脸伸到里头，缩着身子往里挤。我感到衬衫刮破了，一直撕到我的背后；胸罩的一根肩带也被钩住，我俯身向前蠕动时，它也挂断了。我继续缩着身子往前，头上的岩石越来越低，快夹住我的头了。我的手指几乎可以触到它们，细长的样子应该是腿骨，两端有关节突起。它们牢牢地安放在冲刷得如同水泥般坚硬的沙床上。阳光如同手指般透过碎裂的岩石直射下来，指着这里，看这儿，到这儿来找我——

我深吸一口气，弯身把头再贴得平一些，侧向一旁拱起了腰。直到我挤进最后的一厘米，我终于摸到它们了，而我也只能用眼角看见自己的手指。多结的纹理暴露了他们的年岁，骨头的表面就像一片树叶上的孔洞。我的左肩和胸部紧紧地贴在那儿，一块火山碎片滑下来掉进我的左耳里，但我伸出的左手仍然可以活动。如果我直视前方，直视黑暗深处的岩石闭合处，我便可以看见他的样子了，但现在那是在我视野的边缘。可我摸到

了那个边,那个细长而带有凹槽的人肋骨。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

《创世纪》,我父亲亚当说。甚至希伯来的双关语在英语中也能用。他的方脸庞和威伯家式的厚下巴会轻松起来,会掠过一丝惊奇的微笑。即便是瞬间的温柔,也足以迷倒很多人,就算只有那一刻,也可以变成永久。这是一个真正 DNA 基因的故事,我的骨就是你的骨。

我是你女儿。

你是的。所以,从科学方面来讲,和你母亲比起来,你骨头中有的更多的是我。而你也要比我更多的属于她。

我是的,永远都是,是你们两个人的女儿。

智利的土地似乎在轻轻地颤抖,最终将我紧紧地攫住,无法移动,无法呼吸。或者,至少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被坚硬的大地裹住了。不再有任何决定。





第 22 章

家园

1996 年，北艾尔伯塔 瓦斯卡赫坎

卡尔加里

要想进入树林，他们必须穿过擦肩的灌木、矮柳、唐棣、尖锐刮人的玫瑰丛，还有果实已在冬天冻干的野越橘。但是，磕磕绊绊地走过一会儿以后，灌木丛会豁然开朗，前方会有高大的白杨。它们没有杂枝的白色树干簇拥着两座灰色的建筑，在无休无止的西北风中，树干会向房子靠过身来。高大的白杨让天空变成了春天的绿色，像在房子上加了一个热带的树冠。

亚当又在想，它们怎么会在这里，这些大树？院子像清扫过的草原一样干净，鸡群在地上的草丛中啄食着。曾有一棵巨大的云杉树长在茅屋边，那是离花园北面防护带最近的一棵树。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上面会有成群的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现在云杉没有了。在云杉曾经生长的地域那边，还有最枝繁叶茂的一棵树，一棵黑杨树——他父亲把它们称作“黑糠树”，垃圾，树根吸干了每一滴水，总是最先被砍下，却总也没被拿到屋里去，因为那木头本身没热量，只能从烟筒里往外漏烧成黑灰的木浆——但它原来是长在那儿了，就在原来草顶谷仓的那片空地边儿上；树基将近一米。50 年了。

风在呼啸，尽管很高而且又触摸不到，但他却听得见风在掠

过。远远在他头顶之上，白杨摇曳着向东弯下，摆过去后又借着根部的力量挺回来。向上看去，他好像正站在高高的轮船上，巨大的桅杆歪斜了，而他在倾斜的甲板上得靠着什么才能勉强站直。蓝绿色的船帆迎风鼓起，他的身子晃晃悠悠，得用手扶住最近处一棵树桅来保持平衡。突然间，他感到大地在移动，恰如他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一样；他再次倚到白色的桅杆上，船正载着他，正在奔腾的海浪中前行。

“先生？”

回到地面，大地坚实地在他脚下。他从没乘帆船出游过。

“威伯先生？你没事吧？”

艾莉森站在他旁边；她是个高大健壮的女人，但她放在他肩上的手却像树叶一样轻。他转过身来，对着她的微笑：昨晚她和乔尔抵达埃德蒙顿以前，他还从没见过她。他又在想可能是乔尔有好运了，真走运了——不，不是运气。亚当的母亲曾说过，当她第一次透过产房窗户看到他时，他身子胖嘟嘟的，头发黑油油的，哭喊声大得隔着厚厚的玻璃都能听得见，这孩子是个有福的孩子。

“谢谢，谢谢，我很好——”亚当对着艾莉森的注视有些迟疑。“你不必称我‘先生’。”他再次告诉她。

“我知道……”

她耸耸肩，他俩一起笑了。他说：“我在感觉……摇曳的白杨，起风时你摸摸它们，你就能……好像能感觉到它们的声音。”

她伸出手来摸树，她用手掌和手指在倾听着。“玎玲玎玲？”她问，“沙拉沙拉？”

他跟着她的声音在她耳旁嘘道：“沙拉沙拉。”

他们把这声音拖长，和着头顶白杨的节奏，它们如云的树叶正在歌唱。





亚当向上指了指。“过世先人的声音。”

艾莉森盯着他，他轻轻地告诉她：“我没疯。对我来说，这样去想树叶和风声，能感到欣慰。”

她又笑了笑，但还不怎么确定。这时，乔尔吱吱嘎嘎地穿过了木房周围的灌木丛，他猫腰蹲在根掉落到下陷屋顶上的树杈下。“爸，这儿太荒了，”他说道。他用手摩挲着灰色的墙面。“又漂亮又干净的雪松，这么细致，像布的花纹一样。”

“从没刷过油漆，”亚当说，“艾尔伯塔的天气真温柔。”

乔尔拍着墙笑起来。“这房子可值不少钱，两层，水泥地基——可你从前总吹家里很穷！浪漫的谎言。”

“不是撒谎，这不是我们从前的房子。奥瑞斯特·洪迈纽克修的，我们搬走后，他为了退缴税买下了这块地，187块钱。”

艾莉森指着他们身旁黑色原木搭成的小屋问道：“你以前不住这里？”

“那儿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哦？”乔尔挪了4步到她身旁，破败的屋檐差点儿碰到他的额头。“天哪，我原来还以为这可能是鸡窝，要么是猪圈呢？”

“不，不是，是我们在北边温馨的小家。这么好的东西奥瑞斯特是永远都不会把它拆掉的，瞧，墙角安置得多干净？”

“锯得真整齐，”艾莉森说，手指摸着斧子砍过的痕迹。“但木头没有锯……这是什么？”

“用宽刃斧头修齐的。约翰能把木头的两面整得像线一样直。那墙已经立了65年了，看看，还是笔直的。”

“是约翰叔叔把这些木头全修平的？”

“16年了。”亚当轻轻拍着乔尔的肩膀。“现在他们再也不会那样弄了。”

“他们没必要那样。”乔尔弯下腰，看着比脚面略高的窗台。“窗户低得可以迈过去。”

“树可真大呀，”艾莉森说，“发生了什么？”

“那个大木房从没住过人，它当时还没完工。我们是46年5月离开的，那时奥瑞斯特开始砍云杉，开始锯木头建房子了——除了雪松，一切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他一拿到地契就开工了，可他儿子乔刚从战场回来，他就死了。是心脏病。”

在他们旁边，又高又窄、幽灵般的木框架被包围在白色的树干丛中，白杨树轻轻前后摇晃着，好像要挡住从没装上过窗户和门的黑色入口。亚当从艾莉森的眼中看到，她领略到了些什么；大概是恐惧。

他告诉她，“乔·洪迈纽克是为土地而战的，在诺曼底和荷兰战役中，他曾为了一英尺又一英尺的土地浴血奋战。他说他和战友们就是为了争夺土地才被杀的，而当他回来时，这片土地再也不是他父亲活着时候的那个模样了，或许对我们门诺教徒而言也是这样。土地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和食物，但对当兵的乔来说，土地却是占有了还是没占有的东西，成了买卖。你卖掉地上的东西，不管是谷物、树木还是牛羊，全都卖出去，就像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股票一样，用借来或抵押来的钱低价买入，而且多买，然后高价卖出，总要能赚钱谋利。他不想在这个离铁路13英里的林子里生活下去。他在博伊尔镇的一处峭壁上建造了自己的城堡，还有我们路过卢望德时看到的东芝工厂。6年前，他把木材厂卖给了他们，成千上百万，但他还有县里一半的地。”

艾莉森问：“那么你从他那儿把这儿买回来了？”

“是的。一小块，我家的那份，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他清理了每一寸土地来种庄稼——他对他拥有的土地都这样——他用推土机推倒了谷仓、小屋、树木，甚至连青苔沼泽也毁掉了，都一把火烧成了灰，但他没有烧了这片小树林，还有这些房子。”

“那么，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我们定了协议,我也永远不碰它们。”

“我不明白,”乔尔说,“为什么?”

“这是他父亲建造的最后一件东西,而我是惟一在这个地方出生的人。”

“一个真正的好小伙。”

“就像克里族人说的,‘血脉稠浓,流传长久’。”

乔尔大笑起来。“可不是在互联网上!”

亚当的脚踏在这片历经了半世纪沧桑的枯叶中,房顶很低,他可以用手掌摸到屋脊的檩子头。他的手指上沾满了灰尘。一转身,他领着艾莉森和乔尔转到了小木屋那儿,小木屋的框架是长原木搭成的。他走到了敞开的门口处,然后弯身钻了进去。旧屋的空间不过谷仓那么大,从房顶上垂下的许多长纸条就像破牛皮一样。没有地方落脚:地板不见了,散成碎片落在了地窖里。

“都是烂纸。”亚当对门口处两个迟疑的人说。“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用浆糊把包装纸、纸袋子、报纸都贴在了墙上和天花板上,想把风挡在外面。”

艾莉森嘟哝着:“也是室内装修。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还悬挂艺术品。”

“而且你还能读它!”亚当笑了。因为她在这里,他觉得有一股幸福的冲动。“看这个,《锡安通讯》^①,‘1938年,3月22日,星期三’——妈妈总是攒着《锡安通讯》,把它们全都糊上的时候,她肯定伤心死了。”

“真有意思。”

“当时可不是,我们只觉得冷。这中间的房子是他们最先盖的一间,在1930年秋天,5个人住在里面。海伦总是在外边干

^①创建于1884年的门诺教刊物。

活,后来她结婚了。做饭、活动、睡觉都在这儿。两年后,他们在对面墙上扒了一道门,又在两头各加了一间卧室。那一间是我们这些孩子睡觉的地方,玛格丽特躺在帘子后面的帆布小床上,窗帘挂在窗户的正中,我们就都能见到些傍晚的阳光了。约翰和我在这边的双人床上,我对着墙角,晚上不能看书,没灯。当阿贝^①或海伦回家时,他们就睡在玛格丽特的小床上,她要么在这儿搭个地铺,要么到那边爸妈的房间里去。”

艾莉森和乔尔到了房子的半当间,他们斜着身子绕过吊在那儿的破纸,伸脖子向黑暗的卧室里看着。他们胳膊紧紧挽在一起,离亚当也很近。看着他们生气勃勃的样子,看着他们走在了这个狭窄的空间里,进了他的第一个家,他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期盼。在这期待的气氛中,他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她在炸土豆,她在搓衣服,她在熨衣服,他在转着牛奶分离器,牛奶和奶油从不同的喷嘴里冒了出来,她在往炉膛里添木头的时候,火花向她的手上飞溅着。她像念谚语一样不断念叨着,“小时候在膝上玩耍的是你们,长大了让大人操心的还是你们”——有一些是,妈妈,是的,但不是每个都这样。这些长大成人了的孩子现在就在他身边,他明白了,他现在的感觉是满足;好像他终于能不再去考虑他是不是该拿主意了。

乔尔已经转过身,他在他身旁弯腰走过,在碎纸片中张望着。“玛格丽特躺在哪儿?她生病的时候?”

“在这间屋里。她的小床靠着那堵墙,餐桌就在中间。”

“天哪,简直太小了……”

“其实,对个经常得呆在病床上的人倒是很好。从不会感到孤独,这儿她总能跟家人在一起,不管有什么事总能和家人在一起。”

^①艾布拉姆的昵称,亚当的大哥。





“我的意思是……五六个人挤在这儿,15年?”

“在冬天挤着暖和,夏天你大多睡在外面,煮……”他儿子盯着他。“就像妈妈说的,我们总有许多东西吃,而且晚上也没有布尔什维克来砸门,连骑警都没有!”

沉默了一会,艾莉森几乎贴着他耳朵说道:“你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

“不是,”亚当说,他看到了右边墙中间一块乌黑的地方,越过他得不断添柴火的木柴箱和炉子,在角落里的脸盆架下面。他指了指,“在那儿。”那儿的地面已经拱起,下午逐渐西落的阳光从东面的窗子透进来,让那儿显得更黑了。他已经回来过4次,可却从没再进过那间屋子,也从没问过自己为什么;看到那儿的时候,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活着的人一起到了这个地方。这个门窗洞开的破屋里没有异味,长条的泥巴从木头间掉了下来:经历了50年,树木都已长成了,50年中无数个夜与昼,50年的雨雪风霜,厨房早已陷了下去,卧室却凸起来了,就好像是脚下的大地也要翻个身,也要在他们短暂的存在过后、在他瞬间的诞生之后睡得舒服一点儿。他的父母曾互相拥抱着躺在那张床上。

这里曾是他们的家。每次他回到这儿,他儿时家庭的记忆都会充满整个空间。这儿是玛格丽特的房间,她16岁就死了。但现在,她在她的小床上坐着,他正想把她纠缠在一起的长发理顺。

他大声说:“我们还是到外边去转转吧。从窗户那儿看卧室更清楚些。”

乔尔走在他身边,他说道:“奶奶从她兄弟那儿拿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就是他在俄国、戴着顶尖帽子的那张照片,当时他们也住在这儿吗?”

“是,他们在灌木丛里清出了几公顷地,靠砍下的树来建这

座最开始的小房子。那很好，奥伦堡可没有能拿来建东西的树，而这也没什么，只用于干活……”

“他的名字不是叫海因里希吗？”

亚当想都没想就说道：“我就叫过海因里希。”

“什么？”

他有点儿后悔自己说的话，但现在他得说下去。“大概8年。爸爸给我注册的一直都是这个名字，尽管我并不知情。”

乔尔有些更糊涂了，他问道：“你的名字是按那位叔叔起的吗？”

“我不知道。可能在我哭叫了8星期之后，爸爸觉得我肯定也会是个反叛的人。”

“什么意思？”

“总在顶着干，跟一切都顶着干，就是叫你做什么你偏不做什么。”

“噢，是吗，”乔尔说。“我明白了。”

“没事，”亚当说，“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别在艾莉森头一次来的时候就把她吓住了——不管怎么说，他们从没告诉过我有关我和那个名字的任何事。但在俄国，洛温家族的亲戚们已经有了更多他的消息。好像在1945年的时候，他是一名红军军官，后来他们攻克柏林时被狙击手打死了。你的叔伯爷爷海因里希是格恩里希·洛夫上校，苏联的战斗英雄。”

乔尔停了下来，艾莉森也停了下来；他们听到远处有一辆车正从穿过树林的砾石路上驶来。“真疯狂。”乔尔终于开口说道。“他们有没有确切消息，那个在萨哈林岛的兄弟出了什么事？”

“彼得·大卫·洛温，”亚当沉重地说道。他斜倚在久经风霜的墙上，那上面的纹理他还记得；如果没有树，春天的阳光会让那儿更暖和些。他一直在逃避，不想跟乔尔说伊丽莎白·卡特丽娜来的信，他尤其不愿意在这儿谈论他们……但是有些事





情必须说。他小心翼翼地说道：“他们都叫他洛温老师。他们说他很结实，有你这样宽阔的肩膀和浓密黝黑的头发，手劲很大，但是——格恩里希·洛夫去了那儿，去监狱里看他……带着一把刀……也可能从没出过那事。”

“巴拉圭的昂克尔·大卫说奶奶听说过的，”乔尔还在说着，“她曾很肯定地跟他说过……会是在撒谎吗？兄弟相残？门诺教徒杀门诺教徒？”

他的妈妈肯定说过那些低地德语，“Massa”（刀子），“speje”（刺伤）。但是，用来说发生在半个世界以外的事的词语——特别是低地德语中的词——这样的词语能改变、生长、歪曲、倾斜成为一种更残忍、更无情的折磨。跨越洲际的词语会传播，而在词语中你总能全都遇见他们，不管是活着或是死去的人都有。有时甚至能碰见你自己。

亚当缓慢地说道：“我不会觉得那是谎言。家族故事……名字……事实可能会稍稍变变，有时可能会对不上，但总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通常都是真事。”

“但谁杀的就是谁杀的。”

“可能海因里希根本就没带刀——但他是在元帅的制度下，是他杀了自己的兄弟。”

小汽车引起的轰隆声飘散在北边的公路上。路上原来总有两道车辙通向博伊尔，他会站在这儿，半躲在房子的角落这儿看着马车慢慢远去，看着只能拉犁的马在阳光下点头前行，看着轮子在石头路上不断地磕磕碰碰。在垒房的原木间，他摸到一条缝，里面还塞着填缝用的一块泥。他曾搅过泥巴，在泥坑里光着小脚踩着泥巴，还有玛格丽特，还有约翰，然后爸爸弄来好几捆麦秆……现在，他指间的这块泥碎成了粉末，飘走了。

他大声地说：“我父亲告诉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很能大叫。我想可能是在晚上哭闹。他给我取名叫海因里希，可能是因

为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像我叔叔那样,我是个反叛的人。”

“反叛,”乔尔重复着,好像在品味这个词。

“就是些不满意的人,总想找些‘不同’的人。”

艾莉森唱起来:“‘玛丽,玛丽,办事总拧,看你花园怎么种?’”

“正是这样,总拧着来。”

艾莉森说:“我母亲总是说,她早该叫我玛丽。”

“嘿!”乔尔假装慌张地说,“你从没跟我说过!”

在低矮的卧室窗户旁,他们笑了几声,他们听见车门关上的声音,在挡住了他们的灌木丛外面。他们直起身子听着。他们头顶上,清新的阳光在白色的大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

“亚当?你在那儿吗,亚当?”

亚当原来并不想在家里谈论他的叔叔。他和乔尔、艾莉森都想透过窗户缝看看那间黑暗矮小的木屋,那是母亲生他的地方;他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走走,穿过空旷的田野一起上山,到高地上让他们看看海狸筑的坝。

从脚下的田野望去,他想走上去的那条长长的山坡就在瓦斯卡赫坎的家园上,看上去就像奥伦堡的草原一样,在那里,他曾和小彼得、伊丽莎白·卡特丽娜一起散步、聊天,那是在他们驱车去奥伦堡城和灰楼的前一天。当时,她曾领着他们顺着阶梯来到山谷中,接着又走过架在流过欧亚两洲的乌拉尔河上的步行桥,带他们来到公园里的大树下,最后他们来到了死人沟。

他们站在那里,默默无语。亚当顺着一排排的桦树纪念林看着,发呆似地在里面走着,尽力不去想为埋葬尸体而扒开的土地,那不是整整齐齐并排摆着的尸体,像手在床上比划的那样^①;

^①参见小说第7章。





那是被炸裂的尸体，是成千上万互相堆积在一起、后仰着倒下了的尸体，是被一颗爆裂弹炸碎了的身体，那是完美的人体，就像他曾悉心照料过的身体一样，现在却横七竖八地倒在这深深的壕沟里；被残忍地撕裂了。这时，他看见了海狸咬断的树桩，就在他脚下。

深沟的边缘与乌拉尔河转弯处交汇，那儿的一棵树的树桩被咬了。不是桦树。亚当触摸着牙印，摸着扇面状的划痕，摸着中间木头断裂处的碎片。在河流转弯的地方，远方悬崖上矗立着奥伦堡城。不是桦树，是桤木的树桩，80年代时这些尸骨第一次被冲刷了出来。他已拍下了那条河，那条河的拐弯处，还有树桩。海狸不会啃桦树，但它们可能学会啃人骨头。他们一起站在乌拉尔河边的时候，他的兄弟小彼得告诉他们，天知道这些动物想在苏联活下去得做些什么。

但亚当回到埃德蒙顿以后，在他冲洗出来的照片上，他只看见了泥泞的河岸，只看见了河水和夏天时河对岸如墙般的树林。他的两个亲戚一个也不在上面，他记得最清的、被海狸啃剩的树桩也不见了。可能是东西太多了，先是那座房子里面的故事，然后是死过人的公园，然后是河水，然后是暴露的尸骨，然后又是白桦树，最后是他自己发现的海狸——那个树桩就在他照相机的取景器里面；对这一点他深信无疑，而且小彼得也在场，至少还有伊丽莎白·卡特丽娜的裙边，其他几张照片里都有他们。他照了一卷一卷的照片，却一卷更不如一卷。照相机没有拍到站在树桩边的他们，那是照不到。但是树桩还是在那里；如果他把画面向左稍微挪半寸就好了，你应该能看到啊，而且他们两个也站在旁边。他现在能做的一切就只能是回忆，而且要相信。

艾莉森说，她一生中从没看到过一张海狸的照片。那么请过来，他现在打算告诉她和乔尔，穿过田野、爬上家园后面的小山，那儿有它们沿着高地用堤坝围起的水塘。许多树木东倒西

歪地腐烂掉了,有太多的黑杨和正在变黑的白杨树桩,它们都倒在海狸经过的小路和挖出的深渠上,你看得见,也能摸得着。海狸筑坝把水堵住,保护自己的家园,它们能证明那儿的确是块高地。

他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些。那时的每年春天,山那边沼泽地的水只会向北流。但现在,海狸筑的坝已经把水拦住储存了起来,它们拦下的水变成了火袋溪,火袋溪向北流到了火袋湖里,然后是阿萨巴斯卡河,大奴隶湖,最后流到了波弗特海。在相反的方向上,一串淤塞的泥淖、小岛和长得多的南边堤坝让溪水浑浊地向南流去,流过沼泽地后,溪水汇入白地溪和北萨斯喀彻温河,最后流入了哈德逊湾。

他小时候也不会知道这些。当时,没他能读懂的地图来告诉他,跟他说他们的家园和连绵在东边的群山就是大陆分水岭的位置。现在,海狸已经揭示了这一切。他要在山上建起一座新的木屋子,他已经告诉了从埃德蒙顿驱车而来的乔尔和艾莉森。一座美丽的房子,宽敞又安全,房子要多得让人可以向各个方向眺望。房子前面还要有一个向东的阳台,让他们每天都能看到向南北两个方向流去的溪水。任何一滴雨水、任何一片雪花都可能分成两半,都可能汇入大陆另一边的海洋中。

他也会种上一行行的白桦树,就种在被乔·洪迈纽克用推土机推出的大片空地上,那儿原来有的是白杨、云杉和矮柳丛。要种上成排的树,就像是从乌拉尔河畔延伸过来的林荫道一般,在阳光明媚的假日,奥伦堡的人们会在那儿散步。小彼得说过,莫斯科那儿曾经来过命令,命令把河谷开辟成公园,公园要给那些忠诚的公民,因为在战争中是他们帮助打垮了法西斯,虽然德国军队从没靠近过奥伦堡。但是,那时河流竟冲出了堆堆的尸骨,人们发现自己脚下竟有那么多层叠在一起的被害者的尸骸,于是,他们又用高高的铁丝网把那儿围了起来,还在里面种上了





白桦树。在拍了张他觉得是海狸啃剩的树桩照片之后，亚当又转过身，背对着河流另拍了一张，这一张照片清楚地证实了他自己的记忆：小径穿过黑色铁丝网的缝隙，排排明亮的白桦一直伸向远处的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和小彼得，他们在斜射下来的阳光和几座纪念碑的映衬下显得很渺小，纪念碑是用河里灰色的圆石堆成的，然后用灰浆砌在了一起：

谨记在元帅镇反年代中被无辜枪杀的无名烈士

你们长眠于此

1937 ~ 1938

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每棵白桦树上都钉着一个褐色木牌，上面烫着用西里尔字母^①写的名字。整个下午，他们在树林中走得越来越远，小彼得把图曼诺夫、雷默、布劳德斯基的名字都音译了出来，最后是他的父亲：

威伯·佩特·杰考夫勒维奇

1880年6月20日 ~ 1937年8月15日

成千上万埋葬在树下的头颅都是被从后面打穿的。他们是从奥伦堡的监狱里给拖到这儿的，从欧洲跨入亚洲的桥上，他们可以看见那座监狱。小彼得一只手扶在桥的卷花铁栏杆上，这儿离他曾受折磨的灰楼很远，他只能用手指着那座监狱——高出树林的长房顶和数不清的小窗户——还有奥伦堡的其他建筑。那监狱他呆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格伯乌刚逼他家从莫斯科

①据认为是9世纪时由圣西里尔创制，系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的源头。

回到奥伦堡之后，而小彼得对亚当说“你父母都跑了”。小彼得那时还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孩子，但他毕竟是想逃跑的富农家长子。一个魁梧的囚犯照顾了他，那人是因为杀人被判了终身监禁。是他用粗壮多结的身体抱着他，温暖着他，让他睡得着了觉，保护他免受其他囚犯的伤害；他也从没伤害过他。小彼得说，没有他，他可能已经死了，那人肯定是个杀人犯，但也可能是个天使，谁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奇怪地让他们到了我们身边。小彼得说，他也曾看见这个囚犯一拳打碎了别人的脑袋，还曾一脚把另一个家伙的生殖器踢进了肚子里。在被扔进同一间囚室的刑事犯和政治犯之间，除了恐惧便再没有其他感觉了。在狭小的囚室里，只有12个人可以同时睡在床铺或地板上，另外15个必须站着挤在一起等着轮换，他们有人站着站着就能睡着，就能像被枪毙了般瘫倒在别人身上。小彼得说，那些无辜者的死者，那些曾经哭泣的死者，他们之所以被枪毙，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再也站不住了。曾记得他们的人把死者的名字都已写在、钉在了这里的白桦树上，他们凭着内心的信仰而坚信，白色树皮上刻写的正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

在高大的杨树下，在为家园的小木屋遮风蔽雨的杨树下，乔尔喊起来：“是妈妈！”他喊道：“妈！”接着，他朝那声音跑了过去。

亚当在快步跟上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苏珊娜从没来找过我……9年来一次也没有，只有一次是在莱斯布里奇的那个美好夜晚……他挤过灌木丛，走出树林，一边还为跟在身后的艾莉森挡住树枝。这时，他看见了他轿车旁的两个身影。苏珊娜，她旁边是一辆“仅此一辆的豪华”的银色宝马轿车，已经在那儿的乔尔突然斜靠在引擎罩上，他双臂抱住了自己宽大的身躯，弯下了身子，就好像被人重击了一下。





“苏珊娜！”亚当边跑边喊着。“怎么了？怎么了？”

她张着嘴也向他跑来，来迎接他，他听见了她的声音，还看到她的脸在闪闪发光，好像是在燃烧的火焰中向他说话。

崔茜。崔茜。他能想到的就只是她的名字，崔茜。

“是她，亚当，我知道她的声音！”

她要在晚上 10:45 分从达拉斯飞到卡尔加里。

“离这儿 425 公里——不，我们包架飞机，从埃德蒙顿市区出发，33 分钟的飞行我们就能——”

“还有 5 个小时，我们还得坐在那儿里等——”

乔尔抬起头。“我们大家的车都得在埃德蒙顿，为什么不拼命开车，谁管什么该死的票不票的——”

亚当跑去接苏珊娜的手机，喊道：“我会在卡尔加里机场等着！坐在那儿！就在那儿！”

亚当和苏珊娜一辆车，他们正在 63 号公路上向南开去，从后视镜可以看到，乔尔和艾莉森坐在他的丰田车里，一架里尔商务飞机已经在埃德蒙顿等他们了。排排防护林后广阔的农庄从他们身边呼啸着过去了。

你怎么能看到从死者那儿回来的人？

你会看见她穿过机场的双重安全门吗？

在旷野上，一座腐朽的屋子快塌了，不断伸展的铁轨也快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亚当看见自己拿着一把铁锹正在种白桦树，从空旷的小山上种到悬崖下面的小溪旁，再沿着沼泽北面的柳树丛转到了山顶上，然后又种下来，一直种到高地上海狸筑的坝旁边——海狸不会啃这些能造纸的桦树——。他种了成千上万株白桦树，他可不像在公社的昂克尔·雅各布那样，把树种成一排一排的，他要绕着圈种。他要把知道的每个祖先的名字都烧制在木牌上，要买一卡车的雪松木料，要用所有语言里的每一

个字母,这样,无论他们到底是生是死,他们的名字都能被人读懂。要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希提语^①、马雅语^②、印加语^③、伊特鲁里亚语^④,还要用其他每种死者知道的文字,要让这些名字一圈圈地刻在树上,就像一只滚动的铁环一样永无终结。

苏珊娜说她还在“美航”^⑤的班机上,正高速飞往卡尔加里。

他大声地说:“真让我无法相信。”

苏珊娜说:“你跟乔尔说萨哈林岛上的叔叔了吗?”

亚当结结巴巴地说:“我告诉过……他关于他们……和我的名字,是的。”

她还是在问:“是海因里希和彼得?就像伊丽莎白·卡特丽娜发现的那样?”

“不全是,故事中的有些部分也可能不是真的。”

苏珊娜生气地大叫起来;如果不是她在开车,她可能会来敲他的脑袋。“你答应过我的!去年夏天你答应过我,而且后来每次打电话时,你都说你会把那些记录告诉他,跟他说彼得·洛温是在战后死在萨哈林岛的,是在海因里希葬在柏林的三年以后,你现在又发什么神经?你答应过的。”

“别那么激动,放——”

“你就没点儿长进吗?就不知道除你自己的之外,有些事对别人来说会多重要?”

“是很矛盾,可那些事实已经没意义了,他们说发生的一切并不——”

“只要把你知道的告诉乔尔就行。如果那对他重要,让他自

①希提人是公元前2000~1200年间居住在叙利亚北部及小亚细亚的古代部族。

②马雅人曾居住在墨西哥东南部、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等地,其文明在大约公元300年~900年发展到最高点。

③印加人为秘鲁高原上克丘亚部落的一支,在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

④曾存在于意大利中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名。

⑤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己去找他想知道的意义。”

“好的，好的，”亚当说，“好的。”

苏珊娜很快瞥了他一眼，又回过头看着公路上迎面而来又不断消失了的分道线。她开车慢得像在穿针眼。

国际旅客到达区那儿的玻璃与水泥的建筑中，两层的双重安全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大厅里反复播放着一遍遍的广播找人，但显然没有谁愿意拿起那些正在等待着回应的话筒。在卡尔加里国际机场到达区隔离线的右边，有5个人围成的一个圈。

假如面部朝外，他们会像北极地区的麋牛，把幼犊围在当中，抵抗残忍的敌手，可是这些人只是面朝着他们自己：慢慢地低下头，越靠越近，专心于这围起的慢慢收紧的圆圈，脚并着，头低着，身体围成圆圈。这可能是一家子：母亲、儿子、父亲、一个儿媳或女婿、一个或两个女儿。在机场一块块回荡着声音的厚玻璃之间，有层膜一样的宁静笼罩着他们；他们好像都在凝望着彼此的眼睛，在同一个恒久瞬间，他们又在找寻着他们自己。他们的手臂在触摸着，越过紧挨着的这个又伸向了另一个。要触摸每个人身上的每块骨头，要最终感悟他们的心跳正在见证彼此永不磨灭的爱。

第 23 章

天使之梯

1652 年,但泽 艾因拉吉

从我们出生之时起,衰老就带着我们一步步地接近死亡。现在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我双膝跪在这柔软的黑色土地上,把芜菁一棵棵地拔起。老人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感觉从指间滑落大地的尘土。毕竟,我的名字叫亚当。

土地是这样甜蜜,你可以把土放进口中品尝,你会发现它的好。

在但泽这座城市要塞里,我已经当了 35 年的总建筑师。但是像所有的门诺教徒一样,用石头严严实实砌起的城里是不让我们家住的。这挺幸运。我们村一排排房子在纽格登,在毕晓普斯山和哈格尔山之间的荫庇处,我们有又深又厚的黑土可以开菜园。尽管每支包围但泽的军队都要把纽格登焚为平地,那时我们都得拿点东西就逃到城墙里面,可我妻子安娜和我却都想得一样:有这么一个菜园也值了。烧毁的房屋可以重建,但鹅卵石间却怎么也长不出花儿来。尽管因为我为这座城市工作过,所以这城市请我在瓦根城门之内为我的家人建了三所房屋,我们也从没在里面住过。1637 年时,经皇家允许,我们的儿子亚伯拉罕和雅各布去了对面的埃尔宾市,去在诺加特河的滩涂上筑

389

第 23 章 天使之梯





坝排水。过去的15年里,我们一直是但泽和埃尔宾的工程师,而人们也说是威伯一家在艾因拉吉筑堤、挖渠、排水。和其他门诺教家庭一起,我们修了一排排的村舍,在山丘建了分散的农场,就像很久以前我们在弗里斯兰做的一样。这里曾经遭过很大的洪水,但现在,对岸埃尔宾市的圣尼古拉斯和圣玛丽教堂的尖顶已经藏在了艾因拉吉的果树园和河堤防护林后面了。

说实话,我不只是在艾因拉吉住过。但泽城还准许我在佩斯瓦克买地建房,那个村子能俯瞰到但泽湾中大大小小的沙丘。可我妻子安娜回家了,我只得到这儿与雅各布一家生活一段时间。我喜欢在菜园里拔那些圆润的芜菁,而孙儿们却跟我说,这些芜菁给奶牛吃再合适不过了。

我忍住没笑,我告诉他们说牛奶很好,这个自然,但是爽口清脆的芜菁可以让你的牙齿更坚固。我让他们看了看我的牙齿:整齐而且坚固,起码前面牙齿是这样,瞧!我可是一直都在吃菜园里的芜菁。但是,雅各布最小的女儿小特丽安却不相信我的话。她灵巧的小手指在我嘴里使劲摸着。

“爷爷!”她大叫起来。“你的后牙都没了,它们到哪儿去了?”

我凑到她耳朵边儿,小声跟她说牙齿就像头发,老头子不像小姑娘需要那么多好看起来漂亮,这时,她眨也不眨的眼睛里露出了信服的神情。她就快10岁了,看着她倾听时的样子,我要向最亲爱的上帝祈求,祈求她能长命百岁;她会长成一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啊。

在三角洲上丰饶的菜园里,我弓腰跪着,我觉到了小特丽安的手指在捋着我的胡子边。“为什么你总要种芜菁啊?”她问我,“除了你,没人喜欢它们。”

我的安娜,愿上帝赐给她安宁,她要是听到了这些话一定会和我一起笑起来;安娜也不怎么喜欢做芜菁。她总是说,生活就

是我们满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去享受的一场盛宴，而我们自己已经享受了这么多，所以，把生活形容成一种“不断地失去”是在从错误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说对啊，仁慈的上帝是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但什么是错误的角度呢？焚毁的村庄可以轻易地再建起来，可被杀的孩子却不能重生了。

你怎么知道不能？

同样，他们遭受痛苦和死亡的记忆也不能被抹去。

是的，安娜接着说，这或许比重生更困难。

小特丽安轻轻地碰了碰我：“爷爷，为什么啊？”

“为什么……什么啊？”

“芜菁呀。”她现在还小，还能忍受上了年纪的我。“我问你两次了。”

我把她拉过来，她暖暖的小脸对着我；我亲她的时候，她开心地咕哝着。门诺教徒里的祖父们，特别是有点儿名望的总要表现得睿智、威严；他们甚至不能亲吻自己的孙儿们——除非是躲在树后的菜园里。

我把最后一个干净的芜菁放在我的“小金字塔”上。“来，我们把它们留在这儿吧，这些老东西，在弗里斯兰你奶奶的奶奶就吃过芜菁。”我扶着她强壮的小肩膀站起来。“我们会找点不同的东西，给你找点甜的吃。”

“好啊，好啊！”她喊着，随着轻快的调子，她的小手抓紧了我的手。“土豆，噢，噢，土豆！”

哦，凝结的往事在老人的回忆中点点滴滴下，就像在他踏着犁过的地向前走时，他的孙女在他身边轻快地跳跃一样。普鲁士的低地德语把土豆叫做“eadsbock”，一个新词，是和上个世纪我们带过来的许多荷兰方言之间妥协的结果，正是这个词的发音让我们记起了在荷兰时那些无休止的纷争。我觉得这个词也有“大地”或“六十”的意思，这倒也恰好能说明奇妙的根茎是如何





生长繁殖的，如何在肥沃的土壤中长成各种的样子。1628年简·阿德里安·利瓦特从荷兰给我带来了些小土豆，从那以后，我把它们种得是越来越大。

“这些是从新世界来的，”他说，“从高得让人难以相信的山上来的，但只要种到土里，它们就可以生长，就算瑞典的大炮摧毁了但泽所有运小麦的船，摧毁了但泽所有的粮仓，它们也能喂饱你。”

多年来，我一直在请他帮我重新设计一下这老掉牙的堡垒；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港口水道，应该扩建城墙把长园子^①也围进来，这样，下一次被人围困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的粮食了。在波兰的继位争夺战中，有点儿水上优势的舰队就会来不停地包围我们，再加上后来的“三十年战争”，我们哪有什么时间去重建堡垒，更别说扩大要塞了。但后来，简·阿德里安却突然来了，他的到来如同以往一样总是奇迹：1628年春季的那场大洪水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让他和他可怕的军队被迫放弃了对但泽的围攻。在那场大洪水过后，简·阿德里安带着他的小土豆，乘着第一艘荷兰船冒险驶到了这条河里。那年八月，简·阿德里安帮我设计了新的城墙，可以把下城和长园子围起的城墙。就在那时，我们听说了水手们中间的传闻，他们说斯德哥尔摩给古斯塔夫斯造了艘军舰，叫“瓦萨”号，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瓦萨”号载着双层的青铜大炮，可以把24磅重的炮弹打到一英里以外去，也就是说，不用驶到河里，它在海湾那儿就能夷平但泽。但是那时，正当成千上万的瑞典人聚集在河岸欢呼庆祝时，正当“瓦萨”号挂满了旗帜要从皇宫前驶过时，一阵刮起的侧风卷起了它巨大的船帆，再加上船上太多的武器也让它头重脚轻，于是船倾覆了，海水涌入了所有的炮眼中。就在他们的眼

^①旧城墙以外的可以耕种的土地。

前,就在斯德哥尔摩港最深的泊位处它沉没了。荣耀属于上帝。

简·阿德里安说:“如果古斯塔夫斯把‘瓦萨’号上的大炮运到了维斯图拉河口,但泽能撑多久?”

“但他没做到!刚一起风海水就吞没了他们。”

“四个月之内,”他说,“上帝救了但泽两次。”

当下起作用的是水和风。但作为但泽的主要建造者,我不得不考虑到战争的因素:对于任何征服者来说,我们独立的城市都是战略上宝贵的礼物。但泽固守于此,夹在两边有三条河流的三角区域之内,第三条边是西侧的群山,最高的是毕晓普斯山。除了能建造的围墙,我们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河里的水;当我们打开受控的堤防和水闸时,城两面的引桥下就会灌满水,这能让任何来犯的军队惊慌失措。对我们来说,最难抵御的当然是巨型大炮发射的强烈炮火。这样看来,我们西面的山峦虽然是防御火炮的最好屏障,但也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如果有个将军从西面进攻,并能强攻到山顶上的话,他就不仅在洪水之上,而且也会高过我们的围墙;城市就在他脚下了,他的炮弹能摧毁一切。

世界上不光只有暂时把我们从瑞典人手中救出的水和风,还有土和火。为了能从统治者们的连绵战争中求得一个安宁的庇护之所,我们得掌握这四样东西,组合地用它们。

再加上一条教训:四样东西中的三种没控制好,古斯塔夫斯二世就毁了自己,他是那个时代最虔诚的新教徒,也是最厉害的军阀。1632年11月,在与华伦斯坦^①率领的罗马天主教军队交战的吕西安战役中,傍晚时分,血腥的战场因为飘动的雾变得模糊不清,而冲动的瑞典国王或许失去自己的方向感了,他竟然纵马疾驰在了华伦斯坦的骑兵与瑞典步兵的战线之间,最终他被

^①阿尔布雷蒂·冯·华伦斯坦(1583~1634):奥地利军事首领,在30年战争(1618~1648)中为哈布斯堡王室作战。





自己手下枪法出众的滑膛枪手给打死了。

水、风和火组成了出人意料的致命组合。我和简·阿德里安都认为，只有土才可以拯救但泽。城堡厚厚的围墙是用挖城河时的泥土建造的，面上加了一层薄薄的石片，是用驳船从山上运来的。在强烈的炮火攻击下，石头会碎裂，但其下如堤坝状的斜面却几乎可以不受损坏，因为土会吸收炮弹的撞击力。我们的堡垒面对着三角洲和三条河流，堡垒的要塞从群山北端的圣体棱堡开始，15座棱堡排列成了巨大的弧线，之间有将近两英里长的14堵幕墙，一直到山脚下的格特鲁德棱堡——是个真正的堡垒。

让人头疼的是从格特鲁德棱堡回到圣体棱堡的那堵直墙。那堵墙直对的是俯瞰城市的西边群山，有大约一英里长。我们原来总依靠群山来保护我们，因此那堵墙造得相当矮，所以也十分危险。怎么去加固那堵墙呢？拉杜尼亚河河沿上都是松软的沼泽，几乎没有可用的泥土。毕晓普斯山上倒有足够的泥土，甚至还有可以用来造围墙的大石头。问题是如何把山上的泥土跨过沼泽和沟渠运到围墙这儿来。

市议员们对我说，我们一直都在搬运泥土。

是的，靠修路、修桥、修坡道，拉雪橇、拉手推车、拉独轮车，用肩拉，用背扛。

那么？

好吧。我得做决定。难道要一锹锹不停地挖土，难道要把每一杯、每一块土都背上几英里，难道要再像以色列子孙受埃及人奴役时那样搬运？自修建《创世纪》里荒漠中的金字塔以来，难道我们还没认识到，泥土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方，本身就可以移动！

简·阿德里安回家之后，船给我捎来了他的信。他给我讲航海的人们从霍伦港出发后无休止的旅程：阿德里安·布拉克

曾在“曼哈达”^①过过冬；威廉·斯楚恩是第一个绕过寒冷而又暴风肆虐的南美洲底端的人，他把南美洲的那个角用他家乡港口的名字命了名，叫“霍伦角”^②；彼得·米纽伊特跟当地的印第安人用价值12个荷兰盾的东西换来了“曼哈达”，他在那儿安置了24户荷兰家庭，其中有4家门诺教徒，他又给这个岛屿起了个新名字，叫“新阿姆斯特丹”。

简·阿德里安写道：“用这种欺骗的手段买到这个岛，还起了这么个名字，我看他们不可能在上面建一个人间天堂。”

我回信说：“那么说，我往东行还是对的。”

他回答道：“哦，可要是你当时往西行的话，或许能不让这事发生。我听说他们正在挖运河、建城墙，他们要防着印第安人，我想印第安人肯定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

我只能回答：“我们‘旧欧洲基督徒’的城墙和沟壕已经让我手忙脚乱了，我还能帮上他们去修防着‘新世界印第安人’的墙吗？”

他回信的语气似乎很伤感：“墙总归是墙，没多大作用，也少不了。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无论我们在哪儿，都要按基督徒的方式处世：关心别人、公平地对待别人，就像我们希望被人关心一样。”

跟荷兰人做买卖时谈耶稣的话是行不通的，他的话在面对瑞典大炮时也不管用。也没人敢去说。

“你是个出色的工程师”，简·阿德里安最后写道。“但是我还是觉得你逻辑性太强了。你曾叫我是‘在水下行走的人’，好吧，我不再光想水，我后来也去想水和空气的关系，逐渐我想出了潜水钟。为解决你那西边城墙的泥土问题，你也得想想别的事；或许该多想想火。”

①即现在美国的曼哈顿，此处为当时叫法，即印第安语“我们上当了”之意。

②当时名为“Cape Hoorn”，现根据英文“Cape Horn”通译为“合恩角”。





我试过,但是对我的问题来说,这两种东西并不像他那两种可以联系到一起。我面临的是运动中的关系,不是停滞的情况。我觉得,有用的火差不多都应该是静止的;如果火要是动起来的话,它很可能会爆炸,这就很危险,也很难控制。而另一方面,水总在运动,也比较容易控制。问题在于土。毕晓普斯山的山脚必须保持原样,这是保护我们的坚固支点;因此,修墙的土必须从山顶上取下来——如果山顶变低了,敌人架在那儿的大炮威力也会减低。在毕晓普斯山上修一条水道,用支架撑住,让水倾斜地流过山谷、沼泽、运河和壕沟,需要的土就可以接连不断地冲下来了。可是,第一,你怎么才能把水弄到干旱的大山顶上?第二个问题更难,土被冲下来之后怎么才能让水流回去?第三,解决问题的时间可能会太长了。这三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

是水,是水。流动时那么优美,透明的冰下淌过时声音又那么清脆。水因其重总往低处流;而毕晓普斯山又这么高,除了空气别无他物。我们没有鸟一样的羽毛,不能在空中停留,不能顺风飘流。鸟儿太轻不能驾驭,而人又太重,如果我们想去飞的话,结果只能是摔个粉身碎骨。我们最多能做的是修梯子,一步步爬上去,在空中停留片刻,然后再慢慢回到地上。把梯子靠在陡峭的山坡上,一队人拿着扁担和空桶爬上去,另一队人再扛着装满土的桶爬下来,就这样在梯子上不停地循环。这梯子如同雅各布在睡梦中见到的,那时他头枕在石头上睡着了。他梦见一架梯子,梯子的一头伸向天堂,天使们在梯子上上来下去,而上帝就站在他上面^①。一架梯子一头在地上,另一头向上伸往天堂的大门,而后又下来。天使们不停地上来下去。

天亮之前,我便站在了格特鲁德棱堡上,这是但泽南面的堡垒,曲折的城墙于此转向了北边。我在看着对面毕晓普斯山的

^①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28章。

峡谷。在《创世纪》里，雅各布从石头上醒来后说道：“上帝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在我看来，尽管我在这儿造了这么多建筑，尽管都过了26年，我也还不了解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这儿有什么。我也睡着了，但却睡得不大对劲——或许该向古时的石匠简·亚当·温思要一块石头，让我把头放上去歇一下的石头。

1642年11月13日。在我身后的地平线上，鲜艳的太阳升起了。时值早冬，太阳已向南移了好远，所以，当我站在格特鲁德棱堡上面，面对着毕晓普斯山时，但泽城西墙的影子一直遮到了山腰。城墙太低了，也太单薄了。

一只鸟落在了我身边，落在了城堡的矮护墙上。是只小鸟。在晨曦中，它在灰色石头的映衬下像星星一样闪着光。小鸟张开了翅膀，对这么小的身躯来说，这对翅膀显得太大了。然后，小鸟飞入了山谷的空气中，一个亮点渐渐在气流中升起，一直到了毕晓普斯山的山顶上。它飞起来就像一道划过山谷的光。

第二天我们收到消息，我儿子雅各布的妻子鲁斯在11月13日生了个女儿，是在艾因拉吉他们正在建的村子里。他们给她取名叫卡特丽娜，在低地德语里念做小特丽安。纯洁的意思。

我第一次抱起她时——她还睡着，一张小脸紧皱着——他们告诉我她出生在清晨，我回想起在毕晓普斯山上，太阳投下的光与影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太阳升起的一刻，大地上成水平的光向我展示了山与墙之间的高度差异，它让我能够精确地进行测算，就像我能测出这个完美的小鼻子的宽度一样。

我看见了。机器已经在那儿了，如同空中的一道光。我以前真是瞎了。

用绳子把山和墙连起来。就像鸟飞翔的线路，像被织手套的针不停拉着的羊毛线，那线球于是慢慢解开了。用一根结实的绳子，要像荷兰人在船上用的缆绳一样结实，那是他们从“新世界”带回的剑麻纤维中搓出的。用这绳子在山和墙之间绕一





个圈,把一个个空桶挂在上面,装满泥土的桶会因其较重而自动下滑,会跨过山谷沼泽落到城墙的上方,因为城墙总比山低,与此同时,其他空桶会沿着绕圈的绳子又回到山顶。人们只需在山上把空桶装满,再把泥土倒在墙上。这样,用挂在绳上的桶便可以把土不断地运来了。

我花了整一年时间才解决诸如绳子的尺寸、如何保持桶的平衡、桶与绳子如何连接,还有绳子与支撑柱等等的问题。一旦开始使用,这个空中的绳索运输链还工作得相当完美。全欧洲的人都听说了这件事,都纷纷前来观看,他们把它叫做亚当·威伯的“雅各布之梯”。他们惊叹地看着它,纷纷称赞我,还把这些都写在了报纸和书上,甚至还编了歌。

有天早上,工人们来这儿要开始干活的时候,我亲自坐到了第一个空桶里。就像装满了土一样,先是微微一颤,然后我便沿着毕晓普斯山的山边滑动了。一下子,我觉得自己跌落到了一片空旷当中,然后又是那么一下,我从阳光下跌落到了山谷间黎明前的微光中。桶稳稳地在支撑架间的绳索上起伏前行,我知道自己既不是小鸟,也不是天使。我只是个悬在空中、悬在光影里的人,正在靠近大地上的城市。我再一次迎着灿烂的日出越过了威伯城墙间的威伯棱堡(议会现在已经这样命名了),在工人们把我斜扶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开心地哭着。

我在用铲子把紫土豆从土里挖出来,小特丽安在捡着,她把土豆擦干净,把它们堆成一个个的小堆。像往常一样,她在不停地说着话,她小小的牙齿间吐出的字虽然有时还不清晰,却那么美。她跟我说着:“……这个更大,看!爷爷,你说耶稣有时会不会也挖土豆?”

“他们不挖……”但我停住了。看着她低着的头,还有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辫子,我说:“他们住的地方可能没土豆。”

“他们有的”,她很自信地说。“耶稣想挖到什么都可以,在

他……”

她的声音如歌声回荡着。菜园和果树林上的天空在薄雾中微微闪着光,如同一层透明的羊毛盖着我们;很安全。战争就要来了,波兰和瑞典之间 26 年的休战快要结束了——我想他们的国王是堂兄弟,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河对岸,我的儿子雅各布,也就是小特丽安的父亲在为瑞典人加固埃尔宾的城墙,他们在休战期把那里控制了 25 年;我女儿安娜和她丈夫亚伯拉罕·简森住在但泽,就在瓦根城门威伯城墙内我们的一处房子里,他们靠经营白兰地酒厂已经很富裕了。我的大儿子亚伯拉罕一直在为波兰的防御工程忙碌着,他们在建造但泽的第二条防线,要用高高的棱堡和幕墙把毕晓普斯山和哈格尔山以西的地方连接起来,他们在和苏格兰高地来的雇佣兵一起干活——如果他们能雇到更多雇佣兵,让他们露着瘦骨嶙峋的双腿、扛着令人生畏的刺刀——那但泽还可能可以保持独立,还能保持到瑞典人彻底把城墙摧毁为止。如果他们可能的话。其实,但泽周围大部分的村庄早已被夷为平地了。为了能有足够的碎砖在两山间的峡谷和陡坡上建起新城墙,亚伯拉罕已经拆 8 个村子,其中也有门诺教徒的纽格登和施托尔岑伯格。他正在用着“雅各布之梯”,靠马拉的轮子提供动力,把村里的石头和木材运到他们正在修的城墙顶上,那墙比我修的威伯城墙还要宽,因为瑞典大炮现在的威力比我们曾估计的要大得多。而且,现在他们进攻时已经不用可怕的长矛手了;有一种叫做“刺刀”的刀子现在装到了滑膛枪上,这取代了长矛手,也让每个滑膛枪手变成了一架具有双重功能的杀人机器:远的时候用子弹,面对面的时候用刺刀戳。

我在挖着。小特丽安跪在那儿捡着。她的小手和小嘴都没歇着。到 3 月底冬天的风暴和冰雪都过去的时候,我会回去住在我佩斯瓦克的小房子里,我会在沙丘上散步。《圣经》上说,春天是国王们出去打仗的季节。我会坐在高高的沙堆上,越过但泽





湾向北望，去看大海，看驶来的高大船只。新设计的瑞典战舰又要来了。或许上帝会怜悯但泽，或许波兰陆军和荷兰海军会把它们赶走。又会死很多人了。或许上帝会对我仁慈，我就不用在哪儿看着他们迎着风从海上过来了。还有那些可怕的旗帜。

小特丽安在我脚边叫道：“噢，噢，你挖破了一个。”

我是挖破了一个。挖成了两半，挖破的土豆露出白色的果肉，像黑色土地上闪烁的两枚珍稀硬币。

我挖得太久了，现在猛一直起身，头上有些晕，胃里也觉得恶心，如同久远欲望的热流，这感觉在我身上渐渐散开，我至今还能感到那种欲望。有时看到一个清晰的身影弯下腰时，我会很容易地忆起。天旋地转，一种想吐的感觉涌上我的嘴角；我倚着铲子慢慢弯下身，跪到了地上，我斜着脸看着小特丽安，她在把挖破的土豆扒出来，一股土豆和泥土的气息。

现在她是特丽安洁。到她长大出嫁的时候，她会是大特丽安。多年以后，如果上帝保佑她平安，如果上帝保佑她平安，如果上帝开心的话，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她就会是老特丽埃娜了。

“这儿。”我说，我们的手一起在土里挖着。我们一人挖到了一半，拿起它，像庆祝般地碰了一下。为了我们春天和秋天的欢乐。我把我的小手刀递给她，她笑了；她用左手从她那半个上削了一片下来，又从我的半个上削了一小片。然后，我们把各自的一片放入了彼此的口中。土里刚挖出的土豆，甜甜的，如同冬日的雪一般爽口，我们笑着，土豆片在我们口中融化了。

译后记

鲁迪·威伯曾以“墓石村落”(1964年)为题,描写了他们一家1933年刚从苏联移民加拿大北萨斯卡彻温省一处偏僻之地艰苦、孤寂的生活。在《天伦之爱》的开篇,读者或许又看到了这段描写的痕迹,只不过是换了个视角,从一个初到人世的孩童的眼睛和耳朵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角度去写的。2001年6月,译者之一的赵伐曾与作者共同主持过一次小说朗诵会。会上,作者绘声绘色地朗诵了他这部新作的开篇,那声音、那表情,似乎是想让今天的读者感受50多年前一个孩童面对那片广袤、陌生的加拿大沃土曾经有过的好奇、快乐、恐惧和无助。

但是,《天伦之爱》并非属于描写个人成长历程的“成长/教育小说”之列。鲁迪·威伯以自己惯有的驰骋时空、驾驭历史的创作风格,在《天伦之爱》中把主人公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感情历程融入一个家族几代人更加恢宏、悲惨的历史遭遇当中,描写了一群



在暴政、权力、偏见、歧视重压下的人们如何地逃避、迁徙、追求、抗争,并把这些历史人物的遭遇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贯串起来,在他追溯、重塑过去的努力中发现爱的真谛:爱之广博,足以消融一切隔阂、冷漠,足以海纳一切仇恨、残暴。

重塑过去的权力从来都不专属于史学家。在谈到诗(文学)与史哪一个更接近真相时,亚里士多德看好的却是诗人,他认为历史只能反映个别的真实,而诗(文学)却可以表现普遍的真实。这一段话,鲁迪·威伯无疑是知道的^①。亚里士多德话虽如此,但却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会天然地变得“更真实”,天然地超越了历史已有的记述。如何在文学作品中书写更真实的历史,威伯在新作《天伦之爱》中做了一番有益的尝试。

威伯笔下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历史教科书或是年鉴之类的史书,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不是从纪录事件的角度去写历史,而更多是从人的角度去写,去写历史中存在过的个人,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换句话说,他书就的历史,并不是单纯的时空概念上的事件的纪录,而是对人那种无论过了多少年多少代依然长存的精神的纪录。他所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真实,他在表现历史表象真实的同时,更多注重表现的是个体心灵的真实。为此,威伯大量采用了个人叙事的方式,从“面饼与酵母”和“夹舌钳”等章节门诺教先祖们对所受迫害的自诉,到“天使之梯”中亚当对于事业和生命的感悟,从“西伯利亚之行”中卡特丽娜眼中战争对人的戕害,到“罗曼诺夫第八村的群山”等章节中小彼得等的遭遇,无一不是鲜活的个人生活体验。而生活化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历史,就在于它是属于人的,因此也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西方当代有些作家不同的是,威伯笔下的个人叙事并不

^①在作家的短篇小说《声音从何而来?》中,他曾引用过亚氏的此番话。

是丧失了时间感后琐碎的个人呢喃。威伯深知,回溯历史,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无论种种后现代尝试是如何试图颠覆与解构,但是,绵延已久的话语运作是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瓦解掉的。毕竟,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还是一个线性框架内由“重大”历史事件排列而成的。这个道理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后的大事记即可明白。因此,如何突出历史中的人,把历史还给人,把历史还给事件中的人,同时让现代的读者体验历史的厚重,发见历史人物的生动,体察这个世界上时间留下的痕迹,也是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历史的抽象变为历史中生活的丰富与多样。为此,作者摒弃了整体性的“外视点”,以微观的“内视点”切进一个个的历史场景,以点写面,从数百年前的新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三十年战争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十月革命、肃反运动、二次世界大战、肯尼迪遇刺,一个个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贯穿起了具体的生存境遇,历史成了个人眼中零碎而不凌乱、破裂而无破绽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又信服地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作品书写历史的同时,还应看到,作品中的双重文本结构也是独具匠心的。很明显,小说是以主人公亚当·威伯的生活经历为主线,以他的婚恋纠葛,以他寻找失踪女儿、寻回失落亲情的流浪过程搭起了小说的架构,而贯穿其中的门诺教徒们世代的流浪生活使这部小说成为了一部厚重的家族史。隐喻式的结构以亚当在母亲看护下咿呀学语为始,以远祖——另一个亚当与孙女共享天伦的场景而终。在双重文本间的两种流浪之中,可能还隐藏着更深一层的寓意。在现世西方人心中,经历了启蒙话语的熏陶,经历了两次大战的血腥,上帝已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被放逐了。而上帝死去的同时,人的精神也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所在。因此,从亚当身上可以看出,在经历情感与精神危机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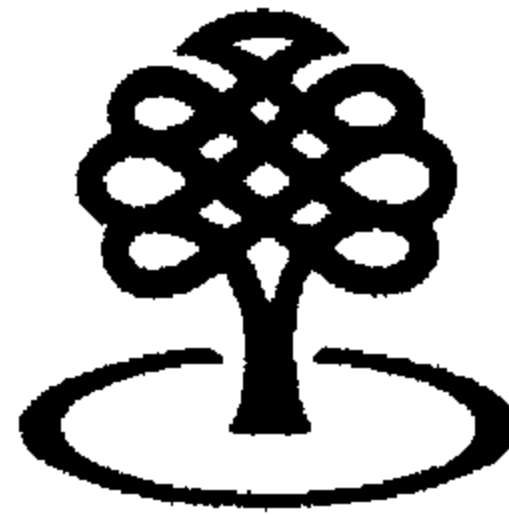


在怀疑自身存在的时候，走出神性笼罩下的个体只能到历史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流浪的情感只有在另一种流浪中才能停歇，只有在先辈的苦难与笃信中才能寻回失落的自我，寻得永恒的博爱。这样看来，主人公的找寻之旅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失落的亲人与情感，可能还有一层心灵自我探求的意味了。

纵观全书，最令人感动的或许还是他笔下的故事，那历史中的人的故事，那一群坚忍而执著的人的故事。他们的做法或许会被某些人看做是愚不可及，看做是不可理喻，但正因如此，更可显现人的平凡与伟大。500年痛苦但却充盈的生命迁延，500年流浪写就的虔诚，500年经久连绵的博爱，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事。

译者

2004年4月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Acknowledgements

The publisher and translators of this novel
would like to make their grateful acknowledgements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readership,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their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for its generous support and ardent commitment to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people.